香港大崩壊

林匡正

次文化堂

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3 1761 11789355 2

作者簡介

林匡正 筆名武大郎，一九八三年生於太平盛世的香港，愛中華文化，以中國人身份感高興，以振興社會為己任。曾讀於香港培正中學和英國波爾夫大學。著有：《八十後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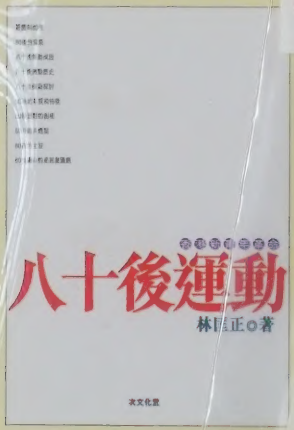
Presented by

盧瑋鑾教授

贈予

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University Library System

ULS



《八十後運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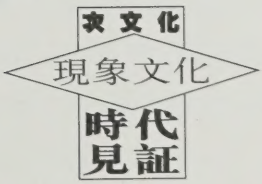
多倫多大學利銘澤典宬惠存
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 2020 年轉贈

CUHK Libraries
004717928

本書榮獲第四屆香港書
及該屆「我最喜愛年度好書」

次文化堂

次文化堂



RICHARD CHARLES LEE
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ies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Ontario Canada M5S 1A5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24 with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of Toronto

https://archive.org/details/31761117893552

次文化現象文化叢書

現象文化系列之八十一

香港大崩壞

林匡正⊙著

次文化堂出版

小恩老師：

多謝！

敬上

23-07-2011

——次文化現象文化系列㊽

香港大崩壞

作　　者：林匡正
社　　長：彭志銘
出版顧問：史亦書
執行編輯：李子翹
助理編輯：劉思航
封面設計：原秋白
出　　版：次文化有限公司
地　　址：九龍彌敦道612-618號
　　好望角大廈10樓1009室
網　　址：http://www.subculture.com.hk
電　　話：27805625
印　　刷：次文化堂
總 經 銷：次文化堂
出版日期：2011年7月初版
書　　號：SCB554
I S B N：978-962-992-277-1
定　　價：HK$118
©二〇一一年　版權為次文化有限公司所有，嚴禁作全部或局部翻印、複印、轉載或其他用途。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釘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代序

跨科際、跨世代的「誇張」力作

洪清田博士

香港學協會主席

林匡正繼《八十後——香港新青年革命》之後，《香港大崩壞》又是一本跨科際、跨世代的「誇張」力作。

所謂跨科際，是在「香港大崩壞」這總主題之下，作者幾乎觸及所有流行話題，從「社會民生、經濟、教育、政治、法治」這五大層面觸及香港面對的問題，再化成幾十個子題，緊扣香港的脈搏，描述和評析現實現象中的人、事、物、理，呈現一己觀點。

《香港大崩壞》示範「通識」的框架與跨度，把各層面、母題和子題的「人、事、物、理」三三倆倆組成「即用即棄」的框架和理論，展現各分科的獨特視角與它們之間可以的內在關係，突顯衝擊力。

所謂跨世代，是把今天「八十後」接駁上香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以至清末)的「文社」，指點江山，月旦時局時人時事。

二百年來中國遭逢「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一波又一波志士仁人前仆後繼，大多二、三十歲縱身歷史洪流，逆流搏鬥。洪秀全太平天國、孫中山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健將主力、全民抗日救國、毛澤東共產主義革命，以至台灣民主運動、內地六四運動，莫不「英雄出少年」。

六、七十年代開始的自發香港學生運動、社會運動和民主運動，由

面對英國到面對中國，星火也是源自戰後新生代的青春歲月。四、五十年來投身歷史逆流、冒險犯難的幾代人，由支流次文化變主流，佔據政經媒介的平台，如今漸次退役，久等的「八十後」迅速接棒。

香港社會重功利，計算即時實效，不如內地/大陸和台灣重視概念、理論和人文的自覺化，對本身對現實現象不知其所以然，甚而不知其然。香港的「文化意識和人文知識」幾乎是真空地帶。主要的香港研究是專上學院按國際命題和標準的專科分割、專業化研究，欠以「香港」為本位的總體大歷史觀、文化意識和人文論述，沒有對本身現實現象的昇華和理論建構。

林匡正一反三、四十年來專科分割、專業化的香港政經教育及媒介文風，環繞「香港」主體，回歸香港六、七十年代（以中國為本位）的大歷史觀，致力跨科縷述「香港、中國、世界」的全景，及時補了香港近年的一大空白。

所謂「誇張」，是按網絡文化而言「正常過正常」的《八十後——香港新青年革命》和《香港大崩壞》，在較「老餅」的「文字文化」中，「革命」和「大崩壞」恐怕都談不上。

一如中外千百年計歷史上的任何新生事物和新思潮，「八十後」在新舊座標、路向和內容交叉格鬥中，難免粗放空疏破碎，以至自相矛盾，但最重要的，是繼續議題和課題，提出新觀點，激發衝擊波，傳承人文精神。

《香港大崩壞》從現實現象出發，由下而上審視、檢驗及質疑、衝擊既成的專科分割、專業化的香港陳述、研究及假定，作者再親歷一次「人、社會、國家民族、世界、大自然」的互動互變關係。

自序

林匡正

天地有邪氣，雜然賦香江。下籠罩維港，上侵擾新界，於地曰霸權，沛乎李郭鄭。經濟當清夷，含貪狂加租；時窮惡乃見，秒秒賺到盡。

如今當覺醒，為下代發聲。六四維園燭，七一人民行。會內毓民蕉，會外長毛棺。為普選公投，為公義上街。

基層住板房，清茶粗菜飯。中產成樓奴，深夜抱妻哭。

或為老懵董，慷慨八萬五。或為黑面權，逆民意而行。腐氣所瀰漫，迂臭萬人憤。當其貫官僚，貧富溝日深。

奴才賴以主，地主賴以尊。中環實繫命，西環為之根。

經濟越發達，貧富越懸殊。跨代皆貧窮，輸在起跑線。

買樓望足秤，求之不可得。單身輪公屋，轉眼十二年。

貧富命運異，民勞富賈食。朝九晚十一，身心俱疲勞。如此再寒暑，妻離子女散。

哀哉十呎房，為我藏身居。公屋沒我份，居屋又停建。樓價月月升，租住唐六樓，被強拍逼遷，硬食假賠償。上街表不滿，政府斥暴徒，唯有書此文，以表吾心迹。

P.S.：書內的所有嘉賓訪問，受訪時因未有定案，未知書名叫《香港大崩壞》。所以鄭重聲明受訪者們不一定有香港崩壞之意。每位嘉賓皆是不同領域的權威，遂訪問他們對不同領域的意見和當中有何問題。

目　錄

代序——跨科際、跨世代的「誇張」力作（洪清田博士）

自序

甲、社會民生 3

第一章　政府思維 5

第二章　官商勾結 14

第三章　地產壟斷 27

第四章　利益輸送 34

第五章　仇富 42

第六章　拜金主義 47

第七章　官僚主義 50

第八章　政府欠缺長遠規劃 67

第九章　政府大花筒 71

第十章　獅子山下精神 73

第十一章　順民 76

第十二章　話語權爭奪 83

第十三章　貧富懸殊 96

第十四章　高地價政策 110

第十五章　置業 114
第十六章　打工仔之苦 132
第十七章　市區重建 139
第十八章　醫療事故 148
第十九章　環保 157
第二十章　社福 170
第二十一章　文化藝術 181
第二十二章　人口高齡化 188
第二十三章　出生率遞降 196
第二十四章　宗教霸權 202
乙、經濟 213
第一章　經濟單一化 215
第二章　政府缺乏長遠規劃 231
第三章　政府態度 236
第四章　監管制度 238
第五章　競爭力 239
第六章　金融 247
第七章　物流業 253
第八章　旅遊業 258
第九章　六大「優勢」產業 263
丙、教育 271
第一章　政府教育政策勢利 273
第二章　政府政策自製混亂 282

第三章　功課考試代表一切.....285
第四章　對窮人不公.....291
第五章　教育政治化.....297
第六章　通識教育.....300
第七章　國民教育.....303
丁、政治.....305
第一章　中央與香港.....307
第二章　政府權力困局.....317
第三章　政府態度.....319
第四章　政府諮詢和民意調查.....324
第五章　新聞自由.....334
戊、法治.....347
後記——愛

香港大崩壞

甲、社會民生

第一章　政府思維

政府施政思維

數十年來，從香港政府宣傳、推廣手法，可知政府視追求進步等同經濟增長；追求社會發展等同經濟持續增長，總之以GDP（1）定輸贏，這固之然和香港實行資本主義有關。此反映出港府一向視發展經濟、改善營商為首要任務，但這根本不一定使社會安定繁榮。政府把過多篇幅與心機放在GDP內，但GDP不包含社會公平、廉潔公義、空氣質素、食物安全、環境衞生、綠化環保、人文精神、快樂幸福指數在內，因此若過份偏向GDP，是難以發展一個全面多樣性的健康社會。

不患寡而患不均，當經濟增長所得的成果給少數人壟斷，出汗出力的大多數所分甚少，地主卻分得絕對多數，非多勞多得，那麼社會怎會安定？

不患貧而患不安，當社會沒有一個公平競爭環境，中小企營商環境惡劣；勞工無議價力、保障又不足、常被剝削，促成貧富懸殊；而政府只側重GDP，只顧把餅越做越大，漠視利益分配問題和其他社會公義、人文元素，那麼社會安會繁榮？可是在政府心中以五光十色的夜景，霓虹燈滿街等同繁榮，與真正的文明繁榮差距千里。

政府思維只懂搞好經濟，忽視其他社會因素，例如文化、保育、環

保、公義等等，即使經濟高速增長，也不代表社會健康發展（因忽視其他社會因素，沒足夠配套，令社會衍生其他問題），也不等於人民會快樂。GDP不能和好劃上等號，因GDP計算不到發展同時帶來的污染和破壞，也保證不到管治優越性、治安、社會和諧、教育水平。北歐四國(2)已告別經濟高速增長年代，對經濟增長是重質不重量；把精力集中於改善人民生活質素，包括環境生活、文化氣候、社會公平、可持續發展等，所以當地不論生活質素指數或人民快樂指數也名列前茅，由此可知GDP不能和好劃上等號。

香港雖然過了經濟的黃金增長期，但政府思維還十分守舊，沒有與時並進，只重GDP而忽略其他因素，使香港雖是世界排名第6的經濟發達地區(3)，但適宜居住排名只是71(4)。根據諮詢機構Mercer做的《2010年全球城市生活品質調查報告》，香港只排名70，而新加坡則是23。該調查的審核標準包括醫療服務、交通、衛生、環境質素等。

「80後」現象的出現正是要改變政府的思維，不想香港再被單一化經濟思維局限，而扼殺廣闊的發展空間，希望香港能朝多元方向發展，經濟、文明、快樂、公平等因素並存驅進。

大市場，小政府

政府幾乎每樣事都拉上「大市場，小政府」的口號，作為諸事撒手不管的藉口。「大市場，小政府」的確曾為香港帶來光輝，當香港還處於

經濟起步時，還沒摸清形勢的政府的確是干預越少越好。但隨着經濟發展成熟，社會進入另一個階段——經濟結滿果實的階段。經濟雖結滿果實，但不是每位付出過努力的市民也得到應得的成果，反而成果被某少數大財團壟斷了，令到政府需要在不同方面要有所干預，帶社會重回正軌，免社會走向分化，可惜政府並沒與時俱進，思維還停留於上世紀80年代階段。現在「大市場，小政府」只淪為一個口號，當政府為免麻煩、為免爭議而扔下一些應份去做的工作時，便狂呼「大市場，小政府」作藉口推搪。

近年政府不斷變賣公眾資產，包括「五隧一橋」、公共屋邨商場等，把公眾資產私有化，美其名是改善管理，實際是撒手不管，減輕負擔。事實證明，效果適得其反。東西隧問題上，政府束手無策；領匯上市更令眾多百姓受罪；2010年7月九巴在賺得13億的情況下，竟申請加價8.6%，完全無視可加可減機制的5%上限。這些私營機構營運公共事業，掌控公共利益命脈，但政府批出專營權時，沒有保留監察權，此乃把公共利益責任推給私企，然後置諸不理。但香港人的福祉卻是託付在這個又懶又推卸責任的政府手上。要真正做到民心我心，政府需改變懶惰思維，應份做的事不能假手他人，應參與的便參與，不能再把政府和市場過份簡單地二分對立起來；反之要積極注視兩者當中很大的合作空間與機遇，埋沒任何一方皆會令視野狹隘，不利民生經濟。

政府政策限制新的競爭力量，促成大財團、小政府管治大聯盟

企業為了賺取更多純利，要不斷改善生產、不斷省減成本、改善服務的質與量，才會成功。過程中，消費者在產品和服務質素提高下，乃得益者。要促進企業改善產品和服務素質與調整價格到合理水平，先決條件是市場有足夠競爭。可是政府在某些市場，尤其是地產市場，推行很多干預政策去減低市場的競爭能量，令原本佔有市場較大比例的企業成為既得利益者。

政府每年賣地定了上限，令土地成為無價寶，誰有土地便可掌控大部份資源；又用配額制度去限制競爭，政府只會拍賣大型地皮，讓資本較少的中小地產商無法競投；用發牌制度去限制競爭，這樣便造就了原本強勢的少數大地產商在土地資源上不用面對新的競爭，因新的競爭者在政府的政策限制下，根本難以進入市場。而原有的大地產商就是政府干預競爭政策下的最大得益者。

政府用發牌機制、配額機制、專營權制及一些所謂監管措施，去維護大企業在某些行業的壟斷地位，讓它們享有既得利益，不用面對新的競爭者。有時很多行業出現壟斷，除了自由市場因素，也因政府在市場設下無限關卡去刁難新的競爭者，令舊有營業者不用面對新的威脅。電力市場是上佳例子，政府不肯開放電力市場，只是按地區劃分給兩大電力公司，令兩電不用面對競爭，市民飽受貴電費之苦。

房屋方面，樓價普遍昂貴，是因政府賣地配額制和不肯小型賣地令

地產商不用面對新競爭者。房屋供應量由地產商決定，造成它們賺到盡的機會。而政府不肯開放公屋市場，單位全由政府分配，市民不能任意互換公屋或彼此買賣，令公屋分配效率低之餘，造成大量錯配，也令部份市民輪候期過長 (5)。又例如汽油市場不開放，令汽油價格長期高踞不下；政府用持牌制保護律師界，令律師不用面對外來競爭，導致律師費像天文數字般昂貴；不肯開放大氣電波和發更多免費電視牌照，令這些市場效率和質素降低，只是保護原有者的利益；巴士、地鐵、隧道、渡輪等專營權制度，令那些交通企業的效率和服務質素因缺乏競爭和推動而變得無保證，卻又可任意加價去滿足股東。

政府本身需要有強大資本和土地的地產商支持，以鞏固政權。在沒有民主選舉下，政府沒有人民授權，權力名不正、言不順，只好以政治特權的好處來換取有財有勢的地產商支持。那麼大財團、政府、幹部組成的管治大聯盟便形成，為了維持政府的權可以長久，大財團的利可以持久，彼此間只好互相緊扣，形成勾結。

訪問

受訪者：陳清橋（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系主任）

筆：香港政府是以甚麼思維治港的？

陳：以「做好呢份工」思維治港，好聽一點叫務實吧。政府一直都很短視，不論樓價還是全球化問題也好，連當前形勢也捉不到。即使曾

蔭權上台，眼光都只是放在任期之內，令政策缺乏前瞻性。可是要管治香港這麼獨特的城市——有特殊歷史、外向型經濟、政治訴求多樣性，是需要有高瞻遠矚的管治態度，政策要有先後次序，不可一窩蜂而上。但政府一路打破不了這成規，欠缺把問題變成機會的眼光，令很多問題不斷重複。

香港社會相對多元化，自由開放，充滿動力，才不至於一池死水，只是政府管治帶領太多限制。

筆：為何特區政府管治被稱為後殖民統治？當中又有何問題？

陳：香港殖民統治歷史悠久，社會是中西夾雜，由漁村變成國際金融中心，民間是一直累積了精神。社會充滿本土文化和特色，會默默耕耘，很有動態。香港經濟成就其一主因是保留本地文化，如繁體字、活化的廣東話和粵劇，有香港自己特色，和其他殖民地不同。雖是本土文化，但不斷孕育文化變更，例如配合科技，很多元化。

香港乃全球最自由的地方之一，與其經濟、政治格局相關。英國人眼光遼闊，百多年前已看清香港會成為進入內地的踏腳石。

殖民統治，以公務員作主導的管治方式，是以行政吸納政治。回歸後，以公務員體制為本的公務員治港，是把殖民地的根基延續，尤其曾蔭權深化了公務員治港的方針，他的「我要做好呢份工」思維是和公務員心態一脈相承的。上世紀80、90年代，香港已為後殖民時期作思考，去延續原本較好的制度。

董建華駕馭不到公務員體制，所以管治效果不理想。但香港很多問題涉及中港關係，中國面向世界的變化，單是公務員體制很難處理好香港問題，因這體制打破不了無視野的格局。回歸後新加的問責制、政制發展，是香港趨向政治發展，民主的趨勢。但由於中央對政制的戒心，還是希望香港依靠以前留下來的運作模式和思維。新因素在舊系統內運作，跟不上回歸後與內地結合的複雜形勢。

筆：為甚麼香港會出現地產霸權？政府為何會傾向大財團？

陳：香港歷史以來都是彈丸之地，海港是香港最好的天然資源。加上難民潮，香港人口人才越來越多，帶來更多創意與拼搏。但地少人多的問題越來越嚴重，加上山多平地少，香港發展只集中在地勢較平的市區，而人口不斷上升，使市區發展空間越來越少。政府的賣地政策，讓英資華資財團買地做生意，來使庫房有收入去發展民生。經濟成功使政府可把地價不斷推高，以高地價賣地，來保持低税率和自由港地位。

政府資源大部份來自賣地，釀成地產商致富情況，透過擁有土地和經濟起飛去發展各行各業。香港走向小康社會，地產市場持續發展。香港搞基建、地鐵也是用地產物業發展補貼，養成官民間對地產業的依賴。

地產霸權不是針對炒樓、買地行為，因這乃自然現象。霸權指市場越來越不公平，因政策上缺乏平衡和足夠監察，令市場的開放度越來越低。直到私樓普遍，香港變成由市場主導，而地價、印花税使政府收入

豐厚，政府在自由放任政策和自身利益前提下，缺乏對地產商監管，被人認為是傾向財團。

直到近年民怨大，政府的監管才多了，例如競爭法和最低工資的立法，去保障一般參與市場運作的小市民，使進入商業行為時，不致受到剝削，令買賣雙方皆有議價力，勞工維持基本尊嚴。

筆：地產霸權壞在哪裏？

陳：地產霸權之壞是令香港面貌走向單一化和一致性，令香港多元化面貌精神逐漸消失，強逼人人走進同一生活方式與價值觀。不想香港城市價值、社區生活單一化的人便出來抗爭，要保留香港多元化。財團權力越大，香港走向單一化的危機越大，所以不要地產霸權，不是針對市場，而是想保留香港的生命力與容許不同價值觀出現。

筆：保育及社運便是社會走向單一化的產物，但抗爭行為令一些人感覺負面，其實抗爭行動對香港有何好處？

陳：現代社會發展，很多舊有事物會消失，保育便出現了。保育不是指某些建築物有無懈可擊的建築因素，而是社區發展，有些因素是需要保留，去代表當代價值觀，使民間社會發展不是走向單一化，而是可新舊交流的多元化。民間抗爭運動，包括文化運動、捍衛廣東話，均向其他人展示了自己認同的價值觀，不應隨便消失。多元化價值觀建成了香港獨有的精神。

筆：在地產霸權充斥的香港下，香港的出路方向在哪裏？

陳：隨着科技、互聯網發展、本土文化越來越和全球化融合，全球化令資本主義不能再簡單地以二元角度——剝削和被剝削去界定。資訊流通、媒體發展、公民社會開放、公共空間開放、民主發展，是香港可持續發展的方向。

註釋：

(1) GDP即Gross Domestic Product，中文譯做「國內生產總值」。

(2) 北歐四國籠統指：瑞典、挪威、芬蘭和丹麥。

(3) 世界銀行於2007年做的《購買力平價計算報告》，香港排第6。

(4) Mercer Consulting於2010年發表的《最適宜居住城市報告》中，香港排名71。

(5)《明報》於2011年3月11日的港聞「單身30歲以下申公屋零上樓」，指出房委會紀錄顯示，30歲以下26,000名申請公屋的年輕人，過去從未獲得一次上樓機會。

第二章　官商勾結

成因

高官問責制的不成功，變相加強了政府的官僚主義。高官們為了避免提出具爭議性的提議而成為眾矢之的，便把政策制定責任交給由特首委任的中央政策組。但特首是由地產商和大財團主導的選舉委員會選出來，中央政策組的任命也必須照顧大財團們，所以便多委任大財團的代表、代言人、甚至家屬入中央政策組。因此由中央政策組制定的政策，自然偏袒大財團，形成了官商勾結的現象。而市民的權益在大財團賺到盡的心態下，難免被剝削。

官員們不論有創意或是無創意，大膽革新或是抱殘守舊，人工也是那麼多，不如少點製造爭議，平穩過渡到卸任便算。期間要順道為退休後抓真銀而安排後路，所以切記不要得罪大財團。以前官員聽命於英資，現在則轉為新四大家族（李郭李鄭）為首的華資，所以被稱為「後殖民統治」。

立法會內的功能組別以小圈子選舉（很多界別只有公司和僱主才有投票權，僱員是沒有的）和為大商界度身而設的議席為主導，佔一半以上。由於那些議席的選民，很多也同時是特首選委會的成員，所以那些功能組別議員取態上，較多時也支持政府。除了大家也身處管治聯盟

內，這些功能組別議員不需面對廣大市民，只要具爭議性的議案不影響到界別內的利益（哪管小市民利益有否受損！），便會支持政府。因此在敏感議題、市民大多反對的草案上，也見到很多功能組別為政府護航的情況，令政府夠票通過議案，即使大部份直選議員反對通過（注意：政府的提案只需過半數議員通過便可，不用面對分組點票機制；但議員提案則需要面對分組點票，所以功能組別議席也成為政府否決不喜歡的直選議員提案的工具）。政府不多不少也要去維護和加強那些功能界別的利益，換取他們長期支持，遂形成了官商間的一種利益輸送。

實例

政府於上世紀70年代起停發小販牌（1），美其名是確保環境衞生和保障商戶。對於環境衞生，只要加強衞生管理和提高續牌標準便可。停止發牌無可否認是令店舖商戶面對少點競爭，但其實他們也是受害者。停發小販牌後，讓僅餘的小販、雪糕仔繼續經營至退休後，小販買少見少，快要銷聲匿跡。這樣看來，商場舖和樓上舖面對的競爭好像減少了，但想深一層，商場舖和樓上舖的主要對手是其他的商場舖和樓上舖，小販的威脅其實不大；小販少了，甚至間接增加了商場舖、樓上舖與同樣買少見少的街舖之需求，令這些地方的舖租上升。

市民少了一個小本創業的途徑，被逼租舖才能經營小本生意，最後得益者是業主和地主，停發小販牌為他們確保源源不絕的客源，令業主

在續租時議價力大增，可任意宰割租戶。雪糕仔不獲發牌（30多年來除了一次開恩外 (2)），但集團式的雪糕車卻處處可見，不是厚集團而薄個人麼？

不再發小販牌，加重了市民小本經營的成本和開支，逼市民去店舖消費，間接光顧大地主。為何消費一定要在私人店舖或商場？為何不能在小販林立的公共空間消費？這不是打擊小本生意來確保地主的生意嗎？這又同時扼殺市民購物的選擇、城市創意空間、小市民創業機會。如若廟街、女人街、利源東街、雪糕仔等等小販區和個別小販全部消失，香港的城市不就是少了特色麼？為何要為了地產商而犧牲城市利益呢？

另外政府對市民扮演着守財奴角色，即使在經濟艱難期，需要開倉派米去幫補市民，政府不是推搪說要積穀防飢，就是極不情願。說是派糖，當作皇恩浩蕩的施捨，對市民十分吝嗇。但當要削減福利、電力公司要加電費、巴士公司和港鐵要加票價、公務員要減薪時，政府卻反應奇快的開綠燈，慷市民之慨。而面對着大財團，政府竟又十分豪爽，如電費補貼、批准加價申請等等，甚至是怕了大財團，如多年來也不敢立法規管發展商賣樓的種種欺詐行為，極其量是發指引；以確保地產商營商環境為藉口，不去立法，但街市商販呃秤卻有法例管制。上述情況就算不是官商勾結，也很明顯是政府買大財團怕，卻欺負如貓般溫馴的百姓。

地產商發達乃因70到80年代自由市場、積極不干預政策和證券市

場發達，再配合自己眼光，早在70年代的石油危機時期和80年代初全球經濟低迷時，去買廉價土地，合併和收購其他企業和行業。但其實地產商也因政府的「干預」政策致富。1984年政府限定每年土地供應上限為50公頃，自此地價和樓價大升，有地的地產商直接得益，也造成地產商囤積居奇的動力，因可見樓價只會有升無跌。因此政府不論實施積極不干預政策或是「干預」政策，得益的也是地產商。

結論是在積極不干預時，地產商是靠獨到的眼光和觸覺致富。但後來政府用直接干預政策，控制土地市場，明益地產商，把利益輸入地產商去，令他們暴富，印證利益輸送的說法的合情合理。但政府還說是尊重自由市場，豈不在說謊話哉？實情是霸權主義罷了。2002年大減土地供應和停建居屋 (3)，是把更多利益，源源不絕的送給富可敵國的地產商，令他們差不多到達富無可富境界。

政府政策偏幫大財團

在《競爭法》草案中的條例 (4)，企業被競爭事務委員會起訴，可以賠償1,000萬作和解。但1,000萬對腰纏萬貫的大財團算是甚麼？可能比恆河的沙粒還輕。這不是政府以政策去確保「有錢大晒」，可以合法和名正言順地作惡？政府的《競爭法》表面上是針對在市場維持一定比率的公司，防止壟斷，但原來魔鬼在細節內，表面反壟斷，實為維護大財團。

政府把強拍條例，即《土地（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條例》，申請門檻由發展商取得50年或以上樓齡的樓宇的九成業權降至八成 (5)，被人批評為厚待發展商，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更批評這是搶了窮人手上的羔羊。當小業主或發展商就着收樓價錢而呈上土地審裁處審裁時，土地審裁處的判決是根據強拍一方提出的樓宇失修證明，以及最少三次向住戶出價作決定，造成了發展商在得到物業後，故意不維修樓宇，例如天花石屎剝落、鐵閘失靈、天花漏水、走廊照明系統壞了也不維修，甚至故意破壞，作出斷水斷電的行為。

不肯交出業權的住戶面對惡劣的居住環境，但苦無錢去維修或搬家，發展商便可趁機壓價，以不合理地低的估值出價，住戶不論因環境惡劣而無奈接受，或堅持拒絕，同樣飽受傷害。

當打官司時，住戶（被強拍者）可提出估值報告抗辯，但他們通常沒錢聘請測量師作評估，根本難以和財雄勢大的收購商抗衡。而官司輸了，小住戶還要繳交對方一定比例的堂費，少則也過百萬，隨時不單屋無了，還要傾家蕩產。小住戶的抗爭成本很高，很多時被逼無奈「硬食」不合理的收購價，這全因政府政策的不公和漏洞所致。

當初政府在提出降低強拍門檻時，承諾會研究調解機制，但條例修改至今，還是原封不動，政府沒公佈過任何細節，分明是過河拆橋，違反承諾，置基層民生不顧，只管通過了偏袒大發展商的條例便算。政府不是民選時，當然較多出現這些惡行。政府對有利權貴的條例快手快腳

的立法，但照顧基層的條例（如最低工資）則大歎慢板，甚至不守承諾。

政府有換地政策，讓發展商在補差額後，便可把發展商土地周邊的官地買下，以擴大發展範圍來蓋豪宅，這是活生生的利益輸送。新界北河水氾濫日漸嚴重，是因不少河道兩邊不斷蓋高樓豪宅，把土地填高，令河道頓成低窪地帶，而當中不少河道工程，政府在整頓時會為發展商日後蓋高樓鋪路，而特意改變河道和土地原有面貌。

另一個官商勾結罪證，非政府以土地資助地產商莫屬。稅基狹隘，政府只好靠高價賣地開源。為了吸引發展商搞基建和大型項目，政府以土地資助優惠吸引地產商。例如政府有七成股份的港鐵於興建鐵路和鐵路站時，會透過拍賣，授權發展商在沿線上蓋建樓建商場，例如當年發展數碼港，在不需投標下，優惠盈科去發展貝沙灣地產項目。當年，有傳聞指數碼港連貝沙灣優惠，是「上面」為回報李氏家族成功阻止新加坡財團購買香港電訊 (6)。

表面上是以土地補貼發展商，實質為互惠互利，政策上的方向形成官商勾結的客觀效果。這使社會最珍貴的土地資源進一步集中在地產商手上。發展商控制土地資本，租金水平任其意開天殺價，社會財富集中在他們身上。

原則上，政府的一大角色，就是擔任社會的球證／公證，平衡社會利益，在各人各界用盡方法賺錢時，確保人人皆是合法、合情、合理、合乎道德（法律條例應建基於道德條文上）。現在的政府不但沒做好球

證本份，還要傾重原本賺到肚滿腸肥和權傾天下的一方，怎叫人不生氣？一些高官、富商及親近政府人士，還意氣風發地說如果香港存在官商勾結，怎會那麼多外資華資在香港投資？答案很簡單，因他們想「賺埋一份，想刮埋一份」，總之有錢賺，而無能政府對他們的骯髒手段又「沒有符」，那些外資會在乎民生和基層的實況嗎？只要他們可以一起搜刮民脂民膏，便會樂於在香港投資。

誓死保留功能組別

香港因為行地產主導主義，最大的資本乃土地，故此誰擁有土地便擁有權力，包括政治和經濟特權。他們絕不肯放手，把權力交回人民和開放真的民主。

人民是社會的主體，權力也需來自人民的授予。當社會有真正的民主，便會真正的由人民當家作主。屆時普遍人民勢必向地產商（擁有最大資產者）徵收較重的稅，減少地產商的收入，以達致社會財富較公平的再分配。

事實上，沒有人民為地產商打工、蓋樓、買樓，地產商單憑自己和土地也不能發展事業去賺取利益。可惜一直以來，為地產商出心出力的市民得不到合理的回報，甚至苦無發展機會，才要求財富更公平的分配。

地產商為保着既得利益，絕不會放手，於是便想盡辦法去阻撓民主進程和政治奪權，要保留在選舉方法上有利於他們的功能組別議席、和

分組點票制。而那些所謂功能組別議席，只有老闆可投票，對付出血汗心機的僱員歧視之餘，也反映那些議席只代表僱主利益，而非整個界別利益，加深僱主僱員間的矛盾。

可見保留功能組別只是維護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可是為官的卻為虎作倀，同流合污。2010年5月初，唐英年在「政制向前走大聯盟」的活動中表示：「要求政府即時承諾取消功能組別是不民主、不科學、不務實。」面對唐司長的狡辯，只可用詞窮理屈來形容。取消不公平的制度是不民主？要求政府取消不合理的事物是不科學？要求政府帶頭打破不公義的事是不務實？那麼是否代表政府專維護不公義的事物？要靠自己雙手抗爭，直接去打破不公義的事物才是科學？那麼唐英年是在鼓勵人民上街抗爭了。

訪問

受訪者：黃鶴回（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助理教授）

筆：早前你公佈了一份由你牽頭、全港首個測試是否有官商勾結的報告(7)，得出結論是：有證據顯示香港確存在官商勾結，但這證據並非「壓倒性」。為何你會做出這樣的一個測試？這個測試過程怎樣？得出甚麼？

黃：這測試在2008年開始構思，因這幾年官商勾結雖很盛行，但流於故事式的敘述，沒人做過系統式的研究，於是我便透過搜集資料，

統計和分析，去測試是否真的有官商勾結的成份，官商間有否互相offer或透過政策給予優惠，於經濟表現有否反映出來。測試發現，確實有政治聯繫的上市公司有主要股東、董事在選委會內。那些公司的生意在與政府建立了政治聯繫後，的確好了，是比沒有政治聯繫的公司好。這是難以用經濟理由去解釋，反而政治理由可較易解釋到。

筆：那麼這種情況存在，對社會有甚麼影響？

黃：會造成競爭上的不公平。市場經濟應以公司能力或個人能力作決要，但那些政治聯繫卻造成不公平競爭，向有政治聯繫的傾斜。

資本主義崇尚競爭，但當經濟上的成功者為鞏固利益而去妨礙競爭，是扭曲了資本主義。雖則成功者會嘗試用盡各種方法去避免競爭，但如果制度是民主的、可從機制上限制反競爭行為。社會意識形態、文化因素、歷史背景和政治因素，會影響到制度是否民主。但香港在制度上仍有缺點下，地產商可龐大得佔領各行各業。

筆：政府在消弭官商勾結有否盡力？

黃：市面上最多的說法是政府偏袒大財團，而財團又有北京眷顧。但此說法又非完全正確。雖然政府行為吻合此說法，可是有時也因政府抱着官僚心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從制度上改善這些利益輸送的事，得過且過便算。

也因政府缺乏民意基礎，想進行大改革有心無力，故此不敢去觸碰一些人的利益，倒不如少做些事。政府推行甚麼政策，總有得益者和受

損者，如政府由民選產生，有民意基礎，便敢行這些政策；但當欠缺民主時，小眾利益在媒體上隨時成為主流民意，政府又欠缺民意基礎去抗衡，便不敢行那些政策。

筆：官商勾結和貧富懸殊之間有甚麼關係？

黃：「官商勾結」一詞要小心運用，因很多政府行為貌似勾結，其實可能是官僚作風使然，「政商勾結」一詞會更好。但當政府未能有效制止成功者去妨礙競爭而令市場競爭少了，市民利益會受損。如果有足夠競爭，很多消費價格都會下降，市民便受益。競爭減少，中小企上位機會自然大減，社會流動性也少了，令市民收入與經濟增長背道而馳。例如樓價高，自然使很多事情，包括創意工業和先進工業因地價高而成本大增，難以支付研究及發展項目。高樓價未必是官商勾結的結果，但地產商在政府政策上是得到優惠的。

筆：對革除政商勾結情況，你有何建議？

黃：推行民主和透過推動公民社會，增加公民力量和對政商的壓力。香港人雖然普遍政治冷感，但其實很多時也願意理性表達訴求，如2003年「七一」，啟蒙了往後不少社會運動。在民眾壓力下，有些改革政府是會進行的。

*　　*　　*

受訪者：鄭宇碩（城大政治學講座教授）

筆：近年官商勾結的說法越來越普遍，一向站在前線爭取公義的

你，有否同感？

鄭：「勾結」二字可能重了點，但大財團的影響力是越來越大，侵蝕到公平競爭。以前是「大款傍高官」，現在則是「高官傍大款」。上世紀80年代時，華資財團才開始崛起，羽毛不豐，對官員恭敬。但在前途談判時，中央清楚表明要保持投資者利益，以此為政府政策宗旨。受到中央重視，和在80年代後，華資不斷豐厚，財團的影響力和叫價力也大增。

現在華資的影響力，更不比當年英資低。李嘉誠被國家主席親自高調公開接見、中央領導層來港多住在李氏家族於紅磡的酒店，甚至可能與富豪共晉早餐。現在富豪見中央領導人的機會甚至大於特首，於選特首又有舉足輕重作用，沒工商界支持，是難以擔任特首。

筆：「高官傍大款」的根源是中央表明政府必須保障財團利益，但細節上有甚麼實例？

鄭：有些樓盤如嘉多利山，是一大批一大批官員一起去買單位，很令人懷疑當中利益輸送的成份。很多高官退休後往大財團工作，縱使沒有利益輸送的實證，也難免瓜田李下。梁展文事件說明，官員自然地維護財團利益去為自己退休後謀後路，應是常見的事。高官和財團未必一定要一起坐下商討利益，但雙方或會有默契互相優惠。在監管不足下，很容易造成長期的利益輸送。

很多重要的諮詢委員會，無數富豪二代、配偶、代言人被委任、

且主要是環繞着同一班人，使諮詢制度小圈子化。這些不是基於專業知識、貢獻、代表性的委任，不是官員討好財團的行為嗎？而民間有代表性、有能力的反對聲音，卻不成比例的少被委任。

筆：工商界富豪權力大得連選誰做特首都有舉足輕重的話語權，他們有這麼龐大的影響力及地位，對香港社會又有何影響？政府有沒有甚麼應對？

鄭：工商界的影響力已大得壟斷或半壟斷着香港，影響公平競爭，影響人民生計。例如香港中產要傾盡半生積蓄去買樓，買回來的卻隨時是「呃秤」的發水樓；爭取了幾十年，政府才推出無約束力和無法定效用的指引。示範單位連度呎、拍照也不能，漠視消費者權益，但政府卻縱容地產商。現在有些富豪竟反過來說市民仇富，叫政府去開公倉派米，拿香港人的公家錢去派，以求平息市民對他們壟斷行為的不滿。

筆：政府的應對方法竟是縱容那些不公平的壟斷行為，於民生上有甚麼例子說明這些行為？

鄭：強積金管理費過高，買保險時各層佣金是多少也不知，擺明是益財團；金融海嘯當中，那麼多債券銷售手法問題，又是政府對金融財團的縱容和寬鬆所致；超市只得兩大間，東西又偏貴，政府還帶頭趕走小商店，令兩大超市的壟斷擴展；消委會沒有法定權力去保障消費者免被財團的不良銷售手法欺壓，這些全是例子。

筆：對於改善「高官傍大款」的現象有何建議？

鄭：民主化是唯一出路。民主化下，政府才真正要向市民取得支持。在沒民主化下，政府毋須解釋其官商合作的行為，這不只是監察問題，民主化是最大的制衡機制去避免官商過份親昵。但不論中央或特區政府，都沒顯示走向民主化的決心，看不到香港民主化有很明朗的前景。

註釋：

(1) 市政局於1973年停發流動小販牌，更於1993年3月公佈《強制性取消流動小販牌照政策》。

(2) 2009年食物環境衞生署重簽61個流動小販牌照。

(3) 2002年11月，政府宣佈無限期停建居屋。

(4) 可參考政府於2008年推出的《競爭法》諮詢文件和於2010年12月28日向立法會提出的《競爭法條例草案》。

(5) 立法會於2010年3月17日通過把舊有50年或以上樓齡強拍門檻，由九成降至八成業權，並於2010年4月1日生效。

(6) 2000年5月17日，政府在未經公開招標的情況下，與盈科動力全資附屬公司香港數碼管理有限公司簽訂協議書，把現時為數碼港的24公頃臨海地皮交給後者興建和管理。

(7) 請參考2010年6月28日《蘋果日報》港聞「學者結論　港存在官商勾結」。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助理教授黃鶴回於2010年6月在*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發表了一個關於官商勾結的報告。

第三章　地產壟斷

成因

近年控訴「地產霸權」之聲絡繹不絕，雖則不少聲音對香港完全被地產商霸着的論調有異議。但事實是地產商一些霸道的營商手法大行其道，使營商環境對中小企不利，市民衣食住行差不多被地產商和其相關公司壟斷着。

究竟香港從何年何日起被地產商壟斷了一大半？地產商是否一早就取財無道？地產商是否一開始便以不義的營商姿態出現？這要追溯到上世紀50年代，分析一下華資地產商的崛起，和制度的不健全，如何容許壯大的地產商壟斷香港各行各業。

香港在50年代步向工業化後，經濟不斷壯大，每年GDP錄得雙位數字增長。當時的工廠，尤其是紗廠，更要24小時全天候開廠去應付應接不暇的訂單。那時候香港的土地和勞動成本便宜，而勞工供應在大量內地同胞流入下，十分充裕，且效率與質素偏高，深受國際資金歡迎，從而大量流入香港。

60年代國際資金泛濫，加上中國內地在50年代對海外資金實行流入限制，那些資金便選擇停泊在香港的資產市場。投資者一是看準香港的經濟處於起飛狀態，二是想藉香港作為進軍內地市場的踏腳石，這也

說明為何香港的樓價和租金在60年代大升。

50到70年代工業迅速發展，工人工資隨着上升。工業用地價值在70年代比50年代升了3倍以上，也帶動地價飆升。1973年，超過三分二的上市企業是華資，而當年遇上世界石油危機，出現大規模的股災。在這個經濟衰退期，沒有虧損得要倒閉的大企業，看準地皮價格隨經濟狀況暴跌的時機，不但沒有死守僅餘的資本，反而盡地一鋪大量購入廉價地皮（與家財萬貫的守財奴特區政府截然不同！）。至1975到1979年的5年大牛市，地價飆升，那班看準時機的財主（如李兆基、郭得勝、李嘉誠、鄭裕彤等耳熟能詳的富豪）及其家族企業的資產暴漲。這些企業在興旺的股票市場上不斷集資壯大實力，又收購或合併有潛質的企業，染指不同行業。例如恆基收購中華煤氣和香港小輪、新鴻基收購部份九巴股權等。不論建材業、物流業、公共交通、保險業、物業管理業、電力市場等，全都被那些大地產商統領。

不少與大企業有生意來往或是合作夥伴的專業界別人士，如會計師、律師、測量師、建築師、金融精英、銀行總裁等，被委任在大企業的董事局內，或聘用在行政機構內，形成專業界別為大地產商服務的局面。這也說明為何地產商的利益直接影響眾多專業界別的利益，及為何那麼多專業人士服務着以地產商為首的統治大聯盟。

70年代初，香港證券市場開放，大量資金流入香港股市，促進金融業發展。那時更有遠東會、香港會、九龍會、黃金會，四大證券交易

所同時出現的盛局。香港證券交易所便是香港股市發展有成，四大交易所合併下的產物。隨着香港股票市場發展，也吸引內地股市的開放，很多華資財團為求拓展業務、進軍世界，便選擇在香港上市，籌集國際資金。英資和華資的踴躍上市，進一步奠定香港金融中心地位。而上市的華資也得到充足的資金進行擴展，業務不斷擴大，企業也因而不斷強化公司管治，以步入國際化之路。

華資利用上市去集資去擴展，加上他們本身不斷改善管治模式和手法，令企業得以迅速發展，壯大後又實行業務多元化，進駐更多行業，為今天壟斷香港各行各業奠下了基礎。根據2000年的報告，在香港上市的企業，超過三分二是家族企業，以華資佔多數(1)。

80年代，金融業開始蓬勃，加上工業北移，取而代之是內需帶動零售業。那時隨着公屋興建，普遍人能安居樂業，而人民在工業化年代豐衣足食起來，收入穩定，有多餘錢消費，使需求大升，零售業憑此發展起來。在「加(零售)一減(輕工業)」下，第三類生產取代了第二類生產，成為香港經濟主流。再者80年代內地改革開放，帶動香港旅遊，加上香港中西文化交匯特色，吸引歐美及東南亞旅客，同時推動香港零售業，使香港成為購物和美食天堂，也成為亞洲旅遊熱點。

香港在金融、零售及旅遊業的帶動下，商業寫字樓、酒店、商店的用地需求大增，造成市區地價大升。加上政府於1983年起實行限額賣地，令地價更高，使在70年代憑着先見之明而囤積居奇的地產商發達了。

地產霸權出現

香港人安於本份，即是地產商發達，也不會眼紅妒忌，無故生恨（可惜有些常作不義之舉的財團，為了轉移人們不滿其作風的視線，不惜誣衊人們因妒忌他們富有而仇恨他們）。反之，靠拼搏而致富之人，是港人學習榜樣，只會受到敬佩，君不見田家炳、蒙民偉、邵逸夫、林世榮、李嘉誠等富豪皆為不少港人的偶像嗎？當然李嘉誠神話有點塑造成份，乃當權者故意無限放大，神化李嘉誠，來勸說港人只要努力便能致富，卻淡化李嘉誠娶得富貴妻子而得到一定財力支持的部份。當社會普遍人士感到難以單憑努力而向上流時，李嘉誠神話便大派用場。

可是當部份大財團恃着本身勢力而壟斷經濟成果、掠奪眾人的努力時，對地產霸權之控訴便出現了。在80及90年代，經濟發展速度驚人、不論白領的薪水還是藍領的工資，都追得上同一時期經濟增長而帶來的通脹。那時以地產商為主的大財團不斷膨脹，但因經濟成果人人也分享得到，所以甚少聽見人們投訴甚麼地產霸權出現。但到了近十年，同樣出現經濟增長，同樣出現通貨膨脹，但數據顯示從2001到2010年的工資增長水平，每每落後於通脹增長水平，反映基層勞工不但分享不到經濟成果，反而成果被掠奪，實際工資不斷下降。

實際收入每年下跌，累積十年的情況更是驚人，基層怎會沒怨言？而同時見到大財團實際收入大增，相比下自然怨氣叢生，地產霸權之說日益受到廣泛流傳也是出於此因。簡單以人均產值來說，香港應是人人

也有能力置業，但偏偏連律師、醫生也控訴買不起樓 (2)，足以見到即使平均個人付出很多，但處於弱勢的中產和基層，所獲得的分配遠低於合理水平。

地產霸權不着重於地產業佔GDP百分之幾，或是地產相關的行業佔GDP幾多幾多，而是以地產商為首／為主的大財團取財無道，取於一個欠缺公平競爭的環境。而這環境正是地產商經營手法之霸道和政府默許所造成，既扼殺了其他企業空間又剝削了小市民利益。自己富有不會令人產生怨氣，但阻人發達、奪人身家、損人以利己便是霸道，霸道配合上權力，就是霸權！更甚的是地產商還擁有大量政治特權，在選委會擔當主導的角色 (特首選委會的界別，超過一半是地產商可直接或間接操控，其餘的不是地產商有經營分業就是有贊助)，連特首和官員也要忌他們三分，他們又可直接和國家領導人會面及北上告御狀，自然與官員、幹部組成統治大聯盟。人大政協聽命於北京、大商界政團聽命於地產商，令政府的政策在回歸後，因沒有英皇支撐，由進步走向保守，社會被壟斷的情況因此日深。

就連政經風險顧問《亞洲情報——展望及警告2011》報告也指出，香港地產商勢力大得足以左右政府施政，甚至能夠透過寡頭壟斷，自行制訂政策。

實況

消費者的權利和選擇萎縮，是地產壟斷的一大罪孽。很多李超人集團旗下的屋苑，所僱用的管理公司也是他屬下（即使像畢架山一號和聽濤雅苑等屋苑的管理公司遭劣評如潮，業主也無法更換公司 (3)），而住客在屋苑內亦只可光顧李氏集團旗下的超市和電訊公司。由日常用品到電話與上網服務，都被逼被李超人集團一手包辦，即使服務質素差和價錢不合理也別無他選，住客缺乏消費者權益。而這也同時令到那些行業缺少競爭，即使財雄勢大的外資也難進軍本地市場，因市場已被本地大集團壟斷了。外資難以「插旗」，減弱了香港作為國際經貿市場的地位和吸引力。

大財團、小政府

政府常說是以「大市場、小政府」的方針治港，實情是「大財團、小政府」。社會和市場大部份的資源、發展空間被大財團壟斷，即使被視為最珍貴的土地資源，五大發展商所擁有的土地是政府的3倍 (4)。加上特首選委會成員以地產商和其有關的機構或公司為主，使地產商成為政府的半個老闆（另一半是「阿爺」(5)），大財團擁有政治特權（在功能組別議席和選民單位、人大、政協、諮詢委員會、政府智囊組織充滿富二代和大財團家屬與代理人），使政府施政要常優先考慮大財團意願。大財團在擁有絕對資源和政治特權下，特首要有他們的支持才能上台組織政府班底。連政府也要以大財團馬首是瞻，你說不是大財團、小政府才怪！

李禱文

網上流傳一篇改自《主禱文》的《李禱文》，雖只是網友們嘲弄天文台的颱風預警不太準確和控訴地產霸權的自娛作品，但卻能在網上風行起來，不多不少反映了網友及市民們對地產商勢力澎湃的不滿。《李禱文》如下：

我們在中環的超人，願人都尊你的姓為李。願李的國降臨，願李的旨意行在香港，如同行在長實。我們日用的物品，百佳賣給我們。免李家的稅，如同我們免窮人的福利。不叫我們遇到風球，救我們脫離黑雨。因為住屋、電力、交通，全是李的，直到永遠。阿門！(《超人福音》6章4節)

註釋：

(1) 請參看《香港社會科學學報》第38期(2010年春／夏季期)，頁36。

(2) 2009年10月15日，特首曾蔭權出席電台節目，有女醫生致電稱，欲與律師男友結婚，但卻買不起樓。請參看2009年10月16日《明報》港聞「醫生律師投訴買不起樓」。

(3) 請參看2010年9月24日《蘋果日報》港聞「聽濤雅苑業主起義反長實」和9月25日港聞「屋苑管理差　反長實星火燎原」。

(4) 請參看2010年7月5日《經濟日報》港聞「五大發展商土儲　超港府三倍」。

(5)「阿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的俗稱。

第四章　利益輸送

政策上的不周和傾斜

除了管治聯盟的因素導致利益輸送外，一些被認為利益輸送的例子是來自政府推出政策時欠缺周密。政府推出強拍條例和降低其門檻到八成，令小戶主議價能力大降外，也因政府沒推出相應措施支援，使他們欠缺保障，大發展商形勢卻因而大好，在制度上處處受偏護。這是政府政策傾斜發展商的一活生生例子。

公屋富戶政策是另一個被人詬病為「利益輸送」的政策。公屋富戶政策即公屋住戶資助政策，乃房委會自 1987 年開始實施。要求住滿公屋 10 年的住戶，需每兩年申報資產收入一次，以家庭收入計算，如發現超出政府定下的入息限額，需按超出程度而繳交倍半、兩倍、甚至市值租金。政府的盤算是基於某些住戶入息會不斷增加，而至可進入私樓市場或租住私樓，不需繼續居住公屋，故成立富戶政策，減低那些住戶續留的意欲，便可騰空更多公屋單位給輪候人士。政府原意十分好，但問題是政府訂下的水平是否合理。政府認為入息超出某限額便有能力進入私樓市場，但在樓價暴升的年代，政府的評估如不合理，把一些沒能力進入私樓市場的住戶也當作成有能力，那便既做不到原意效果，卻加重住戶的負擔和造成不少相關後遺症。

按2010年4月的最新修訂，一人家庭入息限額線為14,881元，二人家庭入息限額線為23,321元，三人家庭入息限額線為26,261元。即平均個人收入略超過一萬元便算富戶，對比收入萬元以下的住戶，需繳交較貴租金尚算合理；但月入只得一萬多些的市民，又是否有足夠能力進入私樓市場？看三、四百呎的上車盤現在動輒要百多到二百萬，個人根本難以買得起私樓；即使是租也要數千元，佔入息三四成甚至一半以上，就算勉強可負擔，日常生活也變得非常拮据。

公屋富戶雖難負擔私樓，卻有能力負擔居屋。富戶政策的確使不少入息較佳的公屋住戶流向居屋，也使居屋充份發揮「流轉門」的作用。但自從2002年「孫九招」(1) 出籠，停建居屋，問題便出現了。那些負擔不起私樓的富戶，在缺乏居屋下，只好選擇留在公屋，令富戶政策原意想騰空多些單位的效果做不到，卻造成富戶數量倍升的現象，由停建居屋前的11,000多戶增至2010年的約24,000多戶 (2)。在現時貧富差距越來越大之下，即使經濟增長，普遍基層也難分享成果，物價不斷飆升，收入卻無寸進，富戶政策變相令入息高點的基層百上加斤。不少家庭成為「富戶」是因子女成年了，出外工作，賺取數千元月薪，而令入息限額超標。為免負擔太重，唯有取消子女戶籍，安排子女排隊申請公屋或租住租金較廉宜的蝸居（因單身青年輪候公屋的時間過長，動輒要10年以上，輪候期間不是冒被踢走之險偷偷地住在原本單位，便是出外租廉價蝸居）。現在非長者單身人士佔輪候公屋隊伍中的四成半，但政

府只撥一成輪候單位給他們，造成今日單身人士輪候到公屋時，已經是人屆中年。近年板間房、殘舊唐樓等蝸居需求大升，以致蝸居租金也暴升。以上便是政府停建居屋，令富戶政策失去了原意，並產生趕人租住蝸居或排隊申請公屋的後遺症。

板間房的租金在2009到2010年間升了三成，30平方呎沒有冷氣的板間房，月租1,000；一個4人單位的板間房，租金由2,500升至3,200元。籠屋呎租更比1997年樓市高峰期時升了約三分一，達近百元一呎，比無數私人豪宅的呎租價還貴上一倍有多，可是全港約10萬人正居住在板間房、籠屋。加上政府於2004年撤銷《租住權管制條文》，引起租客議價力大跌的副作用，致令飽受加租之苦。近年格仔舖的大量出現，也是舖租過貴的衍生物，是店舖版的板間房。

在70、80年代，政府大量興建公屋和居屋，以及當時還未有公屋富戶政策，很多基層不用繳貴租，變相有更多剩餘金錢去創業，再加上個人拼搏，創造了不少傳奇，成功脫貧向上流。但現在停建居屋和富戶政策雙管齊下，很多基層青年首當其衝，被逼進入昂貴的租務市場，把大部份入息雙手奉獻給業主。在業主眉開眼笑同時，年輕人已沒有多餘錢創業，再加上舖租越趨昂貴，尤其領匯接手屋邨商場，把所餘無幾的廉租舖也清除殆盡，使年輕人創業成本大增，難以脫穎，全皆因政府政策堵塞了一條年輕人上流和脫貧的重要階梯。對這些年輕人更不利的是，政府把強拍門檻由九成降至八成，頓使舊唐樓的樓價和租值飆升，

不單令上車盤日少，也令年輕人捱更貴的租。政府政策在思慮欠周下治絲益棼，苦了一班有心向上爬的年輕人，甚至導致一些心態較消極的年輕公屋住戶，為避免交貴租，而選擇做散工或人工較低的工作（免超出入息限額），又或乾脆做宅男宅女，寧領取綜援也不想白幹一場，不願外出工作把收入奉獻給業主。

政府的富戶政策和停建居屋政策雙管齊下，只是益了地產商和大業主，不管有心或無意，也難洗利益輸送之嫌。

政府在2010年《施政報告》中提出的置安心計劃，也是利益輸送的一例。該計劃透過先租後買的模式，用公帑補貼市民買私樓（首5年的首期獲五成的折扣去當作買私樓首期或原單位的補貼），乃擺明車馬托市，明益地產商。政府死不肯重建居屋，只推出甚麼置安心，其實只令地產商安心罷了。至於市民？繼續置業擔心，或索性安心放棄安居念頭吧！置安心計劃完全不能改善住屋供不應求的情況。

置安心計劃只是幫助月入2、3萬的家庭，資助他們置業，方向本是良好的，但這些家庭本身其實是有置業能力，只是速度較慢。政府有沒有搞清誰人最需要資助？政府根本無視月入2萬以下，又不能入住公屋的夾心階層，以及月入數千，符合入住公屋資格，但輪候10年也等不到公屋的單身人士的苦況和衍生的問題，如籠屋、蝸居、露宿者日增、援交、吸毒等。政府應多建公屋、放寬申請資格、建夾心公屋和重建居屋，以減低輪候公屋時間和增加夾心階層的選擇。

為何政府只看到月入2、3萬家庭的需要，卻看不到月入2萬以下人士的苦況？政府的愚笨實在令人難以理解。

官僚主義導致利益輸送

60、70、80年代，香港經濟騰飛，人人靠捱靠搏，賺取到一定收入或第一桶金而上流和脫貧去，當中公屋政策的功勞不可抹煞。當年港英政府刻意把公屋興建在工廠區和就業旺盛的地區附近，更在公屋邨內興建商場、街市、熟食檔，甚至還設有政府合署，為邨內的住戶創造就業，當中包括福來邨、元州邨、白田邨、朗屏邨、啟業邨、坪石邨、大元邨、麗閣邨等等，多不勝數。這樣節省了市民上班的時間和交通費，令市民有多餘時間騰出來作兼職賺錢，或消費娛樂以促進社會經濟，劃定了香港生氣勃勃的面貌。

可是自從1983年起，政府落實高地價政策和市區的土地應用近乎飽和後（或是不願再在昂貴的市區地皮興建公屋），於90和千禧年代落成的公屋，絕大部份也在偏遠地區，加上政府沒有配套建設，令那些地區缺乏就業機會。市區和商業區遙遠，工廠又已北移，那些公屋居民不能像往時般在居所附近找到工作，反之就業成本非常之高（交通費和交通時間）。90年代後，合資格申請公屋的新來港人士和受市區重建影響的基層，獲分配的公屋大部份在偏遠的天水圍和東涌，使這兩區成為窮人集中地，加上缺乏就業機會和出外就業成本太高，便衍生了「天水圍城」、「現代貧民區」的問題。

本來市區是有地的，但政府為求使高地價政策能發揮最大效用，把市區地留下來拍賣給地產商建私人樓，即使是市區重建的土地，也不

是留給原本居民，而是在打破本來面目後，全用來發展新型豪宅和商場以吸引發展商參與重建。把原來的基層區搖身一變為新型豪宅區，把原來居住的基層去除，發配到偏遠地區，只是為了讓發展商可賺大錢及促使他們一起開發土地而已，這不是厚發展商而薄基層市民麼？做事力戒甚、奢、泰，是誰限死政府在重建時不能去粗取精，把重建的土地預留一些給公屋？為何只可建「地標化」的大型商場和豪宅呢？

只要打破舊框框，新建的公屋可以是小型的或一棟式的，不一定要整條邨的蓋建才叫公屋，只需能安置原本居住的基層和同區窮人，再在那棟公屋低層興建商場和街市以提供就業機會，重建的目的便已達。但政府不肯這樣做，因政府認為公屋要十座八座的蓋才算，公屋只能以大型屋邨形式出現，不能獨立單棟式的興建，此乃由於在政府思維中，古往今來的公屋都是那樣興建，既往程序是這樣。這反映政府官僚主義、一成不變，死守舊時規條，不懂變革創新。

再說重建後，新豪宅落成不但令原區居民無法負擔貴租而被逼遷離原區，還會拉高同區二手樓價和租金，而又減少了當區市民的創業機會。因新的大型商場由私人管理公司負責，管理現代化，設施新，舖位又較大，舖租比以往昂貴，只有議價力強的大財團才負擔得起，致令當區物價上升，同區基層生活負擔增加。因此政府的官僚主義，除了引致利益輸送的效果，也造成天水圍城、市區基層負擔上升而加劇貧富懸殊的問題。

天水圍城

天水圍、東涌成為貧民區可謂政府的官僚主義、不完善規劃、利益輸送混合下的產物。那些地區缺乏就業機會，居民出外就業成本又過高、加上個人動力因素，造就一些長期失業者，一些小孩甚至從沒見過父母上班的。而因生活有問題需拿取綜援的人士，更慘被政府、傳媒、外界渲染為「蠢人」(因不是專業人士，只是「低技術」勞工)、「懶人」(不管是故意或被形勢所逼而失業者)、「賤人」(為了不鼓勵人申請綜援和產生社會敵意以使人退卻申請綜援，政府和部份傳媒常把不足1%的騙取綜援人士無限放大和大肆張揚，誤導社會以為拿取綜援的人，全是懶得工作而攤大雙手等政府救濟)、「廢人」(在功利主義盛行的社會下，賺不到錢的便是廢人)、「累人累物」(要靠政府和納稅人資助，飽食終日，缺乏政府提倡的獅子山下精神，有違政府的自力更生主義)。他們很多在長期被標籤化下，自尊低落，對其他人產生戒心和失去互信，只好封閉自己在家中，或找家庭裏比自己更弱的弱者發泄、或沉溺賭博、販毒(某程度上是想搵快錢，以為有錢就可取得別人尊重)，或沉淪於酒精、毒品來麻醉自己，以逃避現實、脫離指責。這衍生大量家庭不和、家庭暴力、虐偶、虐兒、酗酒、吸毒、病態賭徒等問題。

即使有上班的，因工時過長(低技術勞工常面對的情況)和花大量時間於交通上，很難抽時間陪伴家人與子女打成一片。年紀細細，嗷嗷待哺的子女在缺乏家長監管和父母關懷下，容易出現童黨問題、濫藥問題(因家庭貧窮而自卑，透過欺負人和濫藥顯威去增強信心、或獲得肯

定和麻醉自己），甚至援交（在物質主義下，人有我無，而家人又沒能力給自己零用錢去消費購物；有些甚至為了家計或家中患有重病的親人去籌錢醫病，而去作援交賺錢）。政府必須引自身官僚主義、利益輸送政策而衍生的各種問題為鑑，再去改變一貫的思維，重新審視政策上的缺漏。

天水圍城問題窮源竟委是政府的錯失，把受市區重建影響的基層和新公屋申請者全安置在偏遠地區的公屋。但安置之餘，政府沒為社區興建足夠設施配套，包括牀位、醫院、就業設施、社區設施，不是錯落不齊就是嚴重缺乏。舉例新界西每名居民只有平均1.9張牀位，而全港平均則有2.9張；新界西因就業配套不足，失業率比全港高1%；商業大廈不足，醫療和社工人手缺乏。因重建而撤離原區、失去了原來社區網絡的居民到了陌生的新區，更加需要有社區設施幫助，但政府反而本末倒置，漠視這班需要照顧的一群。為求補過，後來只好要求一些展覽商和賽馬會優先在該區聘請一些一次過或短期合約的員工作補償。

註釋：

(1)「孫九招」是2002年時任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推出九項的救市措施，包括取消拍賣土地、暫停勾地一年、即時結束居屋計劃等。

(2) 請參看2010年7月30日《亞洲電視》新聞「公屋富戶數量過去幾年累增一倍」。

第五章　仇富

坊間盛行仇富說法，但這形容並不貼切。不是仇富，而是恨。恨，恨一些大財團的不義之舉；恨，恨一些富有老闆的狠心行為。準確點形容，是恨不公義之舉，但坊間不少媒體，基於貪方便或誤解，把恨不公義和仇恨富商劃上等號。世界上並沒有無緣無故的恨，把恨不公義當作成仇富，是因有些不義之舉，只有富商才有財力、資格去做。

不義之舉可小至到，大僱主恃着權勢和於勞動市場佔有壓倒性的話語權，為了賺取更多，不惜刻薄員工，譬如OT (1) 不補水、不補假、扣飯鐘錢 (2) (一些員工應有的休息時間，而非不勞而獲)，務求把員工機械化，要求每分每秒也開盡摩打地工作，連一刻小休也沒有，才叫應有的工作表現；為節省成本，要員工一人做二人甚至多人的工作份量，但不加薪；做不完便要OT，但沒補水；上班前下班後點貨的時間不計時薪；要求員工假自僱，以求不用供強積金和提供退休福利，總之林林總總。亦有巧立名目，合法但不合情的扣取員工薪酬，例如洗工衣費、清潔工的清潔用品要員工自己出錢購買 (還要光顧指定牌子)、小小事情便扣糧、下令放無薪假 (但要回公司「幫手」)、不為員工購買醫療保險等等。

當員工們反抗、或要求立法去監管某些剝削行為，卻會被形容成破

壞營商環境、加重企業負擔、令企業面臨倒閉潮，甚至破壞香港的成功之道，總之就是罪大惡極。難怪從前香港被打工仔喻為遍地黃金，現在則是處處被剝削。為何有些大企業對高租金、瘋狂加租可以容忍，但員工希望工資多一點卻容忍不下？

不義之舉可大至到，壟斷土地和生活必需品以榨取民膏民脂；故意阻撓中小企的競爭；各種收樓時的惡行，包括截水電、鎖鐵閘、派失業人士晚晚到隔鄰的空置單位開party和流連、故意不維修大廈、打開空置單位窗戶，讓打風落雨時，大量雨水流入，從而滲入下一層、大閘常換鎖等；至於地產商，在賣樓牟取暴利下，還大建發水樓「呃呎」(影星何超儀曾這樣諷刺發水樓現象：「選港姐度三圍，無理由連個墊都度埋。」(3))、大賣「騙人」售樓廣告(但沒法例約束)、以及使出各種騙人手法和資訊不透明等等，更令人悲憤莫名。最令人不齒的是，貴為城中首富，長期名列世界十大巨賈之一的李超人，隱瞞旗下樓盤建在堆填區附近被發現後，竟厚顏地說那裏空氣使人心曠神怡。富豪動不動就說撤資，以「恐嚇」市民不要反對財團的所為，也是不義。為富不仁的財團這樣罪行滔天，有血性之人能不仇其行嗎？身家萬貫還要這般惡行滔滔，為人所仇視乃自招矣。富豪因其家產之巨和資源之豐，影響力甚大，他們作出不仁之舉時，對社會侵害也自然大，也因而容易招人之怨。

單是The Icon事件已令人氣憤。人家用上一生積蓄供了首期，付上過千萬去買一單位，卻是裝滿垃圾，新樓內竟全是頹瓦敗缸，交樓前又

不能先驗樓，要簽了約才能驗。已經賺了人家一生積蓄，即使多花數萬元買全新家俬也不過份，但發展商竟用上如此手段，而代理商賺那麼多錢，但原來所負的責任卻只是那麼少。發水樓、縮水樓、呃呎樓還不止，現在再加上垃圾樓，如此取財無道，市民卻毫無辦法，法律又規管不到，完全無符，叫人仇不仇？

「仇富」一詞更多時只是既得利益者和特權階級，為了轉移視線，企圖合理化社會不公義情況，引用來抹黑感到不滿的市民。可惜一些權貴打手、歸邊傳媒、部份政府高官把合理的「仇不公義」當作成非理性的「妒忌仇富」，令社會矛盾加劇。例如出身富貴人家的政務司司長唐英年認為時下社運等同針對官商，實屬可悲，也顯示出他沒了解異見出現之原因，最終令問題沒法解決。

才子陶傑於2010年11月15日的電台節目中表示：「現在社會沒公義，因有錢大晒，有權大晒。」前高官王永平說過：「與其說市民仇富，不如說社會不公……香港社會矛盾的根由是在不完善的法律保障下，聰明的商人用盡法律沒有明文禁止的空間，賺盡一分一毫。而在過程中的計謀手段，令小市民感到不公平。」

時代變遷，追求不同

50至70年代的香港，只要努力便可改善生活，當時人們追求的是安居樂業、有工做去改善生活環境；但求有瓦遮頭，告別鐵皮屋、木屋、一家十多口同逼一室的環境便可。

80至90年代的香港，告別工業時代，踏入金融起飛年代。除了個人努力，還可憑着眼光，開發零售市場、在股市投資、拿着第一桶金進軍商界而致富，在安居樂業上加了一個賺大錢、賺快錢的目標。那時香港自然崇尚金錢，追求得金錢才有安全感；而且人人都在專心掘金時，誰不掘誰就是笨蛋。追求金錢，可彌補小時貧窮所缺乏的安全感或失落感。小時候因為窮，根本不會奢求物質，很多物質慾未能滿足；當長大了，因社會經濟發達，而各行各業還未被大財團壟斷起來，市民容易致富，進身中產（以收入角度計算），有了錢便可瘋狂購物，去填補未滿足的物質慾，也使香港的零售服務業旺盛起來。

70年代中期前出生的，因小時連瓦遮頭也隨時欠奉，生活環境較惡劣，當長大了，配合經濟迅速發展，金錢、地位自然成為他們所追求的目標。但70年代中期後出生的，包括80後、90後，他們的父母已賺了第一桶金，已貴為中產，即使不是中產，也有合理的居住環境，便是政府廣建的公屋，基本生活條件被滿足了。所以70年代中期後出生的小孩，他們不用面對貧困難題，他們普遍不缺乏錢，中產家庭的甚至要風得風，父母有大量金錢去供書教學，去買玩具，不用幫補家計。這群普遍不缺錢的新一代，生活較富裕，當中一些受着父母觀念影響，秉承追求錢為至上；但一些不受父母觀念影響深的，首要追求的自然不是金錢，而是各適其適，有的追求精神滿足、有的追求玩物娛樂、有的追求生活素質、有的追求社會文明、有的追求社會公義。所以有說70年代中期後出生的，是較難觸摸的一群；而當中不把金錢放在重要地位的，

較着眼整體社會，當社會根基或結構出現問題時，因經濟的後顧之憂較少，很多也願意出來抗爭，尋求改變。

回歸後，因樓價繼續瘋狂飆升和居屋停建，夾心階層連安居樂業也難做到，單身的基層也因輪候公屋困難，又買不起樓，連有瓦遮頭的目標也要花九牛二虎之力，奉獻大部份收入去租蝸居，才算勉強辦到；市民想搵大錢和快錢，去賺第一桶金的願望，因上流機會少了、創業成本因租金與物價等問題影響變得越來越高、市場被大財團霸佔得八八九九，難以實現；生活素質因污染嚴重、空氣質素惡劣、環境不斷被破壞、工時過長、工資未如人意、居住環境擠擁等問題困擾，難以改善；社會公義也因特權階級的阻撓、民主進程的緩慢、貧富差距惡化等問題，而難以彰顯。

從前那個年代所追求的和得到的，現在全都難以實現、難以追求，引致的結果自然是社會被民怨籠罩，要求改革之聲不絕，甚麼為富不仁、地產霸權、官商勾結、利益輸送等指控統統湧現。可是一個抱着打份工心態、充滿官僚主義的政府，是沒有決心，也沒有能力帶香港走出此困局，除了等死或積極反抗，我們還可做甚麼？

註釋：

(1) OT即Over time，中文為「超時工作」。

(2)「飯鐘」即全職員工享用膳食的時間。

(3) 何超儀於2010年4月出席「80後試映座談會」時回應記者提問的說話。

第六章　拜金主義

當有錢的富豪能掌半邊天，對香港發展有舉足輕重的作用；當有錢才能改善生活質素，才被別人肯定，享有社會地位，財富便變成了一個社會定成敗的標準。當從小已接觸社會，不斷被灌輸不管想得到甚麼，是玩具、是安身居所、是代步名車也好，要有錢才能實現，社會便走向拜金主義。

拜金主義衍生的是消費與被消費文化，想滿足慾望和需求，要透過消費才可。例如想安居養家，要置業才能；想娶得賢內助，要先給予禮金；想子女入名校，需花錢為子女報讀無數興趣班和學前班；想減肥、修身、瘦身，要購買減肥產品，光顧減肥美容中心；想有健碩身材，要光顧健身中心；唔夠靚，要有錢去美容、整容才可；唔夠型和唔夠潮，要有錢買套西裝或設計髮型才可；要別人給予你社會地位，要買跑車、金錶、名牌手袋……

在拜金主義下，其他文明因素普遍也不被重視。教學以追求財富為主旨；政府和政客要透過派糖、派利益才能得分；社會發展便只以GDP衡量，令公義、平等、仁愛等要素被忽視……

難怪時下很多孩童被問及長大後的志願時，都回答想做個有錢的「成功」人士。

子承父業買少見少

現在供子女入讀直資學校，學費隨時一萬多元甚至數萬元一年，而升上大學則要數萬一年。所以家長多希望子女能讀理科、商科，希望子女將來成為商家或專業人士，務求在金錢上得到合理回報（也說明為何眾多家長們不多希望子女讀文科）。子女在香港、在外地讀完MBA（註），讀完商科學士學位，理所當然是享高薪厚職，又怎會願意在五金行、茶餐廳、涼茶舖等舖頭工作？（即使老闆是父親也好。）在拜金主義盛行下，小型舖頭子承父業買少見少，令一些技術行業瀕臨失傳邊緣，很多民間技術只能在博物館回味了；也令香港的工種範圍收窄了，職工種類不斷減少，就業市場越來越乏善足陳。

從政者着重利益

基於現實的拜金主義流行，凡事以利益評估先行，多於是非判斷。市民對從政者的要求也受拜金主義影響，很多只着重眼前利益以及觸摸得到的「着數」；選民只問從政者有何實際成績，少問其理念和志向，使從政者往往樂於搞一些利益事務，如派米、派飯、蛇宴等歡樂活動，至於有何宏願，則甚少人理會。就算不喜歡搞這些「實務」的，基於現實也不得不做。所以呼籲投票時，總有市民問：「投票係咪會有飯食先？」而心裏同時暗笑你「戇居」。

當權者樂於施行派糖等短期的「博掌聲」政策，也難怪自由黨的田

北俊到沙田的中產區派叉燒飯時（有點奇怪的就是通常派飯多在基層或貧窮區，因那些區的長者連開飯的能力也頗成疑問，但在中產區派飯，難道是想營造出非同凡響之效果？），有市民接受訪問表示以後會改投自由黨，因最少有碗叉燒飯吃，而之前投「長毛」梁國雄，卻甚麼也沒有。

因此利益為先的意識形態便在政圈大行其道，所以當我們控訴從政者短視時，有否想過是由大眾的意識形態所逼成？

註釋：

MBA即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的縮寫，中文為「企業管理碩士」。

第七章　官僚主義

甚麼叫官僚主義？

官僚主義即只按本子辦事，不靈活，不會因時制宜，不會因應情況不同而有不同之做法，只懂跟着指引辦事。不是以民為本，而是以指令為本，不會以人性角度去思考，抱着打份工心態，怕多做多錯，有爭議的事情可免則免。不會有長遠規劃和眼光，信奉不做不錯文化，有事只會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在不做不錯的文化下，產生少做少錯、多做多錯的心態，甚少有膽量嘗試新事物，儘管可能帶來正面的貢獻，但只要有些微機會做得不好而引致惡評，就寧願原封不動。

現在要政府推出新政策或改革，需有強大的民眾壓力、民間團體（NGO（1））無數次的催逼。當民意一面倒要政府改變，政府才會見步行步，推出小修小補去回應民怨和壓力，而非政府本身看到問題出現而自己先提出修改。官僚政府只會後知後覺，與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層次更是差之千里！政府不主動向前行，社會難有進步。

實例

見微知著，窺一斑而知全豹。從一些細小的事也可看出政府的腐

朽官僚。日本政府建築物於上世紀80年代已開始進行綠化，但香港政府要等到人家有良好成績，且多年後也沒問題才開始做，比日本慢了20年，而且只學到表面，沒吸收內裏精髓。香港政府的所謂「綠化」只是加點花花草草，並未透過建築物設計，去減低對地球生態的影響。

新加坡政府在橋的橋躉大量種植植物來美化，於是香港有團體建議政府也可這樣做。但港府以恐怕植物根部會滲入橋躉底而影響橋身安全為由，而沒接納。但問題是橋躉底下並沒有水份和泥土，植物根部是不會伸延到那裏去。

有市民投訴某屋邨內幾條燈柱有浪費電力情況，有關部門只派人去看看便算，沒有順便檢查附近以及整個屋邨的其他燈柱有否浪費電力情況，典型的官僚文化。

2011年1月，北非的突尼斯發生政變，貪腐的總統本・阿里舉家出走。但本・阿里的政黨不肯交出權力，令當地陸續發生群眾騷亂及暴動，子彈滿天飛，多人死亡或受傷，本港旅行社紛紛取消往當地的旅行團。當暴動持續近一星期後，香港的保安局縱使在旅遊界的壓力下仍不肯對當地發出外遊警示，令旅行社無法向航空公司退機位和為團友退回機票款項。可見政府官僚惡習太重，甚至到了威脅港人人身安全的程度。

現時政府建築的投標，開始接納一些環保節能設計，以低碳排放為目標。可是當那些建築落成後，政府從不驗貨，不去檢查承建商投標時的節能承諾和減排有否達標，而那些環保指標也沒人監察，沒有執行而

變得形同虛設。這令不少公司在投標時大吹怎樣環保、怎樣節能，以希望中標機會增加，因事後政府不會去監察和跟進。

日本政府要求當地學校用廚餘來發電，以免浪費，以及減輕堆填區的負擔。香港政府有見日本這方面的成功，也欲參考，可是船頭驚暈，船尾驚鬼，怕學校反感，只是提出用廚餘發電的指引，連獎勵性的誘因也沒有，結果大部份學校皆「睬政府都傻」，令計劃失敗。官僚心態令政府不敢硬性規定學校進行廚餘發電，怕引起爭議，結果甚麼也做不成。

回歸後按規定，所有政府部門包括禮賓府、政府總部、消防處等要掛國旗。可是消防處、海關、天文臺、入境事務處等多個部門在回歸後十多年還沒掛國旗，王國興議員在何志平任民政事務局局長時已多次去信提問，這種在私人機構只需一天便可回覆的提問，特區政府要數年後的2010年9月才回覆，效率之慢令人吃驚。

2008年泰國出現軍事政變，黃衫軍圍堵機場，港人滯留當地。但特區政府沒有像中國政府和台灣那樣，派包機接送僑民。直至有港人因趕赴機場途中遇上車禍身亡，港府才肯派包機。這種事後才補鑊的官僚心態實在令人切齒。

政府原先表明副局長和政治助理的薪酬是按表現評估而檢討。事實是民意對副局長和政治助理制度不滿，政府在評估後，對表現好的不予加薪，離譜的是，對表現未如理想的也不減薪。結果所謂「評估」只是

浪費金錢的公關騷，副局長和政治助理一律凍薪。賞罰不明，全出於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官僚心態，而因當初承諾會作評估，才敷衍地評估一番。

每年香港都會從廣東輸入不少於11億立方米的東江水。在2000年代中期，香港有幾年也出現剩餘食水，多得連儲存東江水的船灣淡水湖亦爆滿，而鄰近的深圳卻出現食水短缺的情況。可是港府寧願把多餘食水倒落大海，也不輸給深圳。除了批評政府浪費、不愛惜地球資源、官僚醜態畢現、自私自利外，我們又可怎做？

有學者建議把中環大會堂高座改為一個大型書城，但當時的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尤曾家麗（已於2011年退休）回答：「要牽涉很多部門的呀！」令建議胎死腹中。因一句怕麻煩就連建議是否可行也不考慮，政府官僚僵化的程度已經嚴重至連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地步也不如。政府遇到難題，只懂成立甚麼委員會，聘請甚麼顧問去討論一番，而不是即時去解決，總之就是一味的拖，一味的說要研究研究，就是沒有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法。當經過一段長時間，終於研究出解決方法時，已經人面全非了。最好的例子是金融海嘯來臨，政府只懂成立甚麼經濟機遇委員會；香港足球發展出現問題，民政事務局只懂聘請外國顧問公司研究一番，完全沒有第一時間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而最可悲的就是古樹塌下壓死市民近一年，政府才成立由唐英年領導的跨部門小組去商討問題，辦事慢三拍！更可笑的是，唐英年領導的樹木辦（2）及扶貧委員

會，在未有任何成績時已草草解散，問題仍舊存在，可見政府只為敷衍民意才成立甚麼委員會而已，並非真正有心解決市民困境。

沒嘗試就沒進步，出了錯便弄一個官僚架構作研究，如此社會只有退步的份兒。

成因

殖民地時代行布政司制，所有AO (3) 都是「中立的」，只是執行指令的工具，不可參與決策和政策制定，不用承擔政策的好壞後果。可見公務員的工作十分機械化，形成了官僚主義，即只按上頭指令辦事，盲目的服從order，不會對政策多加思考。

回歸後政府發現機械化的運作蠶食管治的思考和創意，令政策太死板和守舊。踏入港人治港年代，沒英國人於上頭，沒人再為香港擬訂各大小政策（除了有時中央「希望」於香港實行一些政策外），管治者必須自己制定政策，因此首任特首董建華推出高官問責制，以使港人官員有承擔地、肯思考的參與政策制定，實現港人治港，也希望造成政策制定與政策執行的分家，以免公務員負上太多政治壓力。

可是植根百多年的機械化官僚主義不是一時三刻就可改變。由於董治時期不少自己的決策，如八萬五、科技港、中藥港、廿三條推廣、銷售税推廣、禽流感事件、（梁錦松）於經濟低迷時大膽地加税、屋邨私有化等，效果未如理想，令一班高官飽受抨擊。結果突然要承擔大量決

策責任的管治者不敢再有新創意和大膽的嘗試，便重施故技，重當少做少錯、只聽命令的角色。

以前港府聽命於英國，現在特區政府理所當然聽命於中央，事事請示中央，如政改推動、自由行、經濟政策等。當中央無暇為港府的太多民生事務定下大綱時，港府便實踐無為而治，凡事只會求政治正確，打好份工，於任內沒有大爭議便可以了。於是房屋政策上取消長遠評估、教育與社福政策上取消長遠規劃，見步行步算了。而甚麼小班教學、累進利得稅、全民退休保障、固體廢物稅、復建居屋、取消一筆過撥款、立法監管樓宇銷售等措施也為了避免爭議而不敢做了。在懼怕人頭落地，而無接班人的情況下，管治者怎會不抱着打份工的心態呢？原本用意良好的問責制，因推行不順，適得其反，深化了政府的官僚主義，因個個都怕步梁錦松、楊永強、葉劉淑儀和董建華的後塵。結果政策制定的責任便由高官們轉給由特首委任的中央政策組，一個充滿大財團代言人的組職，所以政策諮詢會也有這樣情況，大量富二代憑父蔭而被委任，只有少數是憑實力而被委任，此乃特首為討好大財團和分餅仔所為，因此政府本身也不太重視那些諮詢會，只視為花瓶，形成惡性循環。

以前官員只是執行命令，因此調到哪個部門也可，只要執行力強便沒問題。現在的高官雖仍是於不同部門間調來調去，但由於現在是行問責制，局長等高官還要負責決策，因此出現人材錯配和外行人管內行人

的局面，如羅范椒芬、孫明揚、陳維安這些不是教育出身的管教育、不是環保出身的丘騰華和潘潔管環保等等。即使他們很勤力，在先天不足下，總比內行人管內行人差點，如若個別官員官僚心態深厚，那麼情況便更不堪設想。

政府部門各自為政

在沒有政黨法下，嚴格來說，政府不是一個團隊，只是特首委任不同獨立人士進入不同局和部門去進行管理罷了，彼此間沒有連帶關係，這便出現了部門間各自為政、互相卸責的局面。各局只求自保，不會關心其他局的死活。例如民政事務局申辦亞運，沒其他司局長出來幫手；環境局局長丘騰華要盡快更換歐盟一期巴士和削減巴士線，運輸局又不幫手；食物及環境衛生局推行自願醫保計劃，要一次過得到500億才能發揮預期效用，但財爺與財經及庫務局只肯每年批20至25億，直到500億為止，令食物及環境衛生局想一次過拿500億去推動滾雪球效應的功能發揮不了，令計劃大打折扣。

2008年5月，大埔汀角又有農田被非法傾倒泥頭，涉及面積3,000平方米。苦主彭婆婆報警求助，警方聯同規劃署、地政署等多個政府部門雖親眼目睹泥頭車出出入入傾倒泥頭，但他們竟袖手旁觀，反要求彭婆婆將土地還原，否則提出檢控，罰款可達50萬元！事件反映警方、規劃署、地政署等政府部門有法不依、執法不嚴，令無良建築商可以有恃

無恐、變本加厲，變相姑息養奸。政府部門各自為政，不肯聯手處理新界土地非法傾倒泥頭的問題，令問題無日無之。

問責制之失敗

董建華當年為營造高官負責任心、肯承擔的形像，以及避免公務員承擔政治風險、讓他們可專心執行命令，便成立高官問責制。可是問責制不問責，司局長級官員和公務員們分工不清，令原本應該保持政治中立、支援實行政策、提供專業意見的公務員，也要參與問責官員們的工作，包括面對立法會議員和傳媒的諮詢、推銷和策劃政策，這些全應只是問責官的責任。分工不清，令到公務員和AO士氣大跌，難怪AO的流失率近年不斷飆升，高達雙位數字。政府的過失導致問責制失敗，嚴重影響公務員的工作，為政府帶來管治危機。

官僚僵化，部門卸責

政府的官僚主義導致問責制失敗之餘，也令各部門間建立一套卸責文化來。大家只抱着打份工心態，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凡事少做少錯，當被質詢，便把包袱拋給別的部門去了。

2008年紅磡庇護工場一扇鐵閘突然塌下，壓死了一名清潔女工。事後發現，原來鐵閘並不是突然塌下，而是早已經壞了超過半年，可是政府建築署半年來也沒有更換損壞了的鐵閘，社署也沒做足警告以防範

意外，導致一條人命白白犧牲。社署和建築署在事後也只是互相推卸責任，可見政府辦事是如何的官僚僵化，更換一扇壞了的門竟然需時超過半年之久，效率之低簡直是世界奇聞！究竟是政府官員的能力問題？還是政府根本沒有把這些「小事」放在眼內呢？如果是禮賓府的鐵閘壞了，相信不用數小時，新的鐵閘已經安裝好了！如果在私人屋苑，壞鐵閘一早換好了。證明官僚僵化，根本是死路一條，非改不可。

2007年有市民投訴有人在荃灣郊野公園的公眾地方非法傾卸泥頭，但政府各部門如路政署、食環署互相推卸責任，沒有部門肯受理，結果出現了熱心市民自己清理那些泥頭的情況。政府的官僚僵化不單沒有改善市民的生活，還勞民傷財，一旦出現問題市民只能自求多福。

2005年，申訴專員公署曾炮轟5個政府部門在處理有市民於公眾地方晾衫的投訴時，互相推卸責任，所有部門只懂推卸責任，沒有出來解決問題，導致投訴接受，結果依舊。最後要勞動當時貴為政務司司長的曾蔭權出面才能擺平。滿以為曾蔭權做了特首後，情況會有所改變，可是政府官僚依舊，毫無進步。

2010年，食物及衞生局建議將現有的鑽石山靈灰安置所擴建，預計擴建後，將來每逢春秋二祭期間，通往該處的蒲崗村道及慈雲山道必會出現交通擠塞情況，需借用蒲崗村道學校村用地供掃墓人士泊車或上落客。當區學校村內五間學校已原則上同意借地，惟教育局指當局為學校村購買的保險「套餐」，並不涵蓋學校以外活動，當局亦不會動用公帑購

買非學校活動的保險，故拒絕借出用地。政府各部門互不協調和合作，未有共識便草率推出政策，而教局方面思維僵化，為求自保，絕不合作，苦了市民。此事足見政府部門間卸責文化如何荒誕不經，也足見曾特首從來沒有改善政府的官僚僵化陋習，曾特首根本沒有做好呢份工！

做事慢三拍

政府常常按本子辦事，即使有強烈聲音要求政府修改政策，政府本着官僚主義傳統，只懂拋出「會密切注意未來情況」、「在需要時會推出進一步措施」等老掉牙的回應，而不是即時直截了當地錯則改之。

雷曼事件發生，很大程度是因政府對監察那些所謂的衍生工具慢三拍。在衍生工具的市場已經大幅擴展數倍時，政府對銀行銷售手法的監管次數和人手沒有相對提高，導致政府對那些衍生工具和銀行銷售手法所知嚴重不足。

前平機會主席鄧爾邦被批評濫用公帑700多萬為自己買保險，但政府沒有對鄧爾邦採取任可處分，也不要求他辭職，令到民憤不斷升溫，可見政府仍然故我，處事慢三拍，無視民意的反彈。

強積金實行10年有多，先不評論應否成立有政府加入一起供款的全民退休保障，但10年以來強積金管理費過高，平均2%以上，不合理之餘，又大大削弱了市民的退休後保障。而強積金可用來抵消長期服務金和遣散費，更一直被人詬病（當初因推出時，正值科網爆破危機，於

是便出此下策，給僱主甜頭以換取支持強積金，原屬短期措施。怎料10年後，短期措施成為了長期措施，又是出於政府的官僚主義，不會主動改善政策！強積金原意也只是提供基本生活保障而已，而非更大保障，於現行制度，想有更安穩的退休生活，還是要靠個人儲蓄）。再者選擇基金經理的權力是在僱主手中，而非最終會享用那筆錢的僱員，即使基金經理表現強差人意，打工仔也只可忍氣吞聲，無法轉換基金公司；此亦減低了基金公司間的競爭性，反增其惰性；足見政府策劃政策時的粗疏和荒謬。

可是10年來，無數聲音反映不滿，政府不是充耳不聞，就是知錯而不改，可見做事慢三拍的官僚主義文化已植根政府心臟，影響政策發揮和民生。

政府多年來不肯修訂有關強積金管理費的政策，擺明是要打工仔把部份薪金奉獻給投資管理公司，變相剝削打工仔的收入。

強積金計劃也強逼打工仔把十分一薪金交給經紀去投資股市、炒賣和托市，明益大上市公司（更規定要以香港企業為主，除限死了基金經管的靈活度、顧客的利潤外，也分明送錢給香港的企業）。為何政府不成立一個官方管理部門去管理供款，或交由金管局管理，以後每年提供固定回報或和通脹等同的回報呢？這可令打工仔省掉管理費之餘，更加有意義的是給打工仔多點選擇，不一定要把薪酬放進金融賭海。除了明益大企業外，實在思考不到原因為何政府不肯採用以上建議。

影響極廣的紅隧過度擠塞、西隧流量嚴重不足的情況，困擾了香港10多年，但仍未解決。政府可以透過贖買方式，提前結束東、西兩隧的私營權，再成立統一收費機制；或延長東、西隧專營權，然後設上附加條件等方法解決問題，但政府就偏偏原封不動，甚麼也不做，讓問題一直延續下去。政府於2008年，高費委託顧問公司就3條隧道流量作研究，原訂2009年尾可提交報告，但過了2010年頭兩季，報告也未完成，政府效率之低，令人咋舌。

政府做事也不是真的常常慢三拍，也有反應迅速的時候。在陳冠希淫照事件，警方迅速拘捕了鍾亦天，引致網民大感不滿，繼而爆發極為罕見的網民上街向政府示威。在蘇錦樑以名片代替入息證明一事中，入境處也迅速高調宣佈，會找出那位對外爆出政府醜陋的勇敢員工。應快的不快，不應做或不應快的，政府卻快速的做，難怪常招民怨了。

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政府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一直也被人狠批，但還是死性不改。

早幾年古迹景賢里被業主破壞，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在事件被披露3日後，於譽論壓力下才把景賢里列為暫定古迹，免其繼續被破壞。雖不能說反應過慢，但政府就是不肯修訂過時的文物保育政策，令同類事件隨時再次發生。足見政府慣了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無心從源頭根治問題。

打份工心態

特首這崗位關乎港人的福祉和將來，任重道遠，應是為理想而擔任的。特首和港人就好像一家人，特首是家庭支柱，掌管着家裏的財政、策劃着家庭的未來。特首就像家庭的父親，是一家之主，賺錢養家，時刻想着如何令家人幸福，為家人帶來美好的將來和生活。所以特首應是時刻想着港人福祉，為港人創建一個美滿、公平、人人平等的社會，讓港人能在一個公義美好的環境下生活，不被任何特權和外人所欺負和剝削，為香港策劃一個美好的將來，作好長遠規劃，而不應抱着打份工的心態，只求討份糧。可是曾蔭權競選連任時，開宗明義的說要「做好呢份工」，視當特首為打份工而已，時評人王岸然更形容Donald政府為有史以來最沒有個人特色的時代。

特首和政府一定要和市民好好溝通，而同理心是溝通的必需。可是當前的特首和政府只是抱着打份工心態，得過且過，充滿官僚主義，視程序守則為基要，漠視市民心聲。這說明了為何政府的所謂與民溝通只是公關手法、政治化妝、做騷，為交差而已，無意去明白、理解和幫助溝通對象。怎樣的溝通便產生怎樣的施政，因此政府的政策常脱離民意，不得民心。

不願正視問題

當香港或中國不少問題如貪腐、假貨到處流通、人權問題、政府專

權、種種國計民生問題等等浮現時，一些官員或從政者會說：「其他國家，好像美國，也有類似問題，為何只指責香港／中國？」縱使這是事實，但卻只是在迴避問題核心，沒正視問題；只在兜圈和轉移視線，企圖把錯誤合理化。連問題也不去正視，遑論溯本尋源的去解決問題。

其他國家也有類似問題，就應吸取人家的經驗和教訓，避免重蹈人家的覆轍；不能諱疾忌醫，更不可因別人犯錯而容許自己也犯同樣的錯。這種官僚心態只會令犯錯後錯失改弦易轍的機會。

很多時政府為了推卸責任，把公眾資產變賣給私企，而又缺乏監管，令到資產變賣後，所面對的惡劣情況更加擴大。當年房署旗下商場和街市有很多舖頭租不出去，並非沒有人願意租，而是房署把每個舖位的用途限死，不容變更。例如是劃給作藥房的舖位，只能作藥房，不能賣衣服、賣文具。房署本身官僚，不懂變通，引致很多舖位長年租不出去，最後把資產賣給領匯，但又不保留監管權，令小商戶飽受領匯欺凌。

無人性的政府

為人父母官要以民為本，否則所行政策除不能造福人民，更因沒以人民為依歸，而欠缺民心背向，造成政局不穩。假若掌權者沒人性，奴性比人性大，不頂天立地，是小人，為了權力地位而埋沒良知，怎會以民為本？又怎會以人性角度去看社會問題？又怎會愛民如子？又怎會設

身處地去看待貧窮問題？又怎會令人民甘心地簞食壺漿的擁護政府？

在趙連海事件，曾蔭權表示沒意見 (4)，沒為公義發聲，顯示奴性比良知重要，實屬冷血。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由初初不肯回答記者提問，到各港區人大、政協都關注事件及劉夢熊政協去信中央表示司法不公，是冤獄後，才表示暈刑值得商榷，但又留下尾巴，指有時父母為了孩子，行為可能會過激，似乎是暗示趙連海過激，罪有應得 (5)。這乃沒人性的涼薄說話，企圖為不公的司法開脫。如果因無辜地喝了毒奶粉而患上腎結石的是他兒子，他還會這樣說嗎？在網上寫幾篇文章，在法院外喊幾句口號，是過激麼？

這些沒血性的奴才，奴性蓋過人性，其施政又怎會以人性行先？反之奴性使然，絕不做「阿爺」不高興的事，儘管那是正義和應該做的。相由心生，Donald常常黑面，苦澀眉皺，面沉額赤，被批為面目可憎，不是他沒才能，而是他那副奴相，及囂張跋扈的面貌。人可以不飽讀詩書，但不可以不分是非黑白，可惜香港卻由這樣的人管治着。當人們問及為何我們要為社會不平而發聲，可以趙連海一句說話回應：「社會是應該有公義的！」

順帶一說，華叔司徒華與世長辭，他生前雖煢煢孑立，但不少民運分子也視他為父親，其中王丹更熱切祈求能來港於華叔靈前鞠躬致祭，為此更不惜先後承諾不會過夜、受訪等等，態度卑躬屈膝，與孝子無異。可惜保安局李少光局長無情地只以一句「哀悼不一定在香港」回

應，而曾蔭權更多次不回應。致祭先人是體現中國人慎終追遠的美德，親到於靈前鞠躬奠酒是表示對先人的尊重、不忘、敬愛，盡顯孝道。若說在家哀悼便可，不用親臨靈前，那麼每年的春秋二祭，千萬孝子賢孫在家中沉思就是了，何必千辛萬苦的親臨墳地掃墓？李少光局長的回應不但未盡用一國兩制的自主空間，也有違孝道，完全奴性蓋過人性，可惜他卻是管治香港的高官。

2009年，智障學童唐偉庭入稟法院覆核教育局要求年滿18歲智障學童必須離校的不公義和歧視智障學童的措施敗訴，被律政司追收獲批法律援助前的27萬多元訟費，面臨破產。唐偉庭雖然敗訴，但教統局也撤回方案，證明教統局把智障學童離校歲數上限降至18歲，不但是歧視智障學童（因正常學童到了18歲也不需強制離校），且沒有顧及智障學童的學習實情，沒有顧及他們腦部發育較慢的現實是如何荒謬。

而律政司竟忍心對為公義發聲的智障學童唐偉庭追收27萬訟費，雖於法律上可行，但未免不近人情，且近乎冷血，以及極之官僚。有熱心市民願意舉行籌款為唐偉庭支付訟費，但唐偉庭的母親表示，即使收到款項，也會全數轉贈「關注特殊教育權益家長大聯盟」去繼續和政府抗爭，為智障學童爭取應有權益。好一個現代官逼民反、政府用司法用強權去打壓為公義為弱勢發聲的例子。

律政司冷血的例子還不止於此，2010年中，食環署檢控一名本身有肢體傷殘的新牌雪糕仔（雪糕車持牌人）阻街和無牌售賣糖果（因車上

不但賣雪糕，還賣珍寶珠糖），律政司司長黃仁龍表示檢控是合適的，因食環署已警告過該雪糕仔，但不獲理會。最後法官質疑案情輕微，不應該執法，輕判雪糕仔罰款100元。

此事除了反映食環署職員只懂按本子辦事，沒好好運用手上的酌情權，也反映父親也曾在街頭賣雪糕維生以養家的黃仁龍是何等冷酷。據聞此君是香港未來特首熱門人選之一，如萬一當選，香港之未來不堪想像！

註釋：

(1) NGO即Non-government Organisation的縮寫，即「非政府機構」或「非牟利組織」。

(2)「樹木辦」全稱為「樹木管理辦事處」。

(3) AO即Administrative Officer的縮寫，中文為「政務主任」。

(4) 請參看2010年11月14日《東方日報》港聞「港區人大聯署促放趙連海」。

(5) 請參看2010年11月13日《東方日報》港聞「誰不政改誰下台」。

第八章　政府欠缺長遠規劃

欠缺長遠規劃，影響民生

政府欠缺長遠規劃，直接影響到市民的生養死葬。回歸前政府有10年的房屋政策規劃，會評估未來10年的住屋需求以預備供應量。但回歸後取消了10年規劃，還廢除長遠房屋策劃諮詢會。政府於房屋供應上，只是被動的見步行步，事後補鑊式的，在供應嚴重不足時才增加一點供應，而不是事前預測和籌備，導致供應長期遠低於需求，市民難以置業。當市民難以安居時，又怎會對社會有歸屬感呢？

死葬方面，2010年下半季，政府突然要覓地興建骨灰龕場，但費盡心思卻因處處遇到地區聲音反對，而無法覓得適合土地。曾蔭權突然實行其他的承諾起來，突然的強政勵治，在會議上高調地狠批各大區議會不合作，乃「各家自掃門前雪」。

但問題核心是骨灰龕不足並非甚麼新鮮事，為何政府到現在才為覓地如此緊張？原來這和政府欠缺長遠規劃有關，導致政府「突然」得悉問題存在而要臨急抱佛腳。回歸前政府一向也有尋找地方作骨灰龕場用地，且還有10年規劃和每年一次的檢討骨灰龕供求量，縱使亦遇到諸多阻滯最後也能未雨綢繆，化解阻礙。可是回歸後，政府把10年規劃和逐年檢討停止了，因此才出現「突然」不夠骨灰龕的問題，而近來私

營但非法的骨灰龕場大量出現也是源出於此。如果政府保有一貫的長遠規劃，很多問題便可避免，反之卻是自找麻煩。

政府短視原因

2010年《施政報告》出籠，內容並無改變政府欠缺長遠規劃的文化，還是抱以打份工心態去撰寫香港的未來。評論員葉兆輝也批評港府欠長遠規劃：「整個《施政報告》沒有為香港的未來畫出一份願景。」前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林煥光更批評2010年《施政報告》說：「曾蔭權過去5年的《施政報告》都是斬件式零售或處理問題，沒有整體、長遠及宏觀的政策。」林又指人口老化和貧富懸殊是香港最嚴峻的問題，曾蔭權沒針對該兩大問題提出長遠解決方法。

到今天政府還不多願為香港作長遠的願景規劃，一反負責任的管治者常態，當中不乏因制度缺憾而成的原因。

沒政黨法

在欠缺《政黨法》的背景下，政府不用為下屆管治者負責，只需但求任內安穩，少點爭議便可。所以政府政策多只是短期性和一次過的，缺乏長遠規劃。政府的想法不是為博一時掌聲，便是避免政策具爭議而引致民望受損（因在沒選票授權下，民意已成為量度政府成績的唯一數據性指標）。不少具爭議性的政策，除非到了拖無可拖或中央授意必須

盡快完成，否則政府只會盡量拖延，留待下屆處理。如董建華時代便把最低工資立法和《競爭法》兩大政治炸彈留給下任政府；曾蔭權又把管理骨灰龕場地法例立法、廿三條立法、置安心的實行等問題留給來屆政府。

打份工心態，避免有爭議

沒《政黨法》下，各屆政府間沒必然連貫性，各局間也沒必然關係性。特首和高官只需在任期內做好份內事便可，所以便產生打份工心態。為求任期內平安過渡，不要重蹈董建華腳痛下台和楊永強等辭官的後塵，現屆特首和高官自然盡量避免惹起爭議，施政規劃如非必要，不要太長久，否則夜長夢多，最好是一次性派糖以獲取掌聲。譬如政府喜歡一次性免公屋租金和差餉、綜援出雙糧，卻不去回購東隧與西隧、不肯開放電力市場以打破兩電壟斷、不行中學小班等。除了港英年代留下的八萬五、醫療融資外，甚少長遠規劃的政策，難怪前行政會議召集人鍾士元這樣評價：「特首無政黨背景，亦沒有清晰政綱，令施政缺乏方向，推行政策時諸多掣肘。」而被喻為開明派的富豪鄭家純則這樣批評：「政府不肯作長遠承擔，往往只推出短期措施來解決問題。」(註)

而關愛基金的成立，也只是延續派糖去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思維。和以往不同的是以前政府獨自派，現改為官商統治集團一起派。這因兩者都明白到唇亡齒寒的道理，不能只由政府去獨自承擔社會怨氣，要大家一起承擔，才能減少所謂的「仇富」情緒。但利益輸送、官商壟斷的格局沒變，九牛一毛的小恩小惠不能平息民憤，不能解決深層次矛盾。

霸權主義

為了合理化其無長遠規劃，政府常以自由市場作藉口，遇上問題只懂說市場自會調節，而袖手懶理，因而埋下政治炸彈。對於貧富懸殊，政府只懂說這是自由市場下必然的事，但忘記了政府自己有責任去徹底解決民生問題，不可賴於自由市場便撒手不管。

政府奉行的是帶有自由市場色彩的霸權主義，而非真正自由市場，「自由市場」四個字被政府利用來逃避責任。政府喜歡時便大管特管，不喜歡時就放任不理，那算甚麼自由市場呢？例如政府死不肯開放電力市場和大氣電波，任由大財團壟斷，又不引入新的競爭，在土地政策上只行大型勾地政策，令中小型地產商難敵大地產商。霸權主義即政府運用權力，透過政策把一些市民廣大利益送給其統治聯盟，包括普選權送給「阿爺」，錢財給大財團（包括透過不發小販牌、市區重建後趕絕街舖和批准領匯上市去打擊小資產生存空間，令小市民憑小本經營上流空間大減；再在重建和新土地開發上，大肆興建新商場以擴大大財團的經營機會，亦把原本屬於小本經營的空間改作為大財團營商空間，令富者機會越多，而小市民機會越少）。

註釋：

請參看2010年10月7日《蘋果日報》港聞「鄭家純：仇富不能怪市民」。

第九章　政府大花筒

如以金錢投入計算，香港政府對民生確是頗為照顧。政府每年投放在社會發展的開支，包括教育、醫療、房屋、環境保護、衞生等等，超過總開支六成，比台灣和新加坡的四成半還要多出百里。可是從成效來看，卻令人產生疑問：為何政府投放了那麼多金錢，民生及社會發展還是百病叢生？這是因政府雖願意投放金錢但並不代表投放得宜，也不代表政府財政做到量入為出，應花便花；反而是有些地方不應投放金錢，政府卻大投特投，出現大花筒情況，以致金錢投放了卻得不到效果，反招致麻煩。

屈指算算，便能隨意數出政府大花筒的例子。政府包辦的地區和基建工程所付的顧問費，往往高出私人所付的地區和基建工程數倍（以沙中線為例，原本造價為380億，後來升至600億，而政府給予港鐵的顧問費竟高達100億！）、動用7億元購買500萬劑流感疫苗，結果約一半要掉到垃圾桶內、用1,000萬去設計一個對旅遊沒幫助兼惡評如潮的飛龍標誌等等。更不要說政府的工程造價常超標／失預算了，例如高鐵未動工已由300億加到669億、南港島線由70億增至100億等。其實只要每年看看審計署的報告，實例多得一年半載也數不完。財政常見大花筒，難怪民生改善只得寸進，多年來政府大花筒陋習日復如舊，不管每

年審計署如何提醒要量入為出，但政府總是意見接受，陋習依舊。這不單浪費大量納稅人的血汗錢，也令民生難得改善。

政府算死草

經過金融風暴一役，政府為減少經常性開支，便向公務員開刀。可是政府開源節流的方法只是治標不治本，沒去精簡那個已經架牀疊屋的公務員官僚系統，而只是在公務員薪酬上落手。諷刺的是，政府可能嫌公務員架構不夠尾大不掉，還在司局長以下加設職位，設立副局長和政治助理，但所得結果只是一個大問號及招來更多民怨。在2000年後，新入職的公務員、醫管局轄下的醫護人員、官立學校的教師，不論在起薪點、薪酬遞加點，都比以前入職的為低，造成了同工不同酬的情況。政府又多以短期合約代替長期合約去聘請公務員，使公務員鐵飯碗的神話不再。可是那些短期合約工作，不但沒有福利，在薪酬上也比長期合約的為低，這便製造了內部的不和諧，大家在同一職級、同一崗位上工作，待遇竟可差之千里，造成內部分化，打擊士氣。

政府一方面算死草，為了省錢不惜製造內部分化，但另一方面卻大花筒，厚待高層人員，有悖常情。

第十章　獅子山下精神

獅子山下精神最常出自政府之口，由政府提出，目的是要掩飾其照顧貧苦大眾不力和開脫改善不了貧富懸殊問題的責任。卸膊地把責任推於市民身上，可惜久而久之，只會讓人了解到此乃欲蓋彌彰的做法，惹人失笑。

文化人陳景輝也這樣諷刺政府：「政府只談獅子山下精神，不談獅子山下電視／電影赤裸裸地反映和暴露社會問題和基層問題。」(1)

政府帶頭破壞獅子山下精神

獅子山下精神一大特點是互助互愛。上世紀50到70年代，工業發展，男丁往工廠工作，女士則安坐家中料理家務，以及進行一些小手作去幫補家計，例如麟膠花、縫製成衣、務農等等。當時人們普遍住在自搭的木屋和寮屋內，和周圍鄰居守望相助，如幫手湊仔、一起煮飯、一起擔水、為外出工作的鄰居看門口以防盜、互相借用柴米油鹽等等，盡顯鄰里互愛之情和守望相助之義，發揮獅子山下互助互愛精神。這情況乃建基於寮屋、木屋是一間連一間的密集式建築，容易促進彼此間的交流。

可是現在豪宅及「偽」豪宅大建，家家深鎖門戶，昔日互助互愛的

情景已非常罕見，只在一些舊式公屋還能見到。住在有會所、有游泳池、有雲石大堂的你，能說出鄰居姓甚名誰嗎？

政府的重建方針和住屋供應，也是以冷漠陌生的私人豪宅為主，舊式公屋和寮屋只有清拆份兒，新建的房屋全無考慮鄰里關係因素，只以豪華、注重會所設備為主導，使獅子山下精神不復見，卻慘被政府扭曲利用為不肯積極改善施政的藉口。

獅子山下精神另一大特點是自力更生。於是政府對改善貧富懸殊束手無策時，便大講特講自力更生，叫市民要靠自己，不要靠政府（事實上，政府也靠不住）。鼓勵人們要努力、憑一對白手去上流，沒人會有異議，但政府一面叫人自力更生以掩飾自己的無能為力，一面卻不思進取，帶頭放棄獅子山下精神。回歸後每當遇上經濟困境時，政府只懂攤大手板要「阿爺」打救，乞求CEPA（2）、自由行、放寬內地人來港買樓買股（此舉不正中欲在境外洗黑錢的內地貪官們的下懷嗎？）等等，全無半點自力更生的傲骨。風水輪流轉，有這樣不肯奮鬥的政府，要靠中央打救，盼內地同胞作香港的救主，難怪內地同胞越來越看輕香港人了。

綜援制度漏病，不鼓勵自立更生

當在職貧窮人士，憑着勞力而令收入有微薄增長時，便會立即失去原有的福利補助，令實際收入減少或不變，得不償失，不能刺激起受

助者的勤奮心。例如「自力更生支援計劃」，原意是若領取福利補助者找到工作賺取工資後，只需扣減部份綜援金額，讓受助者的收入維持增加。但豁免額最多只是2,500元，即若工資6,000元，便要扣除3,500元。在豁免額那麼低之下，根本難鼓勵失業或就業不足人士投入勞動市場，因其損失的成本也很高。多年來不少政黨都有反映此情況，但政府一直不檢討或尋找新方案以解決問題，可見政府官僚之恐怖。

註釋：

(1) 請參看《獨立媒體》內「可以有不一樣的懷舊嗎？——談《歲月神偷》」一文。

(2) CEPA即Mainland and Hong Kong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的縮寫，中文為「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內容包括關稅等一系列措施以減少中港兩地經貿的阻礙。

第十一章　順民

香港人常被稱為順民，一向想法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即使遇上不公，反抗不多，程度也不深，與外國相比，香港的抗爭運動可說太弱，激烈程度完全給比下去。究竟香港人為何特別和順？

殖民地時代，政府無論在民生政策、政治體系、司法制度、政策取向，都向洋人大傾斜，對華人不公，為的是替洋人製造強大的競爭優勢，無論於教育或是就業競爭上；也為的是讓其管治同盟享有特權，去佔有大量資源。

權力和資源應是人人平等，人人有份的，這樣對華人不公，華人自然不滿和反抗。殖民地政府為減低華人的反抗情緒和心態，便設法去麻痺華人思想，使他們不會產生反抗意識，以威脅殖民地政府的統治地位——一個搶奪回來且不合法的統治地位。要潛移默化人民的思想，需從教育和宣傳落手，從根本上令人民不會產生反抗不公義制度、不公義統治、不公平政策的思維。於是在教育上，避談「人民」和「國民」，改稱「市民」，去淡化香港人的民族情緒；又大力教育市民要「自強不息」、「逆來順受」、「自力更生」、「不要靠政府幫助，要靠自己」，而美國前總統甘迺迪那句「不要問國家為你做了甚麼，要問自己為國家做了些甚麼」（甘迺迪總統說這句話的背景，不多不少是因為美國在20世紀起的公共開支方針由過往的着重經濟效益轉為平等，但又取不到平衡及

太多浪費公帑措施，令開支倍增，而想削減公共的經常性開支），更是大派用場，把人民作為國家的主體倒置為政府才是主體，把政府角色由服務人民，塑造為管制人民。實行那些宣傳和教育目的是希望人民不要去問為何政府政策不照顧自己，而要對政府失責及那些只照顧洋人等自己友的不公平政策視而不見；也希望教化到人民不去要求改革，以為只有靠自己或等運到，命運才會改變；當遇到困難、貧窮，不要追究因由、不要問政府是否政策出錯或是制度不公平，而是靠個人努力去改變命運，這就是政府口中的獅子山下精神。這些全部都是殖民地政府用來荼毒華人，令市民失去反抗意識的毒藥。

所以當有人要求政府改變政策，便會被抨擊為懶惰、不肯努力，被指為大蝗蟲；要求社會改革，為民請命和推動政府作出改變不被視為貢獻，而是破壞秩序之舉。

回歸後，特區政府被戲稱後殖民政府，皆因施政方針還是傾向統治同盟和大財團，在制度體系和政策上仍是極不公平，所以繼續大力鼓吹那些自強不息等等口號以轉移視線；再去抹黑和醜化那些敢於出來反抗的市民，以維持自己是經人民授權的統治地位。

現在政府和部份管治聯盟內的商界人士，宣傳指基層市民生活困苦、跨代貧窮，是因為命運，是因為不夠努力；即使你一天工作十四小時，也不算努力，因你賺不到錢；你當保安、清潔是因為蠢，因你沒錢去炒股炒樓。反之你去控訴制度不公就是怨天尤人。

多年來政府還同時宣傳有錢便代表一切，只需向錢看和努力賺錢，

令香港人慢慢成為順民，對不公義的制度和政策，多只選擇默默承受，只要有錢便可。政府每年的授勛名單，都有無數商人，在2010年，更有人因贊助過兩次國慶煙花而獲勛。如此香港怎會不變成一個有錢便等於道理、富裕便等於成功的功利主義社會呢？

政府的宣傳也令市民對出來反抗之人投下奇異目光，認為他們是懶和蠢，有時間應該想想怎賺錢，甚麼社會公義根本不值一文。但我們有沒有想過，如果沒有人為不公義出來反抗，社會怎會進步？

因此，當年「六七反抗」被描繪為暴動，反抗手法的武力和不智（因欠缺經驗而部份手法走火入魔），被人用放大鏡無限放大，把所有反抗的人全都打為暴徒；卻對「六七反抗」之成因——政府制度和政策的不公義統統避而不談。這與現在政府稱社運人士過激，無限放大他們推鐵馬的行為，實有異曲同工之效。

樓奴

香港人真悲哀，只想安安樂樂置頭家，讓家人有個舒適的環境生活，讓子女有個舒適的環境長大，卻要花大半世努力，才能供得起一層樓。要有錢供樓的首要條件是需有一份穩定的工作；想有份穩定的工，想收入穩定，有時難免要對公司或上司的無理要求吞聲忍氣。為了五斗米，在現實下，有時不得不低頭，變相助長了一些用心不良的上司或老闆為了貪念而進行剝削。樓價過高令供樓者普遍成為樓奴，而樓奴又加深了順民文化，形成惡性循環。

包容

在香港如此一個民風和順的社會下，有一詞經常被濫用，就是「包容」。

當有權有勢者面對批評、面對異見、面對指責，往往說對方不包容他們的聲音，以轉移視線，避談權貴者被批評的說話是否合理。實際上，不包容別人聲音的，是那些不理批評內容，便先斥責別人不包容的權貴。諷刺的是，有權有勢者的一言一語一舉一動對社會也有着深遠影響，當他們作出不義之舉，被無權無勢者譴責是理所當然的，但有權有勢者反指別人不包容、不理性，是輸打贏要，在道理上說不過人便反去指責人。

從來只是有權有勢的人才有本事和資本去包容弱勢，弱勢根本連包容的本錢也沒有，因為他們只有被欺負的份兒（所以才稱為弱勢）。欺負弱勢的權貴，面對弱勢本能式的反抗，竟反指是不包容。不包容之說在香港大行其道，與順民心態有關。

吳宗文斥說要求他為弱勢祝福的信徒為魔鬼、全球禱告日主辦單位對要求為弱勢禱告的人進行打壓，反斥人家不包容，便是好例子。

訪問

受訪者：馬國明（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兼任講師）

筆：現在常說「香港核心價值」，例如要政府援助、爭取福利便被人批評違反香港核心價值；又例如不大力發展經濟、不推動愛國教育，

又是違反香港核心價值，究竟甚麼叫「香港的核心價值」？

馬：數年前，一班所謂學者在報章上登廣告，提出類似叫「香港核心價值」的宣言，自此「香港核心價值」一詞便多人提了。但香港根本沒有甚麼核心價值，因為過於主觀，沒客觀定義，只是各說各話。就像五區公投前，梁燕成牧師在報章上寫功能組別價值，還引用John Walls的理論，但當然是扭曲了John Walls的理論，但竟然沒人出來批評這些扭曲事實的所謂價值。這些所謂價值根本太含糊，任由演繹。

筆：香港政府常標榜自己行的是資本主義，但近年來，不少聲音，包括經濟學者林本利也批評香港政府行的不是真的資本主義，而是以資本主義為名的霸權主義，你有何看法？

馬：香港行的絕不是絕對的自由市場，但有些政府不想執行，而公眾有強烈聲音的意見，便以自由市場作推搪。一些公營服務，如隧道、電煤供應，有專營權，且還有政府給予的利潤保證，這些根本不是自由市場；又例如大氣電波發牌，全由政府話事，有多重限制，已不是自由市場。至於政府是否行霸權主義，看《地產霸權》(註)一書便知。

筆：政府常被批評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做事沒遠見，尤以曾蔭權政府為甚。為何應該以民為本的香港政府，如此缺乏長遠視野？

馬：董建華政府是想有作為的，董看出香港租金過貴，嚴重損害競爭力的問題。董有一套較完整的管治思維，洞悉單靠公務員治港是不夠的，於是便搞問責制，但最大問題是搞得只有半桶水。而曾蔭權是典型醒目仔、抱着打份工心態做特首，懂看時勢和聽老闆話，特別是在不同

情況下聽不同老闆的話，如地產商和中央。而曾注重的是政治化妝，曾又說過要講務實，講長遠則沒用，是從根本上否定長遠規劃的好處。因此政府凡事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做事沒遠見。

筆：現在民間充滿仇富、仇商的說法，究竟仇富、仇商是否存在？為何會出現這說法？

馬：這說法在1997年前已有，包括報章也有說。這說明直選議員只懂搞福利主義、派免費午餐，又說香港不需民主，只需自由便可。殖民地時，政府已從行政吸納華人富豪、精英分子，把他們委任在各式各樣的諮詢委員會，於是施政只需和商界傾好便可以。97前有句說話便是諷刺這情況：「Hong Kong is ruled by the Hong Kong Royal Jockey Club, Hong Kong ShangHai Bank and Hong Kong Government in that order（香港是由賽馬會〔因大部份權貴皆是賽馬會會員〕、匯豐銀行和香港政府所管治的，而排名是順次序的。）」所以當香港說要行民主改革時，那班在統治聯盟的既得利益者當然反對，便出現不同言論，如福利社會、仇富等來反對香港民主化。維持殖民地以來一直實行的精英統治制度、功能組別、小圈子選舉，正是把這些統治聯盟利益系統化。這說明為何官商勾結出現了。

筆：那麼要怎樣才能推倒這統治聯盟利益系統化？

馬：因政府和大商家是「自己友」，故此誰做特首也沒分別。要改善問題就要推行民主，而民主建基於政黨政治，不能沒有《政黨法》，使管治者有班底，未執政已建立長遠方向、思維和施政理念。

筆：還有一種說法說民粹主義出現在追求民主的香港，究竟何謂民粹？民粹是否真的出現了？

馬：民粹即是做一些令人民快樂，卻附帶嚴重後遺症的事，而同時又不能解決問題。最近將軍澳堆填區擴建事件、申辦亞運事件，所有政黨皆反對，背後存在民粹主義。當政策是設立一些厭惡性的措施，便出現。但歸根究柢是香港沒有長遠政策，因政府沒長遠規劃而出現厭惡性政策時，政黨只能民粹，避免不得民心，卻沒把問題解決。政府自己也很民粹，沒決心去長遠規劃去處理重大問題，如貧富懸殊，任由其惡化，有問題不去解決，當民怨大增，政府便只懂派糖去博一時掌聲，卻沒去解決問題根本，非常民粹。

筆：現在有一種說法，指政府的城市規劃是為地產商而設的規劃，無論是開發新區或重建，興建的全是讓地產商賺取暴利的豪宅，為何會這樣？

馬：不是規劃出了問題，而是因工業北移，香港經濟轉向服務化、金融化，政府便同時要搞好包裝，即是搞好市容去吸引外資、遊客。大建豪宅便是搞好市容的政策。以前只在半山區、南區和九龍塘有豪宅，現在則周圍、所有地區、連舊區都要處處見到豪宅。但這結果令市民負擔得起的樓宇越來越少，加上停建居屋，使樓租也豪宅價起來。

註釋：

《地產霸權》一書由潘慧嫻所著，顏詩敏翻譯，天窗出版社於2010年出版。

第十二章　話語權爭奪(1)

世代之爭？

近年80後、90後的出現，被視為與上兩代人爭奪利益。首先，不應以年齡來劃分人群，因此世代之爭的說法不大好，較準確的用語是意識形態。意識形態簡單來說有三種，分別是「求變」、「維持現狀」、「沒意見」。當然前兩種可再仔細劃分，但暫且先放置一旁不說。不同群組間的爭奪，通常是「求變」與「維持現狀」兩組人間的爭奪。爭奪的就是話語權，哪方擁有話語權、能獲得較多沉默一群的認同，哪方便可佔上風，進而使自己的訴求能成真。由於人人皆不同，每人對不同事件的看法也有異，因此每人每次身處的群組也可不同，例如今次處於「求變」，下次處於「維持現狀」，甚至隨時間而改變，今天「沒意見」，明天轉為「求變」。當任何一方處於壓倒性優勢，而事情還有轉彎的餘地時，另一方必大舉出來反抗，造成互相爭奪的局面。

就以高鐵事件作例子吧。政府在2009年時，形勢看似在西九建高鐵的方案定必通過，支持方案的可歸類為「維持現狀」。那些反對在西九建高鐵的市民便出來發聲、集會，務求說服社會反對高鐵方案，令議員們改變投票意向，使方案不獲通過；而這些不想西九方案通過的市民，可歸類為「求變」。當「求變」的一方聲勢越來越浩大，使一些議員

改變投票意向（例如民主黨）、及得到越來越多輿論支持（包括主流和非主流傳媒）時，主張「維持現狀」的一群感到威脅，便開始出來群起反擊，期望減弱對方的聲勢、讓話語權回流。他們的行動包括舉行集會，游說輿論和「沒意見」的市民等。

政改方案也一樣，是「求變」與「維持現狀」雙方在輿論支持、支持人數、議員取態上不斷角力。雙方都希望能得到比對方更多的支持，從而得到話語權，令自己的訴求成真。當年廿三條撤回、董建華腳痛落台，便是對廿三條將要立法、董建華繼續執政「求變」的一群成功壓倒「維持現狀」的一群，得到更多支持而獲得話語權，令訴求成真。

當然「求變」的一群往往能發揮出較大力量，因為他們必須積極，才有機會改變現狀、扭轉局勢。也不要奇怪為何遊行示威的人總是「求變」的一群，只懂反對，而責怪他們搞事，因為遊行示威者通常是反對政府某一政策或現存制度，很少會是支持政策或擁護政府而出來遊行示威，除非有着數，如「蛇齋餅糭」(2) 或反對力量很強大，感受到威脅才會出來，例如政改一役和當年撐廿三條。

每人對不同事件基於不同考慮，會有不同取態。可是政府對群組間爭奪話語權的舉動看成是世代之爭，再從世代之爭裏去尋求減少不同世代間之爭拗的方法，簡直是行錯方向。政府是假定了人們因出生年份的不同而出現爭拗，漠視人人每次可能在不同組別間游走、每次取態皆不同、同年代的人也有意見分歧的事實。因此政府想出來的解決方法，都是建基於錯誤的假設上，錯上加錯，沒有成效。

政府令致社會不和諧

沒有成效頂多是浪費研究的金錢投入和時間，但政府因掌權者和社會上身處較高權力位置的人，是在1980，甚至1970年之前出生的較多，便把社會分割為80前和80後兩群人，二元對立起來（政府也把對政府政策常持反對意見和要求較快步速改變現有制度的人歸納為80後），把問題簡單化歸納為年輕人欠缺上流機會和收入不如意，然後在輿論上煽風撥火，「勸告」80後不要諸多不滿、不要生事、要安份守己等。有時為了在輿論上佔優和爭取「沒意見」市民的支持，更不惜抹黑80後為不積極進取、只懂投訴、只懂怨天尤人、懶惰、比上一代人差、激進、暴力等等。更甚的是，政府為了「合理化」自己對80後的指控，不惜把反對意見最多、最多參與遊行示威的人以莫須有罪名拘捕（例如在中聯辦開香檳而被控襲警的葉浩意、常常遊行的陳巧文和社民連成員、支聯會成員），醜化他們為搞事分子、不學無術但卻在破壞社會安寧；還以社會和諧為藉口，勸說80後不要反對政府。當然，有些時候，警員在清場，即要清走留守在政府總部或馬路的抗爭者時，肢體碰撞在所難免，雙方因而都被批評為暴力，是有點不公。基本上，絕大部份前線警員和抗爭者也是克制的。而留守政總、佔據馬路的行為，以現時的香港文化來看，是破壞秩序，警員也有清場的責任，但我們卻要問，為何抗爭者卑微的要求，只想和官員對話，也要如此以身犯險？是否政府的偏聽固執逼成？可是政府的抹黑、醜化和標籤化行為，卻正是導致更多人不

滿政府以及社會更不和諧的源頭（另一大社會不和諧源頭是政府施政不公，這源自制度上本身的缺憾與人為施政質素問題）。當政府帶頭製造社會不和諧，又不正視自己施政上的失誤，反諉過於提出指正和反對意見的人，社會又怎能夠處於安定繁榮的局面呢？

民粹、不理性、福利主義

對「維持現狀」的一群來說，「求變」的一群威脅着他們現有的政治權利或經濟收益，所以有時雙方會用上一些標籤，去醜化對方，去弱化對方訴求的合理性。最佳的例子莫過於曾蔭權推銷2010年政改時，在一公開場合醜化反對政改人士是阻着巨輪轉（即「阻住地球轉」），說對方是少數（但民意調查是反對政改方案的多一點），暗諷反對的不算真正民意。曾蔭權、唐英年等高官，不但沒去了解反對聲音，和他們溝通，反而製造敵我分化，為求營造政府政策得到支持的效果，不惜令社會更趨分裂。當時政府提出一個沒進步的政改方案，但包裝成有進步，去推銷一個「假進步」方案。可是推銷一個「假進步」方案已表示政府誠信有問題，那麼民主怎「起錨」？政府推銷假貨便想「起錨」和以為沒有人反對，真是太天真太傻。

民粹主義、不理性、福利主義等口號，是在話語權爭奪時常用來抹黑對方的。尤其「大搞民粹主義」和「大搞福利主義」兩句口號，便是想現有政制、權力分佈「維持現狀」的政府和其統治聯盟常掛口邊，對

「求變」的在野政黨所說的話。

當兩方出現爭論初期，擁有實權的一班會以事論事，以理論理，雙方透過講道理去爭取中間市民支持。但當作用不大時，便要加強火力，甚至抹黑和攻擊對方。譬如一些人認為現有社福安全網照顧不足，想改變現狀；或之前工會們認為工資保障不足，要立最低工資法去改變現狀，另一些想保持現狀的既得利益者及擁有相對性大權力的人，便會攻擊出來爭取權益的人為搞福利主義、爭取改善工資待遇的為民粹主義。又例如2003年時，反對廿三條一方的聲勢不斷擴大，想維持廿三條「將會」通過的政府和其統治同盟（那時他們怎會估到最後田大少會掉轉槍頭呢！），便群起出來攻擊反對聲音為不愛國、不理性、誤導市民。

當市民上街想爭取回自己的權益，指出既得利益者的不是和剝削行為，提出社會的財富分配不應嚴重偏頗和不公平時，「仇富仇商」、「分家產，搞共產」的罪名便常被加諸身上。那些剝削別人的既得利益者則把自己包裝得道貌岸然，搬出「獅子山下精神」、「自由市場」等等理論，卻曲解那些精神的本義，把自己的侵略行為合理化。這些偽右派人士，卻同時害苦真正的經濟右派，令他們被社會人士錯認是與既得利益者同一群，是在為虎作倀。

但這些不愛國、不理性、搞民粹主義等「罪名」根本沒客觀標準，是雙方在爭奪話語權時的一些手段和策略，企圖把焦點轉移、弄糊議題。而當有實權的統治者用上此等手段，就會加深雙方矛盾。因市民是

難以苟同想改變現狀便等於不理性、出來訴說反對意見便等於搞民粹和剝削別人言論空間。當此類手段運用次數越來越多，政府又不去改善問題，久而久之便造成深層次矛盾。

不論強方或弱方，都可把別人標籤，例如富有者標籤爭取改善待遇的基層為「懶和蠢」、「不去努力，只懂靠惡」；而政府在社福政策上所用的口號，如「用者自付」、「自力更生」等，不多不少也在暗示需求援助者是懶惰和不發憤，卻在佔用社會資源。至於貧者可標籤欲維護自己權益的富者為「無良」、「為富不仁」。但強方當中，一些是主流傳媒老闆或與有權的統治者關係良好，彼此間有種種轇轕時候，在多種途徑攻勢下，容易令人先入為主，產生優勢；弱勢那方則多會利用互聯網，在網上媒體反擊。

其實甚麼「沒上一代能幹」、「不肯捱苦」、「食古不化」、「中女」、「港女」、「毒男」、「港孩」、「怪獸家長」、「宅男」、「電車男」、「剩女」等等專有名詞，是各種傳媒炒作人，有意無意對自己蔑視的「人群」給予的一些以偏概全的標籤。但當這些標籤影響到人們的形象與自尊，甚而影響部份人的搵食機會、就業機會、上位機會，他們就不能以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心態待之，便會群起反擊。由於不少負面標籤是加諸新生代，所以才有世代之爭之說。一些基層市民其實只是希望社會變得更美好，想改變政府過往偏袒大財團的施政，想保衛本土文化，而非要為搶奪不屬於自己的利益或生計遇到問題才站出來。由於涉及到金錢、利

益、權力，政府和話語權掌有者便以錢、權、利、買不起樓、找不到工作等話語來解釋，以「三四千元人工都會有出頭天」、「慢慢努力等機會」等話語回應，沒心溝通但裝模作樣地扮着在聆聽意見便做成牛頭不答馬嘴、捉錯用神的局面。訴求不被正視，怨氣便日深，抗爭行動便越來越多。

這些爭拗也影響着社會的和諧性。當政府和其統治聯盟把年輕人的不滿扭曲為世代之爭、參與對新生代負面標籤、抹黑爭取權益的一群為推翻原有規則；把反對者的不滿說成是對上一代開火，標籤他們為「搞事」、「過激」、「不理性」時，只會深化矛盾。所以我們常聽到政府回應以「一起理性慢慢再討論」、「我們要自強不息，不要凡事投訴」、「用和平手段表達意見啦」等話語。有時政府為了證明指控訴求者為「搞事」、「過激」、「不理性」是正確的，便進行多些拘捕「搞事」分子，營造他們「不理性」的形象，企圖抹黑他們的爭取手段為「過激」，所以近年便多了政治打壓，乃政府不惜以法治來作政治抹黑。

當市民提出官商勾結、利益輸送的質疑和控訴時，我們的政務司司長不去反省是否制度和政策上出了甚麼問題，反訓斥那些人不分青紅皂白 (3)。試問由此等自以為是、抹黑反對聲音的二世祖當權，香港的未來會好得到哪裏去？最悲哀的是此等領導人在根本裏已誤解異見聲音，難怪雙方鴻溝日深，使香港難以安寧。

可見深層次矛盾，有頗大程度是政府造成，政府有責任解決，因解

鈴還需繫鈴人。政府和其統治同盟應透過講道理去說服大多數，透過改善表現去減少反對聲音，而非主觀地以口號去攻擊異見。

對於想改變現狀的一群，希望政府能推動種種改革，有一句說話形容得很貼切：「做，找死！不做，等死！」

不可強把每代人比較

每一代人，或多或少的總會覺得下一代人不如他們，自己比下一代優勝。這是基於每代人的生長背景不同，難設身處地看不同年代的人之難處。而上一代人因經驗較豐富，人生閱歷較優勝，經歷過失敗，也經歷過成功；相反，下一代還是白紙一張，較幼嫩，相比之下，當然是生活在地球上多一倍歲月的上一代較優勝，但事實上不能這樣比較，否則只會增加兩代人間的代溝。

人有千萬種，每人的經歷和處事手法也不同。只籠統地以年齡劃分作兩班人，再將兩班各自獨立的人拿來比較，也有點兒戲。而上一代總認為比下一代理所當然地優勝的想法，不多不少是源於時光流逝，世界快不再屬於自己，在無形恐懼下，才會用有色眼光醜化將會替代自己的下一代。正如公司來了新同事，屬自己的下一級，居上位的如怕有天那新同事會威脅到他地位，總會找理由去安慰自己，認為對方能力不如自己。當我們踩低後輩、抬高自己的時候，有否忘記自己也曾經歷那情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不要忘記自己也曾處於學習階段，也有出錯

的時候，這樣做不但剝奪了未上位者的機會，對別人有欠公平，且只是簡單地把一大撮新投入社會的人朦朧化，無論對他們累積人生經驗或讓其他前輩去了解他們，都會因先入之見而令他們扣上不必要的枷鎖，反掩蓋了他們的長處。

身體要靠新陳代謝才能健康，社會亦一樣，要不斷新陳代謝才能延續下去。如我們不給機會下一代，不肯放手，讓他們從失敗中成長，那麼社會便不能健康地承傳。再者每個年代也有爭取反對聲音，我們不應以洪水猛獸視之。

有衝擊才有改革，有改革才有進步

經歷過二次大戰、香港淪陷、日軍屠殺的長輩，部份會覺得即使文革下的中國，已經比之前好得多，不應有過多苛求；而現在的中國和香港比以往更是大躍進，所以會不明白為何年輕人還不安於現狀，見到年輕人出來遊行示威，便視為搞搞震。部份老一輩，經歷過上改、文革，會認為現在的中國和香港縱有很多不足之處，卻已大為進步，不會再有甚麼要求，因此他們較少參與抗爭，寧安於現狀，不怕不夠好，只怕比以前更壞，所以抗拒改革之聲，不大認同「80後」所為。當獅子山下精神被用作叫人安於現狀的口號／工具，部份老一輩的人便容易被麻醉。

生活基本需求會隨時間、幸福度、社會文明度、風俗等改進而相對增加的，但當基本需求得不到滿足，便構成損害。遇上損害，人們會出

來抗議，衝擊現有規範。沒有衝擊，當權者會自動自覺改革，去革新現有的病態政策嗎？社會不斷進步，時間不斷流逝，不去改革，結果不進則退。

訪問

受訪者：邵家臻（浸會大學社會工作系講師、專欄作家）

筆：現在讀報章雜誌，滿是青年人問題的報道，援交、吸毒、懶散、毒男、港女等等，總之問題處處。究竟年輕人真是有那麼多問題，還是社會對年輕人世界的解讀有不同？

邵：青年問題最大的成因是成年人世界不懂解讀青年人間出現的現象。我先從care and control的角度入手。對於青年問題，政府往往只從control角度處理。例如上世紀60年代擔心青年影響公共治安和秩序，便多辦青年舞會去讓年輕人發泄精力，使他們無多餘精力生事。到70年代則透過家庭管理、學校生活去影響青少年的公共秩序，以防他們參與黑社會。到90年代，則由control走到care，因明刀明槍的control成效已不大。政府開始多講青年創意，強調青年人是社會棟樑的說法，提出民族教育和成長的天空計劃等等。但這care也只是control的延續，只是隔靴騷癢式的關懷，思維還是高高在上，脫離青年社群，因政府害怕真正的青年聲音。所以甚麼青年高峰會、交流會、驗毒計劃都只是象徵式的，只為表示政府有關懷的心，卻無誠意聆聽真正的青年聲音，那麼對

青年現象自然出現錯誤的解讀。

接着從chance and choice入手。這chance是建立在物質的基礎上。政府認為青年人有怨氣、有投訴、有不滿，全因他們處境有困難、搵不到食、沒有工作、無法向上流、人工低，沒有choice，才會對社會有不滿，才會發聲上街。但很多時，年輕人並非因本身利益受損才不滿，而是他們關心自己身處的社會，認為社會不應是這樣，不應充滿不公義，不應被地產霸權把持，不應奪去本土文化，所以才想去改變現狀。但因政府的錯讀，誤以為年輕人因本身利益受損，沒有工作才引起不滿，便只懂提供chance讓年輕人搵食，以為就能解決問題。政府和成年人的管治思維過於商業化，太功利的看青年人文化，結果便觸不到問題核心。

Problem and question也可解讀問題。青年現象到了政府眼中，便成為了問題。政府把青年現象問題化，當成病毒看待，認為要消除，令青年覺得被侵犯，使兩者難以溝通。青年現象出現，政府只懂調動人手去消滅問題和作馬後炮式的解釋，而非走進社群去了解實情，對生命世界看得過於簡單。例如援交現象出現，政府只是掃蕩、救火、立法、打壓，卻沒去聆聽和嘗試了解現象出現的原因，只懂滅火，卻不懂去尋找火種源頭。政府應放下身段去了解現象，不要每每隨便的使用強硬手段去處理問題。

筆：政府用先入為主的心態去解讀青年人現象和文化，又不肯放下身段去嘗試認識年輕人的內心世界，那麼政府是用甚麼價值觀和思維去

理解青年？

邵：政府是用中環價值觀去解讀青年。認為青年一定要名校畢業、有好成績、常獲獎，才是有價值，才是發展良好。政府抱的全是精英心態，以為中環便代表全港，只是以管理邏輯去解決問題，用數字去看待問題。簡單說是用宮廷式的管治，由上而下去處理問題，不容下而上的開放參與和質詢。官員只求別人信任他，卻不希望別人質詢他和挑戰他，在表面上造成增強政權被認可的效果，全因這個政權不是來自人民認可。

筆：不單政府錯讀青年文化和現象，即使輿論也認為現在的青年人很不濟，遠不如上一代。究竟事實是否如此？還是只因話語權在政府和已上位的一班人中，當他們出現錯誤的解讀，便為年輕人扣上不必要的樑鎖？而以世代論去把年輕人從整體社會分割開，用「代」作衡量單位，又是否適當？

邵：首先何謂一代也難以搞清，也根本難用一代來解釋所有人。成年人基於地位、超卓心態定下對年輕人的論述，用過去眼光看現在的問題，難免出現偏頗。而當話語權在定下論述的人手裏時，青年人難以參與本身的論述中，他們只是被論述者。當無辜被貼上不公平的標籤時，要花很大的氣力、精神和時間去消除那些不必要的標籤和誤解。而標籤別人者，只是草率地去評論人，令自己失去了解事實的機會。這使年輕人花過多時間去證明自己和抗辯一些非事實的事，那他們怎可專心貢獻

社會？

筆：對於政府的施政，你有何看法？

邵：在沒有民主下，政府的老闆不是市民，只是以看守者身份去延續殖民地管治思維，直到真正把香港的管治還給市民為止，即真正有民主為止。現在的政府只是過渡政府，因此官員不會真正的走入群眾，去理解群眾，以避免知道太多問題而要去做過多的工夫。政府怕多做多錯，所以只是不聞不問。當問題浮現眼前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不會主動去作長遠規劃，形成政策上的短視，使很多問題只能暫時止痛，難以徹底根除。

註釋：

(1)「話語權」即對某事情或物件擁有解釋／演繹權。可參看2011年3月3日《AM730》刊載，梁文道所寫《話語「拳」》一文。

(2)「蛇齋餅糭」指服務居民的工作者以價惠價為居民提供蛇宴、齋宴，以及免費派發月餅和糭。

(3) 請參看2011年1月15日《明報》港聞「唐英年：當心『車毀人亡』」，報道唐英年於一公開場合對80後發表的「車毀人亡論」。

第十三章　貧富懸殊

成因

自從上世紀80年代工業北移，造成大量本地勞工被釋放回待業市場，當中不少轉型為服務業、零售業從業員，而一些年紀較大、教育程度較低的（到現在還有三成勞動人口教育水平在中三或以下），難與大專生、中七畢業生於就業市場一較高下，只好投入清潔、保安、飲食業等中低技能行業。突然一批在嬰兒潮時代出世為主的勞動力大量投入清潔、保安、飲食業，使這些行業出現嚴重傾斜的供過於求，令這些行業的勞動叫價力大降，於是被僱主剝削的情況日趨普遍。這些勞動力就如食物鏈中的蝦毛，總是被小魚吃掉。當然那些小魚未必真是想把蝦毛吃掉，但食物盡被龐然巨大的鯊魚們全吃掉，一點也不剩，魚兒們為求自保和生存，也被逼去食身無三量肉的蝦毛了。這就造成了香港出現結構性失業，也是貧富懸殊一直存在的主因之一。

可是二十多三十年來，政府從無試圖在根本上解決問題，沒為香港作結構轉型，包括乘着優勢發展輕工業，和高端科技工業，卻還模仿美國，作過度消費經濟型結構，但沒實質生產基礎支撐。走美國之路，難怪也走上了美國貧富懸殊的路。經濟結構出現不平衡、經濟根基存在真空、要改善情況只能作轉型的嘗試。但政府一直欠缺魄力和長遠視野作

結構的改革，頂多是推出不論大中小節也模糊不清的六大優勢產業，使經濟結構單一化和貧富懸殊衍生的問題一直困擾香港。

亞洲很多國家和城市也經歷過像香港面對的工業他移，例如遷往生產成本較廉宜的南亞和東南亞。但這些地區因當地政府投入改造，發展新興工業，令經濟結構成功轉型，由單一化走向多元化。這些地區同樣是生產成本高，但其政府能發掘出當地優點以發展該地的強項工業。譬如新加坡、台灣、日本、南韓發展和研發高增值產業、高端科技製造業、電子業等。亞洲四小龍中，除香港外，其餘也成功轉型，工業佔南韓四成的GDP，台灣和新加坡的工業佔近三成GDP。可是香港政府只懂空喊「大市場、小政府」口號，不會主動就着情勢變幻而作改革，反把改革和干預劃上等號，令香港錯失多次改革時機，政府還是毫無長遠規劃於產業改造，又沒策劃新興工業。

遇上經濟環境惡化，香港政府只是在福利保障上投放資源，不從經濟單一的源頭改革，最終導致福利上的開支不斷有增無減（因經濟單一化不斷持續，不斷製造新的受害者，當國際經濟環境差劣時候，受害者更多）。只在福利保障上着手，僅能減輕傷害，卻不能從根本去解決問題。只懂修補禍害，而不處理禍害源頭，問題不會有真正改善的一天。發掘香港優勢，發展本土工業，既可增加政府收入來源，亦可減輕對賣地收入的依賴，有助改善單靠高地價賣地而衍生的問題，可是政府不敢，令改革無從說起。

政府政策傾斜產生貧富懸殊

因小圈子選舉，內裏是大財團操控着大多數委員，特首和其班子無可奈何地由大財團們去選擇，成為管治同盟核心，使政府自然地傾向大財團，要時刻取悅他們。

人是有貪念的，絕大部份人也會貪心和不知足。富有的人也不例外，他們縱使富甲一方，也會想盡辦法去獲得更多（當然窮人也是，但往往有心無力，縱使有力，在長期被剝削下也難以獲得更多）。想獲得更多，便要從別人身上拿取。當政府政策向某一方嚴重傾斜，而那方不論在經濟實力和政治權力也具有絕對優勢，再加上政府為奉迎而給予特權，那方自然容易從別人身上獲得更多，而那一方就是大財團。這便形成富者越富，貧者越貧了，因為連貧者應有的財富也給富者奪去了。政府政策上傾斜，沒考慮競爭機會是否平等、資源爭奪是否建基於一個公平或合理的平台上。只要是原本有勢力的，包括財勢和權勢，便可輕易剝奪弱勢一方的勞動成果，而又沒有機制去制衡，造成貧富懸殊現象。

當一個社會是如此不平等，權力集中在既得利益者時，制度也不會平等，因為制度只會被既得利益者利用作為保障自己利益的工具，令制度起不到平衡的作用。

文化人葉輝這樣形容香港的貧富懸殊狀況：「在經濟不景時，為何不作投資炒賣，只是努力工作，強積金也要無辜少了一大截？房屋變成負資產？」

例子

商界常要求大減利得稅，表面上是大中小企業都得益，但另一方面擁有大批土地的大企業瘋狂加租，中小企上繳的地租／舖租也抵償不了減稅的優惠。減稅時，大企業支出減少，但員工未必獲得加薪，分享不到減稅的利益。如此社會不是富者越富才怪？

實況

政府對貧富懸殊的認知是自由市場的副產品，認為只要做大經濟個餅便可。但10年內GDP增長超過三成，餅做大了，貧富懸殊反而深了，皆因窮人的錢在市場被壟斷下，分配不合理，流到富人手上了。

香港基層雖算不上絕對貧窮，但情況也很惡劣。在香港如此發達的城市，低下階層和領取綜援家庭，多達四成開支用於購買食物上，還未計醫療、交通、書簿費、教育等。

貧窮的通常標準為家庭／個人收入中位數的六成或五成。即使香港社福機構已用上更寬鬆的四成，目前有多達20萬家庭活於貧窮線下，126萬人屬於貧窮（1）。收入最低的一成人口，月入平均3,000元，而最低的兩成人口則為6,000元，但最高收入的一成人口卻是平均97,000元。1997年最貧窮的家庭，平均月入4,100元，但到了2009年，已降至3,000元；而較貧窮的兩成家庭收入，也由回歸前的8,700元降到2009年底的6,000元。在2008年的統計，入息低於平均綜援金額的家庭高達19萬

多，而15至59歲人上，有約38萬收入低於平均綜援金額。根據匯豐的調查，香港人均流動資產約235萬港元，比新加坡高出六成，可是香港九成以上公司是中小企，八成人月入少於2萬，顯示香港大部份的財富落入大財團中。

香港的貧窮之嚴重，在於缺乏脫貧機會，脫貧階梯不斷買少見少。低收入人士與家庭的實際收入不斷下降，分享不到經濟成果。富者越富不是問題，但貧者越貧就是極大問題。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相對貧窮」家庭／個人越來越多，產生更多怨氣。而貧窮家庭數目大增其一原因，是政府於2005年實行計分制 (2)，再配合公屋富戶政策，原本貧窮家庭被逼分拆，使獨居老人／雙老家庭與年輕單人貧窮家庭大增。

財富分配不均，不是多勞多得，而是誰擁有土地便支配財富分配和擁有絕對權力。富裕者長期壟斷經濟勞動成果，令富者收入不斷增加；而基層即使努力工作，也得不到應有成果，收入不斷下降。富者越富、貧者越貧，造成貧富懸殊的局面。香港每年GDP超過2,000億美元，最富有的一成人口分得當中的35%，而最窮的一成人口只分得當中的2%，貧富差異極大。現在月入2萬元的，已是人工最高的那20%；月入少於1萬元的，更佔就業人口的一半，且收入不斷在下跌；而月入少於6,000元的佔了六分一的勞動人口，可見貧者佔着較大比例，富者只佔微小的比例，卻壟斷着絕大部份經濟成果。

最大的問題是即使經濟有增長，基層收入反而下降。2000到2010

年，每年GDP有2-4%的增長，但收入中位數卻由10,500元跌到9,000元。貧窮人口（月入少於5,000元）更由少於100萬增至126萬，佔本港人口約兩成。收入少於4,000元的貧窮家庭，更在15年間，由12萬增到18萬，增幅近五成。

因欠缺社會公義和流動機會漸減，財富過份集中在某少數且固定的一群人，使全面性的社會發展難以持續，像上世紀80、90年代的巴西和阿根廷一樣，中產面臨不斷萎縮局面，使社會民怨以幾何級數上升。

在難民潮時期來港的人對前景充滿夢想，在經濟起飛年代肯努力的人更是一片光明。70、80年代出生的年輕人，對前景雖不感樂觀，但仍然有夢想，肯站出來爭取；可是90年代後出生的，恐怕連夢想也不敢有了。

賭

窮人和基層因流動機會減少，即使努力工作，收入和付出仍不成正比，實際收入不斷下降。但不代表基層和窮人不想有出頭天，他們也想發達，在拜金主義社會下，有錢便等於有地位，有錢自然得人認同。在缺乏上流階梯下，窮人只好靠賭博來賺大錢。在波馬盛行下，窮人更樂於沉迷賭博，透過贏錢來贏回自尊和肯定。據明愛(3)做的調查顯示，八成的賭博人口月入低於15,000元，而五成的賭博人口月入低於10,000元。貧富懸殊惡化，直接導致基層賭博人口增加，對社會風氣影響深遠。

說起賭，不得不提政府在賭這一方面如何不守承諾。2003年，政府為爭取市民支持賭波合法化，承諾會資助戒賭機構，包括成立一個幫助病態賭徒戒賭的基金——平和基金。可是賭波合法化後，平和基金只得一些熱心人士和賽馬會資助，政府卻連一分一毫也沒付出過，沒遵守承諾。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政府沒誠信，如何取信於民？

政府不正視貧富懸殊

要徹底解決貧富懸殊是極為艱巨的事。但要改善情況，只要立下決心，認清問題根源，願意放開心扉的去做，絕對可以做到。可惜的是從政府多次言行，反映政府連正視貧富懸殊的心態也欠奉，遑論改善這種病態情況。

2010年《施政報告》，政府不提貧富懸殊，只說香港有貧富差距。但貧富差距根本不是問題，而是必然現象。除非實行均產制度，及實行得完美無瑕，否則各人的財產便有異，貧富差距必定出現。香港面對的問題不是貧富差距出現，而是貧富之間的相距極之懸殊，且情況不斷惡化及持續。政府的《施政報告》避談貧富懸殊四字，明顯是不敢正視問題，只懂運用政治化妝，巧辭令色的去掩蓋事實。連事實也不敢承認，又怎寄望政府會決心改善問題，堵塞政策的漏洞？

最壞是政府死也不肯訂下貧窮線和貧窮指標，又不訂下減貧目標及長遠的減貧策略。若定下指標和貧窮線，便有目標追求，政府最少有方

向和目標依從。但連量度標準也不訂，目標也欠奉，問題又怎改善？政府是連決心也沒有，怪不得對貧窮問題不作整體深入的研究，也沒甚麼深入分析展示出來。當痛症出現，個別問題逼在眉睫，才去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政府政策不周造成貧窮問題

現實的稅制對有錢人有利，例如沒有累進利得稅、在樓宇炒賣狂熱時，印花稅率低，或可容易地轉為公司資產作交易以逃稅，又沒有向地產商徵賣樓稅。如果政府改善稅制，在稅制上加強財富再分配的效力，便可改善貧富懸殊問題和為政府增加更多收入（那到時根本不用搞甚麼關愛基金了！）。可是基於商界和專業界的反對，政府連討論也不敢，遑論實行。

對於未能升上資助大學的學生，在「消費與被消費」文化下，擔心學歷不足，令就業沒保證，難覓出路，便只好借貸去讀私營的副學士和私立大專的自資課程，可惜這些學位在社會上還沒得到普遍認同，給人次等／低等學位印象。在職位市場結構不變，拿着大專沙紙也不等於會找到好工下，這些學生的出路根本沒保證。政府的副學士政策除了令一班草根子弟未工作已債台高築，令基層青年未工作已不如更貧窮的負資產，根本毫無效益。

政府處理貧富問題思維

政府處理貧富問題思維僵化，在預算社福開支因貧富懸殊惡化而需大幅增加下，為了減輕財務負擔，推出的應對政策往往是向小市民開刀，而非針對大財團壟斷經濟成果的根源。不論銷售稅建議或是醫療融資計劃，政府都是不分貧富的向所有人同時集資，而不去考慮累進利得稅、富豪稅等那些要能者多付的集資方法。累進利得稅和富豪稅會否對富有者造成不公是值得討論，但這裏想點出的是當政府認為要擴大收入來源以應付開支遞增，往往是不論貧富地向所有人開刀，包括基層和貧窮人士，然後取之於斯、用之於斯，把所得收入「左手交右手」地投放回基層身上，此豈不是多餘之舉，兼浪費行政手續開支？但這便是政府的思維，極奇怪哉！而這也道出政府漠視普羅市民一向也有交稅的，只不過不是直接交給政府，而是偷天換日地，通過高租金、高樓價、高物價，交稅給同屬管治同盟的地產商。

面對貧富懸殊問題，政府不想法去解決，反而設立更多架構和程序、製造更多問題，充分反映政府的官僚色彩。面對貧富懸殊，政府只懂設甚麼兒童發展基金、伙伴倡自強計劃，但無甚效用。花額外的行政費和設龐大複雜的架構去處理問題，卻沒對準問題根源，打擊市場壟斷、中產基層不斷被剝削的源頭。政府只懂重牀疊架，浪費公帑，又徒勞無功。

財富再分配

隨着貧富差距越來越懸殊，不單只左傾學者主張財富再分配，不同的學者、文化人、關心時事的人也認同政府應加強財富再分配。長期處於最適宜居住國家首十位的北歐三國——挪威、芬蘭、瑞典便是成功地實施財富再分配的佼佼者。香港過往對財富再分配的討論甚少，不是因為過往沒有貧富懸殊的情況，而是因為政府經濟思維較右，較少提供相對傾左的財富再分配討論；以及普遍對財富再分配的誤解，誤以為實行財富再分配便等同走上50、60年代內地所行的道路，向着共產主義過渡。香港不少居民是因懼怕當年主張社會主義的政權統治，而由內地搬離到香港，如在香港提出財富再分配，不是要重揭傷疤嗎？

只要我們明白到財富再分配的真正含義，便不會再覺懼怕。財富是由整個社會上不同的人和階層一起去生產的，但由於過程中一些難以避免的錯配，令有些人付出較少卻分配得更多，有些的付出被低估，因而分配得較應得的少，致使分配出現不公平的情況。因此社會需要一個中間人或公正人（即政府），公正不阿地把財富按着各單位的付出多寡、努力程度、貢獻多少，再用一套公平的標準把分得不公平的財富，嘗試公平點的再分配。再分配的措施包括徵稅、提供福利等手段。因此財富再分配不等同財富均分，不等同共產，而是按付出和努力去分配財富，當中因各人貢獻的差異，必定出現貧富差距。但香港如此嚴重的貧富懸殊、低下階層的付出和努力被過份剝削，反映香港的財富分配極不公

平，這也反映政府在財富再分配上做得不好，有改善的必要。

人民追求的不是均富、人人身家平等，而是追求公平，追求機會的平等。

訪問

受訪者：何喜華（香港社區組織協會主任）

筆：香港如此繁榮的城市，為何仍出現大量蝸居、板房、籠屋的情況？

何：這和貧窮問題有關。香港房屋相對以前是改善了，公共房屋政策安置了大批人。但板房籠屋還大量存在是因入住公共房屋還有很多關卡。例如單身人士根本很難輪候到公屋，每年只得千多二千個單位分配，但卻有5萬多人輪候，另外新移民亦難入住公屋。政府認為單身人士房屋需求沒那麼大，但單身人士財力有限，又沒人分擔住屋費用，月入超過7,440元已不合資格申請公屋（4），而出去租100呎套房已需3,000至4,000元。政府忽視夾心階層的需要。

低下階層依附舊區生活，因舊區工作機會較多，生活費用較便宜，而新公屋區在偏遠地區，交通費高，就業機會少，所以一些低下階層寧在市區住蝸居也不欲被分配去偏遠地區公屋。加上政府安全網千瘡百孔，很多精神病康復者、有點積蓄的單身老人，也不在公屋和綜援保護之列。而現在的市區重建改變了舊區面貌，小型店舖全被鏟走，市民創

業學師機會大減，舊區生存空間不復存在，舊區居民生活負擔加重。

筆：這對人和社會有何影響？

何：對人的影響很大。蝸居板房地方很擠逼，環境惡劣，生活空間沒保障，對個人自尊和健康有莫大影響。很多住在蝸居的小朋友不敢讓同學知道自己住在那些地方，但政府對他們卻不理會。

對城市形像也有很負面的影響。國際傳媒，如CNN(5)、BBC(6)、《先驅報》也曾頭條報道香港的板房情況。香港人均生產總值24,000美金一年，全世界排第五，身為國際金融中心，但仍有如此情況，天堂地獄共處一地，政府不是無能就是無良。

筆：現在基層面對甚麼問題？

何：工作機會少。和上世紀70、80年代的窮不同，當年只要肯捱，收入有改善機會，有出頭天。但現在肯捱也沒出頭，甚至連想捱的機會也沒有。晉升機會少了很多，機會沒以前那麼多元化。以前肯當學師，可有獨立創業的一天，但現在發展全被財團壟斷，小市民就業想出頭的機會沒了，只能幫財團打工，但又被剝削。香港因經濟結構單一，市民難透過工作改善生活。失業人數一直維持在十多二十萬水平。香港工作種類少，所靠的零售服務業被大財團壟斷，中小企生存空間小。但香港經濟轉型也不易，最大關鍵是沒有工業，工業可引伸很多行業的發展，金融卻不能，令工作種類少了。可是政府從不面對問題，從沒為低下技術工人對工作求過於供提出過解決方案，這樣香港基層的生活情況會越來越差。政府不主動在香港尋求發展經濟出路，不去創造就業機

會、香港只有死路一條。所謂背靠祖國，等運到，只有金融地產得益。

全世界已在靠財富再分配去改善民生和就業困難問題，但香港政府只以積極不干預為藉口去拒絕進行財富再分配，沒透過公共資源空間去改善社區環境、舊區生活、強化老人服務支援、投放小班教學。政府思維停留在80年代、從沒進步過，收縮開支令基層情況更黯淡。

筆：政府在扶貧政策表現怎樣？

何：政府在扶貧政策上是沒方向、沒決心。常說沒錢可申請綜援，但忽視不肯拿綜援，和安全網照顧不到的人。香港有80多萬人收入還低於綜援水平。經濟政策不足是跨代貧窮、貧富懸殊的成因。政府對低收入家庭支援不足，從不去想怎樣長遠保障他們和改善他們的發展與工作機會。這也是浪費人才，減弱競爭力。

筆：你有何建議去改善問題？

何：一定要把政府的思維和腦袋換掉。大市場小政府、積極不干預這些以前有效，但現在無效的思維要換掉。資本主義到現在無效時，應有社會主義思維配合。北歐那些生活幸福國家已全擺脫資本主義，但競爭力還不斷上升，因那些政府對改善人民生活及教育投放很多。但殖民地留下來的官員是不會改變過時思維，死不肯推行小班教學，生果金也斤斤計較，又不肯改善舊區居民需要。政府得過且過，做多點又怕死，左顧右望、根本沒改革決心，使社會狀況惡化。多給基層十多二十億就處處為難，減有錢人稅，少收幾十億則豪爽答應。真的不明白為何政府這樣、只能推說是富豪有政治特權，可向中央打小報告，又基於劣根

性，怕有權有勢的人。政府不是民選，缺乏民意給予權力，使政府不敢去打破那班既得利益財團的壟斷。

筆：天水圍等偏遠區常被標籤問題重重，實情如何？

何：這是城市規劃問題，政府把低收入的人集中在一兩個區，把他們流放邊疆。當區工作機會少，出區工作交通費又貴，只有留在原區等死。政府出賣他們，市區地只留給地產商，不留點給有需要的人，把那些人放在偏遠地區自生自滅，最多提供綜援，沒有積極提供就業機會。這引發很多問題，如家庭暴力、濫藥等。當區的人缺乏宣洩渠道，又不能向政府反映，又不敢起革命，只好把不滿向內宣洩，向家庭成員發泄，引致很多家庭問題。

註釋：

(1) 香港社會福利聯會於2010年10月4日，公佈其作出的研究結果，根據貧窮數據，香港於2010年上半年為止，有約126萬人處於低收入水平。

(2) 計分制是房委會於2005年引入，為一人家庭輪候公屋申請時進行計分，積分越高，獲編配單位的輪候時間便按理越長。

(3) 明愛是天主教香港教區建立的社會服務機構。

(4) 根據2010/11年度的公屋輪候冊入息限額，單人家庭是月入7,440元。

(5) CNN即Cable News Network，中文為「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6) BBC即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中文為「英國廣播公司」。

第十四章　高地價政策

賣地收入佔政府總收入約三分一，如計上印花稅、差餉等土地相關收入，更佔政府總收入的一半。政府主要稅收之一的利得稅，約一半來自地產及銀行業（香港只有約5%的企業需要交稅）。銀行約三成的收入來自樓宇按揭。以上顯示政府要維持低稅率、應付龐大的公共開支（教育、醫療、社福），很大程度需依靠賣地收入（假設政府的收入來源不變）。這是為何政府多年來要保留高地價政策的原因。

隨着「地產霸權」之說在社會上越趨澎湃、樓價高得比天更高，越來越多聲音要求政府取消高地價政策，以減弱地產壟斷和減輕樓市泡沫。但樓價高低是看供求，單行低地價政策不會令樓價下跌，也不能令租金下跌，因租金高是由於供應被大財團壟斷。而低地價政策也難改地產商壟斷之現象，因這是制度上的形成，而非賣地價格的問題。

高地價政策最大的壞處是扼殺中小地產商的生存空間，因中小型地產商根本難與大地產商競逐又大又貴的地皮。其實政府把大地皮分割為幾個甚至幾十個細地皮，根本不會影響總收入，反能給予空間中小地產商角逐地皮，令日後建築必定比現在的更具創意和更多元化，原因很簡單，多了不同的發展商去建築，創意空間和特色自然俱增。難怪葉劉淑儀也說：「高地價政策和聯繫匯率乃擠壓中小企生存空間的兩座大山。」

不但地產界被大地產商壟斷，就連地產代理界也一樣，差不多被中原和美聯佔據整個市場（另外兩大地產代理商——利嘉閣和香港置業，其實屬於中原和美聯旗下），單是中原、利嘉閣和美聯已佔有香港物業代理市場七成以上。

對於樓市和貴租問題，政府應分開投資和自住市場。針對樓市，例如限制海外資金不能購買二手樓和上車盤，或限制數量、對一房以外的購買徵炒賣稅、大增炒賣的房利率等。至於貴租問題，政府可興建甚至經營多些廉價商場和地舖（可和市區重建配合），把租金限定在一個水

平，讓普通市民、中小企可負擔，只劃定少數比例租給大財團（這些舖的租可高些），以保障中小企的生存空間。住屋方面，為無力買私樓但同時又不合資格入住公屋的夾心階層興建居屋是政府應做的事，始終透過置業達至安居樂業乃中國人傳統根深蒂固的思想，而這又同時為因應付交租而缺乏應急錢的夾心階層免除隨時加租帶來的不穩定之苦。

賤價「賣地」

其實政府也有賤價「賣地」的舉動，只不過制度欠缺透明，公眾難得悉，所以才較少人討論。原來地政總署會以短期租約形式把一些相連富賈物業的公眾土地，以廉價租給他們，且是按季或按年自動續約（政府少見的高效率！），讓富賈可以「合法」把公眾土地霸佔來建私人花園。租費只是約數萬元，但如果公開拍賣則隨時數萬元一呎，擺明明益權貴。李嘉誠擴建深水灣道的私人住所和劉皇發擴建青山公路的私人住所便是好例子。（可參看2011年6月11日《蘋果日報》港聞「政府明益劉皇發建私家路」）

壓縮中小企空間

瑞士諾桑管理學院在2010年《世界競爭力年報》指出，高價格是香港競爭力的主要弱點。香港樓貴租貴的地步已達到住宅租金是全世界最高、而辦公室租金也世界排名第三高。高地價政策是促成租金極高的原

因之一，因誰擁有土地，誰便是霸主。

作為一個老闆，他背負的壓力是難以估計的。因如果他倒下來，他的公司會倒閉，旗下員工也會隨之而失業。一個老闆要時時刻刻確保公司的生產力得以保持，公司運作順利，已十分具挑戰；但當有收成時，大部份卻落入擁有土地的大地主／地產商。這大大打擊中小企的生存意欲。當中小企敵不過成果被地產商壟斷，而日漸萎縮時，充斥社會的便只是大型連鎖集團。那麼社會結果只會走向寡頭化，告別多元化的活潑，令社會不再多姿多彩，競爭力大減和消費者選擇被剝削。

可見社會某行業被壟斷，除了出於企業家本身的自利性格外，政府的不公平政策亦會促成壟斷情況。

中產萎縮與實況

中小企生存空間被壓縮，中產只能從大財團手指罅漏出的利益吸收財富；當大財團壟斷越來越廣，漏出的利益越來越少，中產所得也隨之減少，要面對不斷萎縮的情況。現在的中產，只是每天不斷OT，工作十多小時賺取薪金和從投資獲得額外收入。把收入積儲起來，之後以半生儲蓄去置業，去供縮水樓和發水樓的首期，然後踏上樓奴生涯，為供樓成為不停工作和每天重複工序的機器；在精神生活上毫不中產，只是表面「身光頸靚」。

第十五章　置業

實況

近年市民難以置業是不爭事實，即連律師和醫生也哭訴難以置業，根據智經 (1) 的調查，超過半數年輕人心中首要任務是置業，可是在難以置業的環境持續下，恐怕也只是痴人說夢話。自2002至2009年，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的統計，所有類別住宅單位售價上升了87%，而2009至2010年升了三成，部份豪宅價格更超越1997年的水平，尤以港島西區的新落成豪宅為甚；九龍不少居屋，譬如富榮花園，也追上1997年的價格。由此可見香港樓價不但升得瘋狂，泡沫更越來越大，一旦爆破，勢成新一波經濟災難，而當普遍市民也控訴難以置業時，政府不盡快解決樓市問題，管治危機將難避免。有政黨調查顯示近六成人或其家人有置業需求，但只有成半人於過去三年成功置業，其他人未能負擔首期和供樓開支。根據國際水平，良好的狀況是房價與收入的比例 (設定在收入中位數) 為3.5到5倍，香港最新人均收入中位數為每月9,000元，兩公婆合力購買一個200萬單位，水平是11倍，處於極不健康水平。

總括而言，樓市泡沫出現有三大因素：一、大量熱錢流入本港的資產市場；二、各類型住宅落成供不應求；三、上車盤供應越來越少。

對於大量熱錢流入本港地產市場，可分成幾大原因。首先中國政府

在金融海嘯後推出4萬億救市，當中不少流入本港樓市，推高樓價。內地客佔樓市成交總額量一年內由15%升至22%，升幅驚人；內地熱錢流入之影響，不但使大型單位價格飆升，連中小型單位價格也受波及。其次因聯繫匯率關係，香港被逼跟着美國實行低息政策，借貸成本大減，造成大量熱錢。由於歐美市場前景不明朗，熱錢多選擇流入相對較穩固的亞洲新興市場，包括香港在內。隨着私樓租金不斷上升（因停建居屋後，大批買不起樓的夾心階層進入私樓租務市場）和受着國內通脹導致物價上升，在聯繫匯率下，香港不能自己加息和增加貨幣供應以防惡性通脹，誘使大量熱錢投入香港樓市，以確保資金保值和抗通脹。加上港幣與美元掛鈎，港元跟隨美元疲弱，使香港樓宇變得相對抵買，也促使熱錢流入。

近年香港每年約有4至5萬對新婚夫婦、3萬個離婚個案，約5萬多名新移民來港定居，及數量不斷上升的內地客，他們大部份對新住宅單位也有需求。可是政府像看不到置業需求似的，還大減房屋供應。過去10年全部樓宇落成量平均每年46,000，而過去20年則是52,000，未來則每年只35,000，供不應求局面不變。

自從廢除長遠房屋策劃諮詢會，停止為長期房屋需要作評估，樓市供需求失衡快速惡化，樓價大升。

只靠勾地機制來增加土地供應，是政府把樓房供應的主導權拱手交給地產商，供應數量和時機全由地產商決定。這誘使地產商囤地，加上

香港不像內地般有《反囤地法》，令樓價更上一層樓（現在五大地產商囤積的地，比政府的儲地多三倍有多）。在供求失衡下，不但市民難以置業，亦使租金長期高企，租舖創業的成本大增，也不利市民創業，影響零售業的競爭力。

上車盤、中小型單位（兩房或以下）的供應日少，令市民置業難上加難，尤其是首次置業那批。新落成住宅日減，新建私樓單位已由2002年的31,000個跌至2009年的7,200個，而中小型單位佔新落成單位的比例不斷萎縮，因新落成單位當中絕大部份是可讓地產商賺巨利的豪宅和大單位（三房或以上），而不是只能賺小利卻一向是主流需求的兩房或以下中小單位，即使政府為大股東的港鐵和市建局有份參與的項目亦如是。過去10年港鐵上蓋落成的24座屋苑，三房或以上單位超過一半，屋苑單位平均855呎，部份屋苑如名城、領都、領峰、擎天半島、御龍山、漾日居，更是八成至所有單位是三房或以上。加上市區不斷重建，價格廉宜的唐樓單位買少見少，新落成的樓宇卻是以普遍市民難以負擔的豪宅為主，如西營盤縉景峰，呎價最低的也過萬元，高的甚至達2、3萬。一向為市民置業需求最大的中小型單位和200萬以下的上車盤不斷減少，導致市民難以置業潮出現。2003年200萬或以下單位佔總二手樓市場近八成、佔一手樓市場多於五成，但到2011年，已跌至佔二手樓市場四成，佔一手樓市場更跌至少於一成，反映上車盤供應的減少嚴重影響市民置業機會。

內地客不斷增加，他們多以購買價值數百萬甚至數千萬的豪宅為主，是令發展商願意多起豪宅的主因。單看港鐵南昌和康城站三期兩塊共可提供6,600個單位的地皮甚少發展商問津 (2)，便知發展商對可建大量中小型單位的大片土地無興趣。新落成單位成交，約四成買家為內地客，在內地熱錢湧現和投資移民政策鼓勵大量內地人來港買豪宅下，數字只有上升趨勢。政府一日不在賣地條款加入最少提供單位和大小單位比例，難以扭轉發展商傾斜地建大單位豪宅的局面。

政府沒對症下藥

游資湧現，內地投資者、富戶對香港的房地產需求與日俱升，使香港樓價節節上升。尤其是人民幣不斷升值（問題只是幅度的大小、速度的快慢），港元不斷隨美元貶值，令內地資金在港購買樓宇變得更化算，內地客在港置業的需求只會有增無減。可是港府對內地客需求而推動本港樓價，致使樓價高企，市民置業困難的成因沒對準焦。2010年度的《施政報告》，政府對國際和內地資金於本港樓價影響隻字不提，可見政府沒看清實情，從而沒有對症下藥。政府應考慮向非首次置業的買家，在非常時候徵二房稅或炒樓稅、提高按揭息率、設禁售期、新落成樓嚴禁「摩貨」、以及堵塞買家把樓房換作公司資產作買賣去逃避印花稅的問題。

當然樓價上落取決於供需求，政府一日不令供應回復正常水平，一

日難言對高樓價問題作出任何實在措施（偏偏政府在樓價「過低」時卻反應敏捷，大推「孫九招」；在金融海嘯後，美國推出量化寬鬆政策造成大量熱錢，香港作為新興市場之一，資產增長值較歐美高及是游資相對較佳的避險市場，因此吸引大量熱錢而令資產泡沫惡化，但政府的回應往往是不斷重複地說「有需要時會推出進一步措施」、「會密切注視情況」、「不容許泡沫出現」等口惠而實不至的噴口水式話，或只是推出沒對準實情的措施，如增印花稅）。

2010年度的《施政報告》反映政府在缺乏土地供應，導致樓市氣溫過熱的問題還是無心正視，沒去正本清源。政府還是死牛一邊頸，不肯恢復定期賣地或提供足夠的賣地，還在重申勾地為主、賣地為副的土地供應政策。樓宇供應量主導權仍在地產商手中，使供應量不足導致樓價過高的格局沒變，在可見將來，市民仍要飽受過高樓價之苦。當我們早上上班，還是睡矇矇般的狀態途經港鐵車站時，看到四大地產代理商之一的香港置業在廣告上，奪目地大大隻字寫着「樓市長遠睇好」(3)，猶如暮鼓晨鐘，看得我們這些夜睡早起的打工仔們精神為之一振，便可知道地產商是如何蔑視政府所謂的控制樓市措施，也顯示了政府控制樓市措施會取得何等「成效」了。

引致樓市泡沫的另一因素是熱錢（外資）流入。先撇開香港因聯繫匯率關係而難以透過貨幣政策去阻擋熱錢流入不說，政府是可透過財金政策的調整，去減弱熱錢流入的速度和程度，包括發行更多外匯儲備債

券，把更多熱錢借回來，然後再往別處投資。但香港連外資進出的登記數字也欠奉，政府根本沒明確數據作參考，以隨遇而變的調整政策應付，而是像現在那樣生搬硬套的應付熱錢。連登記數字也沒有，從何談起應付熱錢流入而引致的資產泡沫呢？最後受苦的不是想置業的百姓麼？

美國先後兩次透過狂買國債來推低長期孳息率，把美元貶值，亦即傳媒所說的狂印銀紙的量化寬鬆政策。當然準確點形容，「狂買債券」比量化寬鬆更為形容得貼切。加上極低息率，造成大量熱錢流竄，為新興市場帶來極大的資產泡沫壓力。各大新興市場已第一時間推出不同應變措施防止熱錢流入。那些措施不出息口改變、徵收外資投資稅、加強當地銀行現金儲備率、拋售當國貨幣以買美債去托高美元等四大方法。例如巴西把外資投入巴西債券的稅率由2%倍升至4%再升到6%、泰國突然徵收外資投資泰國債券市場15%的利得稅、中國人民銀行在一年內先後6次增加現金儲備率，以減少可流出市場的借貸、日本把息率減至零息口、澳洲暫緩加息、秘魯、哥倫比亞、印尼和台灣等地大手買入美元，以托高美元價值，其中日本、印尼、泰國更進一步的大幅拋售本國貨幣。

在各國也在關閘防洪時，香港政府仍不為所動，在生死存亡之際還死抱積極不干預教條，無為而治。曾俊華在美國實行第二次量化寬鬆後，仍只是表示如果有需要的話，會看看還有甚麼措施可以推出。最後

慢十拍的，在兩個月後才推出增加印花稅和對短期套現樓房行為徵收按轉售時間而定的累進印花稅。政府要在出問題後，才會研究有甚麼可做。一言以蔽之，政府從沒有一套完整的金融政策作指引去應付不同時勢和危機，以致反應往往慢十拍。這也源於政府官僚主義裏面見步行步、不願作長遠準備的思維吧！

至於聯繫匯率問題，相信大部份財經評論人和學者都贊同要與美元脱鈎，只是時間上的問題。上世紀80年代初的金融危機，港元在自由浮動制度下，不斷受衝擊而貶值，在1983年的9月曾貶值至1兑9.6美元的新低。於是港府便於10月15日把港元和美元掛鈎，定在1兑7.8美元水平，希望經濟以後能穩定發展，而短暫的應急措施卻成為政府的長久政策。其實自1972年港幣和英鎊脱鈎後，曾短暫的和美元掛鈎兩年，之後10年則採取自由浮動的匯率，而那時香港股市也開始白熱化，國際資金不斷流入香港。但香港經濟體系過小，容易被外國資金狙擊，令股市大起大落。美國是全球最大經濟體系及儲備貨幣國，而且當年美國政策是致力保持強勢美元，與美元掛鈎可避免匯率過份波幅浮動，令物價指數和經濟穩定；此外聯繫匯率可減少惹來大量熱錢的機會，減少外來衝擊；且因美元是國際貿易貨幣，促使港資進行外貿時，也易於定下價格，避免匯率風險問題。

但當聯繫匯率已無法承受到金融市場的壓力，使資產和經濟要面對外來壓力而大起大落，功效便會失去。不論1998年的金融風暴或是2008

年的金融海嘯，已充分反映聯繫匯率已失去功效。香港更因實行聯繫匯率這種貨幣發行局制度，把可以採用貨幣政策作為調節工具及息率變動與貨幣增減的主導權雙手奉上，要硬食惡性通脹和通縮，眼白白看着游資舞動本港資產市場，令股市樓市出現暴起暴跌現象，嚴重影響經濟民生穩定。加上美國已放棄了其保持美元強勢的承諾，10年內美元已貶值約三成半，匯率和利息由穩固而變得波動，使掛鈎下的港元也要被逼跟隨，也令人們對港元信心大跌。因美國現在是按市場的投資情緒，主觀地調節匯率和息率，使利息波動頻密，增加國際投資者在香港金融市場上下其手的機會。

舉例美國多次進行量化寬鬆，香港被逼跟隨低息，港元也跟隨暴跌，使資產變相減價，吸引大量游資購買香港資產，造成資產泡沫和市民難以置業之風。但當美國加息和增加投資成本，會使游資爭相撤離，令香港資產突然暴跌，就像千禧年代的樓價暴跌，造成大量負資產，正是金融風暴和科網股爆破後，美國不負責任的貨幣政策後遺症，而香港正因聯繫匯率的關係，也無辜受災。當年不少人把樓價暴跌潮的矛頭指向「八萬五」(4)，而忽略了聯繫匯率無法對游資進出作出適當的調節，才是樓價暴跌主因，有欠公允。

聯繫匯率已不能阻止大量熱錢流入，加上因美國不再保持強勢美元政策，已不能起穩定市場平穩發展作用，再保持聯繫匯率及與美元掛鈎只會是弊多於利。不少貨幣曾和美元掛鈎的國家，在遇上金融風暴和

發現聯繫匯率已不能發揮功效時，也先後和美元脱鈎，包括巴西、阿根廷、俄羅斯。可是香港政府官僚主義思維根深蒂固，奉行少做少錯原則，在抱着打份工心態和缺乏長遠視野去考慮港人的福祉下，毫無膽量和意向去脱鈎。即使聯繫匯率已為香港的經濟和民生帶來多次困境，政府也只是安於現狀，不敢去改變實行已久但現已失效的政策，還在力排眾議、力陳保持聯繫匯率的必要。其實港府應下定決心實行脱鈎，改以參考人民幣、新加坡幣和盧布，用一籃子貨幣，按實際供求來定下匯率，免港人再受經濟暴動的災難。新加坡的儲備遠在香港之下，當年和美元脱鈎，都沒有導致新加坡元備受衝擊，香港有中國政府作後盾，還怕甚麼？

即使不考慮和美元脱鈎，政府可做的還不少，包括向外資抽利得稅，甚或俗稱Tobin Tax的外資出入境稅，以增加外資突然大量湧入和撤離的成本，防止樓市和資產市場過份暴起暴跌。不知政府怕「孭鑊」還是官僚積習太難改，在非常時期也不行非常手段，令置業難題無法獲得改善。反之政府只懂在沙堆裏找一大堆似是而非的藉口，例如「與97年樓價還有距離」、「會推倒樓市」、「會重蹈八萬五覆轍」等，去迴避責任。

政府對樓市政策的思維

2010年度的《施政報告》，政府以過去10年平均一手私人住宅的吸

納量為18,500個單位為由，宣佈未來10年提供可以興建2萬個私人住宅單位的土地。切記2萬個單位是可供應量，不是一定會供應的數量，實質興建量隨時更低，尤其是沒相應措施去確保發展商的單位供應足夠下，興建2萬個私人住宅單位的目標可能「凍過水」。

然而過去10年的私人住宅供應量是遠低於需求的，尤其是2003年取消定期賣地後，私樓供應更形不足，但政府以過去10年的私人住宅供應量作參考標準，若非需求突然大跌，只會延續嚴重供不應求的狀況，低估現實情況，會令市民難以置業的現象延續下去。尤其內地客對本地私樓的需求不斷上升（單是2010年的需求已比2009年的升了近五成），政府作的評估竟忽略需求方面，可見其處事的馬虎和粗疏。為何政府不用1990-99年的平均每年27,000私樓吸納量作參考、1980-89年的平均每年3萬私樓吸納量作參考、或索性以過去30年的平均量作參考？

特區政府的思維令人費解，樓價被批評為高得脫離現實時，政府則以1997年樓價最高峰期時作比較，說樓價並不算高；但當政府評估未來的供應量時，卻用供應嚴重短缺時的量數為參考，那麼評估結果自然脫離現實。究竟是政府反智、抑或是故意美化賬面數目去掩蓋偏護地產商、還是官員對實況熟視無睹，則無從稽考了。

人均面積越來越小

香港除了面對樓宇供應不足問題外，還面對人均居住面積越來越

小、的情況，平均只有130多呎，居住環境擠逼。這也使個人空間越來越小、私隱度越來越低，產生的副作用包括精神煩躁、和家人易生摩擦、生活質素較難提升、年輕人晚上喜歡流連街頭也不回家。

香港樓宇過份集中在百分之二十的土地上，而超過3,000公頃的土地，因是私人擁有的鄉村和農地，再配合丁屋條例，難以發展。政府如要改善人均居住面積太小的問題，需在這些問題上好好尋找解決方法。

訪問

受訪者：王坤（公屋聯會主席）

筆： 2009年《施政報告》出台後，連醫生律師也致電電台，公開向特首投訴難以置業，置業困難潮已由夾心階層伸延到中產，反映問題嚴重。究竟為何這幾年突出現置業困難潮？

王： 首先是政府在土地供應方面遠落後於現實。政府常說不夠地，但在董建華管治首5年，不論公屋或居屋平均每年的落成量都比回歸前5年提升了。公屋由平均每年19,000個單位升至28,000個；居屋則由16,000個升至18,000個，只有私樓的建築數量是跌了，但很輕微，由26,000個跌至24,000個而已，整體落成量是每年多9,000個住屋單位。但2003年「孫九招」出台後，居屋停建、公屋落成量跌至平均每年15,000個單位，2009年更跌至7,200個單位。如果不是「孫九招」出台，整體住屋落成量會像特區首5年那樣多，政府現在以不夠地為由而停建居屋和

少建公屋，是難以服眾。甚至當年計劃「八萬五」政策，政府也預算香港有足夠土地去推行此政策，現在政策沒實行，理應有更多土地可以推出來，政府說不夠地是講大話。因此政府失職，住屋落成量的供應太低，是近年樓價狂升的原因。加上停建居屋，入住公屋的資格又太高，一班買不起私樓又不能住公屋的市民被政府遺棄，政府沒盡解決市民住屋基本需要的責任。

筆：沒有了居屋，的確令一班夾心階層受苦，政府逼這班連租樓都成問題的市民進入私樓市場，又缺乏足夠照顧，讓他們自生自滅，產生不少社會問題。但即使可以入住公屋，解決了住屋需要，也要面對很多問題，而當中不少問題，如家庭分開和不和諧，竟是由政府公屋政策不完善所致，例如富戶政策造成公屋老齡化、悲情化問題。身為公屋政策專家的你，又有何看法？

王：富戶政策表面看似合理，但內裏衍生了很多負面結果。政府把入息限額定得過低，很容易便超過，一超過便要付上雙倍租甚至三倍租，收入低微的根本是難以應付。所以很多公屋住戶在子女年滿18歲時，便取消子女的戶籍，要他們再排隊申請公屋（因子女出來工作，即使收入只是數千，亦已超過入息限額）。在富戶政策下，很多年輕人只要有工作，便要搬離屋邨，使家庭拆散，造成公屋大量獨居老人和雙居老人的情況。老人家缺乏子女在身邊，照顧自然不足，造成悲情效果；而在公屋繼承權政策下，子女結婚後便要被逼搬離單位，也造成獨居和

雙居老人問題。公屋的原先不是長者區，是老中青也有的社區，但富戶政策使公共屋邨變成老人區。我和公屋聯會多年來提出租金券政策，而這可解決富戶政策衍生的問題，但政府一直不肯做。

筆：上世紀90年代前，政府興建公屋的政策是差不多各區也興建的，務求使住戶能接近就業市場，以促進住戶的就業機會。但90年代後，政府以不夠地和公屋不能建在靚地皮，其實是貴地皮為由，把新的公屋全集中在偏遠的天水圍和東涌，那些連發展商也未必稀罕的便宜地皮。政府意想不到的是，這方針造成悲情地區的出現。這是否證明政府的公屋政策和重建政策出現思維上的問題？

王：的確是，為何公屋不能建在市中心和靚地皮？公屋座落的地皮應是均勻的，不能只在新界區有，中西區沒有。政府的公屋政策使私樓和公屋不能混雜，造成各階層難以融合。把公屋全撥在偏遠地皮，過份集中貧窮家庭、入息低家庭和就業不足的市民一起，加上設施提供不足，造成悲情地區出現。

在重建政策方面，回歸前的重建是安置原區居民，但現在已不是。重建的原則雖好，但政府欠缺安置原區居民的思維，因重建後，樓價大升，但原居民收入不變，不能負擔，被逼搬離原區，使重建政策變成趕走原居民政策。

筆：除了興建政策為人詬病外，領匯私有化也被大眾和公屋聯會大肆批評。對於領匯私有化政策，你有何看法？

王：領匯私有化下，公屋的管理、租約、市民權益全沒被保證。因私有化不等於提高效率和效益。事實上，領匯接手後，效益不增反減。政府實行領匯私有化，是把包袱推卸，把解決問題的責任推卸，對居民不公平。

筆：近年新落成的公屋有一怪現象，是過早老化，如水喉老化、天花剝落時有出現，相比90年代前建的公屋，老化情況嚴重，不到10年樓齡已出現老化情況，這和政府的政策思維有何關係？

王：自從政府把投標改為價低者得後，公屋提早老化的情況便出現。原材料物價不斷上升，但投標卻是價低者得，對質素考慮欠奉，所以新落成的公屋普遍質素有問題。而政府又把監管外判給顧問公司，連監管質素也無保證。房署太迷信ISO9000這監管方式，而抽樣調查時，只靠目視法，非常過時。加上人手不足，所以質素缺乏保證下，便出現這問題了。

*　　*　　*

受訪者：葉毅明（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

筆：近年出現市民難以置業潮，但政府還是傾向積極不干預，不積極處理樓市問題，究竟為何這樣？而現在出現市民難以置業潮的說法，又是何解？

葉：樓價本身是循環，有高有低。但香港人的人工收入是平穩的，不會暴起暴跌。因此樓價高時，市民會怨樓價太高，買不起樓；相反在

樓價低時則會不敢入市。因此樓價高低造成置業困難是假像，不是買不起樓，而是買得起的全在偏遠地區，是資源和理想錯配。所以政府會認為沒責任幫買不起的市民買樓，便傾向不多干預樓市。

筆：那麼甚麼人最受現在因資產泡沫而造成的難以置業潮影響？政府的政策有沒有照顧到他們？

葉：夾心階層是最受樓價波動影響的一群。他們沒資格住公屋，只有居屋去調整他們的住屋需要。但政府基於面子，死不肯再興建居屋，是沒照顧到夾心階層。居屋雖不能即時解決問題，但最少給人長遠希望。且建居屋，政府也不一定蝕，因賣居屋可增房委收入，是雙贏局面。2003年樓價暴跌根本和居屋無關，是私樓供應過剩，而居屋又不減價，和私樓重疊，樓價才崩潰，但政府卻賴在居屋身上，是誤導市民。居屋在2003年停建，但樓價沒停留在2003年水平，且已升了近一倍，使夾心階層難以置業，但政府又沒政策照顧他們。加上聯繫匯率，香港沒自己的利率決定權，不能用貨幣貶值對抗資產升值。所以現在夾心階層面對的困境，是政府政策失誤，沒法平抑樓價問題。

居屋政策幫到夾心階層，行之有效，買賣和興建又有彈性，政府不肯再實施是十分不智。

筆：政府不重建居屋那麼不智，又不施行政策去幫助夾心階層，那麼政府的政策在幫誰？

葉：對不論樓價高低也買不起樓的市民，有公屋制度照顧。政府政

策較益地產商，不論派錢還是首置，也間接益地產商。只是增加買樓需求，卻又不肯增加供應，只是會令樓價上升。政府最大缺失是沒處理地產商問題。地產商可一定程度上聯手控制供應，如一起勾地，政府又不肯放地、賣地，在供應降低，但需求回升下，樓價自然大升。政府和地產商有默契地減少供應。

筆：現在置業難，其中一個原因是上車盤過少，新建的全是難以上車的豪宅。面對此情況，政府可怎麼做？

葉：地產商要利潤最大化，只建蚊型豪宅，但這對只想置業市民不利。歸根究柢是供應不足和政府指引不足。政府只從短期出發，只顧民調和政治化妝，但對中長期政策討論不多，遑論關注，往往只是諮詢和問問題，但沒實質建議。即使限呎數、限外地人不可買樓、收緊按揭和不斷出口術，也是本末倒置。一日不從長遠供應落手，都不會有實際作用。

政府應重新做回過往也做過的長遠房屋策略。回歸前，每隔5或10年便有一次長遠房屋規劃。有長遠策略，方向才明確，才能每年仔細檢討。但政府只着重眼前民意，且把房屋和土地這兩樣理應一起處理的項目，分給兩個不同局去負責後，政策便甚少協調，在合作上充滿阻礙。

筆：為何政府不肯作長遠規劃，去增加供應，使土地供應不用那麼緊張，甚至使土地短缺情況不再持續？

葉：香港地少人多，四成土地是郊野公園，兩成用作市區發展。但

還有很多土地投閒置散，例如元朗便有很多有發展潛力的土地，只是政府基於種種原因，沒決心開發那些土地。而政府是想土地供應出現緊張的，所以不多規劃新地，不想擴建新市鎮，因供應出現緊張，政府才可行高地價政策。地產商一樣不想土地供應充足，怕樓價會被拉低。所以其實是有地，只是政府和地產商不想有那麼多土地供應，才令土地供應短缺。

筆：有種提議是行低地價政策，但低地價政策真的可以改變高樓價的情況嗎？

葉：行低地價政策是沒用的，因發展商不會配合地以低價賣樓。在密集都市下，土地價值會兩極化，市區和郊外地皮差價會很遠，以及在地產商壟斷市場下，樓價話語權在地產商手上，低地價政策只會益地產商。當年數碼港，以超低呎價賣地給長實，但結果賣出來的也是貴樓。

筆：香港為何會出現大地產商壟斷市場的情況？在外國，這不常見。

葉：香港由幾個地產商壟斷，是因政府推出的常是大樓盤，只有大型發展商可負擔。當年只推大地皮，是因想地產商幫手參與基建，如沙田第一城、康怡花園。但現在政府已不是沒能力做基建，根本不需再推大地皮，由單一發展商發展。大地皮應分作幾個小地皮，使中小型地產商也可生存，一可增加競爭，二可增加創意。現在只推大地皮，扼殺創意空間令建築千篇一律。

筆：地產壟斷的情況是否合理？

葉：雖則大地產商壟斷各行各業，是透過收購和業務多元化，是自然的，但這樣發展下去，市民的選擇不斷被剝削。在競爭越來越細小下，市民被逼接受不合理價格。政府是有責任去改變這壟斷現象，加重壟斷的成本、減輕中小企的生存成本和加大市民的創業空間。

註釋：

(1)「智經」即「智經研究中心」，以商人和專業人士為主組成的智庫和政策研究中心。現任主席是胡定旭先生。

(2) 請參看2010年5月26日《星島日報》港聞「南昌站反應冷淡僅接三標」。

(3) 可參看香港置業於2010年12月在港鐵站賣的大型廣告箱廣告。

(4)「八萬五」建屋計劃是董建華在1997年度《施政報告》內提出的政策。政策內容是訂立目標每年供應不少於85,000個住宅單位，期望10年內七成家庭可置業。

第十六章　打工仔之苦

工時過長

民政事務局在游說市民支持申辦2023亞運時，其中一個賣點是推廣全民體育。但很多市民的反應是，每日辛勞工作，工時過長，連休息的時間也不夠，何來空閒做運動？這不多不少反映了香港普遍工時過長的情況，難怪很多人都希望可以在外國機構効力，因外國機構通常是朝九晚五、日做8小時而已。反觀在香港，不管是文員仔還是清潔工，每天工作最少10小時。做文職的，回到家已過了正常晚飯時間，做保安那些更不用說，難怪香港人不論是高層或低層員工，不管月薪數萬或是數千，開口埋口都是「呢排好忙」、「無時間」，總之就是忙忙忙。再加上於交通工具上花費的時間，真是連陪伴家人、照顧子女、輕鬆一番的時間也沒有。

根據「專業進修聯盟」做的調查，95%的專業人士常要OT（超時工作），當中約一成每天OT超過3小時，九成專業人士表示因OT過多而壓力大增，健康也受影響。有調查顯示，香港約30萬人因壓力過大，而有高危情緒病。

從事飲食業的，平均每週工作56小時；運輸業52小時；批發零售業51小時；保安業60小時；清潔業50小時，遠超國際勞工組織所訂的

每週40小時。中產方面，醫生每週工作65小時或以上；社工全年無休；教師雜務纏身，不能專注於教育天職；會計師常被「食鐘」；專業人士假日也被逼上培訓堂和聽講座，但是「自願的」，沒薪金補回。可見中產也沒好得到哪裏，所以中產只是收入中產，在文明和精神上難過中產生活，因而香港中產被稱為「中產工蟻」。

工時過長的確衍生大量社會問題，包括令人精神壓力大、與家人關係疏離、沒時間休息和放鬆身心、沒時間關心時事、沒時間運動，甚至沒時間交際，令生活質素變差。難怪補習社、快餐店、婚姻介紹所開得成行成市了。工聯會於2010年10月的調查顯示，超過一成的OL（1）日做12小時或以上，因而放假時，寧願獨處休息，也不外出交際，令結識異性的機會大減，出現所謂「剩女」現象。2009年有近16萬名30至39歲的女性未婚，佔女性人口24%，但2001年時，這類女子只有13萬多，只佔14%。該調查又發現，97%的受訪者認為工作壓力和嚴重超時工作會影響家庭生活質素。隨着科技發達，現在上網也可結識異性，而甚麼虛擬性愛、網上情侶、少女在網上結識壞男孩而被騙財色和遭強姦非禮案件越來越多。網上世界花樣百出，再加上工時過長，更加令人不想外出，令人與真實世界距離越來越遠。

工時過長過度勞碌，不管文職武職也一樣，打工仔甚至忙碌的老闆也難抽空參與社會活動和關心政治。無論熱心社會時事者和從政者多麼努力，沉默不關心的始終是大多數。因此香港人對政治冷感，一點也不

意外。

本港就業人士工時過長，政府多年來並沒處理這問題。這是因政府對打工仔保障的思維不足，相反卻在處處維護大老闆。在歐洲不少國家已實行最低生活保障計劃時，香港政府談的還是最低工資。最低生活保障計劃是保障市民只要肯投入勞工市場，若遇到收入不足以維持生活，有關的最低生活保障線便補貼這些低收入家庭，一來可促使人們上班作業，二來可保障市民的基本生活和尊嚴，三來又不一刀切的訂下水平，彈性較高。可見香港政府對打工仔的保障意識和知識也相當落後。

外判制犧牲打工仔

2000年政府為減省公務員數量，除以「肥雞餐」利誘公務員提早退休，再以合約制取代長俸制去聘請新員工，以減省開支。政府還把很多項目和相關職位外判，以「價低者得」形式判出去。價低者得原意是減省政府開支，但此卻令接單的企業利潤甚微，但原材料等成本不斷上升之下，只好在勞工方面下手減成本，造成工人們（尤其是供應多的下層工種，包括清潔和保安）的工資不斷被削及工時不斷增加，福利又欠奉。外判制與合約制以勞工待遇換取政府減省成本，是政府帶頭壓逼打工仔、令工時長、時薪低、合約短的情況越趨普遍。

政府勞工政策漏洞

「418現象」是筆者想提出的勞工問題。因政府勞工政策漏洞，勞工要連續工作4星期，每星期超過18小時，才受到法律保障。這使一些僱主在法律許可下，聘請大量散工和兼職，每星期聘用18小時以下或沒做滿4星期便休息1星期，之後再續約，以減低成本。政府政策漏洞雖為僱勞兩方帶來彈性，卻也令很多勞工在不受法例保障之下，變相容易被剝削。

政府偏私

2009年九巴純利6.8億，申請加價6.8%，但對司機只加薪1.8%，可見「公司好，員工好」的神話不再。九巴需受政府監管已是這樣，於無皇管公司的情況實難以想像。從2000年起，九巴由日薪制改行月薪制，連帶年終雙糧和隨年資加人工的必然狀況也取消了，顯示公司和勞工間只有「共渡難關」，並無「有福同享」。當經濟有點困難，便大開勞工的刀，犧牲他們最多；但經濟好轉時，勞工只分得最少的一份。

當員工罷工，以爭取合理回報時，政府只會叫司機們顧全大局，叫他們收手，卻不會叫九巴高層顧全大局、一視同仁，給予基層勞工合理回報，以去平息風波。偏私的政府為社會製造矛盾，把矛頭全指向司機和工會們，企圖製造司機成為市民公敵的形像，為了罷工而犧牲巴士服務。連政府也偏私大機構，打工仔們會有運行嗎？

靠實力VS靠關係

現在學子想入名校，要中英數、西樂、運動樣樣皆能，又要有良好的家庭背景，如果有西方宗教背景，效果更理想。在就職戰場何嘗不是？身為打工仔的你，很多時總會發現，無論自己怎努力工作，都不會得到上司的賞識和升遷機會；但相反一些與老闆有血緣關係的人，即使工作表現未如理想，也總獲上司厚待及仕途平步青雲。一些雖與老闆沒有血緣關係，沒有人事關係，工作表現強差人意，但懂討老闆歡心，懂擦亮上司的一雙臭鞋，也會官運亨通。

日本學者Fukuyama指出，中國人屬於低度信任社會，強調血緣及個人信任問題，家族企業的升遷上，會以信任為先，表現為次 (3)。其實不止家族企業，普通企業任人唯親的情況亦非常普遍，員工的能力表現，在老闆心中，遠不及拍馬屁那麼有效。重視信任多於實力的文化，也說明為何不論大機構或小公司，也充滿派系鬥爭、人事鬥爭的局面。懷才不遇，勾心鬥角，於華人機構，實在太普遍。

訪問

受訪者：梁耀忠（街坊工友服務處創辦人、立法會議員）

筆：究竟政府推動勞動政策的思維是怎樣的？為何總惹來勞工界抨擊？

梁：政府是很被動的推動勞工政策。除非社會上有很大聲音及資方

反彈不太大，才會推動政策以改善勞工生活，從不會主動的。例如最低工資，香港已講了很多年，很多工友收入連基本尊嚴也達不到，由幾元到十幾二十元一小時也有。直到曾蔭權選特首，才開始提出方案，但政府已不負責任十多年了。

筆：為何應該以民為本的政府，在推動勞動政策上那麼被動？

梁：政府以行政主導，當政府不主導去推動政策，問題很難解決。但政府非民選出來，只會在民間壓力出現時才被動的推出政策。現在推出最高工時，也是拖無可拖下，才開始尋求方案。

筆：現在勞工被壓逼的苦況厲害嗎？

梁：隨着社會改變，政府又立了不少法例去改善勞工權益，現在的情況和上世紀60、70年代相比已經好轉很多了。可是勞工被壓逼的情況仍普遍。例如強積金實施後，很多工友被逼成為自僱人士，得不到勞工保障，連有薪假也沒有；打風落雨下，沒法例規定不用上班，在黑雨警告和八號風球下，很多勞工仍要上班，人身安全保障低；而變相扣減工資的情況雖然少了，但在很多行業還是存在，如保安業，不少保安員要向公司交洗工衣費。

香港在職貧窮狀況嚴重、工時高得不合理，勞工生活不健康，精神疲弱，也令社會的醫療負擔加重，乃惡性循環。

筆：為何香港工運的聲勢相比很多地方，以及相比勞動人口來說，還是那麼薄弱？

梁：香港勞工對爭取權益的概念不強，即使有，也因太忙而難投入參與。香港很多打工仔會否出來爭取權益，多是看個別爭取議題合不合理、切不切身，而非從整體的民生角度去看。所以勞工加入工會，多是為享用工會福利，而非投入爭取運動。當工作比較安穩，不會因出來爭取而被解僱或扣人工，而爭取的議題又有壓逼性，他們才會出來。香港的勞工法例，沒要求被無理解僱的員工一定能復職。

再者不少勞工是1949年後開始從國內來，看過無數政治鬥爭和批鬥，因此對爭取權益運動有戒心，不想涉入政治，加上大公司橫行，員工變得分散，也令爭取力量較弱。

註釋：

(1) OL即Office Lady，中文為「辦公室的女性白領」。

(2) 請參看Fukuyama於1995年出版的著作*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第十七章　市區重建

政府的重建思維

政府是重視硬件重建（樓宇），而忽略軟件（人為因素、地區鄰里關係、文化特色）。政府只是一次過資助了100億，便把市區重建這個燙手山芋拋給市建局，要市建局自負盈虧、自生自滅，忘掉了市區重建乃政府城區規劃職責的一大支柱。市建局為求獲取足夠盈利以維生，便大建商場和豪宅賺錢，再加點綠色（是綠色，而非綠化）作包裝。

社區在重建後，面貌完全改變，原本的居民因無法負擔重建後的豪宅租金，被逼搬走，無法享用重建後的設施，無法從重建中得益。這打破了原有鄰里關係，原有社區特色不復存在。除了發展商外，居民在重建後是分享不到重建成果。而重建後的單一化，把社區原本的百花齊放多元面貌打破了，小商舖被逼走，街舖消失於頹垣敗瓦中，街道文化走向毀滅，換上的全是玻璃幕牆。這使原本社區自給自足，取之於區用之於區；獨立街舖；街坊街里以街坊價互相招徠的文化打破，換上全是陌生的跨區連鎖店，把本土文化淹沒。在政府心中，石屎化便等於現代化。

重建應以改善居民生活為本（現在是反其道而行的趕走居民），不是以改善社區景觀、外貌為主導；不應只注重外表，卻忽略了社區是以居民鄰里關係維繫的。因此現在的市區重建是有形無神的軀殼罷了。

政府市區重建政策的謬誤

政府重建的目的，只是希望建一些五光十色、招牌處處、又大又靚、雕玉塗金的巨型商場和豪宅的所謂地標，以確保人流車旺。政府只以庸俗的審美觀作考慮，從不考慮地區原本的獨有面貌，和重建後如何融入周邊環境。例如市建局在重建時，不會先考察當區原本的人文活動如何，多少人在那處晨運、踩單車、抽煙、玩十五糊；那裏的建築有何特色；周邊的環境如何；該處街道有何文化；有甚麼歷史價值等等。現在只是清一色、倒模的建大商場，不斷拆毀小舖，以大代小，把太古廣場、中環商場群的建築模式copy到九龍區的重建項目（如APM、朗豪坊），然後再copy到新界區，例如荃新天地、新城市廣場。但政府和市建局從沒考慮新界原有的鄉郊面貌、九龍區的風土人情、香港區的人文活動如何，只是蓋一式一樣一色、又光又高又廣的新建築。為何重建時，不能因應每區原有面貌和周邊環境而去建不同的特色建築去保留當區面貌？或改進原有特色？為何拆毀大牌檔和小販區後，新建的不是更井井有條的小販區和熟食檔，而只是大財團才能負擔得起舖租的大商場？重建的精神應是原有面貌的延續，而非令其消失。

近年市民環保與保育意識有所提升，這與保育抗爭頻繁不無關係。政府順應民意，也在重建時多加了保育和綠化元素，方向值得肯定，應予支持。可是政府所謂的綠化和保育，出發點只是把商場包裝為更具吸引力的地點，與真正綠化和保育差天共地。譬如前尖沙嘴警署，即現在

的1881商場，已難令人記起當年警署的面貌、當年防空洞作用的歷史，甚至因吉祥兆頭，而把1884改為1881；又例如美利樓、中環街市，已體會不到以前的素質，把中環街市的外牆塗滿綠色，種點盆栽，便叫綠化，當真貽笑大方。

綠化應是確保環境受保護，不被污染，為市民提供一個潔淨的環境生活；不是塗脂抹粉、點紅點綠，種些花花草草去「美化」商場就叫綠化。綠化和環境配合、當區格調是分不開的。保育應是保留歷史、人文元素和精神面貌，能令人勾起原有風貌。但政府重建時，可有做點關於當區人文的研究，和問問當區原居民想怎樣重建嗎？

新界copy九龍，九龍copy港島，使全港面貌走向單一化。若長此下去，便再難以分新界、九龍、港島了。政府應臨崖勒馬，改變其荒謬的城規思維。香港精神貴在多元化，但政府使香港走向單一化，是抹殺香港的精神面貌。這是在不斷侵蝕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的人文文化方面的軟實力，不利香港長遠發展。

政府的市區重建從沒把焦點放在市民身上，使原居民的生活質素沒因市區重建而得到改善，反而更因此令原本的生活模式和生活網絡被破壞，之後「流放」到偏遠地區。此反映政府的方針並不以民為本，沒從改善市民生活素質上考慮，只是把市區「軀殼」變得更新更美，卻沒有把「靈魂」保留，反而驅滅之。

政策混亂，害苦小市民

市建局幫發展商收樓收地，然後平價賣給發展商建豪宅商場賺錢。在收樓過程中需要安頓原有住戶。市建局收樓時幹勁十足，但安置住戶時卻大歎慢板，很多住戶交樓後多時也不獲安置，但市建局卻過橋抽板，沒好好處理安置事宜。深水埗通州街重建時，有60多戶小業主把單位售予市建局後便靜心等候安置，怎知一等便是兩年多，且還被通知房屋署根本沒有足夠的單位安置他們。荒謬至此，市民受苦。

政府殲滅地區文化

市區重建把各區獨一無二的面貌打破，換成一式一樣的大商場。居民可自給自足，透過服務鄰里以維生和促進彼此關係的現象消失，換上人人皆是大型連鎖店的顧客，鄰里彼此不再相干，沒有關連，成為陌路人。同樣地，領匯私有化也帶來這樣的破壞。

以前屋邨靠着居民可在自己的屋邨內廉價租舖，建立自己的生意，再把物品和服務賣給同邨的鄰里，達到屋邨自給自足的狀況；也透過提供零售和消費互動來促使鄰睦和諧，那種零售消費互動形成一小社區，每區因個別商戶皆獨一無二而各自充滿特色。可是引入了領匯後，自給自足、和諧互愛的小社區被打破，成為歷史去了。屋邨的居民關係也由親密變成疏離。市區重建和領匯私有化把原本是親密的社區變為陌生的社區，每區成為同模同樣的複製品。兩大政策皆以錢為本，非以人為

本，非以地區為本，令社區特性快將成為絕唱。如不在未來的市區重建項目上下功夫，恐怕香港的特色會消失殆盡。

從政府的市區規劃思維和屋邨管理政策，反映政府從不重視本土文化和特色，令香港的色彩逐漸退色。

和諧社會也消失

為何重建後的大商場，內裏的店舖全是連鎖店？首先，大商場因經過豪華裝修、處於交通匯處，容易直達，有車水馬龍的保證，加上舖位面積較大，租金自然較高，因此內裏的全是可負擔昂貴租金的大型連鎖店。大型連鎖店因聘用大量員工，在已經供過於求的零售業勞動市場，比一般獨立舖有着極強大的議價力，往往能比小型獨立舖容易聘請到員工和壓低薪酬去請同種員工。再者大企業有更多資金去運用機器以節省長期的人手成本；在材料方面也因大企業是大量入貨，與供應商有較大的議價力，能降低平均訂購成本，因此大型連鎖店較私人獨立舖能在更多方面節省成本，從而有更大能力去承受昂貴租金。

獨立的街舖、街市被連鎖店和大型超市取代，令街道再沒特色，只是換上無數了無生命的玻璃幕牆。居民平常在街市間的友誼活動、檔主和顧客間的信任關係也隨而消失。在街市買菜長期光顧同一檔舖，不是因該檔特別便宜，而是無數次的光顧、講價、閒話家常而建立了深厚的友誼關係，甚至連對方的家庭成員也成為朋友，彼此互相信任。但在超市只是對着冷冰冰的物品，除了揀貨和付款，沒人跟你閒聊，無從建立

人與人之間的友誼和信任關係。但居民間的友誼互助長久關係，是建立和諧社區、建立社區網絡、建立社區面貌的基礎。現在這些基礎盡失，政府卻豪言要創建和諧社會，那豈不是空談嗎？

單一化的城市規劃

政府的城市規劃非常單一，來來去去也只是大建豪華住宅、商場和寫字樓。規劃單一化原因是香港建築物的規劃和設計，無論是供地產商賺大錢的豪宅、商場、高樓商廈，還是供市民使用的社區設施，或是有保育需求的文藝中心，都給發展商和政府壟斷了，普羅市民根本難以，甚至無法參與當中。

華富邨、杏花邨是當年建築師別出心裁的設計，令香港環境更美好。但發展商起樓時，務求控制成本，蓋出來的建築差不多全是倒模式的。發展商會聘用已上位的建築師去「設計」發展商心目中的藍圖，然後為了逃避樓宇落成後，萬一設計上出了問題的責任，便把那些藍圖交給外面的建築師要他們跟着蓋樓。處於弱勢的建築師們，除了照單全收外，就是不接生意。難怪本港越來越多建築師棄港而往海外發展，而香港建築設計水平也因此越來越不被國際重視，英國在香港回歸後，已不承認香港的建築師牌。香港的建築師在建築物設計層面也被發展商監控下，已難施展所長，除了不能對香港的城市面貌多作貢獻外，也令香港的建築業步向式微。

當規劃來來去去都是同一群人，或因要控制成本，很多花巧和具創

意的想法也大受局限，使建築和城市面貌越趨單一化。可是政府不知是為了貪方便，還是信任不過大家，一直無意開放規劃和建築設計過程給大眾。

訪問

受訪者：馮檢基（前民協主席、立法會及區議會議員）、梁有方（區議會議員）

筆：政府的重建方針和思維是怎樣的？

梁：這分不同階段。早期承接土發局的爛攤子，中心思想為政府收地，以商業運作自負盈虧考慮，給街坊賠償，而非合理補償；發展公共空間和社區設施有限。近期發展局成立，委任相對開明的人士入市建局，加上市民意識醒覺，作風有改善，多了討論和對社區保育的關注。

可是新建的公共空間雖是公眾的，卻由新的住戶負責夾錢維修，而非政府出錢。因此才出現不少屋苑不開放公共空間給市民用的情況，是政府政策的漏洞造成。

筆：市建局進行市區重建時，應有甚麼思維和方針？

馮：市建局的標誌有「人」，聲稱以民為本，但有講卻無做。合理賠償、原區安置、以樓換樓是應有方針，可減少衝突。安待原區居民才是以民為本，但政府少這樣做。市建局只撥出整體收支四成作賠償，其餘為利潤，政府賠的價常偏低，只計算實用面積去賠。政府又少原區安置，對老街坊照顧不足；對租客欠缺彈性處理，要合符公屋資格才能上

樓，對很多上不到樓的租客帶來很大滋擾。他們買不起樓，而重建後的原區樓價大升，只好租其他舊樓，卻很快又要面對重建逼遷。

梁：政府應以呎換呎；多建一些簡約樓給夾心階層，不要全是豪宅。不要再建怪獸豪宅，與原區格格不入。現在重建後，以連鎖店代替小店舖，打擊中小企的生存空間，又破壞了舊區中下層生活社區和佈置。現在是把舊區變成中產豪宅區，豪宅化趕走了基層的生活空間。這是因為市建局和發展商合作，只建豪宅，要賺盡每一分錢。深水埗也起過萬元一呎的豪宅，是不合理，且那還是「扮豪宅」而已。原區居民被拋棄，大蓋大型商場，打擊中小企，辦館、士多差不多消失。但混合形式社區是香港特色，應該保留，應多建回街舖，保留人味。

馮：深水埗等舊區有原有生活模式和強項，但市建局只顧硬件更新。

梁：這是對人物、歷史、生活文化的不尊重。民協一向倡議重建應尊重和保留人文特色。

馮：政府有地應建公屋、居屋，不能只是私人樓，甚至應建樓租給中下層。

筆：市建局收樓和重建的手法是否合理？

梁：早期收樓時，以為是給街坊大恩大德，手段極差，用些欺瞞手段和不專業人士收樓，對街坊的說話又不盡不實；近期收樓時已少了用極差的手段。應用專業人士去收樓和跟街坊談判，減少不必要衝突。而現在雖有社工隊幫助街坊，但最多只是心理輔導，實質作用不大。

筆：對於收樓重建，街坊的心態是怎樣的？

梁：有些住慣了，不願搬走；有些是甘願被收樓，認為樓宇已殘破，但主要問題是有沒有合理補償和原區安置。政府給予7年樓齡賠償，但對放租的業主，則賠少三分之一的估價，對那些業主很不公平，因收租維生不是罪。且政府應提供除了賠償外的選擇，例如樓換樓、呎換呎，令業主不用「硬食」被認為不合理的賠償，以及所動用的公帑反而更少，因建公屋的成本只是400至600元一呎，比豪宅低。

筆：理想的城市規劃是怎樣？政府的城市規劃有何弊端？

梁：重建要保留社區特色，要和原本社區協調。現在的重建把社區特色破滅了，令原有的人味消失，趕絕街舖。例如中上環在重建後，面貌完全不同了，自然形成的舒適生活圈子、建築歷史不見了，只以玻璃幕牆代替。政府的城市規劃是每區都一樣，大型屋苑、大停車場、高樓大廈、玻璃幕牆、大連鎖店，令每區一體化，令各區特色不見了，使當區的人迷失，不會走到別一區遊玩。

筆：對於強拍條例，有何見解？

馮：美其名是加快市區重建，實際是讓發展商和收購商得益，對小業主不公平，使他們的議價力大失。加上發展商分好地盤，一起合謀不惡性競爭，令賠償更低，剝削了小業主的發展機會。因合謀情況普遍，變成誰出價提出拍賣便由誰去拍賣，強拍是加大了發展商以大欺小的機會。民協想修訂回強拍條例，想提私人修訂但立法會沒有私人條例草案，提私人修訂要立法會主席批准，加上現有立法會結構，很難改變情況。

第十八章　醫療事故

政府在醫療的資源投放比例低，只佔GDP的2%多點，與歐美先進國家的8-10%相差甚遠。在人口不斷擴張、不斷老化、環境污染越來越嚴重下，需要醫療服務的人數越來越多，但政府投放的資源沒按比例上升，私營醫院又做不到分流作用，政府又一度縮減醫護人員的培訓，使醫護人員嚴重人手不足，工時不斷加長，醫護人員士氣低落，有經驗的不是往私家醫院或出外行醫，就是提早退休，使醫護人員具經驗者日少。以上原因導致近年醫療事故頻繁，開錯刀、輸錯血、打錯針、配錯藥、醫死人等屢見不鮮。現在先重溫近年部份醫療事故，再分析當中的弊病。

2007年：

一、威爾斯醫院打錯針，血癌少女因而死亡。事後涉事醫生只是被停止臨牀職務，處分過輕。

二、伊利沙伯醫院在手術時，清水當作消毒藥水。乃人為錯誤，醫管局(1)回應：汲取教訓，避免同類事件再發生。

三、聯合醫院錯調兩名病人標籤，使一名嚴重貧血的女病人延誤輸血10小時，原來是化驗室在程序上出錯。醫院事後只訓斥員工，處分過輕。

2008年：

一、心臟病發老伯在明愛醫院門外失救致死。事後發現門內的詢問處職員只叫人打999，見死不救。急症室護士接獲電話6分鐘後才通知保安人員往事發地點。事件反映職員官僚文化深重，只按程序辦事，沒實事求是，像機器多於人。周一嶽局長事後回應：期望醫管局汲取經驗和教訓，強調醫護人員失職。但周局長只是跟進人為失誤，沒從資源不足和官僚主義那裏作徹底改革，即使搞出人命也動搖不到當局的鐵石心腸。

二、伊利沙伯醫院調亂43名病人血液數據，因電腦程序出錯。醫管局回應：避免同類事件再發生。

三、伊利沙伯醫院為男嬰錯注10倍嗎啡，原來是處方藥物劑量出錯。醫管局回應：汲取教訓，避免同類事件再發生。

四、伊利沙伯醫院用零經驗醫生處理切除部份胃部的微創手術，但沒有具經驗的醫生在場監督，反映資源不足。

五、瑪麗醫院護士因沒時間處理，而延誤找醫生，導致肝癌病人死亡，反映資源不足。

2009年：

一、一名男童眼睛受傷需及時治理。但明愛醫院過於官僚守舊，不懂變通，不接受學生以手冊作登記（小時候上學，只帶手冊不帶身份證是何其平常！），要對方繳付700元才可，令男童延誤醫療一小時。周局長

事後回應：汲取經驗，盡量簡化複雜的醫療程序，避免同類事件再發生。

二、東區醫院遺失嬰屍，延遲3日才報警。報告指出有員工沒跟足指引，乃人為錯誤。周局長事後回應：責成醫管局徹查，找出犯錯原因和補救方法，避免同類事件再發生。

三、瑪麗醫院斷錯症，斷錯一名老翁患有睾囊癌要開刀。手術後才發現只是積水，根本不用切除睾囊，令老翁無辜失去右邊睾囊。此乃人為失誤，醫管局回應：會作適當處分。

四、伊利沙伯醫院為中年婦動手術後，遺留棉花在腦內，令婦人右眼失去視力，左臉則中風。此乃人為失誤，醫管局回應：會作適當處分。

五、伊利沙伯醫院調錯兩名初生嬰兒，但事發當晚只得3名嬰兒出生。事發後醫管局一直沒對外公佈，直到傳媒查詢才發稿交代。此乃人為失誤，而伊院也過於官僚，不公佈以為可當沒事發生，事後只訓斥員工，處分過輕。

六、伊利沙伯醫院為5名初生嬰兒錯種過期卡介苗，有護士無依程序核對藥物。伊院事後只訓斥員工，處分過輕。

七、北區醫院為患癌病人打錯針，護士注射前沒核實藥物，病人7日後死亡。此乃人為失誤，醫院事後只訓斥員工，處分過輕。

八、威爾斯醫院護士未核實女嬰標籤便注射抗生素。事發5日後，一直沒對外公佈，直到傳媒查詢才交代。此乃人為失誤，醫院事後只訓斥員工，處分過輕。這反映醫院過於官僚，不對外公佈以為可當沒事發生。

2010年：

一、威爾斯醫院配錯藥，誤將每日服用變隔日服用，導致老婦病死。威院事後回應：汲取教訓，避免同類事件再發生。

二、瑪麗醫院員工亂拔喉，導致婦人變植物人。負責醫生曾一度離場。醫管局回應：汲取教訓，避免同類事件再發生。

三、長洲醫院插錯喉，應插在胃部卻插錯在支氣管，導致病人死亡。涉事護士不需停職，處分過輕。

四、醫生忘記為病人進行抗病毒治療，使乙型肝炎病人接受5次化療後，引發急性肝衰竭死亡。醫管局沒即時公佈，只在事發後新一期的《風險通報》裏才公佈。反映醫管局官僚心態重，不即時公佈，企圖淡化事件。

五、瑪嘉烈醫院護士用過熱開水為嬰兒洗澡，燙傷嬰兒。醫管局回應：汲取教訓，避免同類事件再發生。

六、瑪麗醫院為女病人開刀後，紗布留在體內。醫管局回應：避免同類事件再發生。

七、伊利沙伯醫院為患有腫瘤病人動手術，遺留用作輔助縫合傷口的銅板在體內。醫管局回應：避免同類事件再發生。

從一次又一次、重複又重複的醫療事故，可得出以下分析：

一、每次當局回應都是千篇一律的「汲取教訓，避免同類事件再發生」，但醫療事故還是不斷發生，且越來越頻密。2007年只有兩宗導致

死人或嚴重傷亡的個案，但在2009年升至12宗，反映政府從沒對症下藥，沒針對問題基本。政府自己本身就是最大庸醫，醫不了醫療事故。

二、很多時也只是事後訓斥員工，或處分過輕，阻嚇性不足。這也基於員工士氣原本已低無可低，不欲再刺激員工；加上人手嚴重不足，如果施以停職便令人手更少，出錯機會反而更大。政府於是增加資源調撥，但增加的大部份卻落入醫管局高層袋裏。八成半的醫療開支乃薪酬開支，而管理層佔相當大的部份，卻又不會怎樣問責，出事只把矛頭直指前線員工，使他們成為事件的泄憤對象，難怪前線員工士氣那麼低。管理高層沒承擔，根本不值那麼高薪。管理層大多只在冷氣房看報告，根本不了解前線員工日新月異的苦況。2009年，醫管局最高薪的管理層加薪3.6-7.6%，最高薪5名獲約1,900萬元薪酬。公帑雖有加碼，但沒適當運用。而高層加薪機制不透明，此乃來自政府的「積極不干預」思維，完全放任醫管局自把自為，政府監察又不足。

三、每次出錯都是自己查自己。醫管局的投訴委員會全由醫管局委任，絕少業界人士參與。醫管局查自己，怎會有進步？而跟進工作由醫管局負責，跟進時卻常用《私隱條例》推搪，不肯公開。投訴人往往只收到三種回覆：投訴已被接納；或在處理中；又或投訴結果是甚麼甚麼。而聆訊又不用公開，甚至有時連聆訊也不召開，只由投訴委員會處理。這反映制度長期僵化，不透明又落後。最大弊病是政府無改動意圖。

四、沒制度要求醫管局第一時間把醫療事故向傳媒公佈，缺乏傳媒

監察，因而難有大進步。

五、懲處準則不一，指引過度繁複，反影響效率。

六、人手短缺，一人身兼數職，自然易出錯。但政府無意增加人手之餘，反要減醫護人員減人工。每年超過一半時間是超收病人和有人手不足情況。醫生每週最少一更工作20至30小時，每週工作超過70小時（澳洲為39小時）。2007至2009年，近千名醫生離職，佔公立醫院兩成。當病房99%額滿，便出現人手不足，但一些醫院超收情況達140-150%。一名護士平均對12名病人，但國際標準是1對6。反映政府過於守財奴，把錢看得比醫護人員狀況、市民的健康、醫療服務更重要，可以說是冷血。

七、政府搞醫療融資，搞醫療保險，但應先搞好醫療改革，從體制的根本上修正。政府常說醫療開支過大，是有點誇張，因評估是沒根據實際情況予以調整。例如2004年預計開支888億，但實際只是371億。

八、政府只懂用優化指引應對，不知管理的是人，醫療對象也是人，欠缺人性化、靈活化的管理，思想太僵化，運作也太機械化。

從種種分析，得出幾個共同點：官僚僵化，官僚思想的毒太深；政府思維功利，資源投放嚴重落後；制度落後，審查程序不公開，永遠自己查自己，自己騙自己，導致永無進步。

早在1999年，《哈佛報告書》(2) 已對香港的醫療制度作出探討，指出香港醫療制度的弊病。可是10多年後，醫療政策還是在行上世紀70

年代那套，完全沒跟進《哈佛報告書》的探討，醫療政策幾十年來沒有變過，沒與時並進，那麼醫療事故怎會不頻生？

訪問

受訪者：勞永樂（前醫學界立法會議員）

筆：近年來醫療事故新聞源源不絕，開錯刀、打錯針、配錯藥、輸錯血、做錯手術、換錯嬰等等等等，總之就是數之不盡，究其原因為何？

勞：資源問題是首要問題。香港人對公營醫療需求極大，由住院服務、專科服務到慢性病服務也依靠公營醫療。在私院則過貴，造成公營醫院牀位擠逼，輪候時間過長。政府每年投放約300億在公營醫療，九成用於醫管局，其餘則在衞生署。但300億只佔GDP兩個多巴仙，和歐洲同為提供公營醫療為主的國家8-10% GDP比率投入，卻是差太遠。

香港和歐洲富裕程度相若，但對醫療的投入卻那麼少，自然事故頻生。沙士時充分顯示出投入不足，資源長期薄弱，沒後備設施應付危機。當時每天幾百位沙士病人，已令公營醫院病牀體系癱瘓，隔離設施作分流的配備又不足，使病菌傳染更快。限於資源下，人材難以發揮，事故便頻生。

筆：資源不足，對醫護人員還有甚麼影響？對病人的保障有甚麼影響？

勞：人手不足，使醫護人員工時過長，很多高危病也被逼使用新手處理，但由於經驗不足，又缺乏醫生和護士核對，會使事故出現。而資源不足，藥的成本要平，只可用幾仙一粒的，但好的藥起碼要幾毫子一粒的成本，加上政府慣用的藥廠又來不及做那麼多藥，使藥出現時有差劣的情況。選用那些藥廠是因為它們的藥便宜，但不代表質素有保證。護士平均照顧20至30個病人，連洗手時間也沒有，對病人又怎會有保障？

筆：醫管局方面又有甚麼問題？

勞：醫管局架構過大，使效率慢，且進取心低，過於規條性運作。這個除政府外最大的公營機構，卻把香港的醫療壟斷了。管理太官僚主義，有問題只懂出指引，只懂從制度化出發，不懂處理應急和危機變化，明愛見死不救事件就是這樣。

筆：醫護人員人手不足，工作過忙，病人保障欠奉，兩者間根本難建立深厚關係，那麼醫護質素怎會高？

勞：是的。由於雙方互相重視和着緊的程度低，信任度也低，導致投訴文化出現，令原已繁忙的醫護人員百上加斤。醫生那麼繁忙，和病人閒話家常也難，根本連增進關係的機會也沒有。

筆：政府的醫療政策方向，又有沒有問題？

勞：政府醫療政策，和其他政策一樣，太以經濟為主導，明益大企業。政府常說香港行低稅制，所以醫療負擔不能太大，但市民是有交稅

的，只是付出的錢流入大地產商袋裏，而政府又不敢向地產商收更大的稅。香港不是低稅，只是把錢交給壟斷香港的地產商，而不是交給政府再分配以造福市民。政府的醫療融資方向、強積金也是把市民的錢交到私營機構袋裏，因此政府說醫療融資，市民自然不支持，因付出的錢是明益私營機構，而又未必回流自己身上。高醫療開支應來自社會整體資源，而非個別人的荷包。而且醫療融資只是想搞私營醫療保險，使用公營醫療服務的自然被標籤為窮人和大花公帑，使改善公營醫療的速度減慢。政府應把投入醫療的資源提升到佔GDP的6%。

筆：香港的出路如何走？

勞：香港市民的容忍性很大，可是回歸10多年，經濟越來越被小眾壟斷，市民在各方面也被小眾利益蠶食，出路也越來越少。政府若不盡快調整，市民的怨氣是會爆破的。政府應做好財富再調整，才可避免怨氣爆破。希望社會出現更大的力量去推動意識形態衝擊，使社會改變，去解決問題。

註釋：

(1)「醫管局」即「醫院管理局」，負責管理公立醫院和診所。

(2) 1999年4月12日，政府的衛生福利局委託顧問小組去撰寫香港的醫療制度研究報告，通稱《哈佛報告》。

第十九章　環保

沒從源頭處理環保問題

香港每人每日製造的垃圾量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但還是台灣、南韓的兩倍半。這點和香港政府的環保政策遠遠落後於這兩地有關，當中在生產者自付原則的推行深度，有最大分野。

於2005年的政府調查指出，1974至2004年這30年間，廢物多了6倍，但人口只多了一倍，人均製造垃圾量大增。但政府一向少從製造垃圾的源頭着手，只懂興建堆填區（1993至1995年建成了屯門、打鼓嶺、將軍澳3個聲稱可使用30年的堆填區，但到現在2011年，只過了30年的一半，全部快將爆滿而要擴建，最保守估計的是2018年將完全爆滿，悲觀的則早至2014年）。

前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廖秀冬於2005年訂出每年減少1%廢物製造量的目標，乃看清環保問題必須從源頭做起，但她落台後，這個目標便消失了，前功未達已被廢。這例子反映在沒有《政黨法》下，政府施政不連貫，政策欠缺穩定性，太依賴首長和局長的個人意志。沒連續性的政府（董政府和曾政府是完全兩回事），政策自然不會連貫，因此政府沒可能訂出會實現的長遠規劃。這也解釋了為何政府常把一些具爭議性的題目留給下屆政府（除非推無可推），但下屆政府不代表會照單全收，令政策的不確定因素大增。

台北在2000年已訂立「垃圾零掩埋」計劃，實行廢物製造者自付原則，又硬性規定市民把垃圾分類，否則罰款，使台北的固體廢物在短短10年間少了八成。新加坡在2002年實施「邁向零堆填」計劃，大力開發環保科研，實行工業廢物回收，大行焚化方式處理廢物，使堆填只佔2%的廢物處理比率。

反觀香港，一直以來只是依賴堆填為主導，近六成的廢物要運往堆填區，與台北、新加坡只得約2%至15%的廢物要運往堆填區，有天壤之別。尤其廚餘是接近百分百要堆填。香港在處理都市廢物的政策上，落後先進的外國城市10年有多，枉稱國際大都會。

政府雖在2005年頒佈的「固體廢物管理政策大綱」，定下仿傚台北，以用者自付形式徵收垃圾費的方向，但至今還是只聞樓梯響，不見人影蹤，都市的固體廢物量更是有升無跌。政府至今還未實行徵收垃圾費的原因之一，是香港不像台北那樣，每戶每天都有定時定候去街道拋棄垃圾的習慣，在香港難以統計每家每戶實質的廢物量，因可能出現為了減低付費而把垃圾棄置在別人家門的情況。逃避是解決不了問題，環保與下一代的生活環境攸關，我們必須積極尋求解決辦法。筆者拋磚引玉，建議有管理公司或立案法團的屋苑，每天定時一或數次提供上門收垃圾服務，而沒有管理公司或立案法團的樓宇，可由食環署負責，如此便可大規模地進行垃圾累進收費政策。

但冷酷的現實是政府還是過份依賴堆填，令原本預計可用30年的堆填區在15年間已臨夕陽時刻，差不多爆滿。政府只是以零碎和見步

行步的政策處理問題，如擴建堆填區、停車熄匙等，缺乏長遠規劃、整齊地看待問題，不懂長遠計劃如何從源頭去處理廢物問題、如何根本地減少廢物量。

政府在環保政策的落後不但影響民生，更錯失商機。香港每年產生500多萬件電子廢物，若全數回收可有達6億元商機。可是政府就是一直不肯實施電子廢物生產者責任制或回收廢舊電器的制度，白白錯失商機。

對光污染漠視

香港的光污染全世界第一，還因此登上權威天文雜誌*Sky & Telescope*的封面，可謂臭名遠播。但政府卻對光污染從沒立法監管，也無視光污染對民生造成的困擾。

香港滿街霓虹光管廣告牌，間接營造了東方之珠的名聲，卻對居住在設有霓虹光管廣告牌大廈的民居造成莫大滋擾，居民連基本的「睡眠權」也欠奉，就此想投訴也投訴無門，因政府沒法例監管光污染。日本等與香港同稱為先進的地區，對光污染一早已訂立法例監管，例如監管廣告牌的光不能射向外，及要有遮光設計。

香港政府在環保法例不但遠落後於人，更與民生實況脫軌，不理解民生苦況。

政府辦事之慢，在處理光污染問題上可見一斑。英國等地已經大量使用可見度更高但省電三至四成、具智能自調光暗感應的LED街燈，但香港卻還未引入這類既省錢又環保的街燈，效率極之慢。

政府保護環境不力，削弱香港競爭力

智經在2010年8至10月間進行調查，發現16到35歲的年輕人中有55%認為政府首要改善空氣質素和綠化生活環境，而近半受訪青年表示因環境質素欠佳，考慮於10年內移居其他城市。而思匯（註）於2010年5到6月的調查，得出四分一成年受訪者，因空氣污染嚴重，考慮離港，比2008年的五分一還高。反映政府在環保事務上未如人意，與市民期望出現極大落差，變相驅趕人材往別的地方，長遠會嚴重損耗本港競爭力。

2010年，一般監測站錄得懸浮粒子的平均濃度為每立方米45微克，比世衛標準的每立方米20微克高出一倍有多。而這只是一般監測站記錄，如若是路邊監測站，指數會遠高於此。這幾年的懸浮粒子濃度雖然稍有改善，但同樣污染空氣的臭氧濃度卻在增加。近年每年香港有4位數字的人口死於空氣污染高的日子，單是2010頭半年，已有3,991人因空氣污染嚴重而提早死亡，為香港帶來9.2億元的經濟損失。2010年做的調查發現，91%家庭認為本港空氣質素對子女呼吸道構成威脅，43%深受其害而考慮搬離，48%認為本港空氣差而避免戶外活動。

官僚主義使環保進程緩慢

環保園於2006年啟用的承諾因政府欠缺支援，到2010年才有眉目，大幅拖慢環保進程。譬如對循環再造業欠缺支援，令企業難生存，想搞環保也不能。該行業競爭力下降，把車胎、玻璃等循環再造商機肥水流向別人田，要把循環再造工作輸出外國，也使社會付上環境惡化的代價。

發展是硬道理

有些人和發展商常以發展為由（但發展代表甚麼？怎樣才叫發展？），要不斷移山填海、把郊野公園和綠化地也用來蓋樓。當然人口密集，要分流人口，開拓郊野是無可厚非，但前提是政府有沒有做好城市規劃，讓城市地區充分發揮應有作用而非胡亂開發郊野？而建成的樓，是給人炒多於給人住，這又是甚麼道理？為何大力開發郊區後，市民還是難以置業？所謂發展，是否就是給地產商蓋豪宅炒樓賺錢？

香港平均每人每年碳排放量達6噸，但香港政府大球場種滿5米高的大樹，約6,000棵，每年吸取的碳排量約13噸而已，可見每伐一棵樹對環境都是嚴重破壞，促成極端氣候、令天災、幻變極端氣候惡化，影響人身安全和經濟發展。而郊野和市區間的綠化地，可起一重緩衝阻隔作用，使郊野的細菌難以入侵市區，為都市減少傳染性病菌，保障人類健康和都市發展。如果失去這些綠化帶，都市難以健康發展。

另外，新界很多從前的水稻田和濕地，被人非法傾倒泥石以填高來建屋。表面上看似有人貪心貪錢，實質上政府好心做壞事卻沒全盤策劃。當濕地被列為保護土地，便不准許擁有那些土地的居民把土地變賣，令他們失去賣地的權利，但同時不作補償。這變相鼓勵居民鋌而走險，看準政府執法不嚴，冒險填平具生態價值的濕地來建屋賺錢。如果政府策劃好些，可避免很多濕地被毀。

極端氣候威脅你我

環境污染帶來的後果是氣候暖化，溫室效應有增無減。不要以為氣候暖化只是天氣熱點那麼簡單，其實是直接影響大家的生活質素和威脅大家的生命財產，也影響一個地方的經濟發展。經濟與工業發展、城市開發，以及破壞生態環境等行為都令生態失衡，直接影響人類的糧食供應和生活環境。每年全球因生態受破壞而損失超過5萬億美元，也令糧食與日常生活開支越來越貴（因資源問題）。全球暖化，氣溫上升，北極南極的冰地不斷融化，由上世紀80年代到2010年，北極冰層的體積減少了五分一。很多以前被認為是百年一遇的天災變成差不多每年皆出現，極端天氣變得頻密。例如2003年歐洲的熱浪，令多個國家出現熱死人的情況。厄爾尼諾現象為全球帶來大量暴風雨、水災：2004年美國風災，摧毀了整個新奧爾良，全球損失超過200億美元；中國2008年的雪災，多省要停電，眾多同胞死亡，經濟生產活動停頓；中國2010年南方大雪災，但北方卻遇上旱災，數百萬人面對食水短缺，農務停產，鐵路停頓。拉尼娜現象，為澳洲昆士蘭省帶來強勁洪災，當地煤礦停產，全球煤礦鋼鐵價格大升，布里斯班城被摧毀，澳洲維多利亞省經歷10年旱災，農作物損失數億澳元；大量飛鳥和游魚常常大量突然暴斃，每次由數千隻到數萬隻不等。極端天氣不但令大量無辜人命犧牲，電力供應中斷、房屋損毀、水源枯竭、燃料價格大增，造成水電煤價格上升；農作物失收，令全球糧食短缺加劇，2008年和2010年尾出現兩次全球糧食

危機、食物供不應求，令食品價格近年不斷飆升。

當我們要求政府搞好環保時，我們自身的環保意識卻甚低，這當然和過去教育完全沒有環保內容有關。政府要推行膠袋稅，不少人以不方便為由反對；夏天在室內寧願多穿幾件衣服，也不願意關掉冷氣或調高溫度；不肯自備餐具，依賴即用即棄餐具；貪方便不把家居垃圾分類等等。人民環保意識不提高，環保工程不會順利，受苦和埋單的，是我們和我們的下一代。

訪問

受訪者：陸恭蕙（思匯政策研究所行政總監、前立法局議員、前民權黨主席）

筆：政府的環保思維是怎樣的？

陸：政府對環保沒有全面性的推動力。最高領導者把經濟發展、大型基建和盛事放在首要，把城市發展放在後面。政府沒從改善人民環保思維開始做起，沒從教育做起。政府處理環保是用公務員思維，只懂從錢出發，只懂花錢去解決問題，眼光不全面。政策若遇上反對，政府只會斥責人民不合作，例如廢物處理，1995年已有廢物處理報告，有很多計劃，但很多沒有做到，因政府掌握不到怎做和甚麼應該做。政府在環保上沒有長遠眼光，只是有問題出現，便以為用錢就可解決問題，但沒有從長遠教育與規劃出發。其實政府內裏有很多環保人材，但不懂任用。

筆：政府在處理鄉郊土地政策上出了甚麼問題？為何那麼具生態保育價值的土地，如大浪西灣、南生圍沒被保護；為何那麼多新界綠地變成非法停車場和廢物場？為何那麼多新界人表示政府對新界土地的政策有缺漏？

陸：政府給予新界原居民丁屋權利，但丁屋政策沒軟件配套，容許原居民蓋丁屋，但沒規管，地權上沒限制，令很多農地荒廢，或變成垃圾場、貨車場，與丁屋原意完全不同了。丁屋政策令新界發展和規劃出現問題，很多土地被破壞，因地權、路權問題，規劃發展又困難，可是多年來，問題沒改善，政府一直不敢處理丁屋政策問題。當土地紛紛出現非法傾倒泥頭的問題，或變成非法停車場，政府連哪部門管哪些問題也不清楚，對非法行為又不執法，沒一套完整政策，非常之懶。

香港的城市再規劃做得不好，政府才需要時不時開闢新土地。其實很多樓宇都可翻新，土地規劃可做得更好和配合新形勢。綠化地被侵害是可以避免的，只要整個城市的規劃做得更好。當年也說地少人多一定要填海，但最後證明那些填海根本不必要。政府欠缺的是一套整體地政環保規劃。

筆：政府對保育好像非常陌生，常出現保育意識不足引發的問題，如天星、皇后、利東街、景賢里事件，你眼中政府的保育意識如何？

陸：政府從沒深入討論保育和發展怎處理。政府沒有領導性政策帶出來，每當有危機出現，才單一處理個別事件，非常被動，只是補救，

而非有系統的政策。在古迹保育方面，政府不想承擔處理古迹的維修，便給商界承包，那麼商界當然以商業角度去看待古迹，形成不倫不類的保育，如尖沙嘴1884舊警署與和昌大押，令古迹變成商場。政府對保育沒理念，只是用錢衡量。

筆：對於政府的綠化政策，你有何看法？為何政府常強調綠化，但好像無甚成果？只是個別地方多了些花花草草。

陸：政府那些措施不是綠化，只是在化妝，為建築物化妝。綠化應是想到建築物以後怎對地球生態的傷害性降到最低，從能源消耗和物料傷害性着手，不應只是種些植物就當綠化。

筆：政府一向樂於填海，但填海對生態、對海港的破壞甚大，可是同時政府又沒決心處理好新界地問題，是否填海方便，以及政府保護海港意識不足，才會大量填海？

陸：填海破壞生態、危害環境、令水流急促，又使多了道路和大量廢氣與污染。填海方便，可用建築的廢料來堆填，輕微幫幫堆填區一點忙，又可賣地賺一筆，所以政府樂於填海。但這只是延續本身的問題，因新落成的填海區又會帶來交通擠塞的問題，新落成的填海區，因地利關係，多建無敵海景寫字樓、豪宅、商場，帶來大量人流車流，結果又要再覓地填海。

對於建築廢料，政府從沒要求建築商把廢物材料分開，沒分開哪些可以再用，哪些不能，全部當垃圾，令堆填區壓力大增。政府沒從源

頭處理問題，只是填海，而填海是不必要的。政府可從城市再規劃，改變土地用途，用地政配套去解決問題，例如處理好新界土地，便不用填海。

筆：環保對很多香港人來說，都不是迫切的問題，為何香港人的環保意識普遍不是很高？

陸：這是因為香港人意識不到生態死亡如何影響自己的生活、環境和居住質素。但人要看天食飯，泥土健康、空氣、水質，都會直接影響食物質素，影響每個人的健康。生態被破壞，環境欠缺保護，便會多了天災和極端氣候，直接帶來人命財產和經濟損失，令生產停頓。建築多了，隨之而來的是排水問題，使水浸多了。最重要是教育問題，以前教育完全不教環保意識，但現在開始有進步了，多了人明白生態要保護，否則直接影響自己的生命安危。

*　　*　　*

受訪者：黎廣德（公共專業聯盟主席、前長春社主席）

筆：在你的著作《釋放香港》提到，香港雖是全球經濟繁榮排第6的城市，卻在適宜居住排名70而已。香港能否發展下去、香港能否成為一個適宜市民居住的優質城市，可持續發展是重大關鍵。多年來在環保和推動可持續發展都非常投入參與當中的你，對於政府在可持續發展的推動，有甚麼看法？政府有否努力去改善市民生活質素？

黎：可持續發展於2000年納入政府政策的發展理念，更於2002年

成立「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和「持續發展組」，以確保下一代的資源不受損。環境保護、社會公義與經濟動力為可持續發展框架。從那時起，香港開始醞釀重要的環保政策，訂立以指標為本地發展策略，即先作基本評估，再訂策略去改善指標，例如空氣質素指標。政府選了再造能源、廢物管理和都市生活空間，三大範疇作環保政策的方向，但忽略了社會公義、經濟動力、改善空氣質素、改善食水質素、保育本地文化、排污策略、保護鄉郊景觀、長遠維港規劃、推動綠色經濟、完善交通網絡等方面，這是香港政府的可持續發展政策出現欠缺全面的缺憾。

可持續發展要成功，必須壯大公民社會，強調第二類伙伴合作；不能單由政府去做，要有社會共識和公眾參與才能成功。但政府還沒打破其一路諮詢的思維，即只是誠邀公眾回應政府的諮詢文件，使公眾處於過於被動的局面。理想應是公眾和所有持份者，在制定方向和遠景、制定指標和策略，一起參與。

筆：政府於政策制定過程中，缺乏開放給公眾參與，有甚麼例子可說明，是因政府沒有開放給公眾參與，不理會社會共識，使訂出來政策沒改善市民生活質素？

黎：根據調查，即使要付上經濟代價，八成市民也支持降低市區居住密度和增加人均居住面積。可是政府多年來也不肯制定政策去提升人均居住面積，又不肯訂下降低市區居住密度的目標，使屏風樓、道路狹窄、空氣不暢通等問題，因政府沒訂下目標而一直存在，成為市民生

活質素不能提升的阻力。而市建局把舊區重建後，屏風樓、道路狹窄、空氣不暢通等問題反而惡化。如果政府肯多開放給公眾參與政策制定過程，情況不會是這樣。

筆：政府做事一向被批評為慢三拍，政府的官僚思維治港，在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上，製造了甚麼不良影響？

黎：2005年時，民間已有報告指出堆填區將會爆滿，建議政府採取進取型的政策，包括徵收廢物管理費、支援回收發展、興建焚化爐等。但同年董建華下台後，政府沒意思以目標為本的心態去實行進取型政策，只抱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心態去做事。如果政府有徵收廢物管理費和一早興建焚化爐，根本不用擴展堆填區，也不會出現擴建將軍澳堆填區的危機。

在環保方面，政府沒意識去作根本的改變和長遠策略，只懂搞小修小補的策略，如停車熄匙這些只可改善1%空氣污染。而且政治體制的缺憾，沒為政府帶來內部競爭，政府不會進步，才安於小修小補的行為。

筆：言下之意，是否指制度的問題，造成政府先天性缺乏長遠眼光和缺乏進取的精神？

黎：香港的政治體制太人治，太依賴長官的個人取向。曾蔭權太經濟掛帥，而不是從市民生活方面作取態。曾蔭權對商界顧忌過大，不敢行與大商家和地產商利益有違背的政策，包括不敢對屏風樓有太多的限

制、不敢強硬重組巴士線去影響巴士公司利益。

筆：政府不但不敢碰大商家利益，即使原居民利益也不敢碰，令很多有利民生、保護環境的政策也不能推行。為何政府如此怕原居民？這對整體民生有何影響？

黎：《基本法》規定新界原居民利益不變，及政府要換取原居民的支持，所以政府從不敢嘗試改變丁屋政策和新界土地政策。加上如徵用原居民土地要作出較大賠償，故很多時政府要徵地，即使是為公眾利益，如興建公屋、基建，寧願開發保育地、生態價值高的地，也不會徵原居民的土地；即使那些土地已經荒廢，或成為了廢車場、垃圾場，政府都不會徵用，還在規劃上鬆手，不斷給予原居民那些土地續期作廢車場、垃圾場。一日政府沒一套完整策略去處理原居民土地和新界土地，一日會出現很多城鄉發展的爭拗和矛盾。

這反映了政府政策太經濟掛帥，凡事用金錢作衡量，如賠償多便不肯徵用應徵用而又荒廢的土地。也因政府以經濟掛帥為思維，對保育文化不重視，令香港的面貌越來越含糊。

註釋：

「思滙」全名為「思匯政策研究所」，乃研究公共政策的獨立非牟利智庫。

第二十章　社福

隨着人口結構的變動，由戰後的嬰兒潮、難民潮，到上世紀80年代的移民潮，再到其後的回流潮，及現在的缺乏嬰兒潮，人口老化，社會不斷變遷。經濟和就業結構的大轉變，由第一生產的漁農社會過渡到第二生產的工業化，再轉到第三生產的服務業為主，再朝向第四生產的資訊科技業年代，人口和經濟結構的轉變也帶動着社會結構的更迭。為修補社會結構漏洞而設的社會福利制度必須要隨着社會結構的變換而有所改變，否則便會出現缺漏，無法為社會提供應有的社會保障。

可惜政府默守成規，只懂蕭規曹隨、照本宣科的沿用運行已久的社福制度，在社會保障出現不足時也不從制度上修補，回歸後更無定期檢視漏洞和推度將來會遇見的問題，取消了10年和5年的長遠社會規劃。當出現缺漏，只懂用錢去填溝，如成立關愛基金去博取一時掌聲，而非實在地檢視制度漏弊與規劃。

人口高齡化

人口高齡化是香港和其他發達社區在將來數十年皆需面對的問題。

即使目前，長者宿舍供不應求，很多勞苦半世的長者等不到宿舍安排便已身故。有見及此，政府提出「居家安老」，一來減少輪候宿舍

的長者數目，二來以家居照顧形式代替入住院舍，意圖減輕政府財政負擔。前者一年需要約10多萬財政支出，而後者按政府說法，只需4,000多元一年。

以前房署在屋邨內設有長者聯絡主任，負責關心和照顧邨內的長者，對邨內的獨居老人，猶如提供了一位會關心他們的親人。但在2003年沙士期間，政府因財政緊絀，被錢蒙蔽着眼而忽略長者照顧，取消了屋邨長者聯絡主任計劃，令無數獨居老人頓失親人，不少更因此選擇輪候院舍以獲別人關心。正是政府的政策推使更多長者輪候院舍，現在又要減少輪候院舍的長者，不是荒謬之至嗎？其實屋邨長者聯絡主任計劃正是現實版「居家安老」，政府不重開計劃，老人在缺乏關懷下，又怎居家安老呢？政府政策間存在矛盾，應有的計劃不實行，想推出的計劃又沒適當政策配合，政府的計劃又怎會有成效呢？最後只會再次淪為浪費金錢、浪費時間的失敗計劃。

政府在社福報告狀把長者服務寫作社會負擔，把貢獻一生的長者視為引致大量開支的負擔，十分涼薄，用功利眼光看待勞碌半生的長者。難怪政府當初加生果金要資產審查，現在長者服務又要資產審查，除非極之窮，否則不配有長者服務，足見政府對長者的不尊重。政府低估和漠視長者，不知長者也能老有所為，不懂運用他們的貢獻力，沒有像世界衞生組織那樣，從「活躍晚年」和「長者友善社區」兩大方向落手，浪費長者的獨有優點。如此政府的人口高齡化政策只會淪為算死草措施，無助人口高齡化局面。

一筆過撥款

2001年政府實施被社福界形容為千瘡百孔、滿目瘡痍的一筆過撥款政策。當年政府因懼怕社福的經常性開支不斷上升，難以維持收支平衡，便為社福開支設上限，以便開支可受控制，於是實施一筆過撥款。

這乃商人治港思維（董建華乃富商），把社福當成生意辦，根本忘記社福的真正意義。社福真正意義有數點：

一、幫助有需要的市民；二、推動社會各階層皆能發展；三、社會透過互助互愛，變得更和諧與融洽；四、用社會服務去提升香港的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改善基層生活環境，令他們更放心投入勞動市場，使基層勞工可貢獻更大，發揮更高生產力。改善資源分配，令資源用得其所，提高社會效率；五、使社會更公平、公義，讓缺乏資源照顧的一群，有較平等的機會去改善生計和投入社會。

一筆過撥款根據政府收入好壞而定撥款量。在庫房充裕時，政府會有更多資源撥入社會服務；在有限資源下，政府傾向先給「聽話」和支持政府政策的機構，變相用錢來威脅社福機構在各方面也無條件支持政府，例如校園驗毒、政改等，不少社福機構便表態支持政府。政府不理爭議聲，實施一筆過撥款，是欲以此成為控制社福界的工具。有調查指出不少社福機構，例如風月蘭，在政策倡議時批評政府，令致當申請政府服務合約以維持運作時，常被拒諸門外。而大澳社工謝世傑事件，更是政府不惜以權力去欺壓一些敢於批判的社工實例。

一筆過撥款親疏有別，「聽話」的便獲多點撥款，而非看機構的服務是否有意義。

一筆過撥款政策也在扼殺新社福機構的生存空間，因為新機構往往難與舊有的大型社福機構競爭。

因此政府應取消一筆過撥款，改行黃永提出的3+2的5年計劃 (1)，即首3年按社福長遠規劃定下的步伐行事，後兩年則在檢討後作調整；或索性像以前那樣，每年也檢討，以後作調整。

沒長遠規劃的社福政策

回歸前，政府有5年一次的白皮書或10年一次的綠皮書長遠規劃，且還有每年一次的檢討，所以政府每年於社福的投放、成果是清清楚楚的。但回歸後，政府取消了5年一次的白皮書或10年一次的綠皮書長遠規劃，資源和撥款不是因應預算而分配，也不是按社會實際需要而分配。現在資源和撥款是根據財政司司長就每年財政狀況的收入多少，一筆過撥款給不同部門，所以常出現經濟差時，基層對社福開支需求多了，但撥款反而少了；而經濟好時，基層對社福開支需求少了，但撥款反而多了。

但近年社會福利經常開支是有增無減，因M型社會 (2) 結構深化，以及人口高齡化。如若不早作長遠規劃，是難以緩和M型社會結構深化，以及人口高齡化帶來的影響，只會任由社福開支不斷增長，但

沒對準問題癥結去解決。政府的社福政策沒清晰指標，沒路線圖，沒時間表，對社會的分析又欠奉，只是被動的針對問題，即發現問題或悲劇出現，才作出補救，而非透過分析而主動作出事前預防。

即使2010年的社福長遠規劃諮詢文件，那長遠只得個講字，因那份所謂長遠規劃的文件，就像政府的政改方案，無計劃、無時間表、無路線圖，那算甚麼規劃？沒有長遠的全盤計劃，香港的社福機構仍會是一盤散沙，政府部門如社署、醫管局和民間社福團體、社福服務機構間沒有配合，只會各有各做，甚至互相爭奪資源和服務對象，互相爭奪撥款，不會一起商量如何好好分配和妥善運用有限的資源和撥款。

就以精神健康問題為例，社會近年常出現精神病患者自殺或隨街斬人的慘劇，但出事後，政府只懂增加社工、護士，卻從沒對症下藥，沒有檢討香港原來缺乏長遠的精神健康規劃，沒有檢討過社區福利規劃院舍化問題，只是盲目增調人手，令問題不斷重複出現。

過份依賴商界贊助

政府的社福籌款模式，過份依賴商界贊助。當商界出錢給社福機構，機構便會提供那些商人所希望的社福服務，卻未必切合真正需要，或小眾利益難被照顧。如果由政府出錢和主導，會相對切合社會需求，因政府需向市民問責，因錢來自納稅人。而現在過份依賴商界，除了資源不穩定、社福團體要花過多精力和時間去迎合商界，對社福服務的對焦度也有影響。

政府社福政策令社福弊病叢生

政府應確保社福機構財政營運狀況良好，對社工的工作帶來大量改變。現在社工要常常在社區中心搞活動，開無數的行政會議，寫無數的行政及財政報告，令社工們苦無時間跟服務使用者接觸。這使社工難以花時間去了解服務使用者，難幫助他們解決問題。可是這些繁複的會議和文件工作可謂毫無意義，社區中心需自負盈虧後，社工要忙於為社區中心賺錢營運，和地區人士及商界人士打交道，忙於填寫政府的官僚文件，根本對提高服務素質無甚幫助，反消耗社工的時間精神。這個荒謬制度也解釋了為何近年社工士氣持續低沉、流失量高，甚至社工自殺率也上升中。

政府的功利思維發作，社區中心要自負盈虧，只能做一些可以賺錢的服務，而非真正達到服務的意義。很多有意義和需要的服務，因不能賺錢，沒社區中心願意做了，剩下來的都是大路工作，如補習、托兒和講座等，甚至是運用資助把社區中心裝修得華麗堂皇，去吸引贊助。現在的社福淪為投資式福利，搞服務、搞活動全要看成本效益，扭曲了社福幫助有需要人士的本質。

社福服務檢討，應是檢討服務質素有沒有保持或進步、機構表現如何、政策方針能否實行，而非像政府現在那樣，只求金錢回報和效益評估，只着重錢而忽略服務質素。政府是把社福功利化，當作成做生意般，只問成本效益。

另外，政府分工不清，令社福機構工作過度繁複，直接為服務質素帶來負面影響。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理應只負責家庭危機處理、夫妻親子關係輔導和為單親與新來港人士作支援，但因房署準則含糊，房協又不協助，政府其他機構又不協調，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因此要處理房屋援助申請、公屋申請、露宿人士協助，甚至煤氣優惠評估等工作，令工作過度繁複，人手流失率高，形象不討好，士氣低落。而當發現問題，就像旅遊界發生零團費事件，政府往往第一時間向前線社工問責，只向下層社工追究責任，卻不會追究上層，不會去檢討大團社福政策、保障制度、方針和配套有否出現問題。

香港的公務員是執行命令的機器，效率甚高，不論身處哪個部門也能勝任，堪稱全才，加上不用直接制定政策，因此公務員在部門間調來調去也可以，而政府公務員有三年一調之例，每三年就調部門或工作崗位一次。可是政府腦筋生硬，以為所有部門皆可三年一調，包括社署也實行三年一調。很多時社工正在跟進不少個案，也要調職，由新的社工重新處理個案。但當新的社工對手頭案件剛剛上手時，又要面臨調遷，令社工不能提供最貼心服務，社工和服務使用者難以建立長久的深入關係。需知道社福服務最重要的是社工和服務使用之間能建立一個深厚的信任關係。

政府政策矛盾

現在獨留16歲以下子女在家是犯法的，這變相令很多單親媽媽/爸

爸不能上班工作，但社署又要求單親家長必須參與社區服務的義工工作，否則會受懲罰，卻沒同時為單親家長提供托兒服務，即使有，也是在很偏遠地區。政府政策不完善、自相矛盾、不知所措。

政府政策簡陋

衞生署表示，香港不同程度的精神病人數約有20萬，4萬多為嚴重精神病患者，有潛在危機，但全港精神科護士只有約150名，而政府20支社區康復融入工作隊，只有一隊在天水圍工作，其餘19支隊伍因缺乏地區團體合作和支援，仍未展開工作。可見政府政策的簡陋，是毫無配套和事前準備與規劃。大班鄭經翰批評：「政府對精神病患者的治療和康復工作，缺乏一個全盤計劃和政策，每個部門各自為政，互不協調。」

訪問

受訪者：張超雄（正言匯社主席、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前立法會社福界議員）

筆：現在的社福服務好像問題重重，一筆過撥款後，大部份社福機構和前線員工怨言甚多，政府在社福方面又重視不足，多年來缺乏諮詢之餘又不作長遠規劃，只懂利用資源撥款來令機構「河蟹化」，究竟香港的社福出現了甚麼問題？

張：現在的社福服務和從前不一樣，絕大部份要靠民間團體自己去做，政府只是負責撥款，且為了控制開支和減少支出，撥款已由津助計

劃改為一筆過撥款，使撥款的供應不穩定了，產生不安全感，也擴大了機構間於撥款上的競爭。機構為了得到撥款，往往討好政府之餘，也被逼傾向保守，避免看法和思想與政府有出入，這使民間的創意力量和自發思維得不到彰顯。而且一筆過撥款下，實際的津助額少了，機構唯有在員工身上慳錢，甚至刻薄他們，以換取資源上的安全感。

筆：一筆過撥款下，資源分配變相少了，又是否成為了政府控制社福機構的手段之一？對不聽話的機構便減少它們的撥款？

張：整個社福界已被政府支配了。當撥款有隨時被收回的可能時，社福機構怎不會被政府支配？回歸前政府也很主導，但對於社福政策卻是有長遠規劃，有10年規劃的白皮書，有5年計劃的綠皮書，有每年檢討的制度。但回歸後統統都取消了，未來社福怎樣發展，沒有人知；應否增加人手、長者護理問題、貧窮問題全無規劃去讓社福界按着去做，使社福機構不能預早編訂人手和定下計劃，只能聽命於政府變幻莫測的指令，根本難以提供好的計劃和服務，同時也大削機構的自發性和獨立性。因為機構只能按標書辦事，彈性極低，自由度極低，而且當機構不聽話或對政府批評多，政府隨時可停止撥款或在批新撥款時加添壓力，用撥款來控制社福界。

筆：回歸後政府為何要取消長遠社福規劃？

張：政府取消社福的5年、10年長遠規劃，是想中央集權，收回討論權力，不想社福機構為弱勢發聲時批評政府政策的錯處，反映政府對社福團體的不重視和不信任。政府的社福政策是因應政治需要，利用政

策去擺平民憤，而不是按社區需要而去做政策。政策決定不透明，是按政治需要而突然出現，校本驗毒計劃便是好例子。

筆：剛才說到因資源分配和一筆過撥款問題，社福機構為了省錢而刻薄員工，究竟實情是怎樣？這對服務質素有何影響？

張：機構在各方面削減薪酬編制，如以往20個人做的事變成15個人去做；以往每間服務中心有一個資源顧問，現在卻是數間中心才一個；以往社工做的事，現交給了助理做，以往助理做的事，交給了義工去做；以往薪酬跟公務員制度，有穩定性，現在則是海鮮價和短期合約，員工隨時朝不保晚，且人工只是過往六、七成，福利又大減。因此員工流失率和流動性高，使可累積的經驗少了，對講求經驗為首的社福服務，質素自然低了。且工作穩定性低，自己下個月隨時失業，連自己都未必有工做，又怎幫人？當穩定性低、流動性高，提供的服務也難長遠和穩定，社工難以和服務使用者建立關係和深厚信任，隨時連服務使用者的性格和需要還未了解清楚時，又要換人，欠缺足夠的機會和時間建立關係。

筆：政府以商業態度看待服務以人為本的社福政策時，帶來了甚麼不良影響？

張：政府把服務看成開支，對是否延續服務和撥款只看能否賺錢，但幫助人的服務往往是難以賺錢的。且除政府外，可申請的基金過少，很多不賺錢但幫到人的服務被逼停止，受害的是有需要的服務使用者。於經濟不好時，便大幅削減社福開支，把社福看成負擔，漠視市民的需

要。社福政策的首要考慮乃市民的需要，不能把金錢看得比市民重。

筆：對於社福的未來發展，你是樂觀還是悲觀？你又有何建議去改善社福問題根源？

張：長遠來說是樂觀的，因社會和中國在不斷進步中。只是香港在近10年倒退了不少，很多服務發展停滯不前。改善社福問題根源要團結力量，去改善貧富懸殊、為市民提供需要的服務。當政治制度不斷改善，市民不斷覺醒，民間團體不斷發聲，是會帶動社福界發展的。

筆：現在社會最大問題是甚麼？

張：現今社會最大問題就是貧富懸殊，而政府對此又缺乏處理和改善，社福政策沒去針對貧富懸殊問題，使社會分化大了和進步慢了。政府一日不改變短視的眼光，社會也難進步，當危機出現，社會便容易散渙。

註釋：

(1) 請參看2010年7月28日，黃永於商業電台網站撰寫的網誌「福利改革之重點在規劃」。

(2) M型社會即指一個社會中，中產人口不斷萎縮，但極端的富裕人口和貧窮人口不斷增加。

第二十一章　文化藝術

政府的親疏有別心態，不但顯於政界，更在社福界撥款及文化藝術政策上表現出來。

在政府的場地夥伴計劃下，康文署轄下的場地會優先提供給「聽政府話」和受政府資助的團體，多達10多個。這些團體每次可預約場地達數星期之久，加上受政府資助，門票可以低於成本的價格發售。而被視為「不聽話的」團體，如「好戲量」，便不受政府資助。只能以自負盈虧模式生存的團體，即使有幸預約到場期，也因票價上無法競爭而處於劣勢。而一些吸引力較低的文藝團體，因得政府資助，即使售票情況不理想，政府也會用公帑去買飛包場，慷市民之慨去益聽話的團體。可見「聽話」與「不聽話」的團體受政府的重視程度有天淵之別。

在香港這個文藝不太受重視的社會下（不要以為很多家長在子女小時候便推他們學鋼琴學小提琴就是正視文藝，事實很多時要子女報讀西樂興趣班，目的為他們入名校加大本錢，或表示自己步入中產階層或上流社會，用樂器表示身份而已；也難怪難表達身份地位、難為入名校加分的中樂遠遠較少家長為子女去報讀），文化很難單靠商界和文化界去推行，需要靠政府資助。可是政府卻利用資助程序作為整頓與收買文藝團體的手段，而沒有真正落力推廣文藝。難怪常用辛辣言詞批判政府的

文學家要求西九設立文學館，政府也一直充耳不聞了。

掌管文藝的民政局和旗下的藝發局，除了使資源錯配，令資源被康文署壟斷（以一個無民意基礎和專業代表的官僚機制操控文化界，且每年的經費只得一億，比「盛大」的西九三個設計模型的設計費還少），對本土文化也毫不尊重，沒為本土文化正名和爭取。除透過撥款去企圖掌控文化界外，從沒牽頭帶領文化討論，又對本土文化政策倡議一直欠奉，更無發揮為文藝界發聲以及作為文化人及政府間的橋樑，令文化人不滿時，只能透過文章或直接行動去表達，讓外界錯覺文人特別多不滿。

單看政府委任商界的王英偉為藝發局主席，而非由文藝中人管文藝，就知政府是以商業思維、生意角度看文藝發展，那麼香港的文藝又怎不會是向錢看及發展不出令人重視的本土文化呢？

訪問

受訪者：葉輝（香港文學界前輩，不論詩、散文、文化評論也是現在香港文化界的泰山北斗。著作包括《書到用時》、《詩話——詩緣與詩教》、《書寫浮城》等等）

筆：香港的文化、創意、藝術在社會上普遍認受性不足，本土創意和特色也不見突出，是基於甚麼原因？

葉：紐約、倫敦、巴黎，甚至北京和台北，人民的藝術文化質素是普遍較香港的高，這是因為香港沒有一套完整的文化政策、沒文化規

劃，不把文化當成資產。政府沒有文化部，只把文化列作為民政事務中的一部份。而紐約、倫敦等地，作為國際都會，不但重視別國和世界其他不同地方文化，也重視本土創意。香港就是不重視本土創意，才沒有自己一套文化創意，使香港不能成為真正的國際大都會。

筆：為何甚少本地人願意以文化藝術為職業？

葉：因為看不到出路，甚至很難賴以維生。在藝術方面，做建築、室內設計、書刊設計可以維生，但做音樂家、作家則看不見出路，以此為業根本難維持基本生活。即使是出名的全職作家，如李碧華、陶傑、梁文道，他們也要做電視節目，在其他媒體工作，才養得起自己。長期不能維持生計時，便容易使人放棄。不要說人，即使報刊也是這樣，以前報刊是有文學版面，有詩詞版面，但現在已沒有，因為讀者甚少。報刊寧願加多點娛樂版、馬經，也不會出文化藝術版，因報刊也是看廣告客戶。在商業社會，一切不符合資本運作的事，特別困難重重，不是香港獨有這情況，當城市出現資本化便會這樣。

香港的填鴨式教育也有影響，但不是絕對地影響。也斯、黃碧雲、陶傑也是從小接受香港教育，但一樣成為出色的文化人。

筆：那麼，如果想在香港以文化藝術為全職，應怎辦？

葉：要堅持自己。縱使不能改變建制和主流，必須先堅持自己，寫自己想寫的東西，面對惡劣環境也不要放棄。也可找志同道合的夥伴，醞釀力量去尋求改變，就像三位80後青年聯合參選藝發局改選，便是

好例子。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出書刊，互相觀摩，也是好的。

筆：香港文化創意出現問題，與政府政策和社會思維有否關係？

葉：從上世紀30到60年代，香港和上海是電影雙城。在50、60年代，香港和台灣有蓬勃的文學交流，香港的電影和流行曲紅遍整個東南亞、影響世界各地的華人圈。可是到現在，不論電影和文學，也式微了，這是因社會充滿商業文化，政府只懂用錢去量化文化、電影、創意。例如電影為迎合內地市場和口味，香港元素不斷減少；藝發局思維過於現實和商業化，撥款與否只從功利思想出發，而不是從社會素養方面去想，沒考慮應做甚麼才是對人們有好處。

就像香港以前到處也充滿富有特色與平民化的商場、店舖，但因香港只懂環繞地產產業發展，只向錢看，變成現在的商場個個都一樣，有特色的平民化店舖則被逼走。當人人可靠炒樓炒股去賺大錢，還會鼓勵到人靠創意去賺錢嗎？

筆：香港可怎樣做，去使香港的文化、本土特色再現？

葉：我們不要把文化過於簡單的分為東方或西方、現代或古典，這是難達致有個人風格的創意。要有本土特色，才能開發個人特色。創意輸入要有本土特色，有本土特色，才能成為國際特色。個人特色、個人創意，便是從文化素養培育出來的，再把人與人的感情、環境、意識元素融入自己的作品，王家衛、杜琪峰便做到這境界。香港是中西融合的文化，融合不同形式去表達自己的精神，例如電影是西方人發明，但中

國人一樣可把自己的精神放入去，再發揚光大。

香港是比鄰近地區更有條件、資源去發展創意產業，即使經歷金融風暴和金融海嘯，政府仍有大量資源，可是香港政府是個守財奴，見到民怨才派錢，而不是去想怎樣用錢才能使社會增值。政府政策因文化並不能在短期內帶來大量金錢，而遏抑着文化產業，凡事太過金錢掛帥。香港不能只顧商業而忽視香港的文化思維。文化是香港的根，要有新思維，或最少翻新50、60年代充滿特色的文化政策，香港文化才有希望。

筆：你怎看西九的發展？

葉：希望不是要把西九弄為一新景點或地標去吸引內地遊客，或用來和新加坡、上海競爭。不希望西九重蹈紅館的覆轍，成為歌手開演唱會的地方。西九要輸入文化氣息，要活化，而不是一個有軀殼但沒靈魂的旅遊景點。文學就是文化氣息的基本，要有基本才能把文化和生活連在一起。也希望西九發展成為八成綠化或文化建築，作為那兩成超級豪宅的後花園，希望西九不是發展一大片所謂文化建築，而最終只是西九內豪宅的襯托品，用文化去包裝地產項目。香港所有事都飛不出地產商的五指山，衣、食、住、行全被地產商控制，香港人不論睡覺或清醒，也逃不出地產商的產品。地產霸權令香港的生活、文化、特色全被閹割。

*　　*　　*

受訪者：鄧小樺（文學雜誌《字花》編緝、本土詩人，曾出版詩集《不曾移動瓶子》）

筆：對於文化藝術，政府好像頗不重視，關乎香港本土發展及文化創意的政策和配合不多，熱心推動本土文化的你，有何看法？

鄧：政府對文化的政策欠缺長遠視野和規劃，是因香港乃殖民政府，不會想去建立本土身份和文化，不想市民為自己的地方感自豪，因不利其統治。殖民政府只會挖盡資源便算，缺乏資源便從外國入口，對待本地的產品重視程度很低。回歸後也是這樣，政府從沒想過去弄清香港故事、香港是甚麼、香港值得自豪之處，只懂時段化的推銷香港，例如今期興功夫，便推銷成龍，下期興飲食便推銷奶茶，是時段化的，卻忽略了香港一直積存不變的價值。

筆：負責香港文藝的民政局和藝發局，多年來在推動本土文藝的成績強差人意，是否根本態度已經出現了問題？

鄧：民政局用閒餘態度看待文化，把文化看成娛樂、看成消費，結果文化在社會上不被重視，市民難分清何謂好藝術、何謂大眾生產品，分不清文化和康樂的分別。文化是對周邊有要求，有素養的，不是康樂消費。政府沒有藉藝發局推動民間藝術發展、為文藝界發聲，只作為撥款機構，用少少撥款使文藝界去互相爭奪，製造爭端以利管治。因此文藝界要發聲，只能上街和寫文章，根本沒機構可代為反映聲音。政府應成立文化局或一專責部門，從文化藝術角度去看文化，而不應從管治角度和消閒角度。

筆：作為文藝界一分子，在香港投身文藝界，是否出路黯淡？

鄧：在香港投身文藝界很難有出路。雖香港的文藝界人士善於突擊和入位，持續有年青人投身文藝界，但仍難改變大環境。

筆：大眾傳媒對文化的報道不斷縮小，這現象對香港的文藝有何影響？

鄧：大眾傳媒對文藝、本土藝術的報道太少了，但西九出現，報道是多回了些。但傳媒對文化的認識較淺，即使編輯和記者也如是，令市民認識文化的途徑少了。現在的傳媒太商業心態，只想取悅讀者，沒視傳播文藝為責任，把文化視為即用即棄的商品。以前的傳媒不管能否賺錢，都會要求和希望讀者對文化、文學藝術有一定認識。

筆：對於文藝界的未來，轉機在哪裏？

鄧：西九會被人視為轉機，但包括我自己在內的個體戶藝術家則看不到有好的轉機。雖然西九對藝術發展一定有幫助，對整體有部份正面影響，令原本太差的土壤有點改進，但到現在，西九的搞法還很模糊不清，不敢接觸具爭議性的東西，欠缺需要的革命性和方向。但不是沒有出路的，出路在於社運和異見聲音結合，把沒有的東西，爭取到有為止，如爭取興建文學館，爭取成立單位去負責文學，是正面的爭取，有方向性，是從需要甚麼的角度去想，當爭取力量龐大時，便可爭取到更多需要的東西。政府要改變現行的傾斜主義，因租金太貴，使東西過於單一化，扼殺了香港；而傾斜主義令市民凡事皆以錢為出發考慮點，並非因為貪錢，而是因在香港，沒錢萬萬不能，有錢才有安全感。

第二十二章　人口高齡化

2010年，香港65歲以上的長者約有90萬人，但到2039年，估計會暴升至250萬人。2031年，65歲以上的人口估計由2010年的12%升到25%，20年內比率翻一翻。在2009年，約6個年輕人供養一位長者，到了2039年，估計兩個年輕人便供養一位長者，壓力大增。到2040年，人口的年齡中位數由2009年的42歲升至51歲。而在貧富懸殊惡化下，長者平均的經濟能力日差，上世紀80年代只有8%高齡人口申領綜援，但到了2009年，有23%的高齡人口申領綜援。老無所依的情況惡化下，人口高齡化便成為一危機了。

人口高齡化，表示納稅人人口不論在比例和數目上也大幅減少，而對被供養和保障的需求相對較大的高齡人口則上升，公共開支難免加大。為了應付公共開支壓力，稅率將被提升，更多稅項會出現；即使勞動人口下降而普遍薪酬上升，但在財富分配的格局沒大變動下，勞動人口實際所得分別不大，但面對的稅收和供養長者的壓力上升，而實際落袋的收入下降，消費力下降，對各行各業構成不良影響。如若經濟競爭力因政府短視而向下降，勞動人口的壓力又大增。

出生率低，高齡化情況惡化

近10年香港的出生率也過低，約每1,000人生育7.42個小孩，比台灣8.99個、南韓8.98個、新加坡8.82個低，甚至出生率被評為過低的日本也有7.64個，更不要跟中國的11.18個和美國的13.82個去比了。香港的出生率在全球223個國家／地區排行倒數第三。

年輕人現在連結婚也不夠錢，養自己也只是剛剛好，車也未必買得起（唐英年還訓示80後隨時會車毀人亡，真是諷刺），遑論買樓。連安居樂業也如此高難度，又怎去生下一代，秉承傳宗接代的使命！因此遲婚、長期獨身、不生育的人越來越多，即使生，也是一個夠曬數（大佬，養個小朋友都要400萬呀！）。這是因社會機會及財富分配被地產商壟斷，政府為了穩固政權又要去維護地產商利益以討歡心，社會資源被大財團霸佔，中下層市民收入追不上物價。這個問題不解決，香港前景黯淡。

社會是一個整體，當其他群體利益受損，自己也難獨善其身，如果大家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應團結起來革清弊端。

政府視老人為負擔

從政府的諮詢文件可見，政府多次表明人口老化將會為香港帶來沉重負擔，老人問題是社會負累。但這是必然事實嗎？老人就一定是負累？其實年齡高也可繼續貢獻社會，老有可為，高齡人士也有其獨有價

值。但政府思維守舊，只視老人為負擔，那麼在人口高齡化趨勢下，政府又怎會提出具建設性的提議呢？

在歐美，兩成到五成60歲以上長者還在工作，促進歐美各種行業發展。到了2039年，香港55到64歲的人口群組，估計四成以上擁有大專學歷，難道政府沒想過怎去運用這些人力資源嗎？政府未免有點窩囊吧。

政府辦事慢十拍

2010年度《施政報告》提出要研究長者作回鄉養老的安排和配套，及有意為到廣東養老的長者提供退休生活津貼和研究長者照顧服務及資助模式。驟眼看還挺獨具匠心，頗不錯似的，但看深一層卻是令一番滋味。廣東近年不斷發展，經濟水平大躍進，加上人民幣升值（和可見將來的預期升值），廣東物價不斷上升，生活成本也跟隨上升。不少港商已因此而遷離廣東，到更北處設廠。廣東對長者的吸引力已隨生活成本升高而不斷下降。政府到現在才「開始研究」到廣東養老，是遠遠落後於形勢和慢十拍。現在才開始研究，但沒有時間表、又沒有具體範圍，就連會否諮詢市民也未知，所謂研究只是流於口號，是否會有實質成績出來也未知。

這反映了政府根本沒為人口高齡化帶來的種種挑戰（或危機）作好準備，只懂作出舉不勝舉的研究再研究去敷衍地回應問題，沒實際上裝

備好。多達七成長者在輪候院舍服務時已經死亡，政府從沒解決好輪候過久和院舍質素問題。可見政府很多時太僵化地看待問題，缺少人性化去處理問題。我們的上一輩，每晚獨坐在閣樓窗台，空對着凄冷的月光，等待帶着獲得院舍安排訊息的飛鴿，可惜等了一年又一年，還未等到就已百年歸去，我們怎忍心這些苦冷的長者們連區區一個院舍照顧也得不到？

可行之路

香港、內地、廣東也面對着人口高齡化問題，但港府有沒有想過大家可一起討論設立跨境的老人和安老政策？香港的老人宿舍和牀位嚴重不足，其實可找鄰近地區協助，而廣東的老人醫療較差，香港也可協助以及提供人手培訓。大家可一起互用資源和各自優勢，互補其短，達到雙贏局面。可是港府眼光狹窄，沒從大處着眼，最多是提出難以實行的長者自己回鄉養老計劃。

訪問

受訪者：方敏生（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行政總裁）

筆：香港人口老化問題、人口高齡化會為香港帶來甚麼影響？政府處理人口高齡化問題時，有否對症下藥？

方：人口高齡化是全球面對的問題。在香港，戰後「嬰兒潮」時的

人老化，使高齡人口比例大升，政府要為此做準備。香港老人貧窮問題嚴重，65歲以上人口中有17%要拿綜援，香港沒全民退休保障，而強積金有漏洞，有一部份人得不到保障，且強積金只佔工資一成，是不足夠的。香港有三分一的長者是貧窮的，月入少於3,200元。人口高齡化會令此問題惡化，使貧窮人口大增。這問題需要有政策處理，不能單靠稅收，要有全民退休保障，以及押後退休年齡，促進長者就業。

長者面對服務不足問題。院舍不足，輪候期為3年，有些要更久。政府提出居家安老，但也要服務配合，可是政府在此方面沒規劃，人手不足，專業照顧人員不足，地方不足。現在興建一間宿舍也要數年，顯示政府沒有未雨綢繆，10年後會出現很大問題。

筆：對於長遠規劃人口高齡化問題，社聯有何提議？政府用安老事務委員會去處理人口高齡化問題，是否足夠？

方：社聯提出長者友善社區計劃，因城市開始老化，各方面措施應有調節，例如戶外空間建築、市區重建、交通設施、紅綠燈速度、就業、住屋、醫療等環節，政府要從以上環節着手配合高齡化社會。

政府的安老事務委員會是在勞工福利局之下，不能夠跨界別。董建華時代由行政會議負責，現在卻降格在局下。政府把人口高齡化看成負擔，負面看人口高齡化問題，叫人回鄉養老。但人口高齡化不是負累，而是社會結構轉變，政府要作出調節，但政府欠缺相對的視野和機制。政府沒去處理結構性問題，只是斬件式處理，例如回鄉養老、生果金離

港日期寬減等，可見政府沒清楚方針。大部份長者是土生土長，回去哪個鄉養老？

筆：香港貧窮問題的程度和成因怎樣？貧富差距為何越來越大？政府處理貧窮問題時，有否從根本處理？

方：政府要處理貧富差距和貧窮問題，一旦變成怨氣和社會矛盾時才處理已經太遲。當經濟越來越好，一部份人因而改善生活，另一部份反因而更差，使社會嚴重兩極化，是嚴重警號。現在貧窮線以下約有126萬人，比10年前更差，尤其老人貧窮率高達三分一，兒童貧窮率高達四分一，青年貧窮率在10年內不斷上升，當副學士出現後，貧窮學

生大增；45至64歲貧窮人口達35萬多，比10年前多了10萬。低收入群組月入由10,000跌至9,000，但高收入群組由32,000升至33,000，可見貧富距離不斷擴大。

政府應盡快處理就業貧窮和長者貧窮問題，避免情況再惡化。貧窮問題不是靠慈善或派糖可解決，而要透過社會再分配。美國有負入息稅、tax credit policy，但香港只靠綜援，欠缺其他政策支援。

筆：政府的扶貧思維是怎樣？有否長遠規劃？還是只見步行步？

方：政府多只是派糖，例如綜援出雙糧，而不是檢討整個綜援制度的不足；政府只是有錢鋪鋪清，而不是從長遠作打算。例如強積金應全面檢討，但政府多年來對意見不回應，又不肯作研究，以前有扶貧委員會時，最少會點出哪個層面、人口組織、地區的問題需先處理，然後作出研究。但政府先是拒絕恢復扶貧委員會，又沒執行以前扶貧委員會訂下的目標。

政府應訂下3年、5年目標去處理貧窮問題，要用跨界別平台去研究問題。可惜到現在還只是以慈善去處理問題，例如關愛基金。

筆：新建公屋集中在邊緣地區所帶來的問題，如天水圍、東涌現象，是否政府把新建公屋全集中在某一兩區所致？政府為何這樣規劃公屋？

方：城市規劃和貧窮問題是相連的。那些邊緣地區缺乏工作種類，地區設計沒包涵就業機會。那裏私樓也少，證明政府規劃不足，地區支

援欠奉，市民不願往那裏居住。因規劃不足，小型社區經濟欠奉，便出現貧窮地區問題。天水圍很多年青人，找工作的成年人遠比其他地區高。

觀塘、黃大仙那些地區是因老化才出現貧窮問題。政府要從城市規劃去改善此問題。例如觀塘重建，裕民坊的生活方式是養活了附近的一個大社區、消費力低的數十萬人。但政府的市區重建忽略了這現狀，只懂把社區優化，卻變相趕走那些地區的原居民去偏遠地區，把小型經濟社區破壞。政府只是改善了社區環境，但沒改善市民的生活質素。居住了數十年的居民被逼離開，生活方式和空間完全改變，被逼拿綜援。政府處理貧窮問題時，應從市民生活方式、質素、面貌去考慮。

筆：跨代貧窮的成因何在？和政府的政策有何關連？

方：低收入家庭學童在現有教育制度下，面對很多困難。他們沒錢作課外學習、課外活動，令他們求知識的機會大減，憑知識脫貧機會少了，令社會流動下降。副作用是自信心低，出外吸收經驗機會低。現在連入直資學校機會也少了，讀書出頭的難度大增，翻身機會少了。學童怨家人窮、怨父母，使家庭不和諧。在現今教育制度，窮人已輸在起步線上。政府政策沒規劃，沒對準核心源頭，只是推出兒童發展基金派糖。

第二十三章　出生率遞降

老夫少妻

近年香港男士北上娶妻成為一股風氣，且數量年年遞升，近兩年每年多達萬多對新婚夫婦是港男娶北女（內地女子的俗稱）(1)。而港女北上找北男（內地男子的俗稱）也開始成氣候，2009年有約5,000對新人為港女嫁北男。

對於這現象，大家會歸納出甚麼原因？普遍認為是港男犯賤，貪圖北女皮膚白皙、腰肢嬝娜、杏臉桃腮、玲瓏浮凸，儘管一些北女因在夜場闖過天下，被認為是不清潔，抑或只是廠妹或農村出身，生活多較拮据。大多港男非到肯定自己再無能力「成功爭取」港女嫁給他們，才會「北上泡北女」，但到那時，年紀最少已踏入中年，而泡的，當然是較年輕的女子，始終男士食色性也，而這就促成老夫少妻現象。

另外一個較普遍共認因素（只限男士），就是「港女現象」出現。有認為港女太貪慕虛榮，港男難以滿足她們的購物和金錢需求，於是便把目標轉向較溫柔體貼（當服務性行業的女士在此方面有很大優勢），或較單純（出身鄉郊的）的北女。但事實果真如此？

北上娶妻的老夫，絕大部份都是基層人士，中產和更富有的，娶北女還未成風氣。但好色的男人只限於基層男士嗎？為何絕大部份娶北女

的都是基層港男？

娶北女是近十多年開始的，數字一年比一年多，剛巧這十多年，香港總體經濟不斷上升，金融地產越做越大，但貧富差距卻同時越來越大。這意味着生活成本隨GDP不斷上升，要保持一定生活質素的成本越來越大；但同時基層的收入越來越低，面對的物價和通脹壓力越來越大，養自己越來越難，更遑論收入足以娶老婆和組織家庭。

港男面對此情況，港女何嘗不是？生活成本越來越高，但收入沒隨之上升，意味生活保證越來越低，但哪位女士不想生活質素有保證、不想身邊的男人有足夠能力（包括財力）去保護自己？可是現在男士們連養自己都成問題，對女士們來說，此問題不可謂不大。為了改善生活和找個經濟能力較好的丈夫，女士們只好一開始在擇偶條件上加上種種有關財政能力的關卡，以免浪費時間，錯過那些數目不斷下降的有能力男士，因此給人貪錢的感覺了。當然拜金主義和相隨的物質主義，也是女士們，甚至男士們向錢望和購物慾旺盛的原因。

娶港女越來越難，那麼港男只好北上，去追求那些相對生活質素較低，可用較低的成本去滿足的北女。北女當廠妹和夜場職員，工資只是千多到數千元，而大陸物價較低（當然現在快追上香港了！），基層港男較易滿足她們，而且收入也相對比北男高，對想改善生活質素的北女，港男是有吸引力的，這促成那麼多北女願意嫁港男。港男多年追港女不成後，已屆中年，吸引力越來越低，才真正認輸，把目標轉移到北

女上。因此北女總是被人標籤為貪錢，但事實上，不論北女港女，誰不想生活質素有一定保證？為何總要用有色眼光看人？

由於內地經濟不斷發展，下嫁香港中年或老年男士的內地女子，年齡由80、90年代的20歲左右，升至40多歲的中年女性為主了(2)。經濟發達，但基層分不到成果，貧富差距不斷擴大，是多了基層男娶北女的原因之一，加上某程度的大香港心態，非到最後不選北女，促成老父少妻現象。

後遺症

老夫少妻現象本不是甚麼問題，但在香港總是伴隨着產生感情不佳、家庭暴力、離婚、單婚媽媽問題。首先北女來到香港後，期望總是出現落差，原來身邊的丈夫並非想像中那麼有財政能力，甚至要政府資助、自己隻身來港原來還要外出打工才可以支撐起家庭，要一起共患難了。香港物價與生活成本比她們想像中高，可是到了結婚來港後才面對幻想破滅，後悔莫及；有些較狠心，趁自己還年輕，索性騎牛搵馬，希望找到能力較好的男士。

嫁來香港的北女，總被歧視，不是被指為貪錢，就是因太年輕貌美，被指會勾別人老公，或因出身夜場，被指為淫婦等。

帶頭歧視這班北嫂的其實是香港政府，不把她們視為香港人，要住滿7年才可平等地享有應有權利，又視她們為負累，即使有支援，也不

甘心。連港府也歧視她們，港人又怎不會一樣？在此情況下，夫妻感情怎會好？離婚率自然也較高。而老夫當然也較短命，尤其是基層老夫，平均壽命是較短的，往往先行一步去天國，留下孤兒寡婦，令單親媽媽數量上升。

歸根究柢，出現這些情況，源頭乃經濟上的分配不公，政府只懂一味發展，但卻沒做好收成分配把關的公證人角色。到了當大陸女士生活條件和收入不斷提高，香港經濟收入分配繼續兩極走向時，港男將來可能要娶東南亞妻了。

男女比例失衡

根據統計處數字，2009年港人男女比例是1,000 ： 889，而除去外傭後，比例是1,000 ： 955。但到了2039年，預測比例是1,000 ： 744，而除去外傭後，比例是1,000 ： 804。2009年本港有約51,000個新婚註冊，其中約18,000個是港男娶北女，約4,000個是港女嫁北男。為何趨勢是越來越多港男娶北女？全因「港女」問題？

一來香港男女比例失衡日趨嚴重，二來物價不斷上升，通脹惡化，但大部份人口收入反而遞減，尤其基層收入遞減情況嚴重。收入不穩，合約制散工越趨普遍，哪來錢在香港與港女拍拖呢？行街則交通費越來越貴，睇戲、買衫、買禮物、吃飯統統要錢，單是交通費和吃飯都令人窮。就業不穩定，朝不保夕，前路茫茫，對將來不存厚望，又怎使人安

心在本地結婚生仔呢？

相反，和北女拍拖成本低得多，一來兩地差距，見面次數自然較少，二來內地的消費指數較低（可是隨着人民幣不斷上升，物價隨之而起，這個好景也快隨煙消逝）。在不少北女眼中，港男較斯文，不像北男那麼大男人主義，而港男縱使收入不斷下降，普遍仍比北男收入高，也有住屋保證（最少也有公屋），因此北女普遍願意和港男交往，而港男基於成本等因素，近年也多選擇北女了。

港女相對要求另一半的經濟能力要佳，即使不能養起她，起碼要提供一個居住單位做家；可是現在普遍年青港男收入也是僅夠自己餬口，遑論養起對方或置業了。而隨着女性的待遇和社會地位提升，要求另一半的經濟條件也相應提高了。

40至44歲未婚女性比率由1986年的4%升到2006年的16%。現在每8名15至49歲女性便有一名未婚，但到2039年預計會升至每3名便有一名未婚。1986年，25至29歲的已婚女性為62%，而2006年則降至31%。女性初婚年齡中位數由1974年的23.1歲，升到2009年的28.5歲，這很大程度由於結婚成本越來越高，因實際收入越來越低，追不上通脹。因此結婚酒席越來越多經濟酒席價，又要送這些又要送那些去拉客。收入下降，能儲夠錢結婚的年齡越趨推遲，令遲婚普遍。經濟成果被大財團壟斷，收入大部份也落入大財團袋裏，也是一大催化劑。

出生率下降

既然結婚也那麼難，生子女就更難，因養不起小孩，寧願索性養寵物了。難怪香港的出生率在遞減，全球排尾二。2009年每千名女性生1,042個嬰兒，但到2039年則預計跌到每千名女性生936個嬰兒。出生率下降使適齡勞動人口（15至65歲）將不斷減少。2009年每千名勞動適齡人士需扶養337人，但到2039年，推算會升至每千名勞動適齡人士需扶養625人，大增下一代的壓力，又會對政府的財政構成嚴重壓力，因可交稅人口減少，但需資助人口卻上升。

有危總有機，但要看政府決心。越來越多父母都非港人的內地人上來港產子，而那些嬰孩是有香港身份證的。2009年便有39,000名這類嬰兒，而到2014年則預計會升至49,000名。政府應吸納這些人口流入來香港定居和工作，減低出生率下降的不利因素。

註釋：

(1) 根據總計處調查，2009年有51,000多對新婚註冊，大約23,000多對的其中一方為內地人士。

(2)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在2010年做的調查指出，下嫁香港男士的內地少妻，平均年齡已達47.5歲。

第二十四章　宗教霸權

成因

社會權力和財富分佈越來越兩極化，在缺乏公平的制度平衡下，強勢的為求奪取更多利益而侵略弱勢，處於弱勢的自然受盡欺壓。可是筆者感到一些號稱和諧與正義的教會卻對壓逼者默默附和，以交換金錢支持，以便有更多資源去宣揚教義。加上又不對沒把守好公義關卡的政府作出批評，甚至不去批判內地政府的種種惡行，以得到能於內地傳教的機會。

得到這些資源、金錢，以及在內地宣揚教義的機會，卻是犧牲着作為牧者為被壓逼者討回公道的本份，令曲解教義的宗教霸權出現了。例如國慶便在教會高調慶祝；請高官任嘉賓；大叫建設和諧社會，要支持政府；教會高層出任政協等官銜；和高官有親密關係，但每逢六四、內地腐敗和維權問題、香港政制問題、社會制度欠缺公義等問題，這些教會教牧便以政教分離為由，不評論不探討，在教會內外也迴避。這些教會變成心靈慰藉所，只強調令教徒心靈得安慰，卻對社會不公義不聞不問，有違為弱勢出頭的角色。

原教旨主義

那些行霸權的牧者被稱為宗教右派，多是信奉原教旨主義。原教旨主義指絕對順從宗教的原本教條，但不容其他非最傳統版本的解釋，稍過火位便不容異見，連討論的空間和厚度也欠奉，因此被批評為排他性過強和過份保守固執。當這些保守力量大行其道，會阻礙社會的進步力量。現在的香港是被大財團把持着，小市民難以透氣；制度不完善，亟待改革；民生每況愈下，基層越來越慘，中產不斷萎縮；大學畢業生薪酬多年沒升過，但樓價物價不斷狂升。保守的教會當道，是變相加深了不健康狀況的持續和惡化。作為社會一分子，我們應關懷被欺壓的弱勢，我們是有責任站出來去匡正社會的歪風，不應變相打壓改革力量。

所謂代表真理的教牧的謬誤

「善在心中不為善，善在眾生方為善。」耶穌是走入群眾，在群眾中高聲吶喊，而不是天天躲在教堂內講道。耶穌講求的是親身體會，而非只是高高在上的教導；到現場參與和協助，去釋放被壓逼的人、而非躲在家中讀《聖經》。

馬丁路德金說：「改變不會自動到來，而是需要經過不斷的抗爭。一個真正和諧的社會，不是爭議得到消失，而是公義得到彰顯。」但現在太多教會使福音太個人化，對社會整體參與不多，對社會的討論只流於研討會和小組討論，但甚少身體力行去改變社會，只是躲在象牙塔內

紙上談兵，對實際無甚幫助。太多教會對弱勢的關懷只是施恩式的救濟，就像政府只懂派糖，缺乏從根源上和制度上去改變不義景況。

更大的問題是當社會也在控訴官商勾結時，不少教會為求和中央打好關係以便進內便地傳道，或得到政府支持和商界贊助，與政商越走越近。有時甚至避重就輕，對官商惡行視而不見，沒擔負鞭策社會責任、沒去監察神所倡導的公義和神所創造的社會有否被破壞。當有事，只懂叫信徒禱告，而沒站出來指正各種惡行，是默許惡勢力所為。當政治制度如此不義時竟甚少牧者出來發聲，甚至有像梁燕城之流 (1)，在現有功能組別制度如此不義時，竟顛倒是非的說功能組別是弱勢，要更加保護他們的利益，對筆者來說，這反映他的人格不是可恥，便是沒有牧者應有的智慧，卻扮着真理和智者去作非愚則誣的行為。更甚的是，在筆者眼中，有些像吳宗文 (2) (3) (4)、梁燕城、蘇穎智 (5) 這類牧者 (6) 有不少言論，是在蔑視那些身體力行去爭取公義的平民、參與社運、走進街頭的人，用奇異眼光待之，這是否在鼓吹人們要盲目服從政府？

不論內地或香港政府作惡多端時，還要我們盲目服從政府，出聲批評便是不應該，那不是不分是非黑白，只求討好政權嗎？這樣不但有失牧者身份，更有違公義。有教徒甚至因參與過六四晚會、七一遊行，而被教會擱置受洗禮 (7)。這些教牧對維權人士、為弱勢發聲的社運分子如此難以包容時，卻對中共向人民施行的制度暴力如箝制通訊自由、打壓維權人士、強徵人民土地、官員貪污腐敗，甚至六四屠殺等，都表現得相

當包容和理解，不是避而不談，就是叫人不應批判政權的所作所為。

這些教會在表現樸素、環保、簡約時的同時，卻又追求娛樂化的大型佈道會、華麗的教堂、明星名人講道，難怪它們會為了方便回內地傳教和五斗米而作出討好極權政府、打壓為弱勢請命的人士之行為了。當他們扮着真理去向大眾宣揚他們的一套時，我們有必要撕破他們的假面具。

全球禱告日2010

全球禱告日2010就是那些披着人皮的牧者如何顛倒是非的真實個案。基督教組織「全城更新」舉辦的全球禱告日2010，有記者被當天的義務工作人員弄傷及攝影器材被破壞。事緣當天有約十多名教徒，當中有些是「回歸基督精神同盟」成員，在禱告期間，每人身上各貼上寫着一字的A3紙，砌成「耶穌愛維權弱勢」的字句，並戴上劉曉波、趙連海、譚作人等被捕的維權人士的紙面具，被在場數十名義工趕走，期間發生混亂，而上前拍攝的記者們也遭殃，數名記者更被抓傷和推傷，以及被阻止拍攝。

為何會出現是次事件？事緣「回歸基督精神同盟」認為基督有着與維權人士、被欺壓的弱勢同行的精神，但全球禱告日2010的禱告內容欠缺對那些維權人士和被欺壓的弱勢的關懷，便向主辦單位建議應加上為受毒奶粉事件毒害的孩兒、死於血肉煤礦的工人、被壓迫的同胞、趙連

海、劉曉波等人祝福的禱文，卻被主辦單位視為甚有政治色彩而不獲採納。而主辦單位為免他們會進場示威，把所認知的「回歸基督精神同盟」成員，如林子健和DJ快必等人列入黑名單，以不同理由禁止他們進場。

全球禱告日2010乃一公開派發門票的公開活動，卻以私人活動為由，拒絕「回歸基督精神同盟」成員進場，又以門票上寫明不能拍照為由，拒絕帶着相機的人進場，但實情門票只是寫明不能用閃光燈。難道全球禱告日是一見不得光的活動？為何連拍照也懼怕？而帶着「回歸基督精神同盟」版本禱文的快必，在被禁入場時更被沒收手上的禱文單張，難道是因為不可帶反政府的東西進場？難道為弱勢、為維權人士、為毒奶粉受害者禱告是反政府？是否因場內有林瑞麟、黃仁龍、李少光等高官出席，為免他們不滿或要討好他們，不惜放棄為被打壓的弱勢禱告？

其實「回歸基督精神同盟」只是想全球禱告日的禱文更完美而已，即使意見不被接受，他們希望能入場默默地紀念受苦者，用道具、標語和派發單張與在場的弟兄姊妹們分享自己禱告所關注的人和事，卻被視為搞事和踩場！更諷刺的是，在場工作人員一邊推撞他們及記者，趕他們走的時候，一邊高呼「耶穌愛你」。更有被驅趕者表示，有義工對他們說：「你們說甚麼社會公義、維權人士？《聖經》教我們要馴服於當權者！」這真悲哀，難道我們要盲目馴服於當權者，即使他們做着不公義的事和欺負弱勢？難道我們為了馴服於當權者便不分青紅皂白、不分是非黑白？難道我們為了馴服於當權者，便對不公義和強權倚勢欺凌弱

者的事默不作聲、視而不見？這不是變相助紂為虐嗎？這樣我們的良心去了哪裏？全球禱告日主辦單位的行為不正是變相助紂為虐嗎？他們禱告的時候，對得起天主嗎？(8)

佈道家Alan Walker一語道破宗教霸權的問題：「教會最大的威脅，莫過於重生的信徒沒有社會意識。」

訪問

受訪者：陳士齊（浸會大學宗教哲學系高級講師）（在場還有彩虹中國總幹事張錦雄和UCL畢業生廖立仁）

筆：為何香港一些基督教分會會那麼不歡迎那些與政府意見不同的社運分子，或對遊行示威那麼疏離？

陳：宗教右派或保守派的人對文化有種堅持，一種追求高尚的堅持。但他們只是外表高尚，是語言高尚，是姿態高尚，不是人格高尚。

廖：他們連服裝打扮也刻意很高尚。

陳：他們是學西方那種很身光頸靚的高尚，想別人看得起他們。但當人格未能做到真正很高尚，只會變成虛偽。而社運人士的行為，是追求社會公平公義，為公義奮鬥，是從旁邊審判那班表面高尚，但內裏不高尚，扮高尚的教牧。那班沒為正義用行動去奮鬥的右派人士，便倒轉頭批判那些參與社運的人，是逆向歧視。

那班基督右派先發動歧視別人的言論，人們為自己辯護，基督右派

卻責難說人們歧視他們，完全不合邏輯。

張：基右人士是不敢正視自己沒身體力行去抗爭去為弱勢抱不平，只是站在道德高地責難別人。基右人士信奉原教旨主義，不容許有別的演繹和意見。他們自己保守不緊要，但卻每每強加於別人身上，否則便責難別人，令社會不能多元化。可悲的是，不少基右教會開辦學校，對社會影響很大。

廖：他們保守得連參加萬聖節派對也不能，說是魔鬼行為。

陳：他們只准許世上行原教旨主義，乃一種霸權行為。其實《聖經》很多故事有不同版本的解釋，沒有一種主義可稱為絕對。

筆：但為何那些保守的基督右派，在香港有那麼多信徒？

張：這是由於香港行填鴨式教育，從小不鼓勵人獨立思考，不尋根究柢，牧師說甚麼便信甚麼，沒有經過消化。

陳：部份也為了人際網絡，因教會充滿中產，和有利兒女入讀教會名校。有些教會成為中產生活場所，不多理會外面的事，不多理會外面的弱勢，只是在找自我心靈安慰，乃自私心態。由於不用理會外面世界的紛爭，不用為不平事煩惱，反會充實心靈，所以受歡迎。

筆：為何香港的基右教會那麼喜歡和權貴拉上關係？

陳：這離不開中國人的奴性，喜歡巴結權貴。為了巴結，有些教會人士不惜大力宣傳要馴服於當權者，要支持政府，卻不問政府的權力來源是否合理，不問政府政策是對是錯。有些甚至扭曲《聖經》條文去作

擦鞋行為。也有是為了到內地傳教的特權，和獲得更多贊助與資源。

廖：吸引權貴捐錢不是不對，但應是透過傳道和發揚信仰去吸引贊助，而不是去巴結權貴。

筆：教會應怎去幫助同為神的兒女的弱勢？

張：教會應從推動制度改革去幫助弱勢，不應只靠施捨，因不能治本。應從傳道教導信徒何謂公義的制度，而不是搞大騷，請歌星明星在紅館勁歌熱舞，像開演唱會般。

陳：佛教、道教、回教全不會像香港的基督教會般，大請明星和高官開騷傳道，把宗教糜爛化。這可能和資本主義有關，因基督教原教旨主義和資本主義興起同時出現，兩者都追求成功，而在資本主義則有錢便代表成功。可惜掌權的是保守人士，對前景不樂觀。

*　　*　　*

受訪者：龔立人（中文大學崇基神學院教授）

筆：對於基督教來說，宗教霸權指的是甚麼情況？

龔：一些基督教團體跟政府及社會上有權力的人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把基督教教條推出社會，但因其價值觀十分保守而受到社會質疑，不明為何強要社會追隨他們的價值觀。

基督教有一種觀念是要實現上帝價值於世上，但為免教徒被世界影響，所以便對外面不合符基督的價值作出反對。這些保守價值和中產意識有關，會不想面對改變，免已擁有的權力和地位失去。那些教會正是

維護着自己本身的中產意識形態，不想改變，和政府的少求變思維不謀而合。「霸」指要社會價值跟從這些教會的保守價值；「權」指意識形態的影響力，傾向保守，凡事保留原有面貌和利益，抗拒改變。教會透過和權貴親密關係去鞏固權力，而政府透過教會團體對它的支持和合作來增加認受性。當教會和政府關係密切，可能會被政府利用去增加政策的認受性，從而互相利用。例如2005年政改方案，有教會中人高調出來游說教徒支持政府，而自己本身又被政府委任入去一些架構入面；又例如公開反對五區公投，公開支持校園驗毒，公開批評有立法會議員衝擊議會文化，卻不提議員文化的弊端。

若這些教會人士本身較為開放，為弱勢爭取，不會被人詬病；但現在只是一味保守，希望維持現狀，盲目支持政府；又去抨擊改革聲音，令社會改革能量減低，阻撓了社會的自我更新。

筆：為何保守教會在香港佔着大多數？

龔：這和香港教會充滿着中產意識有關。有調查指香港教會人均收入是中產水平，乃一班守秩序做事的一群，少外求社會給予機會。當中產佔信徒的大多數，教會自然傾向保守道路，即傾向指導性教育，單向的傳遞信息，而非自由開放的讓人選擇，不容批判性思維；傾向社會維持現狀，會阻撓社會改動力量，對衝擊現有政權的人投下奇異目光。

但教會有責任去推動社會現狀改變，不應拒絕接受改變和盲目反對想改變的人。

筆：那麼宗教右派大行其道，對被壓逼的弱勢有何影響？

龔：幫助弱勢有四種方式，一是救濟，如捐獻、設立食物銀行；二是服務和發展，於教育上推動；三是倡議性工作，即對政策提出改善，對弊端提出質詢；四是改造力量，如上街遊行去爭取。這四種方式要同時進行才能幫助到弱勢，可是宗教右派的保守和反對改變，對倡議性工作甚不主張，更阻撓改造力量。

筆：政教勾結的情況是否存在？

龔：具體例子不明顯，但看到某些團體舉辦活動，很刻意拉攏政府和高官，讓高官讀經、領禱，對不民主政權提供合法性。因是基督教團體主動投向政府，以便互相利用，便被稱為政教勾結。

筆：有何保守行動的例子？

龔：一班保守基督教分子創立了一個「和諧頻道」，提倡不對政權提出挑戰。另外很多教會為了可在大陸宣教，很多事自我審查，避免表達一些內地政府怕聽到的立場，避談六四、避談內地腐敗、避談劉曉波等，自我限制部份自由和自我閹割，以換取到內地宣教的機會。這些行為削弱了社會自我更新力量，不是教會應做的事。基督教要堅守與被欺壓的弱勢在一起，不應為某些利益而交換。

註釋：

(1) 請參看2010年4月26日，梁燕城牧師於《信報》撰寫的文章「從羅爾斯正義論看功能組別」。也請參看2010年5月16日，馬國明教授於《明報》寫的文章「516投票　踢走功能組別」。

(2) 請參看2010年2月7日，吳宗文牧師的禱文「為香港求平安」，文字版可到《國度復興報》網頁查閱（http://www.krt.com.hk/modules/news/article.php?storyid=6643）。也請到http://hkatheist.blogspot.com/2010/04/blog-post_09.html看網上大黃傻貓的回應評論。

(3) 請參看2010年4月7日，《蘋果日報》港聞「基督教保皇黨籲信眾做順民　號召用空票反公投　學者指官商教勾結形成」。

(4) 請參看網上耶教媒體《時代論壇》文章「教會信徒，請勇敢獨立思考！回應基督教保皇黨對『反宗蔭權運動』的批評」。

(5) 請參看2008年8月28日，《明報》港聞「恩福堂牧師被指推介3建制派」。也請參看網上文章「蘇穎智與梁美芬」（http://aloneinthefart.blogspot.com/2008/09/blog-post_597.html）。

(6) 請參看基督教社關評議人張國棟的文章「『基督教保皇黨籲信眾做順民』讀後感」（http://www.brilliantforum.org/?p=513）。

(7) 請參看2010年4月20日，《明報》港聞「不滿教會『河蟹』　團體今街頭崇拜」。

(8) 請參看2010年5月26日，《蘋果日報》港聞「禱告日義工　邊說耶穌愛你邊打人」。

乙、經濟

第一章　經濟單一化

成因

戰前香港是一轉口港。到了上世紀50年代初，因着韓戰，美國對內地實行禁運，禍及香港。英國在1951年於美國的壓力下，也被逼大增禁運貨物名單，很多戰略性和半戰略性物資，例如金、銀、銅、鐵、油、藥、塑膠等，不但禁止進口內地，也禁止從內地進口。國際間也取消很多貨物運港，使作為轉口港的香港遇上經濟衰退，1951年更被港英政府形容為經濟黑暗的一年。

幸而那時正值移民潮。建國後，不少國民黨老兵和對共產黨恐懼的同胞遷移往香港。由建國到上改(1)到大躍進(2)，內地人民生命、財產受保障程度低，內地移民到港的人數累積有十多萬，為香港經濟轉型帶來契機。那些移民成為香港的新技術人材及帶來大量資金，再配合鄰近地區對電子加工、裝配業需求極大的契機，促進香港工業發展。當時原材料靠入口，香港則提供裝配和加工技術服務(同時釋放了大量女性勞動力，增加家庭收入)。50年代中期起，歐美經濟蓬勃起來，人民購買力大增，對廉價進口貨品需求也大增，而香港相對東南亞其他國家，經濟較為穩定，吸引大量東南亞資金，為香港的工業產品帶來穩固客源和資金。

工業發展起來，從工業人口增長清楚可見，1946年時全港約5萬多人從事工業，到1959年，工業人口飆升到18多萬人，工業成為香港中流砥柱，香港也由轉口港轉型為出口港。工業發展也造就了市民和新來港定居人士脫貧的機會，在那時只要不懶惰、肯捱肯搏，便可順利向上流動，慢慢與一家十多口住鐵皮屋、吃豬油撈飯的生活告別。

禁運在1954年放寬後，香港的轉口港地位，因天然地理優勢帶動下再次發展。水深港闊的維多利亞港與美國舊金山和巴西里約熱內盧港，共稱為世界三大天然良港，香港成為了遠東海運中心。到了60年代，香港貿易有七成是出口本地產品，足證出口取代轉口成為第一貿易。因工業發展，每年GDP增長達雙位數，而到了60年代末，香港就業人口有近一半從事工業，當中一半從事紡織業。當時政府採用「大市場、小政府」的積極不干預政策，對香港的出口採取適度性積極干預政策，所有貨品進出口香港皆是零關稅和免稅，此一來為香港工廠帶來便宜資源，不用負擔龐大生產成本；二來為香港的出口產品帶來價格上的競爭優勢，定下香港作為自由港的地位。

當時政府的「干預」只是在政策上支援香港工業和貿易。於60年代，政府先後成立出口信用保險局、貿易發展局、生產力促進局，為香港出口與工業在資金收入、市場發展、生產力提供支援。譬如出口信用保險局為出口的壞帳提供貸款以支撐生產；貿易發展局為香港廠商提供市場發展顧問服務和幫助開拓商機；生產力促進局則協助廠商培養人材

和改善生產力，保證了香港工業的生產優勢。

但踏入70年代，香港工業開始下滑，80年代更轉為發展金融和零售業，即使工業北移，也能發展出「前店後廠」的轉型，而促成這情況有四大因素。

首先，隨着香港工人三餐溫飽不成問題，能安居樂業（最低限度能入住公屋，不用再住較簡陋的木屋、寮屋），生活質素改善，對工資和相關福利要求自然提高。資源價格也因經濟發展而隨風起舞。工業用地價格在20年內平均升了3倍，而當年香港像現在內地一樣，行的是密集式勞動工業，工業成本也隨經濟翩翩起舞起來，工業經營者因成本上升而轉移尋找較廉宜成本的地方去。

其二，從60年代末起，亞洲其餘三小龍——台灣、新加坡、南韓也開發本土工業起來，其出口市場為香港帶來極大威脅，甚至在70年代期間趕過香港。

其三，1973年世界石油危機，歐美經濟遭受擊潰，對入口需求萎縮，也打擊香港出口業。

其四，東南亞國家的工業於70年代發展後，在成本低廉優勢下，搶去了香港不少出口客戶。

80年代，國內改革開放，在國家規劃的指導下，釋放大量人力、物力、市場、空間給工商業發展。外資和港資為求減低成本和進軍內地市場，把業務北移，遂造成香港工業北移。八成以上工廠北移，香港工

業大走下坡，大量工人失業。幸好那時股市走向成熟，加上法制良好，資金在香港得到充分保障，外資港資進軍內地也先在香港集資，大量資金流入金融市場，造成金融業崛起的勢頭，填補工業流失的空虛。就業市場也由工人主導轉以專業人材、金融業、服務業為主，香港改以第三類生產為主。經濟藉工業化的基礎和金融業的迅速發展，打下發達局面，市民平均收入良好，財富大增，消費慾和購買力上升，帶動內需。香港的零售業、飲食業也被帶動了，工廠留下的空地在時移勢易下改為零售商店，又可應付上升的內需和歐美、東南亞、內地旅客的消費需求。香港市面步向繁榮，普遍人能安居樂業，條件較好的甚至可透過炒樓炒股致富。

1986年，四大證券所合併為聯交所，令香港股市從80年代初的世界經濟甦醒過來。1983年訂下聯繫匯率及政府繼續落實積極不干預宗旨，以低稅率及簡單稅制來吸引外資（諷刺的是到了現在，游資泛濫，想阻慢資金流入程度也很困難，政府還是奉行吸引外資的低稅率及簡單稅制政策，足見政府一招打天下而無視時勢轉移的思維非常落後）。再者，70年代尾，香港已發展成為世界第四大黃金市場，只排在紐約、倫敦和蘇黎世之後；當中因殖民地關係，香港能進行倫敦金買賣也促進香港金融業發展，成為世界金融中心之一。香港在80年代工業萎縮，貿易方面又由出口轉回以轉口為主（在90年代，八成以上的貿易是轉口），靠着東方之珠和維港優勢，香港舉世矚目，成為亞洲第一轉口

港，這當然很大程度上也因內地改革開放，使香港成為貨物與資金進出口內地的必經之地；而香港司法制度完善，稅低且簡，制度鮮明，保障性高，又有良好的國際機場作貨運和完善基建，使外資願意透過香港進軍內地。

香港人口上升，戰後嬰兒亦已成人。普遍人在經濟發展下，分享到經濟成果而收入上升。80年代香港無論薪金或工資升幅都追得上通脹和GDP，有時更是雙位數百分比上升，和現在工資追不上通脹簡直是天壤之別。市民生活豐裕後，因中國人安家傳統思想，對房屋需求上升；而政府實施有限賣地，在酒店用地、商業用地需求也大增下，使土地價格大升。當時也正值政府要發展新市鎮去紓緩市區密集人口，為地產商帶來無限商機，令地產業起飛。這便是香港走進一條過度消費而欠缺實質工業支持，又着重投機炒賣（金融、地產）來支撐香港經濟的不歸路。

在金融上升速度飽和，經濟發展開始停滯下，各種問題便浮現。結構性失業、貧富差距越來越大、有資本作炒賣和沒資本作炒賣的人群，收入差距不斷擴大。香港若不像50年代、80年代般，憑鬥志作經濟轉型，必走入經濟衰退的死胡同。但在官僚主義充斥的政府帶領下，香港有可能在經濟轉型上，殺出條血路嗎？

積極不干預迷思

雖然積極不干預政策在50到70年代的工業發展，以及在80年代金

融飛騰起了莫大幫助，但請看清當今情勢，現在香港是已發展城市，不再是發展中的發育青年，積極不干預能牽起的作用已退減。遺老遺少的政府若還死抱不求變的官僚心態、死守積極不干預政策，積重不返，是漠視社會需要轉型的實況。積極不干預到了現在只是成為了政府不去應變、不去革清弊端和合理化懶惰行為的藉口。政府現在已懶惰得除非民意反彈極大，才會逼得不已般作點小修小補去換回民望。

政府死守積極不干預政策，相信是對資本家的一種表態，向他們表明政府的經濟政策會一如以往，不會變動，那麼資本家手上的生意不會受政府政策影響，既得利益不會失去。政府希望這樣可以穩住資本家的信心，免他們撤資，免香港的資金流失而影響經濟的穩定性。但政府和部份資本家忽視了一點，就是政府政策不與時並進，不就經濟生態演變而進化，政府欠缺長遠規劃和過份被動，凡事不積極，沒為社會提供足夠的機會，反會令原本優勢盡失、競爭力大減，令經濟不穩，結果全部階層，包括資本家利益也會受損。現在香港已告別過往的粗枝大葉放任式高速經濟增長模式，變相上流機會隨經濟增長放緩而減少。個人奮鬥要成功，必須有機會配合才能實現，不是只叫別人奮鬥就能白手興家。現在政府還是積極不干預，沒去為社會創造足夠機會，令社會缺乏上流機會，令社會不和諧，令社會變成一池死水。

其實干預並非甚麼罪大惡極的事，很多時候政府不是「干預」，而是負責。政府是有責任介入市場，去平衡弱肉強食的自由市場帶來的社

會不和諧及矛盾。可是很多時政府為免被批評在干預市場，連責任也不負。「積極不干預」和「消極不負責」只是一線之差，取決於政府態度。

出路

獨木難支，經濟單一化一向是香港的核心問題，不由分說，隨之附帶的有結構性失業、社會結構傾斜的壞影響，經濟轉型是香港出路的不二之門。經濟單一化意指經濟結構缺乏工業，過份依靠金融地產撐起大局。

政府單靠高地價政策去維持收入和低税治港，故一直有聲音要政府擴闊税基，擴大收入來源，亦因此早年政府才希望開徵銷售税。欲開徵銷售税説明政府也意識到要擴闊收入來源，朝對方向。但建議胎死腹中、不得民心、不堪造就，是因銷售税不分富人窮人，都劃一税率的徵税。對富人只是九牛一毛，無甚影響；對中產卻是百上加斤，尤其在柴米油鹽樣樣加的年代，再加上銷售税，中產恐怕不勝負荷；對基層更猶如開刀剖腹，在工資追不上通脹而實質上不斷下降時，既要面對物價上漲壓力（在人民幣不斷升值下，物價只會有升難跌），又要面對銷售税，即為日常必要開支交税。開徵銷售税根本乃劫貧濟富的行為，自招民怨，計劃自然無疾而終。雖則提出開徵銷售税，決心不再單靠依賴賣地是方向正確，但卻不得要領。經此一役後，不知是信心受打擊，還是元氣大傷，不欲民望再受挫，政府再無提出要擴闊税基了。

政府應該考慮利得累進稅、炒樓稅、物業空置稅、外資進出口稅、外資投資利得稅，向收入不斷上升的大企業和在香港賺過盆滿缽滿的國際投資者徵稅以造福廣大市民，這些對國際大鱷來說只是九牛一毛，如稅率不太過份，不會影響外資投資於港的意欲，要明白香港吸引外資不在於簡單稅制，因稅制再複雜，只要有足夠商機及法治清明，確保資金受保護，外資一定樂此不疲的來投資。但如若經濟單一大削香港競爭力，商機大減，為保簡單稅制而不解決收入過度依賴賣地的局面，是本末倒置。再者在資產泡沫時，這些稅收可起點防洪作用，一石二鳥。

可惜港府只懂以「小政府」為由，不去考慮開徵這些稅以開拓收入渠道，被舊有思維限死自己的施政，效率低兼不靈活，毫無創意，使香港步向死寂。

自從80年代工業北移後，香港成為以三級生產為主的消費城市，和美國一樣，經濟靠市民不斷消費去支撐，包括購物、飲食、娛樂、置業、炒股。這也說明了為何政府以前要大賣香港是美食天堂、購物天堂、在股樓採取放任政策和寬鬆監管，正是要吸引人們來港消費。從此，香港四方八面都是大商場，不論家中屋外，眼皮底下盡是消費廣告、借貸廣告（以促進消費的金錢）、信用卡廣告、樓盤廣告。消費主導，沒工業或高科技業去支撐，有一大危機，就是一旦遇上主導香港命脈的樓股市不造好的日子（受天災、金融人禍影響），例如沙士、金融風暴、金融海嘯時期，市民便會因就業不足而令收入、財富相應下跌。

在一環扣一環的消費城市下，這會導致百業蕭條，市面死寂，經濟不堪設想。

在天災人禍下，企業為保營運，必定裁員以節流，使市民收入下降。在財富效應下，樓股收入皆跌，這班有樓有股消費力強的市民隨之身家大跌，消費意慾和能力大減，借貸行為大減，壞帳壞債上升，使零售業、金融業、銀行業、地產業這些經濟支柱的發展也停滯起來。香港的問題癥結和美國一樣，核心不是消費高或過度消費，而是經濟單一，只靠金融，而嚴重缺乏農業、工業、科技的生產，消費需求遠高於生產供應，長期處於貿易逆差。看香港沒一樣東西能自給自足，即使從小我們便被灌輸香港是漁港，但魚產也超過八成要靠進口。唯一的解決方法是提高本地生產，重新振興農業、工業和第四生產科技業。農業因農地越來越少，而難以振興，但絕不能荒廢之，因連食物也過份依賴他地，在政局不穩時，便弊端畢現；工業雖已北移，但國內的生產成本近年隨經濟發展而增長，使香港有吸引工業回流的能力，而大力發展第四產業的科研和科技業，則是最可行之道。

經濟單一、過份由金融地產主導，使香港的就業結構也偏畸起來。香港的專業人士，例如會計師、建築師、測量師，全依靠金融地產業來養活，但金融地產業提供最大量的就業職位是相對技術性低和學歷要求較低的經紀和保險從業員；四大支柱的零售業和旅遊業提供最多的也是低技術職業位則只是絕對少數；四大支柱的物流業所提供的職位，是運

輸司機和勞工，因此香港的就業結構以sales、經紀、保險推銷員、運輸勞工、建造勞工為主，而這些職位有否工開和有充足就業率，則全賴香港的內需和國際資金來港炒賣和消費，意即香港就業市場的興衰，全看股樓市與金融市場的好壞。香港金融地產只佔GDP的四分一，但卻差不多主導各行各業和市民就業狀況的命運，證明經濟結構單一化，一行定生死。

就業市場以不需高學歷的職位為主，對高學歷的專業人士需求又不大。近年大學生供應量隨學位增加而上升，包括大專學位的副學士出現、學位名額隨大學數目上升而增加（由三間認可大學到七間再到九間）；但需要高學歷的職位卻沒有增加，因經濟還是單一化，就業結構沒改變。此造成了大量大學生做sales、經紀、接待員、飲食從業員的情況。這些工種因對學歷要求不大，加上供應充足，尤其是數碼化時代，大量人手可被機器取代，人工自然不高。這造成了高學歷、低收入情況極之普遍，一些大學畢業生因期望與實際有落差，找不到心儀的工種而長期失業。在就業結構不變下大增大專學位，反造成了濫發沙紙和學位貶值的反效果，對一些要借貸才能完成大學課程的貧苦學生來說更是艱難。而當年嬰兒潮那代人數眾多，很多還是拼搏年齡，他們現多成為了高薪的管理層。在高薪上層職位的人沒怎改變下，新一代的大學生要晉升更是困難，無可奈何的要在低薪職位捱一段日子了。這也說明為何現在的大學畢業生總感到前路茫茫。大學生不再是天之驕子，高學歷不保

證高收入，只保證高成本而已（因學費有加無減），要還學生貸款的，日子將過得更苦惱。

要解決這問題，出路有四。第一是等上一代全退下來，但這有點不切實際。第二是經濟轉型，發展高端行業和科研，使高學歷的年青人有更好出路，不用再跟低學歷的搶飯碗，但政府說要經濟轉型已多年，從沒成功，可謂談何容易。第三是企業靠科技和創新去增加競爭力和打響自家品牌，即進行路線調整，走知識型經濟路線。這需要教育和培養人材方面的配套，可是香港一向奉行填鴨教育，務求培養出來的學生只是會執行命令的順民（這緣於殖民地政府不想港人公民意識太強，要他們只做不會反抗殖民管治的順民，以及只希望培養一批具執行能力的公務員），不鼓勵創新和獨立思考，以致創新思維欠奉。政府只懂推出知識型經濟的口號，卻不在教育上配合，只會徒勞無功。第四是香港和內地融合，令香港出產的大學生能多進內地就業，紓緩香港出路窄的情況。但目前從企業的管理模式、環境安全、法治完善來看，香港較易吸引內地大學生來就業，反之內地生活環境安全度較低、法治不明朗、人權保障不足，令不少本地大學生對回內地發展有戒心。除非內地法治走向清明，文明程度等軟件配套上大有改進，中港兩地就業市場融合才能白熱化，否則要大量本港大學生到內地就業，實非易事。

訪問

受訪者：黎則奮（人稱Q仔，資深時政財經評論人、《智取太平山》主持人）

筆：可否解釋一下香港經濟單一化的緣由？

黎：戰前香港是轉運港，之後便到50年代的禁運和難民潮，大量資金人材來港，令工業得以在香港迅速發展。60年代時，香港經濟已有基礎，政府行積極不干預政策，而匯豐銀行則扮演維護體系穩定的角色。60年代香港行自由經濟，工人長期被剝削，引發「六七暴動」，為香港帶來新轉變。70年代，麥理浩上台，為了使基層生活穩定，必須解決工人長期被剝削的問題，麥理浩便脫離積極不干預，改行大政府主義。麥理浩進行全面改革，包括大型建屋計劃，令人人生活有保障，基層有公屋住。麥理浩有一整套管治模式，奠定香港經濟的長遠發展，走向繁榮。70年代香港發達，是因政府介入，有長遠規劃，令香港長治久安。所以有說法指自由經濟令香港致富，是不正確的。

70年代末，內地改革開放，香港工業北移，沒有進行第二次工業化，但國際企業和銀行看準大陸市場，紛紛來香港開分行，投資香港以便進軍大陸，令香港金融發展起來。加上當時大量興建公屋，為香港很多地方開了荒，政府大興基建帶動很多地區開發，包括沙田、荃灣、香港仔等。政府又大量批地賣給地產商發展和蓋樓，令地產成為香港的主要行業，金融地產主導香港經濟。到了現在，亞洲四小龍只餘下香港沒

有轉型成功。

筆：那麼香港的競爭力如何？會步向衰落還是維持優勢？

黎：回歸後，香港注定沒落，因大陸發展了，兩地隔閡打破，以前香港的優勢，現在大陸也有。因此香港經濟的四大支柱不斷萎縮。若非內地政府支持，香港經濟四大支柱的競爭力會更進一步下降。就如內地大開名牌店，內地人還會來香港買手袋嗎？當外資可直接停泊內地，還會在香港轉口嗎？

香港現在只餘下空運和金融還有點優勢。香港仍有良好的法治和自由保障，資訊發達，而內地還沒有。所以前海要成功，需要仿傚橫琴島給澳門管理那樣，交由香港管理才能。而大陸搞人民幣國際化，以信譽良好的香港作為試點，使香港金融業仍有重大價值。空運方面，上海北京已超越廣州，也快爬過香港頭，但香港勝在航線多，客運量上有優勢。

筆：那些僅餘優勢能否持續？萬一優勢失去，香港會面臨甚麼境況？

黎：當內地法治良好，不需再以香港為人民幣試點，香港的金融優勢便頓失，那時便會game over。

香港沒有工業、沒經濟基礎，如果優勢失去便大鑊了。香港很依靠內部消費，依靠財富效應，樓市股市造好，身家便上升。所以當經濟下滑，樓市股市停頓，香港的內部消費便大跌，使經濟惡化，沙士期間便

是好例子。金融風暴後，收入和公司營業額掛鈎，基本收入越來越少，花紅佔的比例越來越大，因此當樓市股市大跌，香港人的收入便大跌，經濟死寂。這也說明為何香港人實際收入不升，人工也不怎樣加，只是公司業績好時才多點分紅。

筆：香港貧富懸殊情況是怎樣形成的？

黎：高官們大量豪宅在手，政府不肯分開居住和投資市場，不肯復建居屋，更不肯把居屋價脱離私樓價，樓價被投資的一批人拉高了。即使增加土地供應也沒用，因賣不賣新樓的權仍在地產商手中。因此在香港，沒有樓便注定做窮人，加上人民幣升值、物價上升、支出上升，沒有樓的一群沒有資產保值，只會越來越窮。有樓的一群在通脹下，可因樓價上升而財富上升。

現在的香港教育，窮人沒錢上興趣班，沒錢出去交際，沒錢多學多元知識，又沒錢出外升學，將來成人，競爭力便不夠強，難找到好工以脱貧，跨代貧窮是注定的。

因此香港的貧富懸殊是結構性的。除非政府在財富分配上做得好些，透過税制改革去增加基層財富，增加基層收入、消費力、競爭力，貧富距離才可縮窄。但政府不肯改革税制，不肯引入累進税，反而引入領匯，令窮人的出路也打破，使他們難以創業和飽受貴租。政府的政策令貧富距離增加。

筆：究竟官商勾結情況在香港有否出現？

黎：有！政府制定政策時常利好大商家。政府停建居屋後，房委會少了收入來源，只好賣資產作投資去維持興建公屋和維修的費用。房委會資產是香港人的，政府卻把之賣給大財團，敗壞香港人的家產。領匯私有化，使大財團入侵公共屋邨，去搜刮民脂民膏，令基層出路窄。領匯賺大錢時，又不會減租，不會回饋小市民，只是加管理高層的人工和花紅與派錢給私人股東。基層市民和沒錢炒股的人，永遠不能得益。

筆：在雷曼事件和眾多債券事件上，金管局飽受抨擊，究竟金管局的體系有甚麼問題？

黎：金管局的主要作用是穩定港元，但現在卻連銀行都管，外匯基金又做投資。政府應把金管局分拆，成立投資公司；金管局應專注做穩定港元的工作。奇怪的是，金管局在投資表現差時，高層不用減人工，但在賺錢時，高層的人工和花紅大增。這些投資收入應分回給香港市民，因政府是金管局的老闆，而市民是政府的老闆。政府應透過派現金、退稅、減交通費，甚至搞基建去增加市民收入和消費力，以促進經濟，而非現在那樣只去養肥一班高層。

筆：政府辦事為何如此強差人意？

黎：政府官員只是抱着打份工心態，尤其是Donald，很多事不敢做，只是技術性官僚，做好order便算，思維不全面，分析力不足，不懂在哪些地方投入資源去改善民生。政府只是守財奴，不敢花錢去改善問題，又不用向人民負責，不需面對民主，只是討好傳媒和政客便可，

扮做事便可過關。無論醫療、房屋、社福，根本無一套思維可言，只是回應批評式的逐樣小修小補，沒一套長遠思維作基礎。

註釋：

(1)「上改」即「土地改革運動」，由1950年冬天進行到1953年春天，起因是執政共產黨要把全國封建或半封建的土地改變為農民的土地所有制。最後3億多貧農、雇農或中農無償分得約7億畝田地，過程中不少地主和富農被打死鬥死。

(2)「大躍進」是1958至1960年，執政共產黨領導下的一場企圖急速推展工業化運動，可惜浮誇、急於求進和不切實際的風氣，造成以千萬計的同胞餓死。

第二章　政府缺乏長遠規劃

經濟上政府也欠缺長遠規劃，不懂未雨綢繆。即使2008年被政府定為長遠策略的六大優勢產業，也只是炒冷飯，把從前的政策重新包裝過，然後再推出來而已，連基本方針也沒有。不足一年後的《施政報告》，更是對六大優勢產業隻字不提。

在經濟上算是有長遠規劃的，可數到碩果僅存的《香港2030規劃遠景與策略》研究報告。報告裏面預計古洞北、粉嶺北及打鼓嶺會成為一些高增值、高科技生產及物流活動的特殊工業地區，但具體策略和細節也欠奉，即連期望有甚麼效果也不知，因報告沒訂下任何短中長期的目標，恐怕最後會爛尾收場。報告可取之處是方向值得肯定，因意識到香港需要重新發展工業，不是輕或重工業，而是高端科技，但可惜無具體細節，令人擔憂又是再一次的假大空美麗謊言。

國家一向把各省各市的發展和分工規劃妥當，但香港政府連香港在國家未來整體發展中，扮演甚麼角色和地位也不清楚，如何配合發展優勢也像不大多知情，從不主動出擊和提出香港可怎配合，而只是被動的等候被定位。那麼怎能為香港長遠發展訂下適合的目標和策略？

順帶一提，《香港2030規劃遠景與策略》研究報告指，到2030年香港仍維持商貿活動主要在維港兩岸的格局，新填海用地、舊政府山、添

馬艦也因而大建甲級商業中心和大商場。政府的報告沒有帶來新意，只是重複舊調，卻揭示政府漠視維港兩岸不論發展和交通已飽和的狀況，更不要說到2030年。政府不在規劃上求變，只是不斷填海去紓緩維港兩岸的負荷，但填完海後又在新填海區大建商業中心，反令交通擠塞情況惡化，之後又要再填海，形成惡性循環，而惡性循環乃來自政府欠缺新思維與規劃矛盾。

既然即將興建沙中線以及發展東啟德區，為何不藉此良機，把沙田大圍和東啟德區發展成香港的新衛星商貿區，以紓緩維港兩岸的壓力，及為香港前景帶來新突破？正如1987年廣州因全運會而發展東邊的天鵝區為新的商貿中心，2010年因亞運而發展南邊的番禺石樓區，以分擔天鵝區的飽滿狀況。

政府沒長遠眼光，香港難覓出路

面向國際，不但令香港企業有足夠的營運資本去僱用本地的就業人口和給他們提供合理的報酬，又能吸引本地和外國資金投資，令香港經濟得以起動。但由於政府眼光短視，沒政策配合，除了出口物流業和金融業之外，香港大部份行業也難面向國際，可是這兩個行業面對的競爭日大，而政府在政策與規劃上又缺乏支援，令這兩個行業在國際市場上也不斷萎縮，再難支撐起香港經濟增長，加上政府沒有魄力帶動經濟轉型，令香港經濟步伐停滯不前，前景黯淡。

香港經濟的未來在於融入大珠三角經濟區，與周邊地區團結合作和互動，否則只會和周邊地區產生自殺式的惡性競爭，和令到產業結構不完整。但香港政府從不考慮這問題，從不做長遠規劃，連未來的方向界定也欠奉，經濟的出路在何處也不清楚。我們不是要求政府很英明，但最少也不要如此窩囊，如此短視，連出路在何處也不確定。

新加坡之所以能比香港吸引更多中東和東南亞的金融公司和基金公司，以及工業、電子科技業遠勝香港，是因新加坡政府在決定發展某一經濟措施後，會有全盤的政策配合，反觀香港政府只是提出概念，然後讓業界自生自滅，欠缺全盤政策配合，以致競爭形勢落後於人。

實例

金融海嘯後，美國推出量化寬鬆政策，令游資湧現，各國進行貶值性貨幣競賽。那些游資湧入，令包括香港在內的新興市場出現資產泡沫。其實政府可以稅務優惠或回贈優惠方式，吸引那些游資分流到六大優勢產業，刺激它們發展，去幫助經濟多元化和轉型，又可減輕資產壓力，一舉數得。但短視的政府沒這樣做，只懂眼白白看着游資造成資產泡沫，令民生受苦。

訪問

受訪者：蕭若元（香港才子、資深傳媒人和時政財經評論人）

筆：其實政府的理財思維是怎樣的？

蕭：香港政府是守財奴，這是不合理。全世界政府行赤字經營，香港政府卻有近3萬億身家，非常富有，再過十年八年，已可永久不用抽稅。經濟右派認為政府不需那麼多錢，否則只會身痕，搞很多浪費金錢的事項，成為大花筒。例如西九，全世界都沒有這樣的博物館加表演場地混合體，且要花200多億，是埋不到尾的，再者博物館不是單靠興建的，而是要靠歷史累積，像大英博物館和羅浮宮。又例如高鐵，要用600多億，且九成會虧損的。

筆：那政府應怎樣做？

蕭：其實在1998年我已提出政府要派錢。以香港政府富有程度起碼每人可派二三十萬。這不但可根治貧窮問題，還可促進經濟。另外政府應行負入息稅，只是3%回報，政府已可每年多500億收入。香港現在約有126萬貧窮人口，每月補貼3萬元，也只是375億，而補貼可促進消費。香港貧窮問題是政府造成的。政府不知怎運用錢的價值，其實派錢不應叫派糖，而是叫調節貧窮。

筆：為何政府那麼有錢？

蕭：在1990年前，香港政府有多少外匯儲備是秘密。以前港元和英鎊掛鈎，要印錢便要交換英鎊，然後成為外匯儲備。而外匯儲備不斷增多，且年年收息，會連本帶利不斷滾大，所以政府越來越富有。回歸前，中國政府要求港英政府在交回香港時，要有500億儲備，怎知最後卻有1,000多億。即使香港經歷過金融風暴、沙士和金融海嘯，也是用了一兩千億。到現在，錢不減反增。

筆：香港政府常標榜積極不干預，但港府實行的經濟策略真是積極不干預嗎？

蕭：香港表面實行自由經濟，但其實很多地方都是壟斷的。壟斷會造成效率過慢和貧富懸殊的問題。金管局和證監會效率低而造成雷曼事件、債券事件，便是因香港的股市和衍生工具交易被壟斷。又例如香港很多專業都是被壟斷的，電力市場、醫生、貨櫃碼頭、交通、電視廣播、能源、股市交易、地產等等，令這些專業收費過貴和效率低，是政府發牌機制造成，由港英時代開始，讓小部份人謀取暴利，這令財富集中在小部份人身上，造成貧富懸殊。這樣的情況可持續下去，是官商勾結所致。

筆：對於香港將來競爭力有何看法？

蕭：專業上的壟斷帶來低效率、減弱競爭力。如果政府肯拆走壟斷，香港的競爭力起碼提升一倍。只要沒有壟斷，香港可找出自己的經濟方向和出路。而和深圳結合，成為千五萬人大都市，是香港的出路，但政府沒有這樣做。政府應行小政府，包括公營房屋收市值價和可以自由買賣，不再由政府發配，消除錯配情況。當基層有需要，政府補貼便可，這又可省回房署大量冗員。

筆：可否概括香港的經濟問題？

蕭：可分為四大問題，首先是經濟壟斷問題；其次是政府沒效率；之後是香港教育沒有創新度；最後是人口增長不足。這四大問題是死症，因政府官僚，政客又不正視這四大問題。

第三章　政府態度

得個講字

董建華時代已屢次三番地表示單靠金融服務業的發展模式已不合時宜，但到現在曾蔭權時代已近尾聲，仍故態依舊。政府屢教不改，常常只得個「講」字。2008年時，政府宣佈要為紡織及製造業輸入5,000名勞工，但最終只得117個，可見政府的所謂計劃，很多時出現嚴重落差，淪為口號式的假大空計劃。

新加坡已成功轉型到高端科技、生物科技、創意產業發展，但香港政府在轉型方面，講了十多年，還只是稽留在「沒時間表、沒路線圖、沒大綱、沒目標、沒細節、沒分析」的六大產業，轉型前途怎不漆黑一片？

官僚的理財思維

政府常被批為守財奴，即使坐擁5,000多億元儲備，在經濟低潮期和有需要時，也不應花則花，不敢大刀闊斧。這是因政府的理財思維一向也是官僚主義所致。

經濟不景時，包括金融風暴、金融海嘯期間，是政府最需要花錢去打救社會的時候，正如病人生病時，最需要從醫者贈醫施藥，否則病入膏肓時變得無可救藥。可是基於官僚主義，在經濟不景氣時，政府反而

不敢花錢去刺激經濟，怕被批為大花筒（和澳門政府派錢的勇氣，簡直差天共地）。港府只以「大市場、小政府」為藉口，說市場自會調節經濟狀況，擺出一副愛理不理的態度。政府此舉是忽略了乘數效應的作用。因只要國民財富增加，才能刺激消費市道，從而連鎖地刺激企業收入和就業市場，令經濟回穩。守財奴的官僚理財思維，只會徒令市民受苦。

以金融海嘯為例，政府那時應增加開支去刺激就業市場，增加社福開支去幫補受害基層，增加補貼去支援中小企，但政府反而削減公務員薪酬，帶頭牽起減薪潮，令就業市場雪上加霜。政府補助的只有大企業，例如在民生困苦期批准九巴加價。對市民莫財，對大企業卻疏爽，難怪利益輸送之指控不脛而走。

第四章　監管制度

香港能成為國際金融中心之一，其中優勢在於軟件配套，不論金融法律、司法聲譽、監管制度都世界一流。但投資產品千變萬化，日新月異，一場金融海嘯證明監管制度若不與時並進，會危及該國甚至全球性的經濟硬盤。而香港政府，在大市場、小政府的信念下，監管制度沒有與時俱進，出現了不少漏洞，包括：雷曼和星展迷債事件出現，便是金管局對日新月異的債券產品的監管條例過於落後所致；出現銷售員多次欺騙長者安裝不合理地貴的機頂盒，乃因政府沒有監管條例適用於這些新科技產品上；樓花長期貨不對辦，但仍苦無法例管制；多間美容或修身中心倒閉，監管法例太過落後無法發揮監管作用，多間瑜珈中心相繼倒閉，但政府監管條例不足，苦主欲追究也無門。這些侵害人民資產的不道德行為能多番不斷出現，全因政府的規管消費條例，對打擊誤導性、餌誘性的營銷手法，出奇地竟然不包括金融業、強積金、電訊廣播業、醫生服務、律師服務、保險業等。而對成立保險業監管局的訴求，一直只在研究階段，不見實質成績。

對預繳式收費的服務或產品，也嚴重規管不足。例如預繳金額不設上限、預繳期又不設上限。這些都會大大影響香港的聲譽、公信力、投資環境，但政府還是一副散漫態度，令香港競爭力不斷被蠶食。

第五章　競爭力

地產壟斷令競爭力大削

不要以為樓價高、地產壟斷只會令一眾欲置業和創業的市民受苦，原來地產壟斷和高樓價同時在破壞香港營商的競爭力。香港百物昂貴，原因是樓貴租貴，企業生產成本也因而過高。瑞士諾桑管理學院在2010年《世界競爭力年報》指出，高價格是香港競爭力的主要弱點。香港樓租是全世界最高，企業最大的開支成本是交貴租。但國際大企業流動性高，會蠢得來香港捱貴租受苦嗎？這說明高價格元素正在削弱本港的營商競爭力。在租金不能減下，只好於別的生產成本上落工夫，例如原料和勞工，使勞工成為最大受害者。

在一個健康的市場，企業和勞動的生產力（包括量與質），是財富分配的最重要因素，也是該地經濟最大的資本，是對生產和勞動的重視。在健康的市場，提供高效能生產力和特色創意產品，是企業能賺取利潤的最佳途徑。可是在香港，土地才是最大資本，而且大得排擠其他資本。誰擁有土地就代表擁有高利潤，能獲分配大絕大多數的財富。即使企業和員工們的生產力如何高，產品如何具特色，也不代表能帶來利潤和分配得合理的回報，因隨時連租金也負擔不起。香港是一個極不重視生產力和勞動力的怪地方，當高效能生產力獲得重視，那些地方便叮

以實行高科技經濟及生產帶動經濟；當特色創意產品是決定利潤分配的重要指標，該地便能步入知識型經濟。

當政府常說要邁向知識型經濟、要步向高科技經濟，卻不改變土地壟斷一切的局面，勉強進行甚麼改革或轉型，只會以失敗告終。

暗月，冷淡，無光。

香港的經濟在政府帶領下，前途黯且淡。

政府欠缺人材培訓規劃

2007年政府宣佈要設立人力發展諮詢委員會，聲稱要為香港培育人材方面訂立全面規劃，但到現在仍停留在「吹水」階段，連實質起步也沒有，只是決而不議、議而不做。其實早於2002年政府已成立人力發展委員會（2007年的是加了「諮詢」兩個字！），但至2010年完結，8年來從未提供過任何關於人力培訓和人力發展的報告，根本是沒實用，浪費公帑，卻又成立甚麼人力發展諮詢委員會，只是重牀疊構，毫無必要。而可幫助中小企、有實質成效的中小企業培訓基金，反而一早終止了。

政府推出六大優勢產業，當中檢測驗證業缺乏1,500名人材供應，政府卻不在此下工夫。有需要的不做，即使有做也只是浪費公帑而毫無成效，政府思維真叫人摸不着頭腦。

提高競爭力的出路

和內地融合對提高競爭力很重要，首要是放棄大香港心態，要虛懷若谷，不可像Donald那樣，容易黑起面口。

今天不單香港自身的發展會直接影響本港未來，內地的規劃、周邊的發展也直接影響香港的未來。但港府眼光短視，甚少長遠規劃，即使明白和內地融合的道理，也無甚作為。

香港的周邊地區已建立了長遠合作的規劃，包括深廣穗、珠中江、廣州佛山同城化、澳門橫琴島合作等計劃。香港如要保持長遠競爭力，珠三角一體化規劃是刻不容緩。但香港政府卻沒參與「珠三角一體化規劃」、沒去互用區內的資源資金，而只是去作一個無實權的「大珠三角商務委員會」的諮詢角色罷了。可見政府眼光裹足不前，管窺蠡測，只抱着打份工心態，不肯去為香港的長遠未來承擔，令香港競爭力不見樂觀。

香港之將來要適應過往以香港為中心及主導着珠三角區和周邊發展的地位，會轉移為如何配合和進入內地及周邊地區的規劃，由過往單一香港主導轉變為大家一起主導策劃。最佳的方法是，待周邊地區的法治、治安軟件也裝備妥當時，香港和深圳與珠三角區整合為一大經濟區，不論資源、勞動力、人口、金錢也互相使用，業務上作出整合，免除惡性競爭，令區內集結工業、科研業、金融業、物流業，成為大中華甚至東亞最大的單一經濟區。

廣東勞工待遇不斷上升、生活質素提升，直接影響香港人口結構、勞工就業市場、就業機會、營商環境，因這會使粵港兩地勞動力交流和人口遷移大增，將來的部署必須考慮這些因素聯合力量，否則只會脫離現實。但政府思維還停留在大市場、小政府階段，對5年規劃、長遠計劃、計劃經濟有戒心，不多肯和周邊地區一起進行計劃經濟，一起策劃未來的發展藍圖，還是自我中心，令香港競爭力前途堪慮。

訪問

受訪者：雷鼎鳴（科技大學經濟學系主任及教授）

筆：回歸後香港經濟好像浮現很多問題，貧富懸殊被評為已發展地區的第一；經濟發展停滯不前；年輕人缺乏上流機會。身為經濟學者的你，又認為回歸後香港經濟出現了甚麼問題？

雷：根據數據，由1997到2009年，香港經濟無甚增長。政府公佈的GDP有44%增長，但政府用的是GDP個人消費支出平減指數，計算GDP時沒計通脹、也沒計人口增長。而物價於這十多年跌了一成有多，人口又上升，家庭數目上升，以消費物價指數計，人均實質收入變化不大，十多年上升少於一成，一年少於1%。如果以家庭為單位，每戶平均收入更跌了約2%。可見政府公佈是有點誤導，相對準確的描述是整個社會基本上於經濟上是停滯的。

筆：經濟停滯帶來甚麼後果？

雷：結果大學畢業生人工和十多年前沒有分別，由幾千到一萬多。可是90年代那時雖起薪不高，但加薪快，幾年後的升幅很快。但現在加薪慢，又有新競爭者的出現，如部份工種北移，內地來港的就業人士。內地人均GDP增長很快，香港卻停滯，令機會少了。

筆：你怎看香港貧富懸殊的問題？

雷：嚴格來說是媒體把實情誇大了。貧富差距素來很大，1996年的堅尼系數是0.429，而2006年是0.533，只是初步數字，是未計政府公共開支、醫療資助、房屋、教育投入，實質數據是0.427。貧富差距是延續，不是惡化。此外，最高收入5%和最低收入5%勞動人口，在數字上，平均人工差距大了，但實際不是。因97年時沒那麼多家庭主婦出來做兼職，沒計入勞動人口。十多年來，多了家庭主婦出來做兼職，所以才多了在職貧窮人口。

真正的問題是機會惡化。香港經濟停滯，沒新機會，新入職人士的上流機會少了，加上嬰兒潮那批已上位的又未退下來，經濟沒增長，餅沒做大。要等嬰兒潮那批退休，才會騰出很多上流機會。而內地來港學生多了，現在雖時日尚早，這批內地來港學生對香港經濟貢獻還未明朗，卻已起衝擊作用，不少成績較普通的香港學生認為機會被那些內地生搶了。事實上，內地生的讀書質素不比本港生差，讀書很認真。

筆：經濟轉型能否把餅再做大，成為經濟出路？

雷：經濟轉型的關鍵是人材，但香港的高端人材相對較少，本身培

訓不多，而專材輸入數量少，當中不少只是拿香港身份證，但沒在香港生根，沒貢獻香港經濟。而每天來港的新移民只是低端人材為主。

經濟轉型要靠創新，靠企業和年輕人勇於冒險。但香港對知識產權的保障低。專利權沒有刑事法保護，只有罰則低的民事法，沒刑事法表示沒有警方主動去告抄襲的人，要靠自己去告，輸了官司還要賠全費，成本太高。這是變相鼓勵人不創新，因創新成本太高。只去抄襲別人的設計，然後作少許改動便可。保障低，令香港企業不勇於創新。

筆：香港經濟能否再向上發展，還是已開始沒落？

雷：香港經濟能否繼續向上，要看香港能否獨立生存。可是香港缺乏天然資源，不能自給自足，難以獨立生存。所以香港是被逼面向世界的，靠扮演貿易轉口港、推動附加值業務及吸引世界資金透過香港金融市場流入大陸，從中抽點水，香港才能生存。因此香港必須定位為面向世界的國際性城市才能生存，但香港潮流有點內向，對面向世界的意識

較缺乏，只留守本土，缺乏有利國際的創新，為香港經濟增添隱憂。

筆：你怎分析四大支柱的走勢？

雷：金融服務業是可以的，因不斷吸納國際人材，能壯大金融服務業，本港金融服務業有擴大空間，前景是可以的。旅遊業對香港其實貢獻有限，但卻可製造不少職位，如酒店業和零售業員工，且外人遊港多，可繼續提供職位。專業服務也有發展空間，但很多難處要克服，例如醫療服務，首先要探討如何把香港發展為世界性的醫療中心。物流業佔GDP最多，達27%，香港在此仍有優勢，但慢慢失去，要靠提升管理質素去增強競爭力。

但香港大企業已走向國際，在外地發展，反而對香港不利，因資金流出，投放在香港的少了。

筆：發展第四產業，即科研業是世界趨勢，但高科技業在香港能否發展？

雷：香港工業出路在於高科技工業，不能再靠密集勞動型工業。科研要和深圳合作才有出路，因深圳是全國高科技人材最集中的地方，而香港則在高科技研發方面較好。但現時兩地合作規模仍小，且香港人的心理未準備好和深圳結合優勢，香港創新不足，令合作太少，未能發展好高科技業。

筆：你對政府提出的六大優勢產業是否樂觀？

雷：個人並不看好。政府在提出後一年的《施政報告》已沒有再

提，隨時沒有下文，所以六大產業會否發展成大行業也成疑問。

筆：你怎看地產霸權的指控？香港是否被地產壟斷了？

雷：其實地產霸權的指控不太成立。地產只佔GDP約5%，不算多，連四大支柱也不如。地產商在香港很多行業也有影子，但並非「惡晒」。個別行業如超市是被壟斷，但單看地產項目，不算壟斷。例如有說租金太高，舖租太高，但舖租是按供需求決定，人流旺而供應少，舖租自然高。地產商，除了太古外，靠收租的很少，多只靠建樓、建商場，再賣出去。樓價貴是因香港投放於建樓的資源少，落成的樓宇少，樓價貴是供應問題，並非地產壟斷。說是地產壟斷是有點高估實況，但如果政府推出太多的樓，樓市會大跌，對經濟也有破壞。

樓價貴才給人地產壟斷的錯覺，但在二手市場，地產商的壟斷是有限的。二手市場比一手市場多七至八倍，一手樓標價也得參考二手市場的樓價，因二手樓是代替品。如果樓價全被地產商壟斷，就不會出現2003年樓市大跌的情況。

第六章　金融

面對挑戰

2010年底，新加坡交易所（SGX）正式收購澳洲交易所（ASX），預期合併帶來的盈利約5.5億美元，約港交所的八成。雖目前還與港交所有段距離，但新加坡那股氣貫長虹之勢，期望不久後能與港交所爭一日之長短。正如當年我們輕視隔鄰的深圳，今天卻在多方面已迎頭趕上，甚至超越香港。如香港還再不思進取，以昔日藐視深圳的心態看待新交所的威脅，他日必再吃苦果。

新加坡為發展成為新的亞洲金融中心，公然與香港搶客，積極吸引內地企業來到新加坡上市，還引入美國預托證券與港交所的爭客。那邊廂新加坡積極進取，這邊廂港府辦事慢半拍，心態相對散漫。港交所的科技和處理買賣的速度均落後於新加坡，與倫交所、紐約泛歐交易所、納斯塔克OMS、東京交易所等的交易平台速度更是差一大截。港府雖將於2011年下半季引入AMS13.8系統，但即使引入後，交易速度和平台容量還是不及別的競爭對手，長此下去除了優勢漸被蠶食，也未必足以應付人民幣逐漸國際化下引入的大量資金，眼白白看着有生意也做不成。

除了國外的新加坡，國內對香港金融的挑戰更趨厲害。先不要說

中央決心在2020年把近年競爭力增長銳不可當的上海，發展為國際金融中心，對漸走下坡的香港必帶來極大威脅。國家在2010年底發表了有關發展深圳前海為新的經貿中心的「前海總體規劃」，主力發展金融、物流、高端資訊科技和專業服務，當中又以金融為首要發展重點，乃擺明車馬的搶香港金融生意。近年深圳發展鋒芒逼人，已搶去了香港不少物流生意和資金，而中國城市競爭力研究會做的報告，指出深圳的GDP將於5年內超越香港，加上前海發展定位與香港差不多，兩者間必定面對直接競爭，金融業和專業服務業有機會重蹈上世紀80年代覆轍，面對業務北移和流失，使經濟陷入空洞危機。即連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也提出此警告，說屆時香港將有大量服務業移到前海，造成大量失業，但政府還是熟視無睹，仍天真地認為前海不會對香港帶來威脅，沒及早策劃應變措施，屆時香港前途憂矣！

政府自欺欺人，香港勢必衰落

前海計劃獲國務院批准時，廣東省省長黃華華聲稱前海和香港的關係將會是前店後廠，前海是前店，香港是後廠，所以香港不會有任何損失。但實際上，香港由於地少人多，地價高人工貴，在香港開廠的成本遠比在內地高，大部份港資也往內地設廠，更遑論吸引內資在港設廠，香港根本沒有條件做後廠。

香港和廣東省的合作方式一向是香港作前店負責前線工作，廣東作

後廠負責提供資源。現在前海要發展成前店就是擺明車馬搶香港的生意和經濟，前海要取代香港的經濟地位真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但香港的高官們竟對前海的威脅視而不見，眼光極為狹窄，唐英年竟稱發展前海為雙贏方案、曾蔭權說前海連海也未填，根本未能威脅香港，由此可見香港的領導人眼光只限於目前，缺乏長遠視線。

不單如此，政府還稱，幫助前海發展成深圳中環！一個上海已經難以招架，還要應付多一個前海，欠缺規劃長遠景觀的香港，是難以抵擋這些外來競爭的。前海發展成金融中心，勢必搶走不少外資、中資和港資前往發展，又會跟香港在人民幣發債和國債爭一日之長短，香港面對大量資金和金融人材流失是必然的事。政府可資助前海發展，但必須互相分配好工作，業務避免重疊，否則只淪為惡性競爭。

前海根本不是想發展成深圳中環，而是想成為深圳曼哈頓，和香港當年以紐倫港為目標一樣志向遠大，可見香港不但沒和前海商討如何分配發展方向，對前海的意向也理解不足。前海聲明要發展高端商業，而低端商業則留給香港；再者前海要發展口岸，勢對香港的人流物流帶來打擊。若香港還是連十號貨櫃碼頭商討了多年仍未定案、大嶼山物流園、簡化兩地通關手續等工作都只講不做，使競爭力不升反退，那麼在以上產業的地位，勢必被前海取代。

前海地大物博，可填海30多平方公里，先天因素已比地少人多的香港優勝。香港的出路是必須和珠三角等地融合，共同定下發展目標，

把人力資源和資金共同運用，建立共同網絡，一起商討如何透過一體化去分工和解決區內人口老化與居住等問題，又可透過加強流通去疏導就業問題。可是《珠三角一體化規劃》卻沒有香港的份兒，只有一個無權的諮詢委員會去處理大珠三角事宜。政府態度自欺欺人，故步自封，看不見威脅，也欠缺創新思維及不積極參與珠三角一體化，面對鄰近競爭，香港前景實不樂觀。

政府自損金融競爭力

環球的企業到大型國際交易所上市，都必須跟從當地會計及審計準則去編製財務報告，以及由當地相關機構監管。這使不同國家企業的狀

況都可在劃一標準下作直接比較，方便投資者在買賣時進行參考。

荒謬絕倫的是港府在2010年12月15日起，容許在香港掛牌的內地企業只需按內地準則編製報告，令各企業準則不統一；還把監管核數工作外判給內地部門，拱手讓出自主權，非常卸責，也令投資者喪失循法律途徑追究索償的權利。政府此舉是根本地剝削投資者權益，是在趕客。香港兩大財經報章之一的《信報》，更以「香港自毀國金中心地位」為標題報道此事。足見此事的嚴重性和政府的駭人之舉如何為香港金融添上瘡痍。

在香港這個大都市，辦事講求快而準。紐約、倫敦，甚至新加坡的證券市場已一早推出證券無紙化，既環保又加快交易速度；反觀香港在金融計劃搞全面數碼化，搞了十多年也未搞到，證券無紙化還停留在只聞樓梯響的階段，是在慢慢削弱香港金融的競爭力。

李嘉誠於2011年頭公布打算分拆和黃的港口業務，以商業信託基金形式上市集資60億美元，但他竟選擇在新加坡上市，而非香港。作出這決定，並非李嘉誠放棄香港，而是港交所根本沒有商業信託基金形式上市的守則，眼白白看着肥水流向別人田。為了吸引企業到當地上市，新加坡早於2007年發展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和企業商業信託基金，而效果顯著。

關於香港應否設立類似新加坡的商業信託基金，可再作討論，因新加坡式的商業信託基金在保障小投資者利益上相對較低。但值得注意的

是新加坡積極進取，香港政府卻故步自封，這數年來甚麼也不做，完全不着力於開拓金融產品去吸引資金，只是攤開雙手等待中央安排人民幣業務來港，態度消極，只是發甚麼「紐倫港」春秋大夢，卻又沒有實際行動，就連要延長交易時間也一波三折。這個短視、懶惰的政府，乃正宗的「銀樣鑞槍頭」。

香港金融之出路

香港金融業面對內憂外患，如果處理不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將難以保住。

香港金融的一大可見出路在於把握回歸優勢，進行融合。而和競爭力迅速上升、經濟越趨蓬勃的上海和深圳融合，讓內地民營企業來「上深港」三地聯營的金融中心上市，令香港股市吸引更多國際資金（同時在資金泛濫時，其餘兩地也可作為分擔游資湧入的渠道），加強金融業的發展，也會令欲投資人民幣的國際資金更願意流入香港，有助香港作為人民幣離岸中心。如眼光再看闊一點，可把台北也放在融合的名單內，把目標訂在「上深港台」四地金融市場大融合。

香港司法優越，在融合後必吸引更多內地私企（隨着內地開始容許私企的空間越來越大）和台資來港上市。而香港和三地市場融合，金融網絡擴大，也互相流動，使綜合實力大為提高，會進一步吸引國際資金。

第七章　物流業

物流業貴為香港經濟四大支柱之一，聘用近四分一的就業人口，為GDP貢獻近30%。由戰前到現在，不論香港定位為轉口港或出口港，物流業都佔着一個舉足輕重的地位。上世紀70年代葵涌貨櫃碼頭落成，更標誌着香港進入貨運興盛時代。但好景不常，香港的物流業卻面對着一波又一波的危機。

危機

香港物流業的客源主要來自在廣東設廠的企業，當中以製造業廠商為主。可是隨着內地近年的貿易方針調整（把工廠分散到各省各地）、廣東營商政策改變（勞動法規和環保條例增加，大增廠商成本）以及勞動力成本大升（廣東工人工資上漲，勞動市場求過於供，不少廠商甚至每年新年後也難聘請得足夠員工。另外人民幣不斷升值，港幣不斷隨美元貶值），令原本靠成本低廉而進行密集勞動式的工廠大吃不消，很多於珠三角和廣東一帶設廠的廠商不是把廠房移遷內陸省份，就是結業。內地眾多城市，包括上海、北京、蘇州、銀州等都有強勁的物流業務發展，在捨遠取近下，搶去了香港物流界很多客戶。

香港過往物流界的大優勢在於法規優良、管理完善、零關稅、稅務簡單的軟配套，但隨着內地吸收經驗和學習香港物流成功模式，在地大

物博、國家經濟規劃的強大支持下，內地各地的物流業發展不少已超越香港，例如廣州南沙、珠海高欄、東莞虎門、深圳鹽田、蛇口、中山、江門，全對香港貨櫃碼頭帶來重大威脅。在2012年，單是深圳港口處理貨櫃能力將達3,200萬箱，比香港的1,600萬箱多一倍，屆時深圳可取代香港成為華南的國際航運中心。你看獨具慧眼的李超人近年已把大量物流業務從香港轉到深圳，便知大商家也不看好香港物流前景。

在航運方面，新加坡雖則在客貨運量遠不及香港，分別只得約3,800萬人次和170噸貨運，遠不及香港的5,000萬以上人次和400噸貨運，但新加坡樟宜機場已準備興建第四個航廈和第三條跑道，繼海運後，在航運與香港一較高下。廣州白雲機場在數年前加建第二跑道後，又投資140億去加建第三跑道及二號航站樓，在2010年更新開50條國際航線，誓要建立花都航空城，直接威脅香港的地位。

雖則危機處處，但只要業界夠膽識，處變不驚，而政府又夠眼光，能為業界提供良好營商環境，香港物流業仍會前景光明。可是從政府態度看，大有可能事與願違。

政府太短視，物流沒前景

香港的物流公司長遠要拓展內地和外國業務，以及吸引製造業把後期工序也交由香港的物流公司負責，因香港現在大多只負責前期工序，不夠多元，這也局限於香港的物流公司普遍過於小型，資金和規模不足。可惜政府從沒在這方面作長遠規劃，協助香港物流界，即使業界已

反映此訴求多年，政府還是無動於衷，害苦業界。

此外，面對競爭，政府的危機感也嚴重不足。上海2009年貨櫃吞吐量連續第二年超越香港。面對上海被定性為國際航運中心的威脅，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只表示香港的航運制度非常良好，只懂重彈香港在法治良好、信譽良好、發展成熟等舊調，呼籲大家毋須抱太過悲觀的態度，完全無視上海在航運服務迎頭趕上。

但請特區高官張開眼睛看看長三角方面的發展。上海與浙江寧波、舟山及江蘇的長江港一向也是互相競爭、互爭區域龍頭地位，但近年三地已化干戈為玉帛，積極合作，實行長三角港口一體化，以上海為中心，江浙為兩翼輔助，使三地港口分工合作，成為超級港口聯盟，有着

1＋1大於2的力量。珠三角也出現相同問題，香港和珠海、深圳互相惡性競爭，設施重複，部份盲目擴張，可是，香港和周邊港口並沒像長三角等地那樣，還是在自相殘殺。

廣州則成為廣東龍頭，與佛山、珠海、中山、順德、江門的城際軌道已通車，一小時生活圈達標，而東莞、惠州的城規也快建成，在周邊樞紐帶動下，白雲機場吞吐量不斷上升，新跑道和客運大樓快將落成，而深圳機場也日漸擴展，香港則連與珠海機場合作和與廣東各大機場的分工也未做好，辦事效率低，在2011年中才開始為所謂《香港國際機場2030規劃大綱》諮詢，形勢遠落後於鄰近地區。政府完全沒有自我改進的意圖，又怎帶領香港經濟走向新天地呢？

正因政府一向眼光短視狹隘，只懂自我感覺良好，陶醉於現狀，以為優勢會永遠擁有，沒長遠規劃，加上政策混亂，才導致各方面紛紛被人迎頭趕上的局面。政府早於2000年評估機場跑道將於2019年達至飽和，需盡快興建第三條跑道。但2008年金融海嘯後，令航運業一時陷入膠着狀態，使政府放慢手腳，對興建第三條跑道事宜愛理不理。政府以為往後日子也像2008年那樣，航運業身處困境，認為2019年飽和的機會甚微，卻忘記經濟會有復甦過來的一天，使評估出錯。

在2010年底，新報告指出機場跑道不會因金融海嘯而延遲飽和，反而會提前到2017年。可是政府效率慢得要在2011年的《香港國際機場2030規劃大綱》才諮詢是否興建第三條跑道（是否無聊和多餘？應一早去想怎興建和評估對環境的破壞，而非是否興建），使跑道最快也要在

2021年才能落成，出現4年的真空期。屆時會喪失很多客戶，新航線會落戶鄰近機場，包括已做好準備的廣州、深圳和新加坡。這正是政府的失誤，而令航運前景黯淡，損害航運國際樞紐地位。

而政府如今才遲遲的決定起第三條跑道，也是沒看清關鍵要點。首先因民航處的空域調控系統效率落伍，令機場原本可容納每小時78班次飛機，而變成現在只有62班次。兩條跑道也未管好就建第三條，會重蹈效率低的覆轍。另外政府還未與內地政府解決空域限制的事情，沒有協調出清晰的方案，即使起多幾多條跑道也於事無補，因空域限制下，令只要來回各兩條的航道，難大量增加班次。政府不先解決兩大要題就起第三條跑道，隨時得物無所用，令跑道不能發揮應有效益。

出路

香港貨運成本比周邊地區高，將來能否保持現有吞吐量也成疑問。香港物流的出路，除了開拓海外與內地市場外，更要走工業轉型，不要再過份依賴物流業，始終僧多粥少，物流業在強大競爭下，難免受損，只在於程度高低。工業學台灣那樣，進行升值，邁向高附加值、創新設計、自家品牌路線，在危機中進行改革。

海運方面就像梁振英所提出，發展類似倫敦的海事服務中心。憑香港給外界對機制和司法信心，提供船泊管理、船務租賃、海運業融資、海事保險服務、成立海事仲裁中心，提供海事訴訟的調解服務，以海事服務彌補貨運吞吐的下降。

第八章　旅遊業

旅遊業被稱為香港經濟四大支柱之一，佔GDP約3-5%，和全球的9-10%比，是較低。隨着自由行普遍，旅遊業近年的就業人口和員工薪酬增長率，都比全港性的多數個至十個百分點，旅遊業的重要度不斷上升。

處事慢三拍，有錯不根治

2010年7月，一場「導遊亞珍事件」在旅遊界掀起風波，惡導遊形象席捲全國，嚴重打擊香港旅遊業的聲譽，也頓時令跟團的內地客大減。可是翻查資料，聘用亞珍的金凱旅行社已曾數次犯戒，但仍然故我，證明旅遊業議會的政策和處分制度無效，毫無阻嚇性。況且零團費、導遊強逼旅客購物情況以及旅客不購物會遭到刁難的情況，數年來屢見不鮮，新聞也報道過無數次，但有關當局卻可以容許這些事件三番四次的出現，而且有些旅行社更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禁，究竟旅議會、旅發局等部門在搞甚麼？效率之差令人不可接受，處事之心態更使人忍無可忍。

政府和旅遊當局每次處理手法都不外乎永不錄用涉事導遊，把責任全都推在導遊身上讓他做替死鬼，但核心問題則從不被觸及。難道導遊

會無緣無故的罵人？難道導遊皆黑心或全是天生購物狂，要逼人瘋狂購物？政府根本沒正視旅遊界層壓式的逼壓問題，

經濟不景氣，大企業壟斷旅遊市場，香港的旅遊市場被來來去去的三數個旅行社壟斷着。這就無形的壓逼着中小型旅行社，它們為了生存，而大耍茅招，零團費、蝕本團全出，甚至要導遊去想盡辦法壓逼那些旅客購物，否則導遊也自身難保；當中手法包括判上判，把旅客「賣」給導遊，讓導遊自負盈虧貼錢打工，只能透過逼人購物去賺錢（當然有些「出色」的害群之馬由賺錢變成賺大錢）。導遊本身也是不斷的被上層欺壓，以前導遊可從每名內地旅客分得50元小費，現在不能之餘，還要為旅行社墊支不同雜費，足證導遊也是被欺壓的一群。當然導遊和中小型旅行社可秉持良心而不這樣做，可是你不做，很多找不到工作去養家的人會做。而你不去工作，又會被政府某些宣傳及一些大商家標籤你為懶惰，是蛀米大蟲。

可是政府從沒從旅行社和旅遊市場的層面去想問題，更不要說從就業市場及收入偏低人士層面去想了。

另外，多年來旅議會的規管模式是自己人管自己人，當遇上投訴，也是自己人查自己人，導致每次結果都不敢打老虎，而去找蝦毛導遊做替死鬼。經過多次導遊喝罵旅客事件，證明此路不通了，政府還死性不改，稱無意改變管理模式。那麼永遠只靠旅行社自律，不會得到成果。歸咎原因，是政府一直置身事外，不肯肩負規管旅行社和導遊的責任。

連作為經濟四大支柱的旅遊業也不管，那麼政府有甚麼肯管？政府態度極不負責。

政府態度散漫

早在2008年，李小龍故居業主已將故居捐給政府，發展為李小龍紀念館。但過了兩年，政府連設計方案也未有共識，令李小龍紀念館的開館期一拖再拖。李小龍紀念館有助香港增加一獨一無二的景點，但政府的散漫態度實令人費解。難怪影視巨星成龍早前無條件捐一些有價值的電影文物／材料給政府，政府也愛理不理，最後成龍憤而轉交給新加坡政府，當地政府立刻為此興建一博物館。港府的態度，是懶惰和少做少錯的官僚主義，無心經營香港的旅遊業。

政府保育不力

香港之所以成為旅遊熱點，除了城市的瓊樓玉宇和購物熱點外，三面環海的天然美景也令很多遊客慕名而來。其中被稱為香港後花園的大浪西灣，更曾被選為香港最美麗燦爛的景色。可是政府從沒為如此價值珍貴的瑰寶訂下發展審批地區圖，而是讓該處可由發展商任意發展，導致該處大量天然土地被夷為平地作發展，令大浪西灣整體美貌一去不復返，難復昔日光彩，變相為香港旅遊業趕客。這事更被國際傳媒報道，連《時代新聞》也報道此事乃香港醜聞。這與政府一向缺乏監管郊野公

園和海岸公園範圍的私人工程有關，令這些佔全港1-2%土地內的美景被破壞也無皇管，儘管那些發展是違例也好。可是令人難以理解的是政府一直很懶惰，不肯將那些土地納入審批。之後的海下灣、荔枝窩出現同類事件也如出一轍，就是政府不負責任，不肯監管。

其實早於2004年在西貢的深涌已發生類似事件，但政府沒吸取當年教訓，沒為那1-2%的滄海遺珠修例。當同樣事件再發生，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運用緊急發佈發展審批地區圖權力去停止發展商的行為，但只是地方被破壞後才被動出招。有的甚至不理會，任由發展商繼續破壞港人天然資產以圖利。

另外一個政府不敢為那些生態價值高的土地修例的原因，是怕得罪原居民，影響他們的土地發展自主權。但多個團體如長春社、鄉議局等，一早已提議政府成立一個保育基金，在賣地收入內拿出某個百分比給原居民作補償，可是政府就是一直不採納，令無數具高生態價值的土地遭殃。

話說回頭，政府從來沒有一套評估私人鄉郊土地生態價值的政策，去為私人鄉郊和農地作生態評估，令很多像大浪西灣的高價值區被隨意開發。

強逼旅客購物、政府監管旅行社不力、海味店及電器舖欺騙遊客事件無日無之、零團費弊病、政府保育不力等，已把香港旅遊業名聲破壞得透徹，可是政府在旅遊業上的無能，如何幫香港建立一個旅遊之都的形象？

沒有整套旅遊規劃

香港有着殖民地痕迹，乃中西文化交匯的地方，也有着重要的革命史物資本、獨特的地理環境以及各大部落文化。如果政府訂出一套完整政策，可發展出香港自己的生態地理旅遊和古物文化旅遊。可是在旅遊方面，政府的處理太零碎，沒結合不同地區的景點與特色、各部族的文化作一整體性的旅遊線，只是個別景點的介紹。政府也對本土特色文化漠視，只懂隔離飯香，興建外國主題公園當作本港旅遊焦點。

當年政府賤賣土地給迪士尼興建主題公園，只懂推崇外國，不懂運用本土文化。賤賣土地又不保留監管權，弄出迪士尼多年營運不善和長期虧損的大頭佛，結果卻是港人埋單；又不保留大中華區或東南亞區的獨家專營權，令上海可興建一個可以比香港迪士尼大4倍有多的迪士尼公園，直接搶奪本港遊客。這也反映政府的旅遊規劃如何粗疏，只懂見步行步，不懂長遠考慮，也沒有珍惜和好好運用本土特色。

第九章　六大「優勢」產業

政府於2008年提出要發展六大優勢產業，雖然當中四大產業發展也遠落後於深圳，但現在發展也未為晚也。發展六大優勢產業也是在金融海嘯後應運而生的扶貧委員會、經過半年的會議後，得出的唯一改善貧窮的方法。現在該六大產業佔就業人口約一成，佔GDP則約7-8%。(註)

可是政府完全沒有為六大產業訂下任何發展的步驟、時間表和稍為詳細的計劃。短期目標沒有，長期目標更欠奉。又沒有說會否及如何吸引更多就業人口轉到六大產業發展？又沒有說希望六大產業在將來GDP的比重會否增加？佔GDP的目標是如何？香港的教育如何配合六大產業去培訓人材？坦白的說就是甚麼也沒有，除了標題。

究竟六大產業是要取代四大支柱，還是分庭抗禮，由四大加上六大，變成十大行業？或只是作四大支柱的綠葉？六大產業只是開拓新商機或是會長遠發展？是擴闊出路或是取代原路？六大產業目標是為香港創立多少就業機會？這樣一個甚麼也沒有的報告，如果是私人企業的員工交給經理，或是教師寫給校長，不被大罵一頓，也定必打回頭。可是香港人只能苦笑硬食所謂六大產業的報告。

檢測及認證業

檢測及認證業的勞動人口約8,000到16,000人，行業總收入為40到80億。全港約有570間私營檢測及認證機構，政府有公共化驗所約50間。私營檢測及認證機構的總生產約40至50億。醫務化驗所、電器、玩具、遊戲產品、紡織品測證都屬檢測及認證業；建材、珠寶、環保產品、中藥材、中成藥等測證，是香港檢測及認證業應大力發展的範疇。單是中國出口的產品已足夠支撐這個市場，而誠信是香港檢測及認證業的最大優勢。

檢測及認證機構十居其九設在工廈內，但政府要活化工廈，加上地政署認為檢測認證沒有生產成份，對租用工廈單位的檢測及認證機構徵收「容忍費」，即補貼工廈和商廈之間的租金差別。地政署是漠視檢測及認證業對經濟生產力及出口貿易的貢獻。政府政策自相矛盾，一方面說要發展檢測及認證業，一方面卻歧視該行業，又推出活化工廈去增加檢測及認證機構的租金成本，把它們趕去商廈，可是570間私營檢測及認證機構，有530間是中小企，僱員少於50人，收入微薄，根本難應付商廈租金。

而該570間私營檢測及認證機構，約20間擁有過百僱員，而佔有業界七成的總收入，反映檢測及認證業也面對貧富懸殊情況。

創新科技

中國社會科學院做的《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指出，香港經濟發展有三大劣勢，一是生產成本，尤其是租金過高；二是不能與內地接軌；三是不重視科技發展和研究。政府把科研列入六大優勢產業，又說要推動知識型經濟，可是從來得個講字，口惠而實不至。港府的科研叫「創新科技」，即重視創造新的科技，但沒有研發，即不重視跟進的研究和發展。

北京推動科研是有政府大量配套支援的，在土地、稅務上為科研企業提供大量優惠，連澳門也循此方向走。但香港政府則沒有甚麼實際配套，連投入科研的經費也嚴重不足，只有GDP的0.6%，而重視科研發展的美國則為2.7%，中國1.4%且還不斷上升中（計劃在2015年升到2.5%）。

政府不協助，科研由市場主導，令本地科研只重視發表論文和基礎科學研究，政府沒去協助進行更多研發產品給工商界使用。政府對應用研究沒協助，又沒開拓世界市場，使本地科研欠缺紮實的成果支持，令科研市場細小，難以發展創意科技業，也顯示政府對科研的無知。

港府還是迷信金融帶動商業經濟的一套，只着重商貿。2007年曾蔭權把「工商及科技局」改為「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就知政府如何輕視科研，眼光如何短淺。

提倡創新科技產業，但卻沒有計劃如何培訓科研人材和吸引人材加

入，又沒有提供足夠的資源和金錢援助，只是資助那些可在短期內賺錢的科研產品，把科研過份商業化，難怪具冒險創新精神的科研也不在香港做，而到外國去做。政府的方針和策略對科研可謂無實際幫助。

文化及創意

政府成立了一個新官僚機構去管文化及創意，乃是創意辦公室和專項基金。但創意辦公室和專項基金除了撥錢出來外，還有甚麼配套支持行業？基金會否變成一筆過撥款及場地夥伴計劃翻版，只是親疏有別，用來軟性威脅文藝團體聽命於政府的工具？就像文學雜誌《字花》在2009年推出一套六四紀念特刊後，便遭到藝發局削減一半的援助，雖然有關當局事後解釋是一貫做法，因《字花》已被資助了3年，要削資，但在文藝界難免掀起白色恐怖。

香港政府只懂把文化事業庸俗化和商業化，又加上無限的審批制度以限制，又怎推動文化創意？當年的大衛像事件，大衛像被列為三級不雅物，便是國際笑話。反觀台灣那邊，有獨立的文化部負責文化，明白到一個社會要繼續生存，必須要有文化的精神。台北推動文化是帶動民間的文藝氛圍，培養人民的文化精神，不像香港政府把文化當成商品或包裝而已。

政府對整體的文化及創意工作者、市場、氣候有何支援？會否幫業界工作者開拓市場及宣傳？會否培養社會的文藝氣氛？會否從教育方面

鼓勵人民參與文化創意活動？全是沒有答案，何來推動文化創意？政府根本沒有劃定一套完整的文化及創意政策。文化創意必須由社會氛圍、教育做起才會見效。

政府把文化及創意定為重點發展產業，卻同時扼殺和破壞本地的文化創意工作者的生存空間，包括推出活化工廈政策，令文化工作者面臨沒有工作地方的困境；推廣所謂街舞、塗鴉，只是劃死一些地方讓人跳舞、塗鴉，卻不去了解文化工作者真正需要的是甚麼。

醫療服務

所謂的醫療服務產業只是推銷幾塊地皮興建私家醫院。究竟是想趁機吸引多些內地客來港光顧醫療服務，讓私營醫院賺上一筆、提供昂貴但有質素保證的醫療服務為主？或是要去舒緩公立醫院服務供不應求的情況？而發展醫療服務，是會推高醫療收費或是拉低醫療收費？連方向和規劃也沒有，從何說起會對香港的經濟帶來貢獻？

政府表明要吸引周邊和內地居民來港享用醫療服務，但會否加重本地醫療服務供不應求的負擔？例如孕婦牀位會否進一步緊張？會否進一步拉走公立醫療機構的人手、令公立醫院人手更短缺？但政府卻沒提供一個遠景給我們參考，又沒有從培訓醫療人才方面着手。且政府如何保證本地醫療能吸引周邊地區居民？又沒有把香港定為國際醫療中心的決

心，算是重點推動醫療產業麼？而醫療產業對基層醫療服務不足、老人安老院舍嚴重欠缺的問題如何解決也沒有提及。

環保

政府一直強調要發展環保業，而環保園就是政府主打的環保業支援項目。但環保園搞得一塌糊塗，因種種政策上的荒謬，令原本定在2006年開業的環保園，到2010年還未能完全開業。不少在環保園投資的公司也大吐苦水，投訴政府沒兑現承諾，沒有幫助它們，只是誘騙了它們來環保園便算，之後把它們置之腦後。連環保園也搞得不堪入目，還談甚麼環保產業呢？

政府豪言要令香港成為綠色優質城市，但卻連甚麼叫美化，甚麼叫綠化也搞不清；對香港綠化地不斷被非法工程、廢料、泥頭破壞又束手無策，愛莫能助，所謂豪言只會淪為假大空。

環保需要由教育做起，培育人民的環保意識和危機感，否則推行甚麼環保事業、環保政策只會事倍功半。例如南區有中學響應「愛護地球日」，規定每週週五，學生不可乘搭電梯，要徒步上落樓梯，順便多做點運動，但竟有家長投訴校方此舉是罔顧學生安全和剝削權利，顯示出家長過份溺愛學生之餘，也反映環保意識還未深入廣大市民，而家長認為這是剝削權利，卻忘掉學生受教育，在學會自己有甚麼權利時，必須先學懂甚麼是秩序和責任。

教育服務

為何政府會視教育為服務？視教育為商業？教育應是一種使命，一種培養下一代為德智體群美兼備的全才之使命，而不能用錢去量度成效，更不能用錢去主導教育方針。教育絕非買賣的、消費式的服務。難怪政府的教育政策如此功利，令香港教育弊病叢生。

政府的所謂教育產業，只是興建一兩間寄宿學校及私立大學，收高昂的學費，吸納內地和外國學生為主，以求賺一筆。但私立大學的目標如何？只是為了賺外國留學生一筆？有沒有配套政策令優異的外地生留港工作？有沒有一整套政策去促進本地生和世界各地學生交流？新建的私立大學，如何提升本地大學整體的水平？可是這些統統沒有，政府只當教育作一種炒賣，對如何提升本地教育質素、教學風氣、教育文化完全不理會，只是一味想着錢、錢、錢，對本地教育是沒有幫助的。

新加坡也有視教育為產業的情況，但比香港好一點，新加坡在2002年實行「環球校園計劃」，訂下2015年吸引15萬名海外學生的目標。但香港卻連目標也沒有訂。

即使真的要把教育當成產業去搞，也必須邀請國際知名學府來港辦學、推動本地生和全世界學生的交流，培養他們的國際觀、地區觀和全球性公民的視野，課程、大學師資、資源也要國際化，不只是多請幾個外籍教師和多收外國留學生便成。

六大產業虛有其名

觀乎以上分析，可見六大產業只是提供一些土地和稅務誘因去吸引商家投資，而非就着經濟單一化找出路，並非為經濟結構進行甚麼轉型。六大優勢產業的出現，是基於金融海嘯為香港經濟帶來創傷，發現香港的經濟結構太過依賴金融，金融負擔太重，需要分散風險。但政府卻沒有針對問題，六大產業只是為商家提供新的賺錢機會而已，如果再來甚麼金融重大危機，香港只會再次遍體鱗傷，六大產業只是虛有其名，欠缺實效。

註釋：

請參看2010年3月19日，《明報》港聞「六大產業無起色　文化就業負增長」。

丙、教育

第一章　政府教育政策勢利

政府為求控制教育開支，對教育界採取功利的政策方針，以成本和收益去衡量院校的成績。對中學，以收生率和開支營運去量度，入不敷支，對政府財政構成壓力的，便殺校；對大專院校，為了減少對其資助，便把它們推向商界，希望商界能分擔政府對大專教育的投放，於是便對大專院校採用商界捐一元，政府才資助一元的政策，把政府角色由主動化作成被動。

由是，大專校長和主任們便要親自四出「撲水」，跟商界打交道。為打好與商界的關係，做大量推廣、宣傳、應酬、接待的工作，花大量的人力、物力、金錢於那些聯誼推廣、與教育科研和培育學生無甚關係的活動上，使校長出現公關化的情況，有點兒浪費他們的學術地位和行政水平。

中學則要為招生煩惱，以免被殺校和資助被削。教師們被逼應付應接不暇的宣傳和推廣工作，有時為了吸引家長和外界注意，學校把資源集中在對外爭取校際獎項的工作，使學校有賣點去吸引學生與家長們。爭取獎項原是好的，但如把資源和精力過度集中在此便有違教育精神了。要令學校有力競奪獎項，非要先培育一班精英不可，但若資源只集中於培育精英，難免對其他相對平庸且佔大多數的學生不公，也不符有教無類、等量齊觀、無分大小、不分彼此的教學精神。

人，迷茫。當教師們要花大量精力和時間於與教學無相干的宣傳工作、推廣活動時，他們豈能專注於「傳道，授業，解惑」的教育天職？又怎能把學生培育成德智體群美兼備的樑木呢？當我們因新一代孩童缺乏獨立和應變能力而貶稱他們為「港孩」時，我們有否想過其中成因乃來自扭曲變形的教育制度呢？

教師難以春風化雨

政府的功利教育政策，為教師們帶來無數無謂的額外行政和推銷工作，大大打擊教師士氣之餘，也使教師無暇照顧學生、培育學生，難履行春風化雨天職。

火焰，熾熱，劇痛。教改的猛烈影響，令教師工作只有約三分一是在教育學生身上，其餘的是要應付無數的行政工作、開無數的會和不斷作推廣工作。而開會不是單單一次會議那麼簡單，有會前準備的paper work、會後的minute、跟進報告、寫會後建議proposal、然後向校方高層推銷，行政工作之繁多令人咋舌。教師連休息的時間也不夠，遑論撥出私人時間來教化學生，以及吸收更多知識作持續進修。

教師沒時間照顧學生和因材施教，學子們只能靠自修或外出補習去學取更多，促使本地補習社成行成市。可是補習班學費動輒數千元一個月（還要是每科計），窮家子弟只好靠自己了。但本地補習社因客戶（家長們）需求，只提供如何提升應付考試技巧的課程，其他甚麼德、體、

群、美、靈的全人教育一概不理。難怪香港學生大多是只懂應付考試的機器，也使新一代無論在EQ或AQ上，都得不到好的鍛煉，現在政府還以國民教育以偏概全，代替包含德育的公民教育，未來學生們的道德水平，恐怕又要降一降。

小白鼠，愁且憐，弱且幼，可無辜。嗚呼！香港人年紀輕輕時便已成為政府不斷變幻之教育政策下的白老鼠，哀哉！我們除了花錢出外留學便別無選擇。

功利主義思維害苦香港教育

表面上，社會能出產越多大學生，就表示教育越「成功」，而中小學方面的成績，相對下不受重視，「立功」的機會較少。於是在政府功利的思維底下，近年於中小學教育的資源投放比率越來越低，若要削減教育資源，必從小學、幼兒園入手。政府忘掉教育一定要從小做起，正如建樓要由低建起一樣。政府的功利眼光害苦了香港的教育，害苦了人文質素。

另一方面政府為使教育越來越「成功」，便製造更多大學生，大白象地增加很多自費（即自生自滅）大專學位，但就業結構上又沒配合，只是濫發學位，像美國大開印鈔機一樣，把大專學位貶值；政府對這些自費學位又欠缺監管，對大學生培養只是重量而不重質。

在功利思維下，主流學校只願收取成績好的學生，以便在公開試上有成績保證，而小學則只願收才華橫溢的學生。幸好並非每所學校也

這樣，位於中西區的新會商會學校，便專收新移民和有特殊需要的孩子（包括有輕度弱智、嚴重學習障礙、過度活躍症等）。可是新會商會學校也因收生不足面臨殺校，而政府沒因該校對社會弱勢的貢獻而格外開恩，也沒考慮有特殊需要學生的學校，在師生比例上與主流學校不同，只會以迂腐的官僚態度代替彈性思維和人性良心。面對類似情況的，還有專收有聽覺和視覺障礙人士的，正言匯社的啟聾學校和心光盲人學校。張超雄這樣批評政府教育思維：「香港教育劃一的師生比例、劃一的課程內容、劃一的開班線、劃一的評核方法，貌似公平，但卻是壓根兒歧視和排斥有特殊需要的孩子。孩子的需要是多樣的，但教育官員只懂計算成本效益，死抱管理主義思維。」

當公立教育被政府的功利教育政策玩弄至不似人形，而入讀私校及名校又過份講求關係、財富、背景時，非中上階層的學子便缺乏接收良好教育的機會，令他們一早輸在起跑線，難以上流和脫貧。

「幼園學券制」是政府功利思維的產物，為求減少對教育的經常開支，教局推出幼園學券制代替經常性資助。學券制以半日服務為基礎及以學生人數決定資助金額，故對營運成本較高、只得一輪學生而相對學生人數較少的全日制幼園不利。因此全日制幼園獲得的資助少，而全日制教師獲得的進修資助金額也因而較少，令全日制教師流失率高達五成。全日制幼園學費當然比半日制的較貴，成本也較高，但獲得的資助卻較少，家長的學券金額不會因選擇全日制而增加，令選擇全日制的家長減少，加上政府政策的漏洞，令全日制教師減少，將全日制幼園推向死亡邊緣。

訪問

受訪者：馮偉華（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會長）

筆：自從近十多年政府推行教改、教育界和政府的關係常出現緊張情況，但教改的原意是希望教育質素不斷提升，但效果明顯與預期落差很大，是否當中出現甚麼問題？

馮：雙方間缺乏互信，是教改成效不大原因之一。政府對辦學團體、教師、甚至教署充滿着不信任，令教界怨氣叢生。政府當教育工作者是夥計，而不是夥伴，使教改事倍功半。教改由上而下，幾個官員決定一切，缺乏諮詢；過份靠行政方法，又加設過多監控機制；過多改革措施同一時間進行，令太多混亂產生，教界難以適應。「外評、內評制度」便是政府不信任教師和辦學團體的一個好例子。教師因此被逼花費大量時間進行與教學無直接關係的行政工作，為怕被殺校，而做宣傳工作、包裝工作去搶學生。但正確做法應是提升教育質素，現在政府往往只是從資源角度考慮教育問題，忘掉教育質素才是首要；青少年問題、濫藥問題等，是不可用資源角度去看的。

筆：除了不信任，還有甚麼問題？其實政府近年在教育投放的資源已很多，為何仍是這樣？

馮：教改的動機是良好的，但過度急於求成，便帶來翻天覆地的影響。政府以大躍進思維行教改，想用短時間徹底改革所有事，過於好大喜功，那是不顧現實情況。例如政府為增加大專學生人數，便大開副學

上學位，卻欠缺事前的審慎規劃，令課程質素不穩定、副學士社會認受性低及令大專生供過於求。又例如為改變填鴨教育實行通識，但範圍過闊、評核沒標準，又沒指定指標，令教師、學校、學生無所適從。

政府投入資源雖多，但用不得其法，使資源用得不值。你看校本評核牽涉到大量資源，又令教師工作量倍增，但卻不是直接使用在學生身上。

筆：那麼學生們有沒有從教改中得益？教育在政府的領導下，本質是否變了？

馮：學制變得過快，學生無可避免地成為了白老鼠。改革雖多，但不見教育質素因而提升了。政府應有長遠的教育規劃，按部就班，不應急功近利。現在教育越來越商業化，對教育是本末倒置。校長像CEO多於教師，花時間作宣傳、交代、籌款等推廣工作，而不是教育工作。在教育商業化下，投訴文化也衍生了，扭轉了從前尊師重道的思維，令一些家長和學生抱着「顧客永遠是對的」心態，待學校教育如商品服務，特別在自負盈虧的課程，如學券制幼兒園、大學副學士、直資中學。雖然權力意識提高了是好事，但老師們要有權威、專業形象，才能把教育傳授工作做得好。

筆：那麼有何建議改善教育工作和教改過急帶來的後遺症？

馮：政府應視學校、教師為夥伴，善待老師，增加穩定性；政策不能操之過急，要有長遠規劃和先後、優次的排列，先集中人力物力做好較急需的；不能蔓延商業思維，要強化教育基本目標，就是培育好學

生；提高教師地位，吸引更多人投身教育；推行小班教學，使老師工作穩定，可專心教學；資源供給要穩定，不要太短視，要運用得宜，不應投放過多於行政報告工作和過量的監察。

筆：對於回歸前後的教育官，你有何評價？

馮：港英時的教育官，他們變動太少，有些政策過時守舊也不理會；對李國章和羅范椒芬的評價，則是用心良好，但好大喜功，忽略現實狀況，改革推得過快；至於孫明揚，他表示他願溝通，但較為安於現狀，甚少肯糾正前官員推得過急的政策，進取心不足。

*　　*　　*

受訪者：程介明（香港大學教育學院講座教授，香港大學校長資深顧問）

筆：看報道常指出新一代大學講師士氣普遍低落，對前景黯淡，在你眼中這又是甚麼一回事？

程：講師可自己設計課程，體現學術價值。講師有些叫助理教授，薪酬不低，工作穩定，因採用三三制，一是不續約，一是獲長工；但他們看不到前景，不確定何時升職，因大學沒設退休年齡，年紀大的教授很多不退休，令後來的晉升機會少了，而評核標準又常變，令人難以捉摸。

筆：有批評副學士是濫發大專學位，令大專畢業生貶值，課程質素又沒保證，對窮人又不公平。你有何看法？

程：副學士的設計不是保證升上大學，但香港副學士能升上大學的

比例已頗高，比美國的9%高很多。副學士是私營機構提供，窮人可借錢讀，學費經市場調節，有資助給個別窮學生，但不多，因不納入成人教育。

至於是否濫發學位，香港趨勢是越來越多的人能讀大學，像考警察，以前小學四年級畢業的都收，現在很多是有大專學位。現在看大學生，不是看數量，而是看從哪間大學畢業和哪科畢業，是看品牌。大學生多了，對市場供應多了，出來的薪酬必比以前的畢業生低，因以前社會是金字塔，只有少數精英在上層，現在則各行各業的前線也充滿大學生，所以大學畢業生薪酬比以前低是教育趨勢難免的。

筆：大專的撥款模式和結構是否過份依賴政府？政府近年不斷削減經常性經費又有何影響？

程：以前大學較少，政府負擔較少。現在大學多了，學生多了，政府的負擔大增，所以規管多了。政府對大專的撥款模式分為一筆過撥款和逐項條目撥款，而香港大專是以逐項條目撥款較多，那是控制性和指令性較高的。這使學校欠缺靈活、效率，因一獲撥款，便要跟足條文，即使情況有變也不能改，包括收生數量、課程設計，在三年內不能變。一筆過撥款則給予大學足夠自由性，課程設計有自主權。

撥款總數沒有增加，但撥款的競爭性大了，使大學不能再依賴政府撥款，而要出外籌款，這也是政府的原意。可是商界的支持少，大學在政府以外可得的資源很少。不過這也使大學對外界的透明度高了，讓外

界知道大學在做些甚麼。

筆：大學評核職員的模式有否問題？

程：評核機制看三方面表現。首先是研究表現，這是量化的，包括在指定機構發表的文章，文章的影響力和引用率；這令教師忙於做研究，投放在教學的時間相對少了，對教學質素保證少了，因研究和教學難以同時兼顧。

第二是教學評估，用學生作評估。但當處理不好會變成學生和導師間的談判籌碼，令導師可能為討好學生而給少點功課和評分時手鬆點。用學生作評估本身沒問題，但取決於如何運用評估。

第三是服務評估，即社會服務，用知識幫助社會。但服務是否負責任、教學是否有深度、知識有否貢獻社會是難以量度的。這種評核是有意思，但如果變成建制，不理評估以外的因素，便不太好了。

筆：大學進行科研是否面對很多局限？令科研發揮不理想？

程：香港科研經費佔GDP很低，是需要增加的。這可能和政府太着重金融而忽視其他有關。香港的禁忌不多，對做科研提供很好條件，政府應增加對科研的投入。科研分上游與下游，下游對社會有直接貢獻，如醫療方法和新藥物研究；上游則是對長遠有影響，例如新科學發明、新器材發明，科研是世界性的，對整個世界和區域的探討。香港做科研的學者很多，但常缺乏經費，浪費了人材，形成一個香港學者常到外國做科研的趨勢，令香港帶動周邊科研和區域素質的條件降低了。

第二章　政府政策自製混亂

殺校風波

每年總聽到有學校因收生不足而瀕臨被殺，使學校平時要各出奇謀，以免有日殺校遭遇降臨。但可笑的是，殺校這個使到人心惶惶、教師不能安心教學而要顛沛流離的去作推銷工作的政策，是政府一時計錯數才出現，原來根本是一個不必要的政策，卻每年折磨着千千萬萬名家長、教師和學生。

政府在上世紀90年代時評估2001年香港的生育率為2.1，即一成年女子平均生2.1個小孩，需要大量興建學校以應付未來需要。但到了2001年，實際生育率只是1，但大量新的學校已落成，恨錯難返，只好推出殺校政策去拆毀多餘的學校。其實政府可順水推舟推行小班教學，那麼便不用殺校。可能基於政府官員對教育認識不深緣故，不清楚小班教學的好處，或太市儈，凡事只以錢而非教學質素作出發點，不肯推行小班教學，選擇鐵石心腸地推行殺校政策去彌補當年計錯數的後果。

當然小班教學不百分百保證教學質素一定大幅提升，但確保了教師能更專注於每位學生。只要實行小班教學，放棄現有大班教學模式，即不應只是老師讀稿，學生搬字過紙的照抄筆記，而是趁學生人數少了，多進行活動教學和深入的小組討論，那麼香港的教育質素必大為提高。

教局也過於官僚，只懂「殺殺殺」，卻不會從實際情況考慮個案。例如地點偏遠的梅窩，只得一所正統學校，但教局只懂按成本辦事，強要殺梅窩南約學校，漠視居民的切身處境。而之後的正生風波，源頭乃來自教局強殺梅窩南約學校。

官僚心態，不推中學小班

2010年本港有75,000名新學童，預計到2016年只有53,000名，但政府也不肯借此契機推行中學小班教學。不知是否和孫明揚快近花甲退休之齡有關，怕中學小班的效果不好，便要背鑊，有損一世聲譽；抑或政府高層信心不足，即使教協做的調查指出99.6%教師贊同利用人口下跌的機會去推行小班，政府也只是「花弗仔溝女」——拖得就拖。教局和孫局長一副「無為而治」的態度，是因他上台時，Donald政府已是看守政府，加上沒政黨法，政府不是執政黨，沒延續性，也沒有自己黨的監察和壓力，當任期屆滿便可「拍拍籮柚」走人，無後顧之憂，因此在任期最後階段，往往不敢有大作為，不敢作長遠規劃，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把具爭議的問題留給接任政府。

說實在，政府常說中學小班會令教育開支大增也有誤導之嫌。首先教育質素難用錢來衡量；其次小班可解決因出生率下降而變得供應過剩的教師問題，政府可省回一大筆用於肥雞餐的開支。

幼兒園學券制

為了減輕全免資助學童幼兒園學費的負擔及財政支出，在政府於教育上的功利主義再發功下，以學券制代之。但政府不明白，教育上的投入不能單用錢去量度，效果才是最重要，如果減低支出，而效果不變，何樂而不為？但如若為了減低支出，而不惜令成效大減，無形損失更大，因為教育是維繫社會文明，以及保持社會競爭力和質素之條件。話說回頭，政府推出學券制補貼後，換來的是眾多幼兒園紛紛大幅加學費，令家長負擔大增，補貼得不償失，家長們成為受害者。這是由於教育局推出政策時極為粗陋，沒有政策上的配套，沒限定幼兒園不可大幅加學費或必須增加學位供應。教局在推行政策時沒看清市場的供需求，好心做壞事。

大專教育

在大專院校方面，學生對教學人員作的評估調查，直接作為教學人員分花紅和升職的參考。為了收入和前途，教學人員有時難免要想盡辦法討好學生，甚至巴結他們，不敢過於嚴厲。當我們批評大學生水準日漸低落的時候，有否想到這和政府的教育政策有關？而這樣的評估方式除了為教學人員徒添不必要的壓力外，也間接否定尊師重道的精神，把教學人員當成消費產品多於師表。交學費就像學武學藝一樣，是出於尊師重道，是出於讓武館/藝館得以生存，而非消費。可是政府帶頭把教學變成消費，把交學費變成買服務。

第三章　功課考試代表一切

香港的教育太單一化，長期停留於只着重學科成績的思維，忽略了品德教育、創意思維、批判能力的重要性，忽略人應是多元化發展。而學科成績又側重理商科，只重視和地產相關行業的人材培養，如測量師、工程師、會計師等，只考慮如何令本地的地產金融得益，由教育開始已走着經濟單一化的道路。政府這種重商勢利思維，也在其教育政策中完全反映出來，令教育政策傾斜，弊病叢生。

現在判斷教育是否成功，學生是否優異，只從他們的考試成績衡量。一間學校是否成功，只看該校學生於公開試的成績，完全忽略品德教育、人文精神、運動音樂等方面。學校為了學生能考取好成績，不斷透過功課和測驗去催谷學生，使學生由小學起，每天也應付十多樣的功課、默書和測驗，連吃飯、睡覺、洗澡的時間也不夠，更遑論玩耍散心、多做運動和多培養對藝術文化的興趣，令學識不能多元化。

這也使子女沒時間和家長好好相處，去培養感情和家庭關係，家長亦難以對子女教育書本外的知識和分享人生處世態度及經驗。此亦說明為何時下的子女和家長的關係越來越疏離了。連跟自己家長也沒時間相處，這會影響到子女的溝通技巧和人際關係，使小朋友變成只懂和電子產品、電腦、電視溝通，而不懂得融入群體生活。

當IQ代表一切，考試定生死，自然欠缺對學生們的EQ和AQ訓練，使他們完全欠缺解決困難能力（problem solving ability）。學生得不到全面教育，不能成為IQ、EQ、AQ兼備的全人，遇到困難便會不知所措或放棄。加上部份家長過份溺愛子女，而教育又不全面，孩子的成長自然較偏向一面，所以有甚麼「港孩」現象絕不出奇，但過往的討論只集中在「怪獸家長」那裏，卻沒正視偏向教育的問題。

校園暴力

2010年中大社工系和香港家庭福利會做的調查，1,800名受訪學生當中，有近七成表示曾遭校園暴力欺凌（包括毆打、威脅、言語暴力、性騷擾），當中半數更因此害怕上學或出現憂鬱症引起的痛症，如胃痛、頭痛等。如果學校的教育能多培育學生的德行意識，訓練學生的情緒控制能力，相信校園欺凌數字也會大減。只着重學科成績帶來很多負面效果。

填鴨教育

香港的中小學教育一向只能跟標準答案行事，是為填鴨教育。2010年，IBM（1）訪問了1,500間科技企業的行政總裁，大部份認為創造力為領導人的首要本能。但填鴨教育不容標準以外的答案，只重視背誦，不重視創意及獨立思維，因此大公司的CEO（2）不是外國人，就是「海歸

派」(3)。香港教育文化着重紀律，要聽老師話，不容駁嘴，不需思考，只需跟老師的指令便可，不容半點懷疑，所以香港教育較難培養出色的領導人材，而只能產生出聽指令的工作機器、聽話的奴才。

被國內網民譽為最「牛」的教師袁騰飛這樣說：「教師的責任應是讓學生學會思考，而不是灌輸所謂真相。不容批判的真相，比謊言更可怕。」

求學是求分數

由於考試成績足以定生死，學子們的人生前途由公開試定奪，因此變相不鼓勵老師教課外知識，即使教了，也隨時被家長們投訴為何不教課程以內的學識。教師不能彈性的因材施教，只能把課程照講一次，缺乏因應實際情況的轉變，為教而教，教考試內容成為唯一目的。對於課外知識，認為學子們自行看課外書或待他們長大了才吸收也不遲。可是功課測驗排得密麻麻，哪來時間和精神自行學課外知識？早幾年教局推出「求學不是求分數」的口號，只是宣傳伎倆罷了，全沒實質政策配合，信了宣傳的家長學生等同自毀求學前程。

教育不應只是傳授學子們學科知識、專業技能，還要傳授立身處世的智慧、靈性修養。不論大中小教育，不應只着重為社會提供人材（在拜金主義的社會下，人材與能為GDP作出貢獻、能賺錢劃上了等號），還應着重立人品德、處世態度、人際相處、文明精神、社會文化、關心社區、明辨是非、批判思考、推動社會走向更美好，否則學子們只會追求名利錢慾，而忽略道德、良知、黑白原則。

訪問

受訪者：廖老師（八十後教育工作者）

筆：身為教育前線工作者的你，在教改推行後才開始投身教育業，對於教改，你有甚麼看法？

廖：教改本應是革清弊端，但推行得太過急，令教師無所適從，對學生無好處。

筆：那麼教改推行得那麼急是基於甚麼因素？為何政府想改革弊端，最後卻衍生更多弊端出來？

廖：教改推行得太過急是因推行改革的官員用商家角度看教育。政府希望用最低的成本、最少的時間去換取最大的利益，但教育是要慢慢培養學生茁壯成長，用兩三年去改變整個制度是沒可能的事。現在教改繼續進行，全因官僚主義，為迎合上頭要求才改革，為做而做，一些本來不需改變的也去改變，而不是從教育長遠景象出發。例如母語教學、三三四，是為做而做，根本上沒改變的必要，得出效果不但母語教學沒成功，反增加了家長對英中、對精英制的投向決心。

筆：身為教師的你，現今教育制度對你有甚麼大影響？

廖：文憑教師和學位教師待遇之分別，打擊了教師間的士氣，造成階級之分，令教育團隊不和諧。這根本是古舊制度，應改的卻沒去改。文憑教師無論起薪點還是晉升機會皆比學位教師差，但這制度卻令教師過多時，很多學校皆以文憑教師的待遇去聘請學位教師，令到文憑教師不被保障之餘，學位教師反被剝削。其實文憑教師絕不比學位教師差，但教育

政策卻從制度上歧視他們，令他們受盡不公平待遇，又怎能教好學生。

筆：對於新通識學科，你有何看法？

廖：通識應是心態，不是科目，政府怎可把心態變成科目？學生應以通識心態，全方位學習，多角度思維去讀每一科，而不是把通識劃死為一科。心態是難以被評分的，在評卷時必定出現大問題。中史、歷史、文學、地理等學科由主修科變成選修科，有些學校甚至在初中已不開中史科了，以集中資源去搞通識。但中史是必需的，不知歷史又怎通識？對祖國、對民族陌生，又怎進行國民教育？

筆：除了通識，對於中文的課程改革，教中文的你又有何看法？

廖：現在中文沒有課文，改以訓練學生的能力點。能力點即讀、寫、聽、說的綜合能力。沒有課文，變成學生只懂招式，而沒有內功修為；只有技巧，但沒有內容根基。中文淪為為考試而考試的科目，而不被當作語文去學習。中文科變成只針對考試技巧，失去了學語文的真正意義。以前有課文可以背誦，令腦袋積藏寶貴材料，打好根基，因為中文是一科重語文能力、重修養的學科，不應只針對技巧。現在學生只覺得中文是「唔使讀」、「無野學」，不能培養出對文學的興趣。中文只重技巧是急功近利，也反映出政府的急功近利心態，把之蔓延入教育，荼毒學生。

筆：殺校政策，使教師的工作多了，政府又沒趁機辦小班教學，你有何意見？

廖：出生率不斷下降，學校自然收生不足，為免被殺校，學校於是大搞很多對外marketing的宣傳活動，卻變相把投放在教育的資源時間分

薄了，對學生的照顧更缺乏了。教師應以照顧教育學生為主導，但現在老師們既要應付因應教改的行政工作，又要對外做宣傳，根本無暇關愛學生。其實小班教學可使教師更集中照顧學生、學校不用被殺，教師也不用應付如此多的無謂宣傳，可是政府本着商業心態，不想投放更多資源於教育，死也不肯辦小班教學，用商業心態看教育是大錯特錯，小班教學因沒金錢回報，不能用金錢衡量，政府才認為不值得，卻忘記了學生有更多照顧，教育質素上升，便是回報。教師連飯碗也保不了，怎教好學生？

政府判定學校成功與否，只懂從學生成績來衡量，太片面。以成績代表一切是抱着消費者心態看教育，忘記教育本質乃培育學生成為才德兼備的人。而且現在的學校由於資助不足，要自負盈虧，辦課外活動和興趣班要收不少費用，令貧窮學生被拒諸門外，甚至成為被針對和冷落的對象，而老師因要應付過多無謂的行政工作，不能照顧他們，令這些學生在家庭、在學校缺乏溫暖和照顧，只能以吸毒、結交損友、援交去得到開心和自信心，認為有錢才有尊重、才會有更多人關懷和學習機會。

註釋：

(1) IBM即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乃一美國上市的跨國資訊服務公司。

(2) CEO即Chief Executive Officer，中文為「首席行政總裁」。

(3)「海歸派」即「海外歸來人士」的俗稱。

第四章　對窮人不公

要進入名校接受公認的優質教育並不容易，因在計分制下，自己本身或有親友份屬富貴，會較有利；住在名校區網亦較有利，但由於名校區網的樓盤往往是昂貴的豪宅，變相令貧窮的市民較難入讀名校。再者現在收生着重學前培訓，學生未入讀學校已經需要報讀和學習大量興趣班、培訓班、語言班、雞精班，反智之餘也令沒錢報讀學費動輒幾千幾萬元的學前班的窮人卻步。窮人要讀名校，除透過自身努力考取好成績，便只餘津貼學校的名校了。

傳統名校多集中在九龍塘、中西區、南區、何文田等豪宅區，而住在偏遠的天水圍、將軍澳的窮學生，縱使成績好，也難負擔交通費去傳統名校區就讀，出路狹窄。

可是自從2006年起，又是錢作怪，政府為減輕負擔，教育局鼓吹大量津校轉行直資。而直資實行校本管理，政府不用直接管理，減輕行政和資源負擔，讓學校自己處理問題，把教育責任完全放手給學校自理。加上政府強逼教會津校成立「法團校董會」去控制教會中學，減弱教會學校自主性（這看到政府一方面放下管理權，一方面對有戒心的辦學團體收緊權力），令很多學校在教改進行後，為避免收生不足而被殺，轉為直資，當中包括不少傳統名校，例如聖保羅中學、拔萃等，令

窮人的選擇更少。而直資學校有收生自主權，自然優先收取一些有地位和家底的富家子弟。窮家子弟出路窄，除了先天性因素，還有政府後天的政策造成。

現在因為政府要全港官津中學劃一「自願」縮班，使一些像皇仁的官立名校，在人口密度高的區縮班減學額，進一步阻礙窮學生入名校之路。前天文台台長林超英也直言：「學校直資化如今已經變相是貴族化，令基層家庭子弟要讀好學校的機會也大大減少，現在政府要官津學校一刀切（縮班），令他們連想憑好成績入讀所剩好學校的機會也剝削，這實在是沒理由。」

窮人本身社會地位已很低，加上由求學時已面對政策帶來的種種不公歧視，向上流機會大受限制，在起步點已大幅落後於人。這是跨代貧窮延續的主因，因接受良好教育本是窮人可賴以脫貧的渠道，現在連渠道也欠奉了。如若大家不希望社會過份充斥弱肉強食的局面，想社會平衡一點，必須正視教育政策上的謬誤。

中國人有句說話叫「三歲定八十」，對於窮人的確是三歲定八十，甚至三日已定八十——出生的時候是貧窮，差不多注定一生都貧窮了。

副學士

副學士是另一個飽受教育界批評為對草根學生不公平的制度。政府為求達到更多人口是大專畢業生的目標（當年董建華更曾許下七成港

人是大學畢業生的宏願！），以及給會考和高考成績未如理想的學生更多晉升大學的機會，便開辦副學士課程。政府有偉大宏願同時，卻滿腦子充滿縮數，「又要威，又要戴頭盔」，一方面希望社會能出現更多大專生，一方面又不想出錢達成效果，便要求院校以自負盈虧的方式開辦副學士課程。這樣一來政府不用出錢，更多大專生的目標可達成，而對開辦課程的院校來說，又多了作育英才和賺錢的機會，可謂一家便宜兩家着。

但問題關鍵便正在於「自負盈虧」四隻大字。由於要自負盈虧，副學士課程學費難免高昂，絕不比學士課程便宜。加上政府彈出一句自負盈虧後，便撒手不管，沒作好監察工作，令副學士課程質素良莠不齊，非常參差。課程好壞只取決於辦學機構的態度，質素無從保證。政府沒作好監察工作，只懂叫私營機構開班，乃忘掉了作育英才乃教局天職，連監察工作也不做，是有違教局之責。所謂的副學士，是政府政策下一樣重量不重質的投機而已。

草根子弟如欲繼續求學，只好借貸報讀課程。可憐的是，隨着大專生普及化，不再是天之驕子，即使畢業也不代表康莊大道在眼前。連學士畢業生也只能從事一萬幾千月薪的工作，副學士畢業生能好到哪裏？加上政府沒為副學士課程爭取到足夠社會認同，才會有調查發現副學士生的認受性，在企業眼中只和中三畢業生差不多。雖則報讀不報讀副學士課程是個人選擇，但教局欠缺監察、配套工作不做便大推副學士課

程，也是魯莽失責之舉，反映管治當局並非民心我心。可憐一班草根莘莘學子一畢業便未見其利，先見其弊，還未得到合適工作便先背起十多萬元的借貸。

政府的副學士政策除了令成績較遜的學子們延遲進入社會工作及吸收工作經驗，以彌補成績上的輸蝕，以及製造更多負債畢業生外，實見不到任何客觀上的良好效果。如果教局局長能民心我心，豈會未作好裝備便魯莽推出副學士課程呢？

政府政策自製混亂

中學不減班便要面對殘酷殺校的假自願縮班風波，起因於政府逼官校起帶動示範作用，一刀切減班。但窮源竟委，源頭可追尋到教局死不肯推小班或中班教學之故。教局如肯順應民意，不再對小班教學的共識裝聾作啞，又怎需面對現在的難破棋局？孫明揚裝腔作勢的解釋政府不推行中學小班教學原因，乃每年教育開支會因而由200億倍增到400億（又是錢作怪）。但裝模作樣是經不起考驗的，在多番追問下，孫局長才承認數字只是隨便說說，欠缺實際數據支持。不知是教局處事兒戲，

還是故意裝瘋扮傻，以此來否定小班教學是不負責任所為，是自毀誠信和公信力，造成教局與家長們之間無法修補的裂痕。

另一個因政府政策混亂而自找麻煩的例子，是2010年底審計署炮轟直資學校財政混亂而引起的風波。其實早在2009年的臻美黃乾亨學校已發生過同類情況，只是今次揭發更多學校賬目不清，而且規模較大。但政府卻沒從臻美黃乾亨學校事件中吸取教訓。教局從沒發出嚴正聲明去列出哪些事情是直資學校不可做和投放資源在哪些地方是不容許。教局從沒訂下正式規例讓直資學校知道哪些是違規行為，只發出一些沒約束力且含糊不清的所謂指引，那麼直資學校在不清不楚、灰色地帶滿佈的情況下，當然財政管理便未如人意。而直資學校賬目出現混亂，教局監察不力乃必然原因，因教局從沒認真列出過規矩來。

精英教育的漏弊

香港普遍學校實行精英教育，把最好的教學資源和導師集中培育一批成績最好及質素被認為最好的數十個學生身上，期望他們在公開試和校際比賽獲得好成績、為學校爭光、為學校貼金。但這違反有教無類的教學精神，對領悟力和成績相對較低的學生不公平，因他們人數較多，但獲得的資源和照顧卻較少。且在精英制下，其餘普通學生會被標籤為低人一等，被視為遭放棄的一群，打擊他們自尊心。

當中有些因受盡白眼和不公平對待，在缺乏照顧及輔導下，誤入

歧途，去酗酒、吸毒、沉溺享樂以求散心和逃避現實，逃避被標籤的惡果。有些為挽回自尊和別人尊重，在一個充斥着拜金主義的社會下，會認為只要賺到錢，別人便會看得起他們，於是走上賺快錢之路，包括援交、販毒、進行不法交易等。即使不犯法，為了賺快錢和大錢，女的便投身「嚫模」之列，不惜為錢賣肉，此也引發很多少女面試嚫模時，被別有用心的人士非禮、強姦、拍裸照的罪行大增。

精英教育為社會提供一批成功人士的同時，卻是一仗功成萬骨枯，有很多失敗個案墊底。

政府對學校的資助多寡只看公開試成績以決定，而學校成績好壞是看有多少精英，如此政府的資助方式進一步促進精英教育。可是對不公平的教育制度，我們多年來都只是默默承受，只會訴說自己不好運和天資不夠聰敏，卻忽略了教育制度上的缺憾和沒去求變。在求變聲音那麼微弱的情況下，少做少錯的政府會主動改變充滿缺憾的教育制度嗎？

第五章　教育政治化

教育除了教導學生知識，增強利益判斷能力之外，最重要是培養學生道德和擁有一顆有良知的心。但當掌管香港教育之人，甘願為討好權貴而埋沒良知，甚至打壓學生良心，我們能對香港的教育樂觀嗎？「造因之道，首在樹人；樹人之道，端賴教育」。教育背離應有軌道，又怎能培育出社會棟樑呢？

2010年，先有政府把悼念「六四」娛樂化，視嚴肅的悼念行為為娛樂，後有中文大學高層把學生悼念「六四」行為政治化。時任中大校長兼行政會議成員的劉遵義及其管理層，以政治中立為由，拒絕中大學生會把新的民主女神像和反映「六四」屠城畫面的雕塑品放在中大校園，引來社會極大迴響。最後在輿論的譴責和2,000多名中大學生、校友、市民的護送下，新民主女神像得以在中大校園擺放，而校方也不敢加以阻撓。事後劉遵義和校方不肯就政治中立的聲明道歉，是一錯再錯、死不認錯的行為。為何要把擺放民主女神像、呼籲人們不要忘掉歷史的行為政治化？不去徹底追求當年真相、不去為死難者伸冤，就叫政治中立？

擺放民主女神像、悼念「六四」事件，不是政治中立問題，而是公義問題，是大是大非。為死難同胞、為當年大屠殺死去的學生、平民、

軍人討回公道和真相，是公義行為，但以劉遵義為首的一班學者，竟以荒謬的政治中立為由去打壓學生們爭取公義、伸張正義的行為。真正的政治中立應是能提供一個公正的平台，讓不論支持或不支持平反「六四」的學生都能暢所欲言的發表意見。身為全國政協、行政會議成員、國務院智庫成員的劉遵義去說政治中立，不是雙重標準、寬己嚴人麼？劉遵義真是那麼「中立」的話，為何他在任期間，中大向前特首董建華和政務司司長唐英年頒授名譽學位？他如何解釋此等政治獻媚的行為？

2010年6月，天水圍妙法寺陳呂重德紀念中學向中五班家長發出通告，要求同意子女參加撐政改的「政制向前走大聯盟」遊行，學校將安排旅遊巴接送，整個活動歷時5小時，將計算入通識科的學習經歷時數內，通告上未有提供「不同意參加」的選擇。校方職員表示，若學生未能出席活動，家長需在手冊上寫明缺席理由。而同一時間，傳媒爆出東涌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有教師投訴，校長以教師專業發展為由，要求教師參加政改遊行，否則需向校長解釋原因。教育應是提供不同資訊讓學生自行思考和批判，而非強暴的灌輸，甚或強逼學生跟隨校方的表態，不容獨立思考和不容批判校方的立場。支持政改不是問題，每人也有自己一套看法；而學校為了得到政府注視，向政府獻媚，雖操守有問題，但也只是個別學校選擇，但為了獻媚而出賣教育真義，則枉為人師。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顧炎武說過：「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世衰道微，棄禮義，捐廉恥。」五代文學家馮道：「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敗亂亡，亦無所不至。況為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為，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可見學者無恥是有辱國家和關乎國家的興衰。

公義不會被埋沒，但良知卻可因向極權獻媚而出賣。可惜一些守着教育重任的學者為了保存地位，不惜淪為強權打手、不惜喪失廉恥的作拍馬屁小動作，卻忘記了自己應肩負甚麼教育重任，埋沒人格。加上香港的教育局由漠視法紀與毫無誠信的孫明揚任局長（看他的僭建物事件，以及如何辯稱洗腎不是病和講大話說英皇與皇仁是自願縮班便可知），和由奴性盡顯沒有良知的謝凌潔貞任常任秘書長（看她的無恥六四沙石論，幸好公道自在人心，沙石論的劣評如潮和敢於台上對謝太說出「六四注定有個了結」的學生獲得掌聲如雷，證明大家還是懂得分清是非黑白的），怎令港人對教局高官們有信心？幸好香港還有一班大學生、熱血市民沒有忘記禮義廉恥，繼續為爭取公義出力，不致使香港衰微。

第六章　通識教育

何謂通識

通識是把各種資訊融會貫通，再透過批判思維建立自己的價值觀，包括對錯、是非判斷和利害分析。可是時下社會對利害分析的比重越來越大，對是非對錯判斷的比例越來越小。如通識不走出犬儒主義及功利氛圍，只會強化下一代只問利益，而少問是非的態度。但現在的通識評分只是「剔point」，只着重成效利益，難培養是非觀判斷，且還把每件事簡單二元化，只分為正與反，不是真正的「通」，非友即敵，根本地妨礙了下一代客觀多元理性思考的培養。

政府政策矛盾

教育局表明通識教育是着重創意思維，但歷史、地理卻不是必修科，甚至有些學校在初中已放棄那些學科。又沒有文化、藝術等學科，學生根本沒有足夠的學識素養、文化知識作根基，又怎通識呢？最後只會流於思而不學。

教評局卻表明通識科的考試評分標準不包含創意思維，這等於打了教育局兩巴掌。教評局不肯把創意思維納入考試評分標準，相信是因為創意思維難以判斷優劣，為免麻煩和爭端，便索性不理會創意元素。

但這樣倒不如不搞通識吧，沒有創意思維，哪來獨立思考，哪來通識？最後只會變成老師和學生揣摩教評局的評分標準和要點，變成是揣摩標準答案，淪為學而不思。通識教育如此走下去，只會變成填鴨風氣難戒掉、知識沒增長、批判思維沒深化的三不象。

訪問

受訪者：王建元（通識教育推廣及發展協會主席、樹仁大學英文系教授及系主任）

筆：三三四制實施後，教育局於高中階段推行必修的通識科，其實理想的通識應是怎樣？

王：實行通識的方向是對的，自己一向不贊成分開文科理科。實行通識，最低限度能文理互通，希望改變理科是較優越的價值觀。通識列入必修，令老師學生手忙腳亂，是因進入通識，就必須博覽群書。但現在已很少人看書，書要圖文並茂才有人看，師生也欠缺讀書風氣，這因香港教育制度從來不重視或要求學生廣泛閱讀課外書。坊間推出通識天書是與通識理念背道而馳，但通識是激起讀書風氣的契機。

「通」即通達、通才和貫穿，大學的通識做到跨學科，混合美國的博雅教育以擴闊視野，又滲入英國專才教育元素；但不論讀甚麼學科，質疑性是必備的，但不多人具有此思維。通識要時刻對既存範疇作出反思和質疑。通識不是常識，不是把學習課程用不同角度審視，再加上自

己意見就是。通識要反常識，因事情不是理所當然的，老師要帶領學生有批判性，思考要達至逆直覺。要反常識才可以轉，要逆直覺才能通，不被既定思維限死，要通才能識。通識要將資訊轉成智慧，將資料增值和消化，達至對某事物有見地的了解。

筆：香港現在的通識科有甚麼弊端？

王：中學通識分開做六大範疇，首先已狹窄了範圍，且各個範疇是分開的而不是打通；但不打通各樣範疇，又怎叫通識？

通識是必修科，影響入大學的機會，但老師難立體評分，因沒有評分標準，即連陶傑也不合格。教育制度看低教師地位，通常入不到大學的才入師範，因師範地位比大學低，在制度上已看低教師，那麼教師質素怎會普遍地好？怎把通識教好？現在老師太多額外行政工作，退卻教師熱誠，也令教師缺乏時間去廣泛閱讀，這又怎教好通識？

筆：現在即使大學畢業生，普遍也難覓得人工高的工作，起薪點低，晉升機會不多，很多學子為了確保工作前途，只好繼續進修，讀更多學位，或於更有名的學校進修，這種「消費與被消費文化」，是否扭曲了教育本義？香港教育文化是否成為了功利主義的產物？

王：香港的教學成為消費文化多於教育一個人怎去做好一個公民。由入學前的培訓班，鬥入名校，愛名牌效應，希望交了多少學費便有多少回報，令讀書變成一種消費。即連大學也搞消費文化，傾向取錄可令其賺多些錢的外來學生，開一些着重學費收益的課程，首要是交得起學費才能報讀，對草根不公。

第七章　國民教育

回歸前的公民教育，其指引已概括了民主教育、人權教育、國民教育、法治教育和全球教育，是有廣泛性。但現在政府提倡由國民教育取替公民教育，是以單元性取替多元性，不利學生的多元吸收和全方位啟蒙思想之餘，也是根本地對民主、人權、法治等價值觀的輕視；也使學生在全球化的趨勢下，反其道而行的龜縮於本土，令視野狹窄。

國民教育與通識教育互相矛盾

國民教育會否成功，非取決於政府的決心和資源的投放，而是政府推行教育時的心態。如若國民教育還是採取報喜不報憂的路線，選擇性的報道有利執政者的新聞而不報道不利的，只會得不償失。在資訊發達、獲資訊渠道越來越多的高科技年代，學生已習慣從不同媒體和互聯網大千世界去覓資訊。如果政府不改國內國民教育中，普遍採用的報喜不報憂的教導方式，會被認為是企圖進行洗腦教育，招致慘敗。

政府也要切記答案不能有統一標準，在敏感問題上採用選擇題形式(如評論領導人的功績)，只會鼓勵背寫，不重批判思考和自由思維，與通識教育背道而馳，不單會暴露教育局教育思維混亂不一，或過於着重政治考慮，還會斷送政府的公信力。但觀乎政府以國民教育取代更全面

的公民教育舉動，顯示出政府心中的教育只是政治機器，國民教育難容樂觀。說到底，報喜不報憂的國民教育志在培育一批易於管治、不甚獨立思考、盲目支持政權的人，要他們忠君愛黨。但當學生們從客觀事實分析時，課堂上報喜不報憂，以及強制的主觀灌輸，徒添他們反感，強灌式的國民教育注定不會成功。

不管是否國民教育，教學也應反映社會最真實一面，而非偏重任何一方；進而透過反思，分析哪些地方有缺失，應改進；哪些地方有優勢，應保衞和加以發展。

通識教的是「居民」身份認同，但國民教育則是「國民」身份認同，兩者並不協調。政府的「國民」定義是以身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為榮，以建立中國人的自豪感，乃肉麻地暗地宣傳愛黨才是愛國，以及在排擠台灣、印尼、馬拉、新加坡等海外華僑，難道他們不算中國人？為何政府不強調唐人、漢人、華夏民族身份呢？是否過份的「擦鞋」呢？政府的公民教育委員會連「國民」定義也沒定下，又怎推廣國民教育？是否在敷衍「阿爺」了事？

丁、政治

第一章　中央與香港

行政主導

中央希望香港能實行行政主導、精英統治、保障大資本家利益；撇除支持中央政府不提，這是中央對香港要求的三大原則。中央回望殖民地時代的成功，在於那時實行行政主導，即所有政策由港督策劃，然後由效率高的公務員執行命令；以及港督兼任立法局主席，高官兼任立法局議員，非官守的議員則由港督委任；而司法高官也由港督任命。這種模式合符中共一黨專政和三權合作的制度，故堅持香港要行行政主導制。港英時代的精英管治取得成功，加上資本家的投入令香港繁榮，中央想香港保持優勢，深信要保留行政主導、精英管治、公務員體制和資本家利益才能。

北京希望保留功能組別，便是用此來沖淡泛民於立法會的6：4黃金比例，令立法機關不能對行政造成衝擊；而北京又認為功能組別能維持精英管治，可是當事實反映那班專業人士並非想像般精英時，態度也開放了，如容許功能組別的選民基礎有變和超級區議員的出現。北京保留人大釋法權，就是希望司法最終能保住行政威嚴，保護行政主導。至於讓大財團能在選特首和政府上有決定權，是希望透過給予特權，令華資留港投資以促進經濟、因而處處保護大財團利益。

保護資本家利益

50年不變的承諾，除了要穩住港人信心，也要穩住外資和大財團信心，確保它們的利益不受損，而《基本法》也列明要維護資本家利益。有些人不明白為何「阿爺」會容許大財團壟斷香港的一切，各行各業由幾大財團包辦大部份市場，這是因為有利於北京控制和管治香港，要香港受控，要香港人聽話，只要令到控制香港大部份資源和各行各業的幾大家族和富豪合作或聽命便可。當然要財團和超級大富豪合作，難免要給予他們一些特殊地位和特權，把他們包含在統治大聯盟內。

只要和大財團保持良好關係，香港人能不聽話嗎？香港人的衣食住行，有哪樣能不光顧大財團的？香港的資源，有哪樣不是大財團控制的？香港人，有誰自己或身邊的親朋不是在大財團打工的？一日大財團能壟斷香港，一日能保證香港人無法作反到哪裏去！

港人治港VS庸人治港

中央樂於見到一些唯唯諾諾、百分百聽話的人作官員，聽命為先，才能為次。如才能高的，會為其拉動班子，栽培政治和參選資本，按筆者愚見，梁美芬能組成西九新動力，從而當選立法會議員，背後豈沒有無形之手幫助之理？至於才能較低的，安排在一些爭議性較低的職位便可。按筆者愚見，曾德成能當上民政事務局局長、唐英年能官運亨通、霍震霆能長駐體育文化藝術界立法會代表一職，背後豈會沒有勢力人士

扶持？偏偏申辦2023亞運卻由他們負責。而筆者大膽冒犯說句，假若唐唐能成為特首，此等奴顏媚骨治港，將會是「庸人治港」和「傭人治港」(聽話之人、唯命是從之人治港)，掩蓋港人治港特色(註)。

再看唐英年發表反問異見者「為何不想想自己做不了下一個李嘉誠」的言論，以及當中無知地或埋沒良心的否認地產霸權的存在，便知此等人做高官非港人之福。筆者奇怪為何要做李嘉誠？他旗下集團的壟斷行為，以及說「『日出康城』一帶空氣令人心曠神怡」的言論，早已為人所不齒，即使家財萬貫又怎樣？不是忠直之士是不會令人心服的。唐英年是忠實拜金主義者，把利益放於道德上，坦白說，以唐英年之才能，沒有父蔭，他能當上政務司司長嗎？政府平常對民意偏聽，以致政策期望常與公眾有落差，現在高官叫人聽政府的話，不是痴人說夢嗎？

人材錯配

這也引伸另一問題——人材錯配。曾德成長期在《大公報》一間報館工作，長期在同一系統辦事，嚴格來說，他連當新聞處處長也會引起質疑，現在竟負責管理全港的文化、康樂和體育，自然難以交出好成績。除了因為他是根正苗紅外，實想不到為何特首會委任他作民政事務局局長。這種只問政治取向，少問個人能力和專長的委任方式，導致人材錯配。

訪問

受訪者：程翔（資深傳媒人、新加坡《海峽時報》駐中國首席特派員，2005年曾因涉嫌間諜罪於廣州被判監禁5年）

筆：一國兩制對香港是甚麼一回事？

程：一國兩制是把很好的尚方寶劍，除了國防和外交，中央給予香港的空間很大，只在於香港政府懂不懂運用和夠不夠膽運用。但政府內的政治人材不多，夠膽的更少，往往只從一國去想問題，沒把政策精神發揮得淋漓盡致。

在政改方面，於一國兩制下，香港可走先一步，但因政府缺乏魄力和膽識，變成凡事要中央首肯才被動的推出。

筆：為何政府如此缺乏魄力和膽識？

程：整個香港社會對政治不太投入，尤其是上一兩代人，由內地移民來港，是過客身份。當上一代人有份在經濟發展參與，才多了人參與政治。到中英談判，應是港人政治醒覺時，但港人在談判過程只能從屬中央意向，使香港沒有一個環境去「谷」政治領袖人材。而回歸前一切皆由港督和英國決定，公務員只是執行命令，故沒有培養政治人材。回歸後，北京只需要令其放心的人，越無政治才能越好，越無獨立思考越好，越聽話越好。因此特區政府沒有政治領袖去發揮好一國兩制給予的空間。

筆：一國兩制對香港的民主發展是障礙還是推動？

程：當政府不主動利用一國兩制給予的空間去發展民主，香港的民主步伐便由北京指揮，而北京是不想香港民主步伐走得太快。北京的顧慮是港英在上世紀80年代開始搞民主，像在其他殖民地，如印度和巴基斯坦搞民主，去為將來埋下一個沒有英國人的親英政權，這樣香港可能變成反共基地，令北京擔憂。再者香港是資本主義社會，如民主步伐太快，可能出現免費午餐，影響資本家利益，所以北京認為港英搞民主是充滿陰謀。

只要確保選出來的人符合北京「愛國愛港」的準則，北京不怕香港有民主，所以初初答應07/08也可以普選，但後來發現07/08還不是時機，才推遲到2017/2020。不過北京只是「文字」上准許直選，因普選的定義還未定，看2012年的選舉安排，北京是有意更改普選的定義，有意保留功能組別。

筆：為何回歸後，政治打壓事件不斷增加？

程：北京是不喜歡香港常常出現示威。特首權力來自北京，變相唯北京馬首是瞻，要做一些討好北京的事，便去打壓那些反對聲音。

筆：回歸後香港在經濟上要依賴內地，香港政府有沒有在人權保障和政制發展上進行一些動作去答謝北京？

程：有出現這情況。隨着中國經濟地位不斷上升，各國對中國都有顧忌，連美國近年也不敢向中國提出人權問題。身為伸手派，樣樣問北京和常要北京打救的特區政府也不例外。為了答謝北京給予優惠，特區

政府凡事也聽北京話，把一國兩制給予的自主權拱手讓給北京。特區政府向北京拿着數，連內地省市政府也看不起，有廣東省市領導人公開嘲諷香港沒甚麼了不起。

筆：港人治港有否落實？還是只是表面化，內裏是京人治港？

程：中央不會直接向特區政府落order，但會透過管治班子的換班，確保委任司局長是百分百聽北京話的人。所以有些沒有才能但聽話的人，會被任命為政府高官。在立法會方面，北京會為聽話的候選人提供大量資源或動員人手去為他們助選，以確保愛國愛港陣營能當選。

筆：為何回歸後敢批評內地的新聞和傳媒也越來越少？

程：對於中共來說，傳媒是筆杆子，而中共起家是靠槍杆子。對中共來說，筆杆子是奪取政權的兩大法寶之一，所以要把傳媒控制，保證傳媒執行中共的方針。對於香港傳媒，則透過統戰手法籠絡，例如給予傳媒的老闆政協、人大等地位，給予傳媒經濟收入，如落廣告。這會令傳媒「自律」，在回歸前已這樣。當傳媒報道影響到中共一黨專政地位，更會去打壓那些披露內地尖銳問題的傳媒。

筆：香港發展民主對內地有甚麼影響？

程：香港這百多年來一直促進中國在政治上的進步。太平天國的天朝管治模式是洪仁玕在香港參透出來；百日維新時，康有為與梁啟超參考了很多香港管治的模式；孫中山的革命思想來自香港；國共內戰時，在野共產黨也利用香港作為宣傳民主的基地；到今天，內地不能出版的

禁書，在香港可以出版。香港被英國人統治了那麼久，反而是中國最自由的地方，因此中共怕香港民主發展起來。

*　　*　　*

受訪者：劉銳紹（資深傳媒人和時政評論人）

筆：究竟香港有沒有一些政策，不是特區政府策劃，而是中央政府希望在香港推行，然後要求特區政府執行？

劉：2003年廿三條立法，在未被否決前，北京以死命令方式要求董建華確保立法會要夠票通過，當時泛民只得25票，按道理政府要拿取30票去通過廿三條並不難。當時董建華提出過那時香港還未適合為廿三條立法，可是北京命令不能改，因為北京一些官員思維認為強行通過也不會有問題，因香港不會亂，即使亂，也有解放軍作後援。最後田北俊突然辭任行政會議成員，在自由黨表明不支持下，北京沒辦法才撤回立法，足證北京想用行政手段影響特區政府。

2005年董建華落台，曾蔭權上台，公開理由是董建華身體不好，但2004年董建華去過瑪麗醫院做身體檢查，報告指董建華身體良好。雖然2003「七一」後，民間倒董聲音大，但非主因。當時背後不同集團在計算如何延續利益，下任特首如何延續政府有利工商界的政策，北京聽取各方面意見後，決定讓董建華下台，和國內調走省委書記模式一樣。

筆：北京管治香港思維是怎樣？

劉：確保行政主導，一國兩制成功和香港不受外國勢力影響是北京

管治香港思維。行政主導是確保政府控制一切；一國兩制是香港跟隨中央政策，以向台灣作出示範，因此經濟差時，中央會打救香港，以起良好示範作用。而一國高於兩制。

至於香港不受外國勢力影響的定義很含糊，因香港人自發要求民主自由，都被北京機械式的以為一定和外國勢力有聯繫，因北京認為民主自由是外國價值，但對於香港人，這是普世價值。這會令矛頭集中向勾結外國勢力，忽略香港人的民主訴求。

筆：回歸後北京對香港的管治態度有否改變？

劉：香港回歸時，北京不太知怎去管治香港，董建華乃無兵司令，心中不知怎去管治。回歸5年後，北京知香港不會亂，不會作反，最多是上街和平示威。北京對香港信心大，但不等於完全放手。2003「七一」後，北京認為要多聽香港各界聲音，要去接觸平時沒有或少接觸的人，之後第一次中聯辦公開接觸公民黨。北京派人來香港聽意見，是要意見如實反映，不要再有文字修飾，使北京感覺不到香港真象。至此，北京的接觸渠道擴大了。所以這幾年來北京有和不同的民主派接觸，甚至不排除和激進民主派接觸。北京現在願意做姿態去改善形象和增加溝通渠道，如安排全體立法會議員到內地，這些表面工夫以前不會做。可見北京在管治處理手法靈活了，但政策沒有變，還是行政主導。

我們也不應機械化地認為跟有關部門接觸便是壞事，便是被收買，因事實並不是，要看個人造化。這是簡單化看問題，除非用武力革命、

否則要爭取階段性目標，不能流於空想主義，一下子便以為可到達最終目標。極端行為只是拉攏支持者的手法。但北京的統戰手法頗差，接受統戰的全是講金不講心，只講利益，統戰效果只是聚合一批以利益為主的人，不是一批真正同聲同氣的人。

筆：香港對中國有何利益？

劉：任何一個政府不會從管治理念去看施政，而是從利益思維去看施政。香港價值是體現於台灣，起示範作用，以利統一大業。

香港是外資進入中國和內地中小企業進軍世界的橋樑。香港外向型經濟結合對中國經濟有莫大好處，使中國跳入世界的門越來越闊，包括意識和普世價值觀。香港對中共有經濟價值，所以北京願意給香港自由度，雙方是互借東風，進退有度。香港被北京利用時，可發揮作用影響回內地的社會層面。

筆：港人治港是否真的？

劉：很難簡單作結論。官員全是香港人，北京是取大放小，方向北京控制着，小事放手讓香港管理。香港有很多內部事務，北京是沒管的。但香港人認為最重要的一件事，可以自己選特首，北京卻不放手。

筆：為何近年政府多了去打壓社運與紀念「六四」的活動？

劉：國內有種叫精神感召式的管治手法，告訴自己的想法，然後交由香港政府自己去想方法迎合北京的想法。但香港政府缺乏政治視野，連擦邊球、好言相勸、向北京反映的行為也欠奉。打壓活動是在大家長

管治意識和小臣子奉迎心態下便出現。

筆：有說回歸後主流傳媒不斷歸邊和自我審查，你有何看法？

劉：目前傳媒還是多樣化的。但北京透過經濟手段去影響傳媒，因大部份傳媒老闆在內地有生意，所以多出現被「河蟹」的情況，隱憂不斷擴大。

筆：你怎看現在政府要在中學推行國民教育，代替公民教育？

劉：從政治角度出發，北京認為香港人缺乏對國民身份的認同。董建華當年提出母語教育，其實是透過母語教育去帶出國民教育，以增加香港人的歸屬感。回歸以來的升旗教育、國民教育，犯了一個大毛病，只着重正面教育，不着重全面教育，不提負面的事，只提中國怎樣強大，報喜不報憂，使國民教育公信力低。國民教育最重要素材是國家處事的行為，例如太空人上月球、主辦奧運；但一些國家行為也起了反面作用，例如處理異見人士手法，使人認為北京只重視硬件，忽視軟力量。這些行為會抵消其他方面的國民教育，令國民教育不成功。

註釋：

有興趣請翻看2011年1月24日由筆者主持的香港電台節目《左右紅藍綠》之「唐英年評80後」。

第二章　政府權力困局

在沒有政黨法下，特區政府在立法會是零票的，這在世界任何的議會內，已是荒誕無稽的笑話。政府要靠保皇黨派的支持才能肯定夠票通過政府議案。而保皇黨派根本不用效忠於特首，他們有的是直選議員，擁有強大民意基礎，難道還要聽命於無民意授權的政府？或許這完全解釋了為何曾蔭權政府於2005至2010年間成功立法的政府議案，不足六成，坊間更出現「政府無權，議會無票」之說來諷刺這現象。所以政府都盡量避免提出具爭議的議案，即使拖無可拖，也盡量避免在選舉年或接近選舉的日子提出，因為需要考慮直選的黨派，不管是保皇或是反對派也好，在哪些時候是特別手緊的，申辦2023亞運和擴建將軍澳堆填區議案正是極佳例子。

政府要得到建制派議員支持具爭議的議案，除了平常要多接納他們的意見、高調支持他們外，不多不少也要給他們一些甜頭來換取支持，諸如委任區議員、各大紫荊勳章、諮詢架構成員、政治助理和副局長等，因而「政治交易」、「利益輸送」之說便不脛而走。

特區政府無權要求建制派必須支持，但會為建制派提供大量水喉，跟建制派積極保持良好關係，以便聲音能夠上達天庭西環。政府有能力「團結」建制派，使中央政府希望獲得通過的議案（或不希望獲得通過的議員動議）可以順利過關（或不過關）。「阿爺吹雞，全部跪低」的說法雖

有點刻薄，卻也反映了某些事實。試問不喜歡以激烈反對與抗爭來表達訴求，喜歡透過溝通向中央表達意願、以妥協去爭取目標為作風的建制派，為了和中央保持良好關係及確保有足夠的資源支援，又怎敢逆中央意而行？因此建制派往往「小罵大幫忙」，在議會和傳媒面前猛烈批評政府，但在投票時卻支持政府的情況常有之，在政改方案和每年的《施政報告》致謝動議屢見不鮮。

政府偶會提出一些並未得到「阿爺」首肯的議案，而內容極具爭議性，事前諮詢工作又一貫不足，包括友好黨派也沒被好好諮詢，但政府卻一意孤行推出那些議案，一廂情願以為建制黨派會支持，卻忘記議案未得「阿爺」首肯下，建制派不用歸邊，結果往往被大比數反對，如申辦2023亞運和將軍澳堆田區擴展議案。事後政府怪責友好黨派，說行政立法機構關係破裂，乃推卸責任。因此政府常說行政立法兩會關係不佳，其實是政府自以為是、不喜接納意見的態度造成。追本窮源，問題出自制度上的缺憾。政府並非民主選舉產生，沒民意授權，加上沒有政黨法，特首不隸屬於任何政黨，沒必然的盟友，沒有實權。這使政府沒法有效地號召所有友好黨派支持，所以有時要「阿爺」出手。這也是「京人治港」說法的由來，因很多議案能否通過，要看北京意願。2010年政改一役，便是西環穿針引線，跟民主黨進行溝通，才使議案通過，完全繞過特首。

政府為了討好友好黨派和議員，只好親疏有別，給予他們隆厚待遇，向他們示好，以希望有足夠票數。政府在立法會無票的情況下，強政勵治，只能發生於夢中。

第三章　政府態度

政府一向被批評為親疏有別，漠視民意。當然斥政府漠視民意有點過於口號化，但政府對有異見的民意不尊重卻是事實。很多人勸政府要謙虛兼聽，以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心態去聆聽民意，已說得舌敝唇焦。但政府一聽到異見便「黑面」，甚至反唇相稽，處處杯葛異見民意和進行假諮詢去虛構一個政府得到大部份民意支持的泡沫，然後像瘦骨嶙峋的巫婆，裝出一副慈祥和藹模樣向天真無邪的白雪公主賣毒蘋果似的，向廣大市民推銷「魔鬼在細節裏」的政策。如若政府肯一早兼聽正反聲音，把政策草擬到最好（在能力範圍內），那根本不會出現像高鐵、政改風波的大頭佛。

國際著名智庫Legatum Institute做的調查指出，經濟方面香港全球排第10，但政治權利卻只排82，是全球最差的20多個城市或國家之一。該調查解釋香港排82是因港人難向政府反映聲音，政府又不怎聆聽異見。這正正道出政府的親疏有別態度不但影響民生和政府運作，還使香港落後於世界，在政治方面「邊緣化」自己（運用政府的術語）。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政府卻是偏頗側聽，多番打壓陰乾異見，仇視拘捕前線分子；政府實行親疏有別，政策擬定脫離民情，即使碰壁還充大頭，受到強烈反彈才會改之。

訪問

受訪者：成名（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

筆：自上世紀80年代起，香港政治制度改革之聲浩大，但一路以來，政府對政治改革都是採拖字訣，對全面加快民主進度很有戒心，這是何故？政治制度不民主，是否會使政治較穩定？

成：中共行的是專制政體，保持共產黨一黨獨大乃其首要利益，所以懼怕香港全面民主化會難控制香港，以及為內地省市作出示範，會瓦解其統治。於是中央透過政制作為控制特首選舉的操作手段。在立法會方面，則透過分組點票機制，政府只需控制四分一議席便可否決政府不喜歡的議案，這是不民主，而超過一半的功能組別議席是小圈子選舉產生，政府易控制。回歸後，大量牽涉民生的議案便是被這四分一議員否決，製造大量民怨，也變相剝削直選議員的權力。

香港的政體是半民主政體，容易導致不穩定，因而亦容易出現意圖改變政制的運動。相反，民主制度是較穩定的，民眾較少動員大型運動來推翻政府。所以制度不民主，不一定帶來政治上的穩定。

筆：那麼，不加快進行政治改革，使民主制度早日實現，又會為民生帶來甚麼問題？

成：不肯改革政制，便是默許怪胎繼續生存，會製造不少問題。首先是貧富懸殊問題。在2003年的調查，香港貧富差距比不少非洲國家還要差；而在2008年的調查，50萬僱員收入低於5,000元，40萬僱員低於

4,000元，這會加深結構矛盾。功能組別以商界的代表為主，商界透過功能組別發揮力量，加上政府不是民選出來，對很多中產和基層的苦況沒切膚之痛。而商界言論可直達中央，也使香港政府有顧忌，便在政策上偏向商界。

第二，特首選舉最終由中央話事，而特首選委會的結構是商界話事，使特首在推行政策時，不敢得罪商界。但政策對商界傾斜，默許大量壟斷狀況，會削弱香港的長遠競爭力。

第三是政府容易出現親疏有別，選用人材與政治取向掛鈎，而非與能力掛鈎，政府的精英統治在這情況下是做不到的。在諮詢委員會、委任區議員等層面上，一面倒偏幫建制派，不但把一些不親政府的精英拒諸門外，還使有六成民意支持的泛民被邊緣化。

第四是特首由中央話事的小圈子選出，特首和其政府沒選票上的認受性，但30名直選立法會議員卻有選票上的認受性。當政府表現差時，會造成惡性循環，更加畏首畏尾，不敢推行具爭議性的政策和使改革不徹底。加上沒有政黨法，特首只要不被炒便可，不需向政黨交代，因此政策較短視。

這些矛盾全是半民主政制導致，但中央卻以為只要搞好經濟便可。

筆：為何香港政府行事那麼官僚？常以看守政府心態辦事？

成：沒《政黨法》是原因之一，而香港邁進民主化又不斷被阻撓，間接鼓勵現在的半民主政制繼續製造矛盾。政府沒必要對民意有徹底回

應，政府做的諮詢常不公開，諮詢只是門面工夫，不會因着真正民意而作修改，給人假諮詢的印象。彭定康年代已比60、70年代有大進步，回歸後卻倒退起來。政府發放消息有選擇性、對個別傳媒敵視。政府很多問題遲遲不處理，即使立法會多次提出要求改善，政府也不做，如發水樓問題和壟斷問題，直到政府和特首的民意支持度跌到很低，才被逼去做。

筆：政府常被批為大花筒、浪費公帑，原因在哪？

成：不少事情，如奧運馬術、申辦亞運，是為討好北京而做。這原本沒有問題，但在極高貧富懸殊下，市民是不會支持的。因政府不去解決逼在眉睫的問題，又不肯多花錢去滅貧，所謂扶貧措施只是一次性，非長遠政策，但卻同時大花錢搞面子工程。政府承擔低，沒長遠規劃，全因沒民主政制，政府不是直接向市民問責，加上香港人的逆來順受性高，少透過抗議來表達憤怒，間接鼓勵政府不作長遠承擔。

筆：香港的傳媒對政府的監察是否足夠？是否足以推動政府施政？

成：香港傳媒對政府的壓逼性低，對政府監察不足。傳媒的自我審查嚴重，因很多傳媒老闆在內地有生意，結果在監察內地和香港政府的新聞上會投鼠忌器。當網絡報道，如Facebook、Inmedia越來越多，相比下，市民會選擇後者，使主流傳媒的公信力不斷下降。而沒有接觸網上傳媒的市民，會因主流傳媒越來越少報道一些不利中央和香港政府的事件，如政治打壓事件，導致警覺性低。

沒有獨立的傳媒監察，對香港的自由法治是有威脅的。大家以為只要自強便可，但不明白現實是很多事情被制度阻撓了。

筆：有甚麼方法或建議去改變現在狀況？

成：透過群眾運動是最有效方法，透過和平非暴力的持續動員。但這要政黨和民間團體充分合作。中央也不是鐵板一塊，也會有讓步時候，如1988年「《基本法》事件」，因群眾不斷動員，最終中央作出讓步，把91直選議席由10席加到19席，可以普選的年份由2011年提前到2007年。但群眾動員有廣泛性，把握政治機會，是可使大家覺醒。相反單靠談判，成效不會大。例如今次中央在政改讓步，很大程度是五區公投的出現，使中央明白若不讓步，群眾運動會不斷出現，於是才讓步，而非民主黨談判的成果。民主黨在過去十多年不太着重民主教育，所以才較難推動大型民主運動。民主黨反過來着重地區事務、談判，是在「民建聯化」。

第四章　政府諮詢和民意調查

政府和某些主流傳媒做的調查，皆充滿導向性。它們調查的目的是尋找切合自己意向的人或意見，然後大加包裝來發表，以支持自己心中的意向，而非真正去探索民心背向。2011年的《財政預算案》不是一早大賣廣告說會廣聽民意嗎？如果真的有聽，絕不會弄出如此大頭佛，派錢都不懂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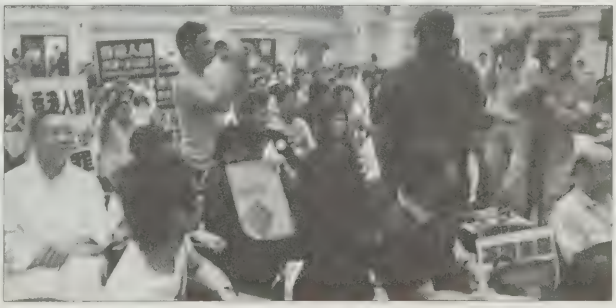
傳媒做有導向性的調查，是要化妝成「持平」的容貌，然後「搵位入」政府。但政府做調查，應是去了解民意以使政府的政策更完善或讓政策貼近民意，清楚市民的反應，而非像現在那樣，去製造一些幫自己的「假」輿論，流為惡性循環。例子包括當年調查得出大量人支持政府的廿三條草案、申辦2023亞運、支持政府政改方案、所謂的社福長遠規劃諮詢文件（完全不怎諮詢前線社工和相關的教育界人士，又不問服務使用者意見）、資助市民置業諮詢（實為找反對復建居屋的聲音）、高鐵調查（透過有導向性問題，調查結果和其他調查出入過大，其他機構的調查結果，大部份為支持與反對意見相約）等。正如政府為2010年的社福長遠規劃諮詢，所問的15條問題，除了最後一條，全是Yes/No question，只需填十多二十個字便完成一個諮詢回應，程度膚淺，根本無助了解社福界情況。

政府做導向性的調查，便掌握不到真正民意，政策出來的方向便有偏差，然後自然被市民、議員和輿論批評。政府為了安撫群眾，又假意的再做具導向性的調查，企圖製造政策是有利民生、已體察民情的印象，或已小修小補，得到大量市民支持。這樣還是逃避真正民情，又沒觸及問題核心，乃一錯再錯，冥頑不靈。

做騷的諮詢

一些關乎香港前景的重大諮詢，特首只是委任諮詢會去處理，例如最低工資委員會、社會福利諮詢會、扶貧委員會。內裏的成員全由特首委任，過程封閉，公眾難以監察和不能主動參與。而最大弊病是那些諮詢會有權無責，提出的建議，政府可隨意不跟進，只是花瓶而已。這種做騷的諮詢和政府的導向調查同出一轍，只是表面裝着順應民意去做點事，實質工作全無做到。

聯合國的諮詢工作，是定期的、有系統的、從社會上多角度收集觀點，但港府的是變幻莫測、不定期、單一方向的，難怪港府做出的諮詢成果強差人意，而調查結果跟真實落差甚大。



政府有時會進行一些地區諮詢會，擺出諮詢民意的姿勢出來。但十居其

九的回響是政府意見接受，但態度照舊。有時，諮詢的問題和被邀出席人士，更是事先精心挑選，名副其實的做騷。2010年，曾俊華到順利天主教中學就政改方案諮詢師生意見。事後有學生向傳媒踢爆政府要求校方先提交學生和老師會問的問題，而校長事後也證實有此事。真是好一場公關騷，不過對於被踢爆，政府又是厚面皮的例牌否認。

政府有時甚至故意製造出虛假民意現象。如2010年，唐英年落區推銷政改方案，被傳媒踢爆他的保安扮市民接傳單；而其後的支持政改大遊行，多個團體被踢爆威逼利誘會員和市民出席，包括提供超平海鮮餐、參加旅行團（但只說有文藝表演，沒說是支持政改集會）等；而這些事情，相信大家也司空見慣了。

隨着反對政改的聲勢越來越浩大，政府在這些聲音的鞭策下，也加倍努力的去推銷政改。高官們由最初的落區派傳單，進步到落區家訪，去聽市民親身訴說生活苦況。雖則高官們平常也應多落區家訪，不應臨急抱佛腳有需要時才落區，但有落總好過無落。高官落區是想營造出政府關心市民的形象，想受訪家庭感到被重視，而不少受訪者也因此而感到高興。政府實際上是想混淆視聽，把市民多謝政府關心的回應當作是支持政府政改方案，可見政府如何功利地利用市民去宣傳政改方案。如果真是重視民意，為何民意和政府政策落差這麼大？政府不肯復建居屋，只推出所謂「置安心」去回應市民置業訴求，已反映政府本質。

2011年中期，政府為準備在2012及2013年在中小學推行新的「德育

及國民教育科」而向教師進行諮詢，可是卻被批評為「假諮詢」。諮詢會的負責官員，教育局總課程發展主任張永雄以訓話形式批評教師常引用負面新聞講解國情，此舉即是叫教師造假，要多說好事。可是每天內地都有層出不窮的負面事情，包括政府如何壓制異見聲音、黑心食物天天新款、強拆事件日日有之，教師照實直說乃其本份，政府竟公然假諮詢之名，要教師配合政府的奉承行為！教局又一早否決教普世價值、說是西方向中國施壓的方法，連商量餘地也沒有，根本不是諮詢。這也反映政府無知，普世價值早於中共上台前數百年已建立，一直得到肯定，政府的說法不是無知就是在顛倒是非！而諮詢會的問答時間由45分鐘減至20分鐘左右，只為方便將來報告諮詢過多少教師，為造數而已。事後政府又不肯回應記者提問關於張永雄訓話的問題，分明是「過了海便是神仙」，回應也覺費時，這怎會是想去聽不同聲音？(註)

同期政制事務局建議以後立法會議席出現空缺時，由原本落選候選人當中最多票那位補上，更是連諮詢也不肯做，企圖快刀斬亂麻，使荒謬事過關。政府稱此舉是避免議員像「五區公投」的五位議員那樣，辭職令政府要動用公帑進行補選。但空缺的出現，除了辭職，還有意外身亡或健康嚴重受損等原因，例如當年民建聯主席馬力離世，如果根據政府建議，他的空缺將會由泛民的何秀蘭補上；又譬如在新界東擁10萬多票的劉江華不幸因健康問題要辭職，其位置將由只得2萬多票，自由黨的田北俊補上。政府的建議完全漠視那些原本投了離職議員一票的市

民，對他們極不公平。一旦當選的議員有任何意外而令議席出現空缺，由敗選的候選人補上，等於抹殺了投當選者一票的選民聲音。這種抹殺市民代議權的建議實在危險，政府宜慎思。

其實要防議員濫用辭職，立例令辭職議員不得參加補選便可，剝奪一個人的參選權總比剝奪數以萬計市民的代議權更化算。但其實辭職再選已賠上被指罵為浪費公帑的成本，下次再選可能失去市民支持，所以根本不用立任何法例去規管議員辭職的問題。但政府連公開諮詢也不做，反映政府無心聽坊間聲音，根本是想一錘定音！

選擇性公佈調查結果

有時民意真的不可欺，不管問題有多導向性，得出的結果未如政府所期望時，便會選擇性公佈對政府有利的結果，以圖歪曲民意，讓市民產生政府政策得到大多數人支持的錯覺。例如申辦亞運調查，明明調查報告白紙黑字寫着市民對香港應否申辦亞運仍有一定的保留，政府不提，反說成支持申亞者增加。又例如政府公佈調查結果，指民意支持政府的自願醫保計劃，但原來有高達87%的受訪者認為若增加醫療撥款，應用於改善公立醫院服務，比選擇資助醫保的53%多，但政府又隻字不提。

政府於Facebook作宣傳

政府眼見時下青年人常玩Facebook，以及常在那裏討論各種話題和組織活動，於是也決心在Facebook開戶口，與網民溝通，並打算聘請兩位月薪過兩萬元的Facebook戶口管理員。這暴露了原來特首辦內，竟苦無一人能兼任此職，即連常被批評人工高但無所事事的特首辦助理也不能，抑或是政府真的很隆重厚視於Facebook與網民溝通？

政府在Facebook開了一個名為「上亞里畢道Upper Albert Road」(http://www.facebook.com/UpperAlbertRoad) 的戶口。在那裏時不時張貼官員出席過的活動，和一些較中性的新聞。但政府和網民的交流與溝通，只是政府張貼一些宣傳和資料，然後讓網民隨意留言，但過程中全無政府工作人員回應，所謂的溝通是單向性的，即你有你發表意見，但沒人回應你，甚至有沒有官員看過你的意見也成疑問。所以筆者也從不在那戶口留言，免浪費青春。但有一次終究按捺不住，要留言「大讚」政府。該次活動宣傳圖文並茂，而文字版記錄如下（可登入這連結看原文：http://www.facebook.com/#!/album.php?aid=48087&id=154260614604096&comments)：

唐英年司長、譚志源主任與羽毛球運動員打友誼賽 (11.1.2011)

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夥拍綽號「黑妹」的港隊羽毛球手葉姵延，相約特首辦主任譚志源 (Raymond) 和前港隊羽毛球手陳念慈，打了一場「混

雙友誼賽」。一拿起球拍落場，唐司長和「黑妹」葉姵延就全力作賽，而熱衷球類運動的Raymond和拍檔陳念慈也配合得極有默契，兩隊你贏一球，我追一分，鬥得難分難解，比數也很接近。

當日賽事緊湊，但原來雙方也是先禮後兵。賽前，唐司長表示自己左腳受傷，兩位運動員即時提醒大家熱身工夫要做足，還分享了護膝方法，並示範了一些簡單拉筋動作，讓大家跟着一起做。

兩位高官在上班時也能寓娛樂於工作，是在宣傳不管工時多長，功課又幾多，都可以全民體育呢？還是說明很清楚低薪運動員的慘況，明白非精英運動員的出路有多黯淡？不管怎樣也好，筆者看完後，也忍不住留言讚好：「多麼務實的工作啊！」首先可見到特首用公帑高薪聘請的政治化妝師們功力之深厚，以及難怪唐司長月薪30多萬，譚主任10多萬，完全做到體察民情，民心我心的境界，正正帶出打工仔們希望在繁重工作時段，既能安袋人工，又能及時行樂的夢想，不需再被超長工時、無限OT所束縛。

值得一提的是該活動上四人分別穿上有「2」「0」「2」「3」四個數目字的衣服，相信是為爭取申辦2023亞運造勢，但文中並無隻字提及，實有點欲蓋彌彰。究竟是政府想表達其行事之務實和低調，還是覺得把支持申辦2023亞運大方說出來會令心中生愧呢？

高高在上心態，不肯面對群眾

曾蔭權就着2010年的政改方案邀請當時的公民黨黨魁余若薇進行公開辯論。可笑的是政府不肯容納現場觀眾，連少少的觀眾也害怕，不敢面對群眾，只懂閉門造騷。這也可能因為曾蔭權覺得，他肯進行辯論已是紆尊降貴了。早在2010年5月初，曾蔭權宣佈會帶領政府團隊宣傳政改方案，當時有記者問他會否落區親自派傳單，曾蔭權竟反問記者他應否去派！當時早已反映曾蔭權那種高高在上的心態，視親自派傳單為有失身份的工作，這與政府不是民選，沒經過民主選舉洗禮有關，始終有着高人幾等的心態。雖然後來特首也肯親自落區，但從種種安排看，也難掩高高在上，不願深入群眾的心態。

即使高官落區，也不是真正的面對群眾。初時連落區行程也保密，又不通知傳媒，還要安排兩輛隨行的警方鐵馬慢駛，阻擋記者尾隨；更封隧道讓其專車通過，務求令傳媒無法貼身採訪。後來雖情況改善，但官員落區推銷政改，不但有無數警員、保安包圍，與市民間築起重重隔膜；即使安排親密接觸，也要去親政府區議員的地區，事先安排探訪哪些家庭。例如曾蔭權落區，也只參與支持政改的活動演講或只是派幾張傳單、拍下照做下樣罷了；唐英年落區，去以為較安全的中產區九龍塘，遇上反政改的示威者，他不是走前與他們傾談和聆聽意見，而是拿着大聲公大喊：「起錨！起錨！起錨！」不斷和對方鬥大聲和鬥氣，毫無聆聽不同聲音的誠意，也顯露出了他的政治風度何其低。

政府高官沒有自己乃人民公僕的意識，可能和權力並非來自人民有關。他們總認為自己是高高在上，於是還富於民便叫派糖，是皇恩浩蕩，要人民感恩。林瑞麟在推銷2012政改方案時，便說這是常餐，以為有餐吃，市民便要滿足，要做順民、做犬儒，不應再諸多要求，不應反對政府方案。

2004年11月，時任財政司司長的唐英年就財政預算案，到一座談會聽取社福界的意見。可是面對不少社福界和基層人士的批評時，唐英年回答：「我如果對社會無承擔，我唔會做財政司司長。我本來係商界人，唔需要好似依家咁活喺玻璃罩裏面，大可以閒時打吓高爾夫球，返半日工，放工食吓飯，多啲陪吓仔女，我點解要聽你哋發洩。」可見唐英年那種高高在上的心態，認為他肯做官，市民便應莫大感恩，不應有任何批評。但他卻沒說做官如何滿足他的權力慾、地位慾、一些無法用金錢衡量的肯定和快感。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於2011年1月於一青年領袖訓練計劃啟動禮發表演詞時，強調大家應該有心平氣和聆聽別人意見的胸懷，又表示領袖需學習聆聽。但他和政府一貫作風無異，也是講一套做一套，沒以身作則。於2010年5月，曾俊華落區派傳單推銷政改方案時，遇上一位反對方案的老師，曾俊華先是不友善地跟對方互望兩秒鐘，再說出一句「多謝你咁大聲」；2011年初，曾俊華落區諮詢財政預算案意見時，有市民送上苦瓜，表示自己生活困苦，望政府能給予幫助，但曾俊華拒絕接收苦瓜，還輕佻地說出「你帶番屋企今晚煮嚟食」的言論。

不講文明的政府

政府為求一些新的政策能蒙混過關，不惜不講文明，其操守和祈福黨無異。衞生福利局於2010年推出給街市販商的新租約，上面沒有訂明續租權和繼承權的條文，但過往的合約是有的。被發現後，政府解釋續租權和繼承權是一貫政策，故合約毋須列明。這不是叫簽約者盲目相信政府？這不是不講合約精神？政府覺得自己的誠信很高嗎？政府為求街市販商簽署具爭議性的新合約，便和寶藥黨一樣，要人盲目相信，完全不講文明。

註釋：

請參閱2011年5月26日《明報》港聞「通識教師批新國民教育假諮詢」。

第五章　新聞自由

重要性

傳媒和輿論對當權者及政府的監察稱為「第四權」，是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外，確保政府施政以民為本和社會利益為依歸的權力。傳播學家拉斯維（Lasswell）指出，傳媒有監察政府、提供意見和教育大眾的三大功能。

傳媒應以民為本，為市民發聲，乃人民喉舌。負責任的傳媒會專心監察政府施政，批評政府犯下的失誤，是要以正視聽，讓市民了解犯錯之根源，逼使政府汲取教訓，避免同樣錯誤再發生。而批評的同時也會刺激市民思維，對政府施政帶來更多意見和建議。負責任的傳媒更不會一味的批評，還會找來權威作出中肯評論和改善建議供執政者參考，以求令施政更為進步。因此傳媒對當權者和其黨羽施政的監察，起了有效的鞭策力，能減低政府犯錯的可能性和預防不少政治危機發生。

以菲律賓為例，當年馬可斯上台後禁止新聞自由。菲政府為建設國家，向外大舉借貸發展基建，當時的傳媒對此一貫讚好，歌功頌德；而對於國內官員，包括總統在內的種種貪腐行為噤若寒蟬，使政府洗腳不抹腳、中飽私囊、驕奢淫逸態度蔚然成風，國家一片敗壞。結果一班新聞從業員集體辭職，控訴政府腐敗，才引起國際關注和國內的倒馬潮。

縱使馬可斯倒台多年，其為菲律賓帶來的創傷至今未癒，足見新聞自由對一國之施政和國人前途有着關鍵作用。

政府漠視新聞自由

《羅吉亞尼權利法案》宣稱新聞自由是一切言論的基石，任何一個政權都絕不應妨礙這種自由，可惜我們的政府卻帶頭妨礙新聞自由。警方於2004年起採用第三代指揮通訊系統（數碼化）後，記者不能再截聽巡警通訊和不能再於999報案中心聆聽警方線頻。自此，警方便選擇性的發放突發新聞，而非像往昔般記者們在即時截聽後，憑着專業分析，判斷哪些為突發新聞。一些嚴重新聞更會被警方封鎖，以「保護記者人身安全」作為不發放新聞的理由。當年警方承諾在數碼化後，每天公佈約100宗突發事件，但到了2009年下半年，警方平均每天只公佈2.7宗突發事件，與當天承諾相差千里。警方食言，過了海便是神仙。

這顯示港府對公眾知情權着緊度遠遠不足，而原因不出以下兩點：

一、懼怕傳媒監察警方，當發現警方執法出現問題時，對警方辦事「阻手阻腳」。政府此慮是多餘的，香港警方一向專業，哪怕執法時出現問題？但隨着警方近年要特事特辦更多政治檢控，問題便隨之出現。

二、視傳媒為宣傳工具而已，漠視傳媒應有的監察職能，也漠視傳媒擴大監察作用能確保市民知情權。

舉例警方於2010年12月初公佈和內地公安聯手偵破一宗監守自盜

案，涉市值9,000萬的金條。但原來警方是延遲了一個月才公佈，在不影響調查和不會對任何人的人身安全構成威脅下，不作立即公佈是不恰當的。

政府打壓港台

政府帶頭打壓港台 (1)，是妨礙新聞自由另一罪證。廣播處長多番批評《頭條新聞》節目 (2)，政府卻默許之，更離譜的是在2010年8月，政府公佈的香港電台《約章》，竟不把監察政府列為港台之職，反把宣傳政府列作港台之責，可見香港政府欲把傳媒扭曲成政府喉舌，企圖把傳媒變為當權者的傀儡。

政府更為規管港台留下尾巴，拒絕以立法方式保障港台的編輯自主，加上操控港台生殺大權的顧問委員會只由特首委任，在沒法律保障下，港台在批評政府時難免投鼠忌器。《約章》亦列明培養市民對公民及國民的認同感乃要務，即要港台多搞一些載歌載舞、和諧式的紅色愛國／黨節目。

《約章》列明港台以後在電視頻道只能播中國傳媒的節目，改變過往不論中國或國際傳媒的節目皆可播的規矩，政府想把港台定位為宣傳機器，真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這不但一步一步的收窄港台自主自由，也令香港蒙羞。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竟有明文規定港台不能播國際傳媒節目，實在令人失笑。

增加香港人對一國兩制的認識於《約章》中也列為港台的主要任務。可是推廣一國兩制是政府責任，把之推卸給港台，有公器私用之嫌。雖則推廣一國兩制乃為好事，但這樣列出來只會縮窄了港台的編輯空間，令其走向單元化，成為宣傳傳媒多於大眾傳媒。

自我審查嚴重

在2010年的調查，超過五成市民認為香港新聞傳媒有自我審查，34%認為傳媒在批評政府時有顧忌，比例為13年新高。難怪香港中文大學於2010年做的調查發現，市民認為傳媒的公信力大幅下降。

傳媒自我審查嚴重，是因擁有傳媒的富豪，多於內地有生意，及與特區政府同屬統治大聯盟，傳媒下屬批判兩地政府時，難免有壓力。員工為了保住飯碗，有時難免鞭策力度要輕點，或報道一些事情時避重就輕。

TVB (3) 以免費電視台不應播任何政治廣告為由，否決接受一單廣告生意。該廣告內容是一套市民拍攝的影片《好茅》，影射政府的政改方案。但同一時間，無線電視卻大播特播政府用公帑拍的宣傳政改方案廣告，無線電視的雙重標準，是傳媒自我歸邊的好例子。

本地傳媒

本地傳媒常被批評為過於煽情、把新聞娛樂化、既有立場過深、

自我審查越來越嚴重、公信力越來越低，甚麼「CCTVB」、「中央十台」等諷刺傳媒河蟹化的花名頻出。見微知著，外國的新聞之花，如Barbara Walters，是具有實力和強大新聞觸覺，但香港的新聞之花，可能囿於高層壓力和取態，導致難以發揮，真的只是「花」，除了樣子甜美外，別無深厚功力，由此也看出香港的新聞質素如何了。

TVB新聞部資深記者柳俊江於2010年尾離開任職8年的工作崗位，離開後他於微博有感地抒發：「離開無線一刻，每一個同事跟我握手道別時都送上一句：『恭喜，你甩難了。』」、「近幾年記者淪為『車衣女工』，管理層對新聞早有一套『看法』，記者被要求『照單執藥』，『老細話』之聲不絕於耳；縱使記者有堅持，但屢遭『勸喻』」、「要有機會，先要『聽話』」、「新聞取向太明顯，一點也不中立」、「老闆的意見太強勢，下面沒有人敢反對」、「『CCTVB』之名不脛而走，是因為主導新聞部的新聞取向和觀眾脫節」……從柳俊江的博文可窺探出即連歷史悠久的無線新聞也越來越自我審查，新聞取態有導向性，其他傳媒機構情況如何，也不難想像。難怪多上網的一群，現在寧願信任網上傳媒，也不信任主流傳媒了。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如若主流傳媒不爭氣點，只會加深負面形象。

現在主流傳媒自我審查嚴重，高層常插手編輯方針外，還淪落為給大財團服務。TVB新聞中的「一區一盤」、擺明車馬為地產商賣樓盤廣告，催谷樓價，但卻霸用新聞時段。

網絡傳媒

當主流傳媒的公信力今非昔比，隨着科技發展，網絡傳媒興盛起來。基於資本成本較低、政府不肯交還屬於市民的大氣電波資產，令網上電台、網上討論交流區興盛起來，發揮監察系統的作用。難怪有說法指真正的言論自由體現於網絡世界。可悲的是，大前提是現實世界中，因大氣電波不開放、部份傳媒歸邊，令言論自由不能充分發揮起來。

政府常標榜積極不干預，但很多公共事業，政府卻積極干預，令市場缺乏競爭，消費者無甚選擇，只好默默承受不合理的市場環境。政府長期不肯把大氣電波牌照交還公眾，三間電台長期霸佔大氣電波，兩間免費電視台得以長期霸佔免費電視市場，不用面對新的競爭者。在缺乏競爭下，香港的免費電視節目質素如何，多年來是進步或是退步多，大家有目共睹，反映香港人不能享有質素高的免費電視節目，是政府不肯開放牌照所致。要觀賞好的節目，給錢吧，看收費電視。政府剝奪市民的選擇，然後要市民交錢才能取回選擇權，是多麼荒謬，說穿了是政府把利益輸給有錢辦收費電視的大企業。政府不交還市民享用大氣電波權利和不開放廣播牌照，得益的是兩間免費電視台和三間電台，實實在在的利益輸送。

牌照和配額制是政府過度干預市場的兇器，以便利益輸送。電力市場是另一好例子。政府不肯開放電力市場，讓兩間電力公司壟斷香港電力市場，使它們有利潤保證之餘（世上竟有政府會保證企業做生意永

不虧本，是實賺，且純利高昂，真是世界無奇不有！），還可在賺個肚滿腸肥時，增加電費，令市民受苦；而政府要兩大電力公司履行社會責任，多用再生能源發電，需要給它們更大利益才能實行。政府的荒唐，不但高深莫名，且把市民害得透頂。

現實世界中，市民受盡既得利益者的欺凌，傳媒又未能充分發揮監察作用，平常生活又充滿壓力；而在網絡世界裏，市民可盡情發泄情感，當見到一些不道德，或態度盛氣凌人、不可一世的人，便把所有憤怒投到他們身上，於是出現「人肉搜查」情況，部份人私隱被侵。但當此情況發生在一些不被喜歡的人、風化案受害者，又或事件演變為無限的人身攻擊，便是一種欺凌行為。可惜於網絡世界上，自由和責任還未取得平衡。

訪問

受訪者：麥燕庭（記協（4）主席）

筆：回歸後，香港由港人管治，自己當家作主，但新聞自由空間有否收窄？

麥：於2007年記者行內的調查，近七成同行認為比1997年時倒退，因自我審查普遍。同行要估哪些是中國政府認為敏感的題目，便盡量不報道。而很多傳媒老闆與國內有生意來往，亦使自我審查普遍。

但傳媒從業員應基於新聞因素考慮報道哪些新聞，以外的考慮已是

自我審查。其他國家雖然也有自我審查，但香港沒民主，權力單一，只有一個大政府，如再加上自我審查，市民能聽見的聲音便不廣泛，有些聲音甚至聽不到。

回歸前傳媒左中右都有，天秤能夠平衡，但自從90年代中，親台報紙陸續撤出，天秤失衡，很多事情，主流傳媒逐漸不講，或用詞差不多。例如劉曉波新聞，很多報紙刻意小篇幅報道；2009年「六四」20周年，多數主流傳媒對「六四」的報道出現審查情況，有雜誌記者在做了「六四」專輯報道後突然被炒。

筆：政府近年不斷打壓港台，出《港台約章》，多次關注《頭條新聞》等時政節目，對本港新聞自由有何影響？

麥：港台事件是自我審查的好例子。港台是一個本身不獨立的傳媒，想爭取獨立，卻處處受阻撓。政府控制的傳媒，應是服務大眾和人民，而非成為政府的喉舌，例如英國的BBC，便是為人民服務，非政府喉舌。但香港卻不是，70年代港台獨立，但港台新聞部只是讀政府提供的新聞稿；80年代，港台逐漸發展向公共廣播道路，港台前途問題出現，新聞開始多元化；90年代到回歸，港台高層出現怕和中央對着幹的心態，雖仍有內地新聞，但話題敏感的，往往是別的傳媒出了，港台才報道；回歸後，港台受盡親建制派的抨擊，如曾憲梓、徐四民，但絕少官員開腔聲援港台，只有當年的陳方安生有這樣做。而曾蔭權設立委員會管港台，是自我審查表面化。現在港台是走回70年代的回頭路，受

制不斷加深，是想影響整體的新聞自由。記者雖也有努力去維持新聞自由度，但自由度縮減是必須承認的事實。

筆：香港記者近年在內地不斷受打壓，說明了甚麼現象？

麥：內地新聞自由都有起伏期。80年代改革開放初期，自由度是挺大的，那時跑中港新聞的記者可直接在大會堂和部長對談，可報道的空間極大，只視乎記者取態。但到了1986年，內地政治氣氛緊張，開始出現收窄；到了1989年，限制強了很多，有很多條例加諸香港記者身上，包括《港澳七條》，很多事也要申請批准，如沒批准便採訪，可被控非法採訪罪。

90年代，在華東水災後，香港記者的報道令世界都能關注水災情況，內地對新聞自由的限制是寬鬆了，加上跑中港的記者多選擇息事寧人，不會和內地部門硬碰。可是近期限制又加強了，尤其在二線城市，內地部門會粗暴對待香港記者，甚至用上法例去限制，觸及了香港人的底線。這是由於隨着兩地交流頻繁，北上記者多了，有些經驗較淺，較易和內地部門起衝突；而二三線的地方對待記者還是以較舊的手法，會阻止記者報道一些地方醜聞，為了不想中央得悉那些地方醜聞，不惜用上暴力和便衣，又不讓記者接近官員。

筆：警方收緊對突發新聞的發放，為何會這樣？是否港府對公眾知情權越來越不重視？

麥：過往記者可勾999線去聽機，但2004年開始數碼化，記者不能再聽機，警方又不肯向記者公佈打來999的資料，只是承諾每天發放

100條突發新聞。但初期一年只是每天約12宗，到2009年降至每天約兩宗。現在情況更差，警方公佈的資料較遲，多只是報輕微的事，一些大事包括有人命傷亡的卻不公佈，記者要從其他渠道才得悉。突發新聞是公眾資訊，不是警方自己的財產，這樣做和全球開放資訊的潮流倒逆。在數碼化下，警方可給的資料應是多了，不應是倒退。

筆：傳媒監察被稱為第四權，那麼第四權對社會有甚麼作用？

麥：傳媒是一隊團隊負責監察社會，當發現問題的先兆可先發出警報，令社會防範於未然，減少問題發生。傳媒監察有權力者有否善用其職，代公眾向權力執行者問責，防止權力者腐化。所以當沒有新聞自由，社會便容易退步。

筆：甚麼是新聞自由的基礎？

麥：多元化是新聞自由的基礎，包括資訊來源和報道途徑的多元化。互聯網的出現促進了多元化，而政府也應開放更多社區電台頻道。社會亦要包容多元化聲音，不只是接受單一聲音。

*　　*　　*

受訪者：莫乃光（香港互聯網協會主席）

筆：政府的發牌機制和拒絕發放新牌照，令大氣電波被壟斷，其實政府應否開放大氣電波？

莫：大氣電波頻道不屬於政府，大氣電波乃公眾資源，市民有權分享。政府反要解釋為何霸着大氣電波不開放。應給回市民，讓市民有公平發聲權利，才符合言論自由。

筆：網上電台應運而生，同時網上空間隨科技發展而越來越大，給予公眾更多討論和發聲機會，也得到更多的資訊渠道。但同時，網絡欺凌事件不斷出現，例如趙燕萍事件、吉野家強姦案事主身份被公開、三萬元港女事件等，網絡監管有否必要？

莫：數碼廣播擴闊了媒體空間，網上廣播減輕了對大氣電波的依賴。其實任何事皆有正反兩面，網絡發達揭發了很多以往只能靠主流傳媒報道的事，個人力量、民間記者已可揭破很多不合理的事情。雖然的確出現一些網絡欺凌，但不是沒有監管的。個人原則上不贊成對互聯網監管，因不公平，且不會有效，因監管條例不會追得上科技的進步。

自由必有代價，現在互聯網仍處於學習階段，太多監管會削弱互聯網帶給人民的力量。外國不少國家便想趁維基解碼事件而企圖收縮互聯網空間。如果真是要管，對言論自由有很大影響，令社會可作出平衡的力量萎縮，大原則應是肯定網絡自由和言論自由的凌駕性，不要因短視而作太多監管。

筆：那麼怎改善網絡欺凌的問題？

莫：應從教育方面解決，要讓人意識到媒體和言論自由的關係，不能濫用。

筆：有說政府希望成立網絡廿三條去監管互聯網，你有何看法？

莫：看不出政府會管治網上空間，因官僚思維是怕麻煩，少做少錯，以及政府根本不知怎去管。政府只是回應保守壓力，才有網絡廿三條的聲音，就像以前用條例監管雜誌書刊，也只是政府回應一些政治壓

力而做的，尤其回歸後多了聲音要政府樣樣管，對一些新行業和科技也要管，反阻礙其發展。不少意見認為政府不管是不做事，但干預太多只會帶來反效果。在制度上，政府官員是通才，根本缺乏專才去管科技，政府不識科技，是無得管。

筆：香港在科技發展，在第四產業的發展如何？

莫：美國國力如此強是因大力發展科技，有最高增值的公司，帶動各行各業。中國也意識到科研的重要，重視科技發展，尤其是生物科技。台灣三、四十年前便投資電子科技，發展成電子強國，令台灣實力大升，國際議價力增加。但香港整體社會和政府對高科技都不重視，工商界不太清楚長遠科技發展對它們的好處，只重視炒賣投資。香港政府嚴格上是沒有科研政策，只懂成立基金，但沒政策支援，沒規劃，只是提供一筆錢和官僚的審核程序，去養一班管錢的人，但對科研沒很實質的效果，這大大影響香港的競爭力，是在邊緣化香港自己。

註釋：

(1)「港台」即「香港電台」的簡稱，乃政府官方電台。

(2)《頭條新聞》乃香港電台的影像節目，以風趣幽默、輕鬆方式諷刺時弊。

(3) TVB全寫為Television Broadcasts Limited，「無線電視」的簡稱，中文全寫為「電視廣播有限公司」，是香港首間商業無線電視台。

(4)「記協」即「香港記者協會」。

戊、法治

重要性

看到內地接二連三的冤黑獄事件；看到趙連海、譚作人、劉曉波伸張正義的下場；看到內地司法的落後；為了同是黃皮黑髮的國內同胞，我們要協助內地推動法治巨輪，讓內地的華夏同胞能早日受良好法治的保護。

內地法為黨用，國內的司法到目前還是以體現（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意志為任，以黨的利益為司法的出發點，而非以憲法為依歸（毛澤東於1955年宣佈以後法院審判，不得以憲法為依歸），連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司法最基本條件也達不到標。因而有些時候，內地司法成為一些貪官包庇執法者惡行的工具，讓不潔身自愛的執法部門更有恃無恐的違紀亂法。內地的檢控權在檢察院，需向黨中央負責（香港的檢控權在律政司中，不用向特首負責，司法獨立得以體現），實行三權合作，司法變成了配合行政機關的配角，甚至成為當權者維護自身利益的護身符及貪官用以欺壓人民的工具。

我們應慶幸香港有良好的法治、應珍惜來之不易的良好法治，不容其受到破壞，因為法治是保障人民的最後一個關卡。香港法治仍然優良，但近期開始有隱憂和走下坡之勢，在人權、民主、法治、自治，權力分立的保障有缺漏或外來打擊。現先約略介紹以上名詞的定義：

自由——在不侵犯別人人權下，每人都有做任何事情的自由和選擇自由。

民主——人民乃國家的主體，主導着國家。為了避免以武力解決問題，和體現人人權利平等，人民透過民主選舉，選出代表負責管理國家，憑此實現以民為本。為避免代表們或會腐化，要保證人民的監察有效，代表犯錯後有機會修補，民主選舉必須加上任期等附加條件。民主需要司法、人權保護、良好政制的配合才能發揮實效（所以台灣、泰國那些民主國家出現弊端，不是民主本身有問題，而是缺少配合因素，令民主不能發揮實效）。而民主能體現平等的社會基礎，雖不是甚麼靈丹妙藥，但卻為社會尋求共識去解決問題提供了起步的平台，否則問題不會有解決的一天。平衡統治制度的天秤，確保政權的合法性來自廣大民眾，讓人民透過公平公開的民主選舉和政綱契約的選擇，把統治權交托給心儀的從政人。由於人人平等，人人參與選舉的機會應是均等的。

有不少政客只懂說甚麼民主不是靈丹妙藥、民主也會選到不好的領袖、民主只會選出派錢領袖等話，藉以企圖拖慢甚至反對民主進程，但又沒甚麼實質的意見提出來，反映那些政客根本不明民主之真義。而高明一些的，則會為民主進程加上很多框架，例如均衡發展、政制要確保經濟發展等，扭曲民主本義之餘，只是為拖慢進程找藉口。

人權——不是由當權者賜予，而是每人與生俱來的權利，而且是人人平等的，不容別人侵犯。每人都有運用權利、追求生活所需和利益的自由，但由於人人平等，這要建基於平等參與和公平競爭之上。政府有

責任保障每人的權力不受任何事物侵犯。人是國家的主體，政府是人們協調出來的代表，因此政府必須以人為本。

司法獨立——法院審訊不受外界影響，不受政府和行政部門影響，以明文憲法為依歸，有法必依。

自治——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除外交和軍事外，港人和其代表有權決定香港所有事務，但有爭拗是一國大於兩制，還是一國與兩制是無分大小。

平等——每人與生俱來都享有平等權利和要為社會負上平等的公民責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根據哲學家羅爾斯的說法：「平等是公義之必要條件。公義乃公平社會的基本條件。一個公平的社會才能帶給人民持久穩定。」

憲政——用憲法治理國家，乃人民和統治者之間的契約，人民授權統治者去為人民謀福祉。憲法可約束任何專政、專權和領導人的權力。

還原惡法

回歸後臨時立法會通過修訂「公安條例」和「社團條例」，收緊對遊行、示威和結社的規定。內容是將市民遊行的通知制度，改變為警方變相的批准制度，包括要收到警方「不反對通知書」，或沒有收到「反對通知書」，才可進行遊行，為遊行加上申請關卡，加上審查制度，變相剝削市民的集會自由。至於社團條例，取消了通知制度，改為成立社團，

必須註冊和審批，為人民的結社自由加上審核和申請的關卡。這些令到市民自由受損的法例修訂、被抨擊為還原惡法。

非法集結罪

非法集結罪一向被抨為嚴重過時，應廢除，因非法集結罪乃一條莫須有罪名。1967年，港英當局為對付暴動，參考英國陳舊的惡法，將三人或以上的聚集定為「非法集結」罪行，用以對付示威表達活動；只要是三人或以上的聚集，無論事前組織或臨時湊合，都可以適用。港府一直不肯廢除此惡法，是因對付異見和社運人士時，若安插不到襲警、阻差辦公等罪名，罪行元素廣闊而含糊的「非法集結」罪，就成為方便的控罪選擇。

例如2007年底，梁國雄等人在時任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的寓所外示威，事後被控非法集結罪；2009年聖誕節，包括立法會議員李卓人及梁國雄在內的5名支聯會常委，以及四五行動成員占思堯等6人，於中聯辦示威，事後被控非法集結罪。

實例

近年政府為了突出社運人士的所謂「激進」形像，多了拘捕那些「搞事」分子，營造他們「不理性」的形象，企圖抹黑他們的爭取手段為「過激」，引發了很多政治打壓實例。在鄧竟成任警務處長的4年內，總

共拘捕過105名參與過示威的市民，當中19人在中聯辦門外示威被捕，部份更被警方以《侵害人身條例》控告（連臭名昭彰的Amina也沒此對待）。而中聯辦門外一段行人路，更突然劃出大量空間作大型花圃，大幅壓縮了行人和示威空間。可見香港的法治被行政部門企圖利用和干預，令人擔憂香港走向有法律但無法治的境地（內地的情況正是有法律而無法治）。

近年出現警權過大的指控。作為除暴安良的警隊，警權沒有過大，關鍵問題是有否少數分子濫權、有沒有惡化的迹象。多番對鳳姐和示威者等弱勢人士無故剝光豬搜身、多次被批評以調查之名吃鳳姐霸王餐、警署強姦案、設人肉路障去堵截非法賽車，罔顧市民生命安全等，都成為輿論話柄。

維持社會秩序乃警員之責，而香港警察一向給予市民信心，表現稱職。而對於警員常被投訴在處理示威分子、執行清場命令時濫用武力，筆者也寄予同情，亦相信警員有足夠的專業去判斷使用何等手法清場，以及認同前線警員是友善、克制的。但個別事件，一些更可能牽涉高層人員下一些帶有政治意味的命令，難免使人擔憂。

2010年元旦，有警員突然從後施展插眼技術，阻礙青台記者拍攝元旦大遊行的情況，令該記者眼睛受傷。

2010年1月初，反高鐵集會舉行前，有警員深夜到訪陳巧文家，還暗示陳的父母不要參加反高鐵集會。

2010年5月，政府兩次沒收民主女神像，包括巧立名目地派食環署人員，以所謂未有領公眾娛樂場所牌照為由，在時代廣場的公共空間沒收擺放中的民主女神像。可笑的是，那不是甚麼娛樂活動，而公共空間也非娛樂場所。政府是以法律去嘗試解決政治問題，作政治檢控，扭曲法律本身的原意和角色。

事後被傳媒發現原來政府一早部署要沒收民主女神像，在民主女神像未到達時代廣場時，已派定食環署人員恭候，而非政府官方版本那樣，說現場有人投訴才叫食環署人員到場執法。事後當時有份參與沒收女神像的一班食環署人員，寫了一封給天安門母親的公開信，踢爆政府的預謀和表達良心不好過。

2010年7月，有旅遊巴司機被警員掌摑，反被誣告襲警，而導遊小姐欲做證人去證明司機是無辜，反被警員警告要「小心啲」。此事幸得日本遊客作證，司機才沒事，但卻令香港蒙羞。而警員更被市民戲稱正在「公安化」。

同月，有線電視報道少女懷疑被偷拍事件，列出警方和房屋署就屋邨錄影的不同說法。但隨即警方在下午透過政府新聞處發表聲明，不點名批評有線新聞，選擇性採用警方提供的資料作報道，歪曲事實。警方以高調手法，阻嚇傳媒監察警方工作，有違專業隊伍的中立性，也高調介入傳媒的新聞自主。

2010年9月，康文署以政治敏感為由拒絕供出場地予天主教正義和

平委員會，舉辦為內地宗教自由的祈禱活動，政治審查味濃。而康文署署長更被踢爆以謊言掩飾政治審查，包括虛報誇大申辦機構的申報人數，並以人太多為由作拒絕。

2010年9月27日，早前就政改方案在立法會議事廳向高官抗議的蘇兆康，被警方事隔4個月後秋後算賬，以擾亂議會秩序、違反《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為由，上門將他拘捕。

2010年10月，約30名網民到中聯辦外開香檳為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而慶祝，其中一名青年在中聯辦外開香檳時，一抹香檳白泡，沾濕了閘前的中聯辦保安員，被警方以「普通襲擊」罪即場拘捕。此事頓時成為國際新聞，淪為國際笑話。

近年多了港人無故地不准入境澳門，除了一些社運常客外，令人意外的是連中性法律學者陳文敏、《明報》記者、普通社工和大學生也曾被拒入境，比入境內地的黑名單嚴格很多，有傳澳門入境處的名單乃港府提供或協助，才能如此「神通廣大」。而保安局每次皆以不評論個別事件作回應，沒去據理力爭，沒做好保障市民基本權利(出入境自由)的工作。

從以上事例可充分見到政府如何用行政部門打壓異己，怪不得香港市民不支持政府廿三條立法。香港人不是真的反對廿三條，而是廿三條由民選政府還是專制政府推出來是有天壤之別的。民選政府會為人民負責，保障人民和國家，專制政府是為政權負責，保護執政黨可千秋萬

世，廿三條隨時變成打壓反對聲音的工具。現在未有廿三條已如此，政府又怎給市民信心，廿三條立法後，情況會有改善？

法律面前，窮人含X

轟動全港的Amina案，除了該位奇女子的囂張跋扈惡態令人不忍卒睹，一句「I am rich, I don't care, I want to leave」（我有錢，我唔理，我要走），顯示其恃勢凌人，以為「有錢大晒」，連法治也可目空。當大家都以為Amina必入獄無疑時，裁決卻只判她接受感化、停牌一年和罰款8,000元。而律政司令人費解地不選擇以較嚴重的《侵害人身條例36B》（最高監禁兩年，不可緩刑）去告Amina，而只用《警隊通例63條》（最高監禁半年，罰5,000元，可緩刑），以及罪名較輕的「不小心駕駛」而非「危險駕駛」去告，令市民質疑是否因她是權貴之後而二次觸犯同類罪行也不需入獄？此事除了觸發警方不滿，也引起數百市民遊行抗議，高舉司法受破壞的橫額。

筆者相信法官的判決是獨立公正，不會因Amina是權貴之後而厚待她，也因引用的條例較輕，難重判她，但律政司的檢控值得商榷。遊行示威人士，往往被告以較嚴重的《侵害人身條例36B》，是否因為他們不是權貴之後便沒有庇護？律政司實有選擇性檢控之嫌。Amina只需繳交8,000元罰款，而不用入獄，是否表明「有錢大晒」？是否變相鼓勵人，只要付得起罰款，便可掌摑警務人員？法官的判詞內，其中一輕判原因

是被告背景良好，這難免令人質疑是否家境富裕就是家庭背景良好，犯了法也可被厚待？另外高學歷便可輕判，是否認為高學歷便等於人格高尚，文盲和小學程度便等於品格低？高學歷成為護身符也是極不合理的。

另外警方主動撤銷Amina在警署襲擊女警員一罪，事前並沒諮詢律政司意見，更是莫名奇妙。警方稱過往不少案件於檢控前，也少先諮詢律政司意見，反映甚麼案件或時候應該先諮詢律政司意見，甚麼時候或案件不用，根本沒有一套統一的機制做參考。今次事件警方也難說服市民，為何在不諮詢的情況下便主動放棄檢控Amina犯下最嚴重的法例。種種疑慮確令人擔憂。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一些人比別的人更平等，那就是有錢人。前運動美女健將陳學殷勒索富商X一案，法庭要保密富商X身份，誰人透露他的身份或聲稱自己猜得出誰是富商X而又估中的話，便犯上藐視法庭罪。當年字母女星被騙色案，出庭時亦有屏風護身。為何很多同類案件，原告人的身份從不用保密，但富商X和字母女星卻需要？律政司的理由是依據《檢控政策及常規》條文，在衡量公眾利益下，會判斷原告人的身份能否公開。在富商X案件中，其身份地位就成為了保密原因，即他家境富有，便會被保密保護，怪不得很多普通市民在同類情況下，身份也不會被保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對有錢人更平等。

同一時間，香港每年有多宗強姦、非禮案件，受害人上庭時沒有屏

風作遮護，要在眾目睽睽、被人評頭論足下作供，猶如第二次被侵犯。為何香港法律不去保障受害平民的私隱呢？為何名人和有錢人會有着較公平的待遇？(註)

政府保護一國兩制不力

政府保護一國兩制不力，對香港的自治狀況有負面影響。魯平於90年代表示：「普選時，立法會所有議席都由直選產生。」人大常委會據《基本法》規定，在政改問題上的角色是備案角色，政改內容全由特區政府負責，因此廠商會和民主黨繞過特區政府，直接和北京商討政改和功能組別存廢問題，是破壞一國兩制，但政府從沒就事件發出聲明或譴責，卻把政改主導權交給西環，證明特區政府無心維護一國兩制和香港自治地位。

其實當前很多關於香港民主進程的爭拗都是不必要的，爭拗如此激烈，激烈得令香港出現內耗，與有關當局違反當年承諾有關。不論中英談判時期的7封外交函件，或是前港澳辦主任姬鵬飛的公開講話中表明，普選是香港的內政問題，北京不會干預。1988年焚燒《基本法》事件，促令中央政府把可以雙普選的日子由2011年提前到2007、2008年，且還列入《基本法》的附件一及二裏面，所以香港才會出現要求07/08雙普選的言論。可是2004年人大釋法，一錘定音表明07/08不能雙普選，單方面直接關了07/08雙普選的門。雖可停止一時的爭拗，令人們對

07/08雙普選死心，但卻違反當年的承諾，失去爭取普選快些降臨的一方信任，為日後關係破裂埋下伏線，也注定民主步伐的爭拗繼續延長。

香港政府為了保留功能組別，也不惜出賣誠信。不論是1999年或2006年，政府提交給聯合國的報告，也表明功能組別只是過渡性安排，不是永久的，因功能組別在1995和2006年先後被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批評是違反公民權利原則和歧視收入較低的市民。可是到今時今日，政府還不肯承諾取消功能組別，還為永久保存功能組別留下尾巴，辯稱功能組別保留也可以符合普選。

在國內，法為黨用，司法要體現中共的意志和保護中共的利益為首要。「阿爺」為了拖慢本港民主進程，以免國內出現骨牌效應，影響中共一黨專政的地位，不惜破壞法治。2010年突然提出實現民主的五部曲，為實現真普選多加五重關卡，但數年前只是三部曲，將來又可能突然設立甚麼七部、九部曲，視法治為無物。就如民主黨在2010年政改一役，提出超級區議員方案，初時被不少政客及法律學者，如梁愛詩、胡漢清等批評，甚至指摘是違法，但在中央接納民主黨方案後，一干人等即時改變立場，轉變口供，轉為支持民主黨方案或表示該方案合法，前言不對後語。可見法治在部份建制人士心中，是可任意詮釋，沒利的便違法，但到有利時卻變成合法，猶如火鳳凰在皇恩浩蕩下重生。

隨此之外，北京竟又公開表示香港的普選、民主不需要跟隨國際公約的民主定義，意即即使香港實行普選，也未必是真正的民主。香港的

人權條約、保護人權自由的法例也是跟隨國際公約的，萬一有一天，北京宣佈香港的《人權法》、保護自由法例不用跟隨國際公約，那麼後果是難以估計。中國作為聯合國的一員，是有責任跟隨國際公約，並不能任意改變。

應該公正不阿的選舉事務處，也被政府利用作政治工具，破壞其公信力。2004年立法會選舉要增加6席直選議席，按人口比例九龍將加一席。九龍分別有九龍東和九龍西兩個大選區，本來兩區同為4席。當時不論人口或選民登記數量，九龍東也比九龍西多，選民登記數量方面更是九龍東比九龍西多10萬人，可是選舉事務處最後加九龍西一席，而九龍東不變，完全不合常理。要不是官員眼花，就是因為參考以往投票走勢，如果九龍東加一席，很大機會落入泛民手中，但九龍西加一席，則是建制派機會最大。在一加一減下，政府反常理的加九龍西一席，這不是用公信力去換取建制派大有可能贏多一席的機會嗎？最後政府如意算盤打響，在九龍西得19,000多票，親建制的梁美芬得到九龍西的最後一席，而九龍東、泛民陣營社民連的陶君行，得28,000多票也要飲恨。

2008年，香港中聯辦研究部部長曹二寶指香港有兩支隊伍，一支是港府，另一支是中央和內地從事香港工作的幹部隊伍。雖未能證實真偽，但空穴來風，未必無因，且建制黨派和人大政協不是「北大人」任命就是受其援助，是直接聽命於「北大人」而非港府，所以有兩支隊伍絕不出奇。這說明港府雖由「北大人」委任，但必須自動自覺聽話，否

則隨時要腳痛下台還被代替，顯示一國大於兩制。因此很多時港府也要逢迎上意，即使不是直接收到命令也好。2008年9月，一名內地異見分子在沒經過任何法律程序下便被遣返，嚴重不合法治程序和違反《人權法》，但政府一直拒絕交代事件。這表示雖然一國兩制的框架讓港府除外交與軍事外享有自主，但實際必須揣摩上意，官員們才有運行，並非百分百放權。

行政帶頭藐視司法

特首曾蔭權在2011年5月立法會答問大會上公然批評有政黨「濫用司法覆核去阻礙港珠澳大橋工程」的言論，充分反映特首對司法的不尊重。特首說的是有位公民黨義工朱婆婆，申請司法覆核港珠澳大橋的環保評估工作，最後法院判決婆婆勝訴，政府需就工程再進行更深入的環保評估，這樣會令工程有機會被拖慢和使成本上升。

何謂濫用？無道理地使用便叫濫用。朱婆婆的司法覆核是經過法院批准，如果是無理濫用，法院不會批准。而批准後如果行政機關認為是濫用司法程序，可要求法院駁回司法覆核申請，但最後沒有出現此情況，證明絕非濫用。而法院判朱婆婆勝訴，說明行政方便不能凌駕司法，但特首老羞成怒的責罵，分明是認為行政方便應在司法上，不尊重司法。身為特首不尊重司法，是破壞司法地位。當時政府正在上訴，特首在此期間有此公開言論，不多不少是向司法施壓吧！幸而律師公會和

大律師公會也發表聲明譴責特首言論，力圖保住司法超然地位。

教育局局長孫明揚在同月被雜誌踢爆於跑馬地的住所有僭建房間。他在1994年買入單位的時候已有僭建，但在2006年，他還是房屋與規劃局局長時，收到屬他管轄的屋宇署發出書面警告，要求他在兩個月內清拆僭建物。可是身為局長的他竟漠視政府法令，兩個月後仍不清拆，更被屋宇署將物業釘契。釘契後也一直沒有清拆，至今已有5年，乃一錯再錯。

事件被揭發後，孫局長始承認事實，但沒即時道歉，到翌日被部份傳媒和市民筆伐口誅後才公開道歉，且不接受任何提問，其誠意已大打折扣，只是馬虎敷衍市民而已。這事件最大問題不是物業有僭建物，而是他身為房屋部門的掌舵人，不但知法犯法，還無視法紀，鄙視政府機構執法。身為問責高官無視法紀，破壞政府官員名聲，就此已應引咎下台。可是曾蔭權政府還在重用這位漠視法紀、操守有嚴重缺失的人當問責官，乃視行政高於司法，不尊重司法。那麼我們怎能寄望政府保護司法呢？

任意褫奪人民權利

香港雖未有真正民主，但香港人還是有權利在選舉中投票。政府常標榜政制向前走、政制循序漸進，可是在2010年冷不提防的被五區變相公投曝露了香港還沒有公投法的缺憾。政府在一年後企圖以荒謬的遞補

機制取代過往議員有出缺便要進行補選的慣例，顯示人民的權利在政府心中是可以為了統治方便而任意抹殺的。議席不管是議員以何種原因，請辭或是身體狀況不容許再擔任職位而出現空缺，進行補選讓選民按最新情況去表達意向是合理合情，且同時保障選民意願和權利不受損，不論是落敗者替補或是同名單替補（其實也是落敗者，因為名單較後的候選人是不夠票和認同性去當議員）都是褫奪了選民就最新情況發表意向的權利，是政制倒退的做法，乃不合常理，根本不用多談。

政府由一開始不肯諮詢，到後來的假諮詢（有了既定立場才諮詢，不是勞民傷財的假諮詢麼！），曝露了政府視民意如浮雲，為了令「阿爺」高興，民意也可犧牲。一個無視民意民權的政府，又怎會有心去維護法治以保障人民？

遞補機制還曝露了兩件事。一是到了二十一世紀竟還有宦官亂政之局，無甚功績的林公公竟可長期受重用，政府因其回答提問的態度和容貌予人面目可憎之感而大失民心。相由心生，小人自出小人相，品格卑鄙之人在一朝得志時表露出鼠魁之容，實屬正常；反常的是特首任用此等只懂埋沒良知去討好主公的奴才，拖累整個統治班子。第二件曝露的是筆者在眾多議員中唯一真正討厭的一位終於露出洋相。她便是以法律學者自居但卻毫無學者風骨、多番以謬論去為極權惡行護航（包括為中共囚禁劉曉波辯護）、為了表露忠誠而漠視法紀（帶頭不肯騰出街板給五區補選候選人）的鼠王芬，真大快人心！

官僚主義滲透法治

請勿以為政府的官僚態度只會影響民生、政治和經濟這些範疇，即使法治也不能幸免。

隨着科技日新月異，發展一日千里，偷拍技術也突飛猛進，千變萬化，偷拍事情每日皆有，令人困擾。可是按現時法例，私人地方內進行偷拍，只要是業主本身或徵得業主同意，便不屬違法，令受害人一籌莫展。更荒誕不經的是如果用長距離裝備進行偷拍的行為，更缺乏私隱法例保護受害者。不少法律界人士和法改會的報告在過去一段日子，不斷建議引入侵犯私隱的民事侵權行為，甚至列為刑事，但政府總是充耳不聞，抱着少改少錯的官僚心態，愛理不理，令市民的保障不足，也損害香港的法治。

《藐視法庭條例》在1987年始，已被批評為過時，當年法律改革委員會建議修訂條例中的過時內容，但直到今天，律政司也未修訂，效率之慢蔚為奇觀。

訪問

受訪者：李柱銘（資深大律師、民主黨創黨主席、前立法會議員）

筆：你怎看香港現時的法治？回歸後先後發生三次人大釋法，對香港的司法有否影響？

李：到目前為止，香港的司法還是好的，但當然不願見到釋法，因這對法治帶來大創傷，尤其是第一次釋法。因第一次釋法是在終審庭已完成終審之後，使到終審不是終審。那次釋法是因內地五大護法對終審庭的裁決不滿，特首董建華主動邀請人大釋法，破壞了終審庭的角色。

筆：但你對香港法治的前景，有沒有感到隱憂？

李：首先，內地近期多了聲音公開給法官壓力，例如要求三權合作，而非三權分立。但如果法官在司法覆核時要和行政合作，那不是要判市民輸嗎？萬一法官企得不硬，便出問題。新加坡的司法覆核總是政府獲勝，證明其法治獨立性很低，香港為何要學新加坡呢？

此外，委任法官的組織是由特首委任、中央肯定。如果中央和特首故意只放聽話的人做法官，那麼法治很快便玩完。幸好的是，目前還沒發生此情況。但值得一提的是現在多了法官接受內地官方邀請去遊山玩水，怎不會令人聯想起受人恩惠，替人消災的事情呢？香港的法治要靠法官企硬，雖目前仍做得很好，但還是有令人擔心的地方，因單靠法官企硬是挺難的，加上立法會又不民主、行政又常給司法壓力，司法能否企硬是有隱憂的。

筆：民主對香港的法治有何重要性？

李：在民主下，政府需直接向市民問責，會企硬在市民一邊，不會容易受中央擺佈。但現在欠缺民主，政府的實權和政策，很多時受中央擺佈。表面上，除了軍事和外交，其他範疇的決策都是由特區政府作主

人翁，可是私底下，中央對政府決策有很大的影響。例如董建華腳痛下台，是沒跟《基本法》程序，是中央在背後推動，但難道以後有民主選舉，選出的特首不聽北京話，中央又運用私底下的影響力，不跟《基本法》的要特首下台？又例如政改更是中央指導曾蔭權怎去做！

中聯辦常私底下影響特區施政，且越來越密，根本是京人治港而非港人治港。中央干預特區施政越來越多，是不遵守《聯合聲明》。一國兩制是需要民主機制去確保的，特首在沒民主下，哪敢不聽中央話，哪敢說聲「不」？因不聽話的隨時會被撤換，而立法會內，因結構使然，聽北京話的是大多數，他們受上面的人力物力支持才有成就，怎敢對中央不聽話？

一國兩制只差一件東西就可成功的實行，那就是民主。民主雖不是靈丹妙藥，但沒有民主，市民不能話事。但市民不能當家作主，又怎高度自治？

法治和民主是分不開的，因法律可為保障人權的法律，也可為剝削人權的法律。如馬來西亞和新加坡便有很多剝削人權的法律。只有真正民主選出的政府，才不會提出剝削自由的惡法。香港還有惡法和當年政府提出限制言論、出版、宗教自由的廿三條，便是因政府在沒民主下，提出剝削自由的惡法。

筆：對於不少案件，如胡仙案、謝霆鋒案、Amina案等，被認為是司法不公，你有何看法？

李：香港的司法系統是良好的，窮人有法援，一定有律師幫助。有

錢人的着數只是可聘用最好的大律師幫他們而已。法治制度上的保障，其實不存在對有錢人偏幫，加上有上訴機制，謝霆鋒案、Amina案是合符司法程序和機制，如果判決真是太輕，在機制上，律政司可提出上訴。

只有胡仙案是的確偏向了大富豪。因那件案，當時的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只告胡仙的三名助手，卻不告胡仙，理由是星島集團有眾多僱員，怕告老闆會使很多人失業。那麼如果是李嘉誠、李兆基等大富豪犯法，他們聘請了那麼多人，是否也不用告？

*　　*　　*

受訪者：陳文敏（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院長、資深大律師）

筆：近幾年法院判決被質疑偏袒富人的事件日多，是否代表香港的司法正在走下坡？

陳：不能用走下坡來解釋。社會一定有具爭議性事情出現，是健康現象。例如Amina案，是檢控機關一開始已提出輕的控罪，法院只是按法裁決。整體政府運作有偏幫富有人士，但法院沒有。

筆：近期政治打壓事件非常普遍，警權甚至被批評為過大，市民自由保障被批評為不足，你怎看？

陳：這值得檢討，警民衝突近年是多了。但這雙方都有責任。一邊示威者有挑戰性行為，有過火行為，而法例是保障和平示威，警方有責任保障示威和平進行。但警方有時可能是過了火，而在檢控方面，用哪條條例需要有明確指引。

警權是有很大克制，法制上有限制，但個別情況，警方運用權力受

人質疑，是行使權力的問題，不屬於警權過大。在可以方便和寬鬆時，警方不需要太敏感。例如數十人示威，用百多名警察去守，有點誇張。

保障人權方面有要改進的地方，但香港在世界上，相對其他國家，法制是相對完善的，有專業警隊，社會上少有刻意侵犯人權行為。

筆：法治對弱勢的保障是否足夠？強拍條例降至八成、司法覆核隨時賠堂費、令人卻步、沒有集體訴訟法等，對弱勢的照顧足夠嗎？

陳：無可否認富有人士是較着數的，因他們較有資源。但法院不會偏袒有錢人。至於弱勢，有法律援助，且法律援助沒上限。當然，不受法律援助保障的夾心階層最慘。

筆：現在民間和政府多了在法院解決政治爭拗，如將軍澳堆田區擴建事件、居港權爭拗、功能組別存廢等，這是否健康的現象？

陳：法院是處理法律問題，而不是處理政治問題。行政和立法對立中的不少事件，都搬上了法庭，但這些問題應是由行政和立法機關去解決，例如變性人婚姻問題應是行政、立法機關去解決。

筆：香港司法對自治保障足夠嗎？是否真的是港人治港？曹二寶口中的兩個管治隊伍是否存在？

陳：從政治發展方面看，香港的步伐是緩慢，這基於中央的箝制。但懷疑是否有兩個管治團隊，則有點過敏，中央也未必想有此情況出現。香港人可能對駐港機構的工作理解不足，也可能駐港機構與港人溝通不足，使雙方互信不夠。

筆：香港的權力分立運行良好嗎？還是有三權合作趨勢？因中方近

期多次強調三權合作。

陳：行政、立法在彭定康時代真正分開過，但會使行政議案難通過，使行政立法多衝突，之前殖民地的立法局是受政府控制，使立法機關難發揮監察作用。要解決問題，要行政立法真的分開而又不會容易出現衝突，只有走民主路和政黨化才能。司法則相對獨立，也是香港賴以成功之道。行政影響不了司法，司法自主性強，清廉。

筆：你又怎看人大釋法？

陳：釋法問題是制度問題，涉及一國兩制的界線怎界定。但有時人們會賦予太多政治色彩看之。人大釋法令人們反應強烈，是因用行政機關人大議會去解釋法例，而不是法院去解釋法例，這是司法上難接受的。國內是容許人大釋法，行三權合作而非分立，釋法問題是兩種政體

不同制度之間的衝突。人大釋法在國內是有根據的，但香港制度難理解而已。基本上人大釋法是一國兩制，兩制間的衝突，需時間磨合。

筆：本地司法對內地有何含義？

陳：香港司法對內地司法有象徵意義。司法是香港成功的基本之一，可為內地起示範作用，又可為內地司法人員提供培訓。而內地經濟發展、法治也需改善，香港有着啟示作用。

*　　*　　*

受訪者：羅沃啟（香港人權監察總幹事）

筆：人權、自由對香港有何重要性？香港對人權、自由的保障又如何？

羅：人權、自由是對生活質素的追求，重視言論空間、公民權利、選擇空間，有了這些因素，社區才有足夠的發展空間。

相對於很多地方，香港有良好的法律，對人權有保障。但隨着不同時期，香港對人權自由的保障有起有伏。回歸初期的臨立會，對很多回歸前訂立保障人權的條文並不採用，如一些社團條例、個人私隱條例；而且還把一些公安惡法還原，警察權力從公眾秩序擴展到國家安全，存在了很多灰色地帶。回歸後要廢除殖民地時代訂立的《人權法》，是因中央怕《人權法》會改變社會的性質，使《人權法》成為反共根基。殖民地時代訂立的《人權法》是「六四」後因應國際公約而提供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力的保護。那些《人權法》訂立後，香港的立法機關不可立一些牴觸公民權利的法例。一些《人權法》在回歸後被廢除，使《普通法》根深

蒂固，的確對人權保障有威脅。

在2000年時，國際對香港人權保障的注意少了，加上人大釋法對香港司法制度帶來極大衝擊，香港的法體、法庭受中央干預，乃以法治人，以法治來輔助行政，是不尊重法治。從那時起，人權保障出現窒息感。去到2003年時，情況更差。政府一意孤行，廿三條的推動，無論是法律上的條文、推銷的手法、程序的安排，充分反映政府不重視市民的權利。

筆：那麼廿三條被擱置，香港的人權保障是否又恢復了些？廿三條的出現是否偶然的？政府對人權保障的思維又是怎樣？

羅：廿三條被擱置後，政府不太敢逆民眾，加上商界希望穩定，中央態度又有改變，對民間聲音理會多了，人權保障程度的確提高了。但中央還是斯大林式的專權政府，法治只被視為國家機器的一部份。至於香港政府，從居港權案，顯示政府對窮人的權利不重視，還以誇大來港人士數目的虛假資料來抹黑弱勢社群，煽動市民對新來港人士的敵視。政府的管治是欠缺公平思維，因政府是精英心態，看不起弱勢；長官意志凌駕一切，市民聲音常被漠視。因此政府不會主動去保障弱勢。

筆：曾蔭權上台後，政治打壓事件多了，很多政治部門也被利用為政治打壓工具，這究竟反映了甚麼？

羅：曾蔭權的管治思維也是精英心態，實行親疏有別，較看不起弱勢和異見，所以充滿對異見的打壓行為。而自從被中央視為激進的民主派抬頭，中央和部份民主派決裂了，要壓制激進民主派。曾蔭權為討好

中央、要好好服務中央或可能是中央授意，因其政治權力來自中央，便透過加強政治打壓來打擊激進民主派。

筆：政府為了進行政治打壓，不惜濫用行政部門配合，這對香港體制有甚麼破壞？

羅：2010年利用食環署來強搶民主女神像事件，可見政府的打壓是有預謀的。為了打壓，竟荒謬地把悼念活動扭曲為娛樂活動，甚至賠上行政部門的公信力。中聯辦門口的香檳事件，用普通襲擊罪去拘捕開香檳的示威者，不但沒有法律基礎，還把法律定義利用作政治目的，賠上法治聲譽，香港法治因此事而成為國際笑話。而政府用上警隊作為政治工具，警隊的政治中立原則慘被打破，令警隊權威性低落，為此，警務處處長有責任要負。部份港人無辜不能進入澳門的事情越來越多，反映政府對市民權利的保護有選擇性，不會去保護異見者的人權。這使香港的政治體制成為以法治人的體制，逐步「大陸化」，同時也在破壞香港的司法精神。

註釋：

可參看2011年3月18日，《蘋果日報》港聞「被強姦還要自揭傷疤」。

後記

愛

教我如何不流淚

由於土地被壟斷，安家所需的普通住宅被包裝成金玉其外的豪宅，以泡沫價格賣給市民。

由於政府沒做好球證角色，很多同胞被無理剝削，引致很多人間悲劇。

在街上我們經常可看到一些老年人，無依無靠地彎着腰手腳顫抖地拾紙皮、在寒風炎夏拾垃圾維生，還要被一些無良權貴嘲笑為年輕時不努力、活該；亦嘗聞唐樓小住戶被收樓商用盡手法逼遷。

在觀塘，一位年約70歲的長者，背部彎得不能伸直，全身最高點竟是腰部，但每天還要推着垃圾車收集紙皮，紙皮如跌在地上，要靠難以發力的腰去支撐身體拾回；在粉嶺軍地一帶，每天也有一位瘦骨嶙峋的老婆婆在公路上推着紙皮車，冒着被車死之險去收紙皮，大腿只約我們的手臂那麼粗；在大圍，不論日曬雨淋，每天總有一位背部彎曲、白髮如潮的老婆婆推着紅白藍膠袋，在天橋底賣着生果菜乾去維生；大角咀海興大廈的200多戶住戶，自從兩年前有收樓商進行收樓，小業主不斷受滋擾，電線多次被剪斷，大廈梯間與門外遭淋屎淋尿，同區發生3次不明火災，而

被收的單位一直不交管理費，令大廈無錢應付日常開支；住在通州街208號一間板間房的75歲老伯，因所住樓宇面對收樓、無清潔公司收垃圾，大廈充滿惡臭，單位外的電線兩次被人無故剪斷，老伯因找不到租金相約的單位，老年面對被逼遷；住在南昌街的一位巴籍女士，沒錢搬遷，住的大廈面對收樓，令大廈日久失修，大廳的天花也破爛了，炒菜常有石屎件碟，走廊長期沒電，每天要天黑前回家；類似情況，全港每區多如恆河之沙……

看這些cases，我們可能會感到他們絕望的哀號、悲痛的呼叫，彷彿已陷入了死亡，但我還能感受到他們的鬥志！一股要生存、要尊嚴、要爭取的鬥志！

世上不只有強權，還有公理！所以我們一定要據理力爭，不能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去看待不公義之事情，即使事件沒有損害自己的切身利益也好。因為香港乃吾家，Hong Kong is ours，不容不公義之手破壞我們的家。

文化人陳景輝於文章《非關激進：談政黨政治冷與熱》談到：「精神分析學告訴人們，憤怒意味着：某個人認為重要的秩序受到侵犯。」

我們必須憤怒地去警告和阻止破壞秩序、破壞社會應有的核心價值的人去繼續進行破壞、侵害市民。之後，大家齊心協力用愛去重建被破壞了的秩序，去關懷和幫助被侵害、被侵犯的人。愛和憤怒是相輔相成，前提是出於理性，出於正義，出於良心的憤怒。

大家一起用愛站起來

現在香港處身於一個欠缺公平競爭的環境，社會資源因種種理由被大財團壟斷着。這和香港人信奉「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的信念不同。我們必須站起來，去維護我們的信念，去追求公平公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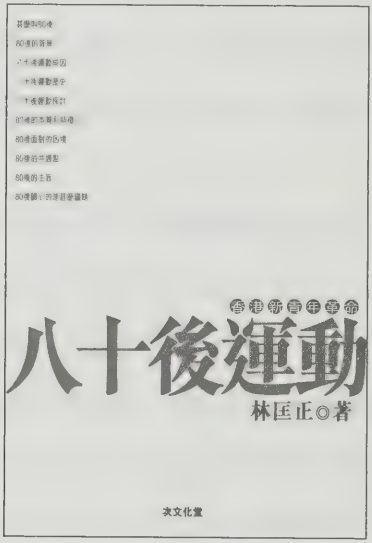
上天、政府可能沒給予我們一個理想國度、一個理想的社會，但我們可憑着自己雙手去創造出一個理想社會給自己和下一代，讓大家一起快樂幸福的成長。

當遇上批評，有人總會晦氣地表示：「咁叻你去做啦！」作為一個評論員，我的「叻」是在於發掘社會的不平事和評論從政者的表現，這乃我的責任，然後用筆寫出自己的意見、自己的內心想法，寫自己所相信的事，因為我所寫、我枝筆，是反映着自己的人格。而政府的責任是看到批評和意見後，想盡辦法，盡快改善漏弊。這也是筆者著寫此書的原因。

有心唔怕遲，趁情況還未惡化至不可收拾的地步，亡羊補牢，雖已晚也，但不能再拖。寄望拙作能引起大家共鳴，反思香港應該是怎麼模樣的，一起去創建一個美麗的家。

補購

林匡正◎作品



《八十後運動》

補購表格（愛護書本，請用影印）

本人現購買　《八十後運動》　_____ 本（每本港幣64元）（連郵費）

姓名：_____

地址：（只接受本港地區）_____

_____

請連同劃線支票

寄香港九龍彌敦道612號好望角大廈1009室　**次文化堂**　訂購部收

支票抬頭：**次文化有限公司**

補購

香港觀察

《九評地產黨》
陳雲◎編

《大仇富》
全港市民◎著

補購表格（愛護書本，請用影印）

本人現購買 《九評地產黨》 _____ 本（每本港幣86元）（連郵費）
《大仇富》 _____ 本（每本港幣78元）（連郵費）

姓名：_____

地址：（只接受本港地區）_____

_____

請連同劃線支票
寄香港九龍彌敦道612號好望角大廈1009室 **次文化堂** 訂購部收
支票抬頭：**次文化有限公司**

次文化堂

讀者服務卡

✣謝謝您購買次文化堂的書，請您詳細填寫本卡各欄寄回給我們，以便我們有為您服務的機會。

您購買的書名：香港大崩壞

購買地點：..... **區**..... **書店**

您習慣以何種方式購書？

□①逛書店 □②郵購 □③電話訂購 □④傳真訂購

□⑤團體訂購 □⑥銷售人員推薦 □⑦其他_____

您從哪裏得知本書消息？

□①逛書店 □②報紙廣告 □③親友介紹 □④圖書館

□⑤廣播節目 □⑥書刊 □⑦書評推薦 □⑧其他_____

姓名：_____ **年齡：**_____

性別：□ 男 □ 女 **婚姻：**□ 已婚 □ 單身

地址：_____

職業：_____

教育程度：□①小學 □②中學 □③大專或以上

您對本書的意見：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可另紙書寫）**

地址：九龍彌敦道612號好望角大廈1009室

次文化堂編輯室收

＊凡來信者，可獲本社禮品答謝（請附回郵信封）。

＊請勿撕毀此書，煩用影印本寄來。

次文化堂

次文化堂

香港觀察

《九評地產黨》

《大仇富》

這本書，是我的珍藏

藏書人：

收藏日期：

寫在歷史終結前

太平山下敗象全紀錄

鄭宇碩：以前是「大款傍高官」，現在則是「高官傍大款」。

馬國明：因政府和大商家是「自己友」，故此誰做特首也沒分別。

勞永樂：政府醫療政策和其他政策一樣，太以經濟為主導，明益大企業。

陸恭蕙：政府處理環保是用公務員思維，只懂從錢出發，只懂洗錢去解決問題。

張超雄：政府的社福政策是因應政治需要利用政策去擺平民憤，而不是按社區需要而去做政策。

黎則奮：當內地法治良好，不需要再用香港為人民幣試點，香港的金融優勢便頓失，那時便會 game over。

程翔：回歸後，北京只需要令他放心的人，越無政治才能越好，越無獨立思考越好，越聽話越好。

成名：香港的政體是半民主政體，容易導致不穩的政體。因而容易出現意圖改變政制的運動。

李柱銘：單靠法官企硬是挺難的，加上立法會又不民主，行政又常給司法壓力，司法能否企硬是有隱憂的。

ISBN 978-962992277-1
11800
9 789629 922771
www.subculture.com.hk

次文化
現象文化
時代見証

SCB 554 $118
ISBN : 978-962-992-277-1
Printed in Hong Kong

封面設計：原秋白　插圖：Andy@Chum